第一部分

拉丁美洲的
殖民时代遗产



《宏伟的城市特诺奇蒂特兰》(局部),1945年,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绘。国家宫,墨西哥城,墨西哥。(© *Banco de Mexico Trust. Schalkwijk/Art Resource, NY*)。

对大多数北美洲人来说,或许殖民地的过往遥远且风景如画,它和 3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关系。但是,拉丁美洲的情形迥然不同。历史学家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说:"即便那些到拉丁美洲随意观光的人,也被那些遗留下来的显著殖民制度和特征所震惊。"殖民遗留物的名单中包括许多日常生活的一些约定和做法、土地使用和劳动制度以及众多社会关系和态度。

拉丁美洲这个舞台的特点是殖民和现代元素的共生和混合:挖掘棒、脚犁和手摇纺织机与拖拉机、输送带和电脑共存。在拉丁美洲,殖民的过去并非令人怀念,而是令人不舒服的现实。它意味着经济倒退、政治专横、腐败和裙带关系;阶层分明的社会秩序以及精英的高傲和对平民的蔑视态度。

我们对拉丁美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考察从对古代美洲的一些说明开始。在古代美洲这个名称所指的那一段很长的时期,美洲土著发展出了事实上独立于旧世界的自身文化。这一过去深刻地影响了殖民时代的特征。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主要中心出现在老的土著腹地——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的地区绝非偶然,那里是数百万勤勉的土著人的家乡,他们已经习惯了对他们的统治阶层奉献自己的劳动。西班牙人非常清

楚，这些土著是真正的东印度财富。土著人口少的地区在西班牙人的殖民计划中微不足道。

同样，殖民时期的决定性特征是西班牙背景。征服者是与穆斯林斗争了七个世纪的西班牙人，战争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战争也创造出了庞大的蔑视体力劳动的贵族(hidalgo)阶层。从某种意义上，如同西班牙编史者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所说的那样："对印第安人的征服是在结束对摩尔人[①]的征服后，西班牙人也许总是用战争反对异教徒。"西班牙经济落后且财富普遍不平均，这严重地限制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甚至限制了让大多数西班牙人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这也有助于解释西班牙征服者不顾一切的勇气以及他们在与印第安人打交道过程中的冷酷无情。有一点似乎也很重要，殖民者中的许多大首领，如科尔特斯(Cortés)、皮萨罗(Pizarro)、瓦尔迪维亚(Valdivia)和巴尔博亚(Balboa)都来自西班牙最穷的省——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贫瘠的土地上。

另一个也许能有助于解释征服者凶残掠夺这一特征的因素，即当代仍存在于西班牙的暴力风气，这显然是再征服及其社会状况和价值观的遗产。巴托洛梅·巴纳萨尔(Bartolomé Bennassar)在他的《西班牙人的性格：从16至19世纪的处世态度和心智状况》(*Spanish character: Attitudes and Mentaliti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提到，为了得到沾满鲜血的报酬——通常只是一小笔钱，而向谋杀社会地位卑微阶层的个人颁发特赦令，这一古老的赦免做法却使得暗杀行为激增。但承认这种制造暴力氛围的历史背景并不是说这应归因于西班牙人的残忍和暴虐。众所周知，殖民的、帝国主义的和国内的战争无论哪一种都充满着暴行和恐怖事件。实际

①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裔，公元8世纪成为伊斯兰教徒，侵略并统治西班牙，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安达卢西亚建立文明社会，现在主要居住于非洲西北部。——译者注

上，在那些历史上的殖民政权中，西班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造就了一小批人，在面对世界时谴责了他们自己国家人的罪行，并且尽其所能去阻止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所谓的“东印度的毁灭”。 5

自16世纪始，西班牙殖民档案的捍卫者已经用偏见和夸大其词指控拉斯·卡萨斯和其他原告，声称他们捏造了西班牙人残忍和暴虐的“黑色传奇”。事实上，每一种殖民力量都有自己的黑色传奇，那并不是传奇而是悲惨的现实。与西班牙征服的残暴相匹配的是种族灭绝的“印第安战争”，它是由美国的民族英雄如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和总统掀起的，他指挥销毁了大约800名克里克人的尸体，割掉鼻子计数并保存了死亡记录。菲律宾人在1899至1902年间由反抗美国的殖民主义而被屠杀镇压，他们以“水刑”逼供，并把市民囚禁在集中营。富兰克林·贝尔(J. Franklin Bell)将军参加了那次镇压，据估计，仅吕宋岛就有60万人被屠杀或死于因战争引起的疾病。

西班牙人在土著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殖民秩序。这一秩序有三个重要方面需要强调。第一，其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封建特征占主导地位。这一封建特征异常清晰地表达在西班牙人的“印第安人”政策中，政策规定印第安人世袭的奴隶阶层地位，他们必须以商品、现金和劳役交纳贡赋，还要和他们的欧洲主人从事不平等贸易。同样的封建原则也以独立的合法状态分配给欧洲人、卡斯达人(Castas，混血人种)和黑人，以规范每一类别人种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些封建特征和一些资本主义要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留给独立后的拉美的遗产，它们也可以解释今天在这些地区一些过时的制度仍然顽固存在的原因。

第二，殖民经济对外依赖于贵金属以及这些产品如糖、可可、烟草以及兽皮的出口，并逐渐融入17和18世纪在北欧兴起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西班牙在经济上逐渐提高了对北方资本主义的依存度，却无力阻止殖民财富和商品通过偷运、劫掠以及外国人接管西班牙商人房产的方式流向其竞争对手。在加入欧洲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封建殖

民经济也具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特征。因此，与欧洲的父权制相比较，奴隶制在加勒比海殖民地具有尤其残忍的特点，把"文明的过度工作的恐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嫁接到了奴隶制的野蛮的恐怖上"。

第三，西班牙的殖民秩序植根于王权与征服者及其后代间的冲突之中。王权害怕殖民地领主阶级的崛起，因此试图控制殖民者的野心；另一方面，王权在安全上又要依赖殖民者对付内外威胁，这使得王权要对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与这一背景相对照，为了控制土著劳动力和贡赋，西班牙王权和征服者及其后代之间发生着持续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非公开的。在这一斗争中，殖民者逐渐占了上风。

西班牙17世纪的衰落是因为权力平衡朝着有利于殖民者进行转移。拥有大量土地和劳力的世袭殖民贵族的出现代表了王权的失败和王权对土著群体利益作微弱维护的失败。当18世纪后期西班牙国王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从高级官员职位上排除克里奥尔人(creoles，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并进行有时会冲击克里奥尔人既得利益的制度改革时，已为时太晚。这些政策只是疏远了强势的殖民者精英，那些人已经开始感觉到国家的曙光并梦想着和外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的益处。

第一章　古代美洲

焦点问题：

- 古代美洲不同地区的环境如何影响文化发展？
- 形成时期、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什么？
- 玛雅社会如何组织？它在约公元900年崩溃的原因是什么？
- 阿兹特克社会如何组织？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如何治理其帝国？
- 印加社会如何组织？印加帝国与阿兹特克帝国相比如何？
- 什么是"性别平行"，古代美洲妇女的角色与欧洲妇女的角色相比如何？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占据美洲的是众多的印第安部落，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欧洲征服前和征服后的历史经验做仔细的考察，可以对洞察其内部和外部力量在塑造人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有趣的见解，这已被拉丁美洲当代土著权力活动家迅速地获悉。因为在欧洲人发现新世界以前至少1万年的时间中，它事实上和旧世界是完全隔绝的。美洲和亚洲之间零星的和断续的接触毫无疑问存在，一些文化特质，主要是装饰风格的交流很可能发生。然而，土著美洲人的文化发展主要反映在各个土著部落之间的关系，他们常常彼此冲突的关系，以及他们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

古代美洲的环境和文化

数千年的与世隔绝已经使美洲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室。在那里,土著部落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适应独特的社会环境。到 1492 年,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表明,早期人类文化演进的模式基本上全世界相似。发现土著部落的第一批欧洲人和部分旧世界的人经历过文化发展的相同阶段:旧石器时代捕猎者和食物采集者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以及和青铜器时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复杂的帝国时期。

古代美洲的居民是几种亚洲体格类型的混合,并且具有与现代印第安人同样的体格特征:黑眼睛、直或卷曲的黑头发,以及黄或红铜色的皮肤。他们的远古祖先可能是移民浪潮中穿过白令海峡的亚洲人,这一移民浪潮很可能早在 4 万年前就开始了,且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 1 万年。然而,围绕着美洲第一批人居住的可能时期有许多争论。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驳斥传统的观点,这种传统的观点是基于遍布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谓的"福尔松石弹点"(Folsom stone
8 projectile points)的发现,那些居住点是在大约 12 000 年前开始的。修正者指出,那些发现,尤其是在智利和巴西的发现,表明更早的人的居住。最近,支持这种有更早居住的论证已经通过语言学证据得到了加强,语言学的证据解释说,古代美洲许多语言的形成需要巨大的时间跨度。

两股移民浪潮似乎已经发生。第一股移民浪潮产生了主要是以采集野果、捕鱼和捕获小猎物为生的原始部落。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原始捕猎者和采集者大约在 22 000 年前经过了秘鲁。第二股移民的进入产生了捕获大猎物的猎人,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散布在整个美洲大陆。到公元前 9000 年,这些亚裔进入者或他们的后代已经到达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

美洲的第一次殖民发生在重大的地理纪元的后期,即被称为更新世(Pleistocene)——巨大的气候变化期的后期。在冰川纪时期,冰毯

覆盖着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广袤地区，当温度上升到大约今天的水平时，冰毯在不同时期开始交替融化。即使在无冰地区，冰河世纪的降水也大大提高，这促使了牧草和林地的繁茂生长，因而有助于各种捕猎活动。因此，这个时期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狩猎者的乐园。在平原和森林中，许多巨大的史前动物在漫步。整个美洲在靠近这些动物遗体的附近，都发现了史前狩猎者的石弹点。

大约在公元前 9000 年，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的消退（威斯康星冰川）之后出现巨大的气候变化，对印第安人的狩猎经济造成了威胁。更温暖、更干旱的气候占据了广大地区。草地减少，生长在那里的大型动物逐渐灭绝。更新世后期狩猎技术的提高也加速了这些动物的消失。狩猎者现在必须或者适应变化的环境，或者随着那些维系他们生存的动物的消失而消失。

美国西南、墨西哥北部和其他地区都发现了成功适应新环境的考古证据。印第安人的食物逐渐转向更小的动物，如鹿和长耳大野兔以及可食的野生植物，尤其是种子，这些都可以做出美味的饭菜。这种新方法最终导致了农业的发展。起初，农业仅仅是对更早的狩猎活动和采集食物的补充；对农业的使用也几乎构不成"农业革命"。这种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换更可能是逐渐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农作物，并逐渐代替了野生可食植物。经过了漫长的时期，之前投入到捕猎和采集植物的时间和精力都逐渐转向农业活动，如清洗、种植、除草、园中种植、采摘、收获和食物加工上。但从长远来看，农业在旧世界和在新世界一样，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后果：人们开始过更有规律、更稳定的生活。食物充足、人口增长也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在墨西哥高地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野生植物逐渐被培育，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南瓜、豆子和玉米。这些植物的家庭培育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7000 至前 2300 年之间。在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玉米的培育，它成为古代美洲文化最重要的中流砥柱。在公元前 5000 至前 1000 年之间，木薯（一种在森林中耕种作为主食的淀粉类根茎）和土豆（在秘鲁）被补充到重要的培育植物名单中。

植物从产地或原产地迅速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到1492年,从今天美国边界的北端到智利都在耕种玉米。但并非所有勤劳的人们都把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些人,例如居住在南美洲最南端火地岛荒芜废墟上的人,就不得不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捕猎或者采集食物或者挨饿。其他人,如在太平洋西北海岸的人就可以过上富裕、稳定的生
9 活,水中鱼多、林中兽足,他们没有理由放弃他们的好生活而转向农业。

在那些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的地方,农业产量依赖于这些自然因素:土壤的肥沃、气候以及农业技术的运用。森林地区的人们通常运用火耕方法耕作。人们砍伐并焚烧树木和灌木,在清除后的地里用挖土棒种植玉米和其他主食。由于这种方法不久就会耗尽地力,因此人们就让这块土地休耕而转向清除一块新的土地。当这个过程足够长的时候,整个村庄就要迁移到新的地方或者采用分散定居的方式,以使每个家庭都有充足的可用土地。因此,火耕农业结构上的弱点通常会严重地限制使用此种方式耕种的人群的文化发展。一种强大的、支配性的强权能够至少暂时地克服这种方法的缺陷,玛雅的成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灿烂的文明崛起在热带森林的环境中,而且是基于由强大的祭祀者指导的火耕农业,但是现在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从一开始起,这一耕种方式就以更精细的农业方法为补充。

在崎岖的中美洲高地、安第斯高原和秘鲁沙漠的沿海地区,发展出了一种产量更高的农业。这些干旱或者半干旱的国家,拥有温和的气候、天然肥沃的土壤,土地易于灌溉,而且利用挖土棒方法耕种,使得其肥力保持得更长久。最重要的是,作物产量可以随着灌溉的便利而提高,这导致了人口增加和劳动分工更加细化。灌溉工程对合作和调节的需求较高,这有利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崛起和他们的权力向更广泛地区的扩张。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崛起的。

最终,居住在美洲大陆上的巨大人群在西班牙征服前可以根据他们的生存基础和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分成三个级别或范畴:部落、酋邦和城邦。这些范畴对应于文化演进的一个阶段。最简单或最原始的,

群体和部落联盟，通常与艰苦的环境关联（茂密的森林、旷野或者非常潮湿、干旱、寒冷的地区），严重地限制了其生产力。提倡平等主义的群体的特征是依靠打猎、捕鱼和采集；与农业相交替；或者把这些活动结合起来。打猎和采集群体的特征是根据季节可以得到的猎物和可食植物的供应情况而有的模式，在某一特定区域游牧、迁移。那些以打猎、捕鱼和采集为生的与火耕农业群体是半稳定的。那些生存的自然基础不但限制了群体或部落的人口密度，而且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单位是自然形成的群体或村庄，群体成员和村民之间以亲属、婚姻、血缘或认可的关系形成部落。社会分层不明确；群体中所有成员都有权利可以得到猎区、渔区和土地。村庄和部落的首领或酋长通过在战争中的勇敢表现或其他突出的能力赢得权威。他们对权力的要求也仅仅限于狩猎期、军事操练或其他公共活动。

这些平均主义社会在亚马孙盆地的许多巴西部落中很典型。他们当中一个经常性的特征是为了获取俘虏，而在部落之间持续发生的战争。在武士被俘几周或几个月后，这些人就按照仪式被处决，他们的尸体被部落成员分享而食之，以获取精神力量和保持部落领地的永恒。16世纪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游记中描述了他的旅行见闻，并把遇到的一些巴西印第安人带到法国。他们的极度贫困与欧洲司空见惯的巨大财富形成鲜明对比，使得这位哲学家对他们的民族精神和自由产生了强烈的触动。他用这些印象画了一幅影响深远的贵族原始人的文字肖像，无知的食人者代表了免于文明之恶的完美道德类型。

酋邦，第二种固有的社会组织范畴，代表了中级水平。酋邦最通常的生存基础是密集农业，这种农业支持高密度人口在村庄居住。这些 10
村民已经失去了自治权，他们由一个精英核心统治，这个核心是由最高酋长和支持他的次一级酋长们构成的统治阶层。在酋邦的社会组织中，等级是重要的因素，而且限定在血缘关系中。个体等级是根据他们和最高酋长在谱系上的亲疏，那些关系近的个体常常担任神圣的角色，并且出行时由大批长官和佣人随从。最高酋长通过支付必要的贡品和

强迫捐献获取剩余产品。剩余产品中的大部分都用来有选择性地重新分配给长官、侍从和战士，以提高他自己的权力。酋邦之间的战争非常普遍，而且合并附近的村庄很可能在他们的增强和扩张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战争使得那些被俘的人成为为胜利者劳动的奴隶，这也对最初社会分层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在西班牙征服前夕，古代美洲存在着许许多多酋邦，绝大部分分布在环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以及伊斯帕尼奥拉岛、波多黎各、牙买加和古巴）。仅仅在哥伦比亚的考卡山谷(the Cauca Valley)就有不少于80个酋邦。

复杂的人口众多的奇布查人(Chibcha)部落和缪斯卡人(Musca)部落位于哥伦比亚东部高地，也许可以用他们来描述这个级别的社会和政治的融合。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密集农业和捕鱼，打猎是重要的补充活动。农业技术很可能已经包括了梯田、有垄高的种植床（在湿润的盆地种植以控制水分），以及火耕方法。除了玉米，这些酋邦也种植土豆、藜麦（一种类似荞麦的耐寒植物），以及大量其他植物。手工业，如陶器、编织和冶金高度发展。对他们最重要的冶金术在古代美洲的手工业中位居前列。

在西班牙征服时，缪斯卡人的大部分地区由两个相匹敌的酋邦统治，它们分别集中在波哥大和通哈(Tunja)。这个地区的人口估计约150万。缪斯卡人生活的大村庄有几百到数千人。每个村庄都是由木杆和茅草的房屋构成，且周围环绕着木栅栏。社会被分成平民和精英，不同部分的成员都分担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平民要上交贡品贡献劳动以支持酋长和贵族们，这些人控制着剩余产品的分配和消费。

酋邦标志着向下一阶段或最高阶段的组织转换，这一阶段有时也称为文明，或者更简单地称为社会和政治融合的城邦层级。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界线，特别在比较大比较复杂的酋邦中是难以划分的，因为城邦反映了已经存在于酋邦中的趋势的扩展和深化。这些都表明存在劳动分工的增长和细化，即不再从事农业的手工业者群体的形成，负责宗教和智力活动的神职人员的增长，以及明显的武士

阶层和被委托从事城邦行政管理的官僚阶层的增加。这些变化都伴随着有明显的社会分层和相应的观念体系的变化。在平民变得更弱势并被分化时，亲属关系在事实上或者在理论上已经把最高酋长和精英联结在一起。真正阶层结构的出现，是统治阶层宣称他们和为他们劳作的平民在本质上不同。位于神职——国王或者皇帝位子上的城邦首领有时被赋予了神圣性。

城邦层级一般都需要生产力高的技术基础，通常在密集农业中已经使用灌溉、梯田和其他高级技术。城邦的规模和人口也不同于酋邦，还有不同地区间产品交换的增加，有时还伴随着职业商人阶层的出现。真正的城市出现了。除了人口、管理和产业中心，这些城市还常常有纪念性建筑和宗教中心，而这在酋邦中并没有发现。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社会都是美洲社会组织城邦层级最知名的例子。 11

在古代美洲，从酋邦到城邦发生质的飞跃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有些人把战争导致的领土征服作为这个过程首要的推动要素；另一些人则认为，城邦产生的首要因素是它作为一个强制机器从经济上解决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还有一些人强调宗教观念形态对推动精英集中控制人口及其资源方面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展示了城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可以肯定的是，如上面所提到的，对于早期城邦，特别是其最高形式——帝国的形成而言，特定的环境条件比其他因素更有利。实际上，我们对此有更多疑问，即这样的城邦能够出现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如北美洲的绿色平原，它坚硬的草地令挖土棒无计可施；或者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人们通常认为不适合耕种，除了那些短暂的火耕清理区。[1] 学者们常常把城邦和帝国的崛起与必要的环境条件联系起来的有利于地区称为核心美洲。

---

[1] 考古学家最近已经发现的证据表明，沿着亚马孙河岸的不同地点的复杂社会都有精细陶器、有土坡的、由泥土堆成的土墩上的雕像。但是这些古代亚马孙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表现出已经发展到超越酋邦层级的，且他们的起源和人口数量仍存疑。

1492年的人口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古代美洲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学者们更容易留下印象的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复杂性，并且通常是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种高度发达的古代世界文化相比较的。关于古代美洲人口史的新研究也提升了对其文化成就的重视。如同我们在许多社会研究中那样，假定人口密度与某种技术及文化水平相关，那么就可以大胆地推测，1492年的土著人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判断其社会成就和在其毁灭基础上产生的殖民社会。

然而，就美洲征服前的人口问题已经产生了较多、甚至是激烈的争论。第一批到达新世界的西班牙人记录的人口很是庞大。根据早期估计，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土著人口的数目高达200万到400万。著名的传教士莫托里尼亚（Motolinia）于1521年到达墨西哥，他虽然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是说那里的居民多得像"田野里的草叶"。印加帝国和中美洲也有关于人口高度密集的报告。学者们在20世纪评价这些早期记录时，倾向于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而言，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记录是可信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斯宾德（H. J. Spinden）和德国考古学家卡尔·萨珀（Karl Sapper）在考虑了土著人的技术和资源后，提出了同样的数据，新世界的总人口是4 000万至5 000万。其他的人，如美国的考古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和阿根廷学者安吉尔·罗森布拉特（Angel Rosenblat）则得出结论说，土著人的技术不能支持早期材料所列举的人口密度，西班牙人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他们发现的人口数量以增大他们自己作为征服者和传教者的功绩。克罗伯估计拉丁美洲的人口是840万；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数字则是1 338.5万。

20世纪4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三位教授：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谢尔本·库克（Sherburne Cook）和莱斯利·辛普森（Lesley B. Simpson）提出了针对古代墨西哥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打开了质疑古代美洲的人口统计学历史的新缺口。伯克利学院

研究运用了大量数据和精密的统计方法，表现为从已建立在西班牙人为了[illegible]统计数这一基础上的撤退，他们认为，墨西哥中部在征服前夕的人口数量是2 500万。

后来，伯克利[illegible]又把质疑扩展到其他领域。尤其令人瞩目的是[illegible]对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数量的结论。以前对这个岛上人[illegible]16世纪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提出的，在低至60万至300、400万之间，但 12
[illegible]一直被看做是来自“黑色传奇”狂热者的夸大。库克[illegible]一套旧数据和对于1492至1520年之间伊斯帕尼[illegible]人口统计之后，他们不仅证实了拉斯·卡萨斯数据的[illegible]，[illegible]了700万至800万人口这一更大的数字。

[illegible]1964年提出，1492年美国的人口也许已经“超过1[illegible]。在伯克利[illegible]没有试图估计整个大陆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口数量，[illegible]工作是由美国考古学家亨利·多宾(Henry Dobyns)[illegible]。亨利·多宾假定土著人口在接触到欧洲人后减少了[illegible]使他们对新的疾病没有获得免疫力，他猜测前征[illegible]人口在[illegible]万至1亿之间；他还把这一数字分配到墨西哥中部和秘鲁各3 000万。

[illegible]的发现和方法已经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些[illegible]异议者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他们是威廉·桑德斯(Willian T. Sanders)和大卫·赫尼格(David Henige)。然而，一般而言，过去半个世纪这个领域的研究结果都相当一致地指向较大的人口数量，而不是我们之前接受的那样。综合伯克利学院及其反对方的发现，并从[illegible]据出发进行推论，这一成就归功于威廉·德内文(William I. Denevan)，他[illegible]人口总数是5 730万，远远大于克罗伯1939年估计的840万。

学者们[illegible]确立古代美洲长期的人口发展趋向。用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的话来说，学者们一般都同意在整体上“美洲的印第安人相对[illegible]少，除了自然灾难如洪水或干旱引起的谷物缺乏，他

们似乎享有特别健康的身体"。直到1492年，他们的与世隔绝保护他们免于疾病，如天花、麻疹、斑疹和伤寒这些在旧世界文明发展时期形成的疾病的集体发生。这种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土著人看，即使他们不和欧洲人接触，也许这些疾病也已经发生了。在许多地区，土著人已经发展出把狩猎-采集和火耕农业联系起来的经济，它以玉米、豆子、南瓜三合一为基础，这是可持续的经济，而且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很小。西部印第安泰诺人(Taino)已经发展出了农业的精细形式，即发展出了以齐膝高的土堤为基础、称为conucos的永久耕地，他们在这里种植木薯、甘薯、各种各样的豆类和南瓜。这一方法避免了对土地的侵蚀，而且"用最简单的方法和最少的劳动给予了可持续的、高度的丰食回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地区的食物供应存在任何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历史已经发现证据：西班牙人到达之前存在着人口威胁。博拉忧郁地观察到，"到15世纪末，由于没有欧洲人的干预，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已经注定要灭亡了。"现在的学者认为，在资源匮乏的地区，人口压力也许在美洲中部玛雅古典文明的衰颓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证据包括慢性营养不良的迹象、婴儿死亡率以及在150年内人口从约1 200万减少到剩余的约180万。与这次危机相关的是砍伐森林、水面消失、过度耕种、地力耗尽以及其他因素。

核心美洲

墨西哥和秘鲁是辽阔的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心，包括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区。这是古代美洲的核心地段，是第一次农业文明的家园。早期村庄生活的证据和基本的文明技术——农业、陶器、编织已经在这一区域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发现。

最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是考古学发现的主要现场。在墨西哥山谷、南部及其墨西哥湾沿岸、玻利维亚高原以及秘鲁沿海沙漠的沙子中的发掘，已经开掘出了壮观神殿的遗迹、巨大的坟墓、大城市和市镇，以及陶器和手工精美的编织品。把挖掘出来的证据和历史解释提供的
13 证据结合在一起，专家们已尝试重建核心美洲的历史。这一努力的

古学的工作是数个连续的阶段，这些阶段以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以及特定的时期艺术为基础。专家们对这些连续的阶段通常给予的名称是古代阶段、形成或前古典阶段、古典阶段以及后古典阶段。这一体系在细节上是简化的，在不同的阶段之间有很多时间上的重叠，而且从一个地区到另一地区，一些时期的延续有相当大的变化。

古代阶段开始于大约9 000年前，当从采集食物和狩猎逐渐向农业经济的开展，在核心美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这一阶段。然而，这种初期的农业在这些社会中并没有引起革命性的变化。大约过了数千年，人们一直生活在与以往基本相同的原始方式中。社会群体小而且可能是季节性移动的；手工编织还不为人所知，但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些地区出现了简单的陶器。

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在核心美洲的许多地区，主要的文化发展开始进入形成或前古典时期。几个世纪偶然的植物实验导致了人们开始挑选各种改良的、高产类型的植物。这些进步从根本上产生了基于农业和定居村庄生活的稳定经济。玉蜀黍和其他重要的培育植物在那些新的村庄中产生；灌溉在一些地区开始应用；一些动物被驯化。在这个时期末期，陶器和编织高度发达。粮食产量的增加使村民能够对神职人员提供支持，这些神职人员在人和神之间进行居间调停。剩余的粮食也释放出劳动力转向仪式场所的建造——一些地面被由木头、棕榈或茅草建造的神殿所覆盖。

形成时期的社会单位是村庄共同体，由一个或更多血缘关系的群体组成，但到这个时期末，发展出了由几个村庄组成的小酋邦。由于耕地和食物相对充足、人口数量少，战争肯定还比较罕见。宗教集中在对丰产和生殖神的崇拜上；人祭可能不存在或很少。

形成时期发展的高峰便是古典时期，这个时期的开始也是基督时代的开始，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1000年。古典这个术语指的是这个阶段标志性的物质、智力和手工业文化的繁荣。在技术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但是一些地区灌溉工程的扩展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剩余人力转向建筑和技术工作。人口也增长了，而且在一些地区，出现了

真正的城市。建筑、制陶和编织技术达到了不错的水平。和秘鲁的冶金业一样，中美洲（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以及毗邻的中部美洲）的天文学、数学和文字也同样繁盛。较早的土丘由位于中心的大石金字塔，以及装饰精致、气势雄伟的神殿、宫殿及周围其他公务建筑的建造，使每一个仪式中心成为城邦的行政首府，由大祭司控制。社会分层已经很充分，祭司者是主要的统治阶层。然而，在古典时期末期，战争的频率增加了（可能是由人口压力引起的、人们对耕地和水的竞争更激烈），这也使得得胜的勇士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尊敬。宗教也成为更为复杂精致的多神教，由更大的祭司阶层把持。

古典时期的典型文化是中美洲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文明、墨西哥西南的蒙特·阿尔班（Monte Albán）文化以及尤卡坦半岛（Yucatán）南部和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低地文化。在此之前很久，奥尔梅克（Olmec）文明展现出了一些古典时期特点，但这一文明一段时间之后就衰落了，因此这些特点通常被认为是形成时期的。在秘鲁，这一时期最出色的代表是沿海岸线分布的莫奇卡（Mochica）和纳斯卡（Nazca）文明。有证据表明，古典阶段局限于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中部（高原地区、秘鲁及玻利维亚的沿海地区）地区以及厄瓜多尔沿海地区。

古典时代在核心美洲的北部和南部都突然消失。公元1000年前后不久，中美洲和秘鲁的大多数重要古典中心，在经历内战或外来入侵这些灾难之后被遗弃或摧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明崩溃的出
14 现是长期衰败的高潮。人口压力、土壤侵蚀以及农民叛乱都是由过度的上贡要求引起的，这也是人们提出的大的古典城邦和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麻烦不断的时代，到处充满了难解的争斗，人们四处迁徙。但伴随着这些灾难，一个新的文明却在旧的废墟上出现了。从大约公元 1000 至 1500 年，后古典阶段似乎被大量复制，只是以比前一个时代更复杂规模的兴衰模式进行着。数不清的要塞和设要塞的社区反映了长期战争的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调城市生活也成为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此外，帝国由一个强有力的城邦对其他许多城邦的征服而形

统治城市占用被征服人们一定数量的产品，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

[illegible]时期没有出现重要的技术发展，但一些地区，灌溉网得到扩[illegible]战争在扩[illegible]，商业在兴起，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在经济上[illegible]更大，武士阶层代替了神职阶层成为主要的统治阶层。帝国思[illegible]影响了宗教的特征，提高了战争神和人祭的重要性。艺术和手工[illegible]表现出从[illegible]的倒退，在一些地区编织和陶器更倾向于标准化和大众化

[illegible]政治权力[illegible]许之后，和古典时期他们的先驱一样，各个帝国也[illegible]秘鲁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文明和印加[illegible]成长的两个循环，然而第一个真正的墨西哥[illegible]阿兹特克征服者，这一帝国直到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才终结。

[illegible]——中美洲的玛雅、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以及秘[illegible]个美洲其他文明的注意中心。这一偏见是可以[illegible]：我们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得更多。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在西班牙人到来的时候依然繁盛，一些征服者对他们所看到的做了[illegible]的描述。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以及两个[illegible]皇帝蒙特祖玛（Moctezuma）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悲惨命运，也成为历史和文学对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关注的焦点。不幸的是，这些被名声和魅力环绕着的人们使他们的先驱者——那些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的文化奠基者的巨大成就变得模糊了

早期美洲文明

早在公元前1000年，墨西哥谷地的居民生活在环绕着玉米、豆子和南瓜地的小村庄里。他们用砍伐和焚烧的方法耕种田地，制造出简单但制作良好的陶器，生产了大批象征生殖神信仰的小泥塑像。到旧世界开始基督时代时，小的、顶部平坦的土堆已经出现，表明已出现更形式化的宗教和有指导的祭祀。

史早时候(大约从公元前1500至公元100年)，墨西哥湾低地出现了早熟的、迷一般的奥尔梅克文明，它的影响辐射范围广泛，一直到墨西哥中部高原和美洲中部。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消失至今都还是个谜。

奥尔梅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仪式中心、巨大的石头雕刻和雕塑、象形文字，同时很可能还包括历法系统。奥尔梅克的主要遗址在今天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拉文塔(La Venta)和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 Zapotes)。奥尔梅克文明的发展及其艺术方式广泛辐射的证据使下面这一古老的观点站不住脚：即玛雅文明在中美洲位列第一。似乎奥尔梅克文明才是中美洲文明的鼻祖。

形成时期高度发达的技术、手工业和科学都使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达到了最高峰。古典时期的墨西哥中部高地充满了成就。大约在基督开始的时代，距墨西哥城大约28英里的特奥蒂瓦坎很可能已经建成
15 了以太阳和月亮命名的金字塔，耸立在一群醒目的庙宇和其他建筑群



特奥蒂瓦坎最大的城邦仪式中心，死亡大道连接着“城堡”——皇家宫殿住宅群和太阳、月亮金字塔。据估计，人口在12.5万至20万之间。在公元600年，它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科比斯 理查德·库克(Corbis Richard A. Cooke)】

[illegible]用来装饰[illegible]的石像、雕刻作品及其磨光技术优美得令人叹为 16
[illegible]特奥蒂瓦坎艺术高度发展的证明。古代水神，后
[illegible]阿兹特克人称其为特拉洛克(Tlaloc)，似乎已经是特奥蒂瓦坎主
[illegible]，但是，有[illegible]的头饰以及羽毛的蛇，后期他们称其为羽蛇
神(Quetzalcóatl)，也[illegible]掌管水和生殖，而且显著地出现在最大的庙
[illegible]阶段，战争和人祭就没有了。祭司以和善的姿
[illegible]衣服在壁画中占据主要地位。

这个[illegible]在特奥蒂瓦坎是神圣之地，而且很可能只居
[illegible]僧侣，再远一点是官员、手工业者和商人的
[illegible]。据估计，特奥蒂瓦坎的人口至少达12.5万。在城市郊区约7
[illegible]乡村人口，他们给大都市提供粮食。很
可能是使用[illegible]的密集农业和山坡上的梯田构成了特奥蒂瓦坎文
[illegible]。特奥蒂瓦坎的宗教和艺术以和平为主导，但它似
[illegible]，还有一个军事城邦，它直接控制的地区远
达危地马拉高地。

其他中美洲[illegible]文明与特奥蒂瓦坎相比都黯然失色。在西南方
[illegible](Monte Albán)，瓦哈卡(Oaxaca)的崎岖山脉中，萨波
特克人(Zapotecs)建造了一个重要的仪式中心，也是个真正的城市。 17
但他们的成就之一——复杂的象形文字体系，却很可能是奥尔梅克人
(Olmec)首创的。[illegible]时，玛雅人的古典文明也在危地马拉北部的
佩腾(Petén)地区兴盛起来。

中美洲的玛雅

在古代美洲的文明中，玛雅文明在文化成就上无可比拟。当然，也
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曾经在建筑、雕塑、绘画、数学和天文学上展示出这
样卓越的能力。今天的墨西哥东南、几乎整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西
部，整个伯利兹以及萨尔瓦多的西部当时都有人居住，玛雅文明在热
带雨林的低地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峰，其核心是以尤卡坦半岛为基础
的危地马拉的佩腾地区。这就是从大约公元250至900年玛雅古典文

明的首要中心。①这一地区的猎物和建筑材料（石灰石和精致的硬木）都很丰富，但几乎在其他每一方面该地区对于建立高等文化都存在巨大的障碍。用那时仅有的原始器具清除茂密的树木以耕种和控制杂草都是费力的工作。没有金属工具、水的供应也无保障、交通工具也贫乏。然而正是在这里，玛雅人建立了一些他们最大的仪式中心。

把环境的限制和玛雅人的成就相比较，导致了一些权威人士推测，玛雅文明是从其他更有利的地区移植过来的。这种观点已由于在低地遗址发现的前古典时期漫长的序列事物而被推翻。如今，大量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低地玛雅人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住在奥尔梅克或其附近地区的人群的后代，他们借来了中美洲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及时地把这些要素融合到他们自己的科学、艺术和建筑的独特成就中。

正如人们疑惑玛雅低地文化在这样不适宜人居住的环境中兴起一样，其迅速的衰落也同样让人疑惑不解。这导致了土地建筑活动逐渐停止，并最终使之在公元800年之后不再作为仪式中心。专家们已经针对这一衰落提出了许多种解释，包括火耕农业导致的地力耗尽、出于同一原因玉米地被野草侵蚀、水资源缺乏、农民反对统治的神职阶层的暴乱，以及已经和玛雅地区断绝商业和政治联系的特奥蒂瓦坎崩溃的破坏性影响。然而，上述解释没有一种让人完全满意。

最近，一种更复杂的关于古典玛雅崩溃的解释出现了。根据这个理论，在约公元550年时和特奥蒂瓦坎政治和商业联系的中断，导致了核心政权的瓦解。这很可能首先是由蒂卡尔（Tikal）——低地南部最大和最重要的仪式中心开始发挥作用的，核心政权瓦解的同时却增强了地方玛雅精英们的自治。这些精英们通过建造甚至更精巧的仪式中

① 然而，最近的考古发现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上认定的玛雅文明开端的时间。在危地马拉北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纳克贝（Nakbe）城的新发现中包括了大量公元前600年至400年的石碑和庙宇，把古典时代的时间段推回到现在通常认定的前古典时期。

——这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表现了他们的自负和权力。人口增加[illegible]紧要生[illegible]社会资源紧张，都迫使人们采用更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illegible]又过来也增加了对耕地的竞争，战争的增加和尚武主义的强化便[illegible]反映。农业产量的提高暂时地缓解了人口压力，并且使古典后期[illegible]繁荣（从公元[illegible]至800年）成为可能，以仪式中心的建造、建筑和艺[illegible]发展为标志。但是更新的人口压力、食物短缺和地区之间的战争[illegible]，我们发现[illegible]袭击更加恶化，在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导致了[illegible]社会出现严重退化。压力的组合——这个理论这样论述，“产生[illegible]的衰退，总之便是由于战争、营养不良和自然灾害而 18
[illegible]人口[illegible]，直到那些活下来的人能够在人口密度和社会组[illegible]其低的水平上重新获得稳定的农业社会。”

这种[illegible]没有发生在尤卡坦半岛北部，一个石灰石的低地平原，[illegible]地[illegible]茂密的荆棘丛生的草丛的森林。在人口数量上和南[illegible]多[illegible]人口在这里，尽管文化成就更少引人注目，但这个地[illegible]也有重要的仪式中心，由建筑的金字塔、多层宫殿和大的方形庭院[illegible]。在大约[illegible]年，大批入侵者从墨西哥中部高地侵入这个地[illegible]，其中，主要是从[illegible]传统的图拉(Tula)过来的托尔特克人(Toltec)移民。[illegible]占领了尤卡坦北部，确立了对玛雅人的统治，他们从奇琴伊察(Chichen Itza)城的神庙发号施令。入侵者带来了托尔特克风格，表现在艺术、建筑上，包括有柱廊的大厅、战士队列和被称为“查克穆尔”(Chac Mools)的斜靠的石雕像等方面。托尔特克的影响也反映在人们对于人祭越来越迷恋上。公元1200年之后，玛雅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又重新恢复。奇琴伊察被遗弃，权力转移到玛雅潘的城邦中，玛雅统治者在一个人口密集的、有围墙的城镇中统治着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让部落首长和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以从周围各个地方得到确定的贡品。但在15世纪，大部分原有的集权统治都消失了。以此成功的暴动推翻了玛雅潘的政府，在1441年摧毁了这座城市。至此，玛雅文明已经完全衰落了。在西班牙人到达这里时，这个地区所有的政治集团或者帝国组织都已经消失了。

玛雅的经济和社会

过去30年的考古学发现极大地修正了我们对于古代玛雅生存模式的观念。直到最近，主流的观点还认为，在玛雅人的饮食中玉米占首要地位，他们几乎只依赖于火耕(刀耕火种)农业体系。由于这一体系排除了在诸如特奥蒂瓦坎和其他中美洲高原地区中心发现的人口稠密的可能性，人们的传统解释是，农业人口是分散居住的，住房主要是典型的一间杆子茅草结构，它们分散在个别的仪式中心和行政中心之间或者聚集在小村落中。这些中心，包括庙宇、金字塔、用于仪式的广场和其他建筑，都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城市"特征。学者们认为，这些中心只是玛雅的精英们——人数稀少的祭司、贵族和官员及他们仆役们居住的地方。另一方面，乡下人住在他们的农田旁边，去这些中心只是因为宗教节日或者其他特殊原因。

这一传统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严重质疑。详细的地区地图显示，环绕着蒂卡尔仪式中心的郊区人口稠密，并且已经从中心之外扩展到几英里远。后来发现，同样高度集中的住宅群也在其他主要甚至次要古典时期的中心出现。用诺曼·哈蒙德(Norman Hammond)的话说："玛雅的各个中心之间的空间充分开放，那些身处分布过着田园牧歌生活的农民，突然变成了挤在一起拥挤的郊区居民。"

古典玛雅的规模和居民密度之间的关系迫使人们对支持他们经济体系作重新评估。目前清楚的是，玛雅人除了火耕农业之外，还使用了精细且长久的农业，包括高产的菜园——在主要产品如玉米间种植蔬菜、树木栽培、开筑梯田和台田——在低洼地区建造人工土壤平台挖土。

围绕着仪式中心如蒂卡尔，郊区人口密集的证据已经引起了关于玛雅低地当时城市化程度的讨论。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古典时期的玛雅中心实际上被遗弃了许多年已经站不住脚了。然而，人们对于在某种意义上，诸如特奥蒂瓦坎之类的地区是否是"城市"，并没有达成一致

另一个是蒂卡尔，位于佩腾的中心，确定无疑是个大都市，中心约有 5 万人口，周围大约二十平方英里之内的地区人口稠密。后古典时期的尤卡 19
坦北部也有某种程度都市化的证据，也许是托尔特克人影响的结果，那里的人们倾向于把城市或城镇建造成一个要塞。奇琴伊察，古典时期一个古老的仪式中心，在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扩展，而当玛雅潘接替奇琴伊察将其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时，建造了城墙环围的大城区。

由于人们看到了古典时期玛雅人口的广度和密度、他们大部分农业精耕细作，以及这种复杂状况对严格的社会控制的要求，这些便导致了人们对玛雅社会组织的重新评价。比较传统的观点是，统治阶层是由一部分和平的精英，他们住在基本上已经被遗弃的空旷仪式中心里，统治着分散在各地的农业人口。随着对雕刻在古典玛雅中心石柱上象形文字破译技术的提高，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玛雅的社会秩序。人们曾经相信，雕刻内容毫无例外是宗教的和天文学的。然而最近几十年来释读工作表明，许多刻在石柱、楣梁和其他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记录的都是战事、战争和其他世俗统治者生活中的大事。

新的解释认为，伴随着不同阶级之间鸿沟的，是存在着的复杂社会秩序。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世袭的统治者，他使城邦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领导权联合起来。他的周围是上层阶级或名门贵族，他从中挑选行政和执行官员。有知识的专业人士，如建筑师、祭司和抄写员也许已经形成了另一个社会阶层。在他们下面是无数的手工业者，他们需要建造仪式中心和城市：制陶者、雕刻者、石匠、画家等。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普通劳动者和农民，他们提供劳动和粮食以支撑起这巨大的上层建筑。这过程中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压垮了他们，他们的不满很可能激起了暴乱，最终导致了玛雅低地文明的崩溃。

关于古典玛雅家庭和居住方式已经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大多数玛雅房屋都建立在高低平台上，而且以三个或更多的数量出现的事实，表明玛雅家庭已经不再是核心家庭，而是大家庭。这很可能是由两个或更多核心家庭跨越了两代或更多代，他们有共同的祖先。通过男性墓

穴上更丰富的装饰和男性在纪念碑艺术上的突出表现表明了男性的优势地位，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血统是父系的，从父亲到儿子。玛雅人的服装和饮食，如同其房屋一样，也反映出阶级差别。玛雅人的衣服跟阿兹特克人的服装很像：棉的缠腰带、皮质带子鞋，有时男性的肩膀上还系着斗篷；女性则是棉质的裹裙以及为头和胳膊留出洞的短上衣。上层阶级穿的衣服式样相同，只不过装饰更过度。

玛雅的宗教和知识

玛雅宗教的重要对象，如同西班牙主教迪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的简洁描述那样，是那些"给予他们健康、生命和粮食的'众神'"。玛雅的主要神，比如阿兹特克人的诸神，代表了那些自然力量和最直接影响人们的物质战争的诸对象。玛雅神谱中的最高神是伊察姆纳(Itzam Na)，它是一个自身包含了许多其他神祇的创世神，不仅创世，而且火、雨、粮食和泥土都在其职责或者统辖范围之内。其他重要的诸神包括太阳神、月亮神、雨神、玉米神和让人恐怖的死神。如同阿兹特克人一样，玛雅人也相信存在许多世界接连出现和毁灭的周期；目前的世界也会在灾难中终结。

玛雅人相信来生：上界由十三层组成，下界有九层，每一层都由特定的神统治着，死神阿·普切(Ah Puch)统治着下界的最底一层。像阿兹特克人和其他中美洲的人们一样，玛雅人也用各种各样的仪式 20 活动膜拜和抚慰诸神，包括斋戒、以放血的方式忏悔、焚香和人祭。古典时期后期，人祭已经广泛存在，这通过玛雅低地各城邦之间越来越多的政治动乱和纷争留下了痕迹，但也许到后古典时期，在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下，人祭越来越多。

玛雅人的祭司沉迷于时间，他们被分配的任务是神秘而且有魔力的。他们发明出一种历法，这种历法比我们要做出调整的太阳年的实际长度更精确。玛雅的神学家相信，时间是上帝背负在他们背上的沉重负担。某一时间段结束时，一个神卸下他的负担，另一个神则背负起来继续时间的历程。特定的一天或一年是幸运还是不幸，依赖于那时

一与背负神是善良还是不善良。因此，玛雅人的日历首先是角色占卜——用来预测特定时期的状况。

玛雅人有两本日历。一本为宗教历，周期是260天，与仪式生活的模式相对照。这本日历由两个时间长度不同相互结合定期循环的周期组成：一个周期13天，以数字计数，另一个周期20天，以名字计数。从第14天命名，以第一天的名字再重新开始下一个周期。第二本为太阳历，其循环周期是365天，被分成18个“月”，每个月有20天，加上这个周期最后5个不吉运日，在这5日所有不必要的活动都是禁止的。这两个周期每52年之后完成一次重合。石柱上雕刻的象形文字所指示的日期和其他日历的数据，如月亮的状态、金星的位置等经常在52年循环结束时和其他时间间隔时雕刻上去。

玛雅人比其他所有中美洲的邻居在数学科学上更发达。他们的计数单位是1、5和20，1用点表示，5用木棍，20或20的数倍用位置表示。数字的位置价值基于0这个标志，这很可能是古代美洲智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个系统中，数字的位置决定其价值，这就可能对表达数字大小的象征符号的数量加以限制。它的简洁性使其远远优于当代西欧的算术体系，后一体系运用繁琐，由罗马数字构成的每一更高单位都有不同的符号。它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带去的数字概念的留存，最好的体系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是，玛雅人的数学似乎主要被应用到历法和天文学的计算上。还没有关于玛雅人对人或物进行计数的证据。

直到最近，人们才相信，玛雅的象形文字和数学一样，主要是为宗教和占卜服务的，而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刻在纪念碑上的许多象形文字是历史性的，它是玛雅统治者生平的大事记。除了出现在石碑、楣梁、楼梯和其他纪念遗迹上的铭文，玛雅人还有许多书或抄本，只有其中的三部幸存到今天。这些书画在折叠的屏板——由树皮制成的本地纸板上。这些书涉及了上面提到的所有内容：天文学、占卜和其他相关主题。它们揭示的玛雅天文学家的观测和计算的复杂性确实让人震惊。

玛雅人没有字母，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的大多数文字代表着思想或者事物而不是声音。但是玛雅文字通过符号字谜的使用已经达到了语音学的音节阶段，词的声音是通过把事物的图画或符号联系起来表现的，说出的事物是词的形成中事物的象声名字。如玛雅人的词"干旱"(kintunyaabil)，是由四个符号构成的：太阳或白天的符号kin、时间的单位石块或360天tun、太阳年haab以及字缀il。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俄国学者提出了这种理论，即玛雅文字是真正音节式的，因此能够通过与当代玛雅人最常用的声音要素与古代文字中最常用的符号相匹配而得到破译，计算机的使用能加快这一破译过程。现在学者们通常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即在玛雅人的书写中存在纯粹的语音象形文字，但它们在已经破解的材料中似乎相对罕见。

21



在博纳蒙派克(Bonampak)卫城发现的古代壁画描述了玛雅的文化仪式，它融合了历史、音乐和舞蹈。壁画中，舞者穿着龙虾、鸟和鳄鱼服，伴随着乐师演奏的鼓、马拉卡斯葫芦(gourd maracas)和喇叭庆祝王室继承人首次登基　【伦敦等档案馆/艺术档案馆】

玛雅文字并没有叙事体的文学记录，相反，大量的玛雅神话、传说、诗和传统历史都是以口头方式代代相传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波波尔乌》(Popol Vuh)中发现了一些。《波波尔乌》是危地马拉基切(Quiché)玛雅人所谓的圣书。这本书包括了两个勇敢的双胞胎乌那普(Hunahpu)和斯巴兰克(Xbalanque)的探险，他们在获得了许多功绩后，升到天堂成为了太阳和月亮。这本书是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后期当地人根据人们的口述史用字母系统书写的。

玛雅人[illegible]了[illegible]活动类型，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中美洲人。[illegible]提特兰的庙宇和金字塔通常比其他玛雅人的地方[illegible]精美和细致。玛雅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illegible]叠涩拱。其他中美洲的人通常使用水平的木梁连[illegible]笨重的方形。玛雅人用石头把两面的开口越远[illegible]顶石连接起来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玛雅[illegible]是庙宇和宫殿上面很壮观，装饰了许多雕刻过[illegible]的视觉[illegible]。庙宇和宫殿的内墙通常饰以绘画，[illegible]保存下来的很少。这些绘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1946 年在博纳[illegible]发现的[illegible]，在墨西哥恰帕斯州西北角的热带雨林中，是一处孤立的遗址[illegible]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 800 年，在一处有三个房间[illegible]建筑[illegible]个覆盖有壁画。这些壁画讲述的故事是以一个舞蹈仪式开始的，[illegible]描绘在一次远征中俘获了用以献祭的俘虏，接下来是战争的场面，最后以人祭、仪式和舞蹈结束。尽管它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illegible]的，缺乏透视和阴影，在人的计数上也有明显的[illegible]，但是它具有的[illegible]却是在其他中美洲的艺术中常常缺乏的。

玛雅的[illegible]也常常证明了那些玛雅人令人钦佩的个人素质——尽管技术有限且生活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但他们却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一。迭戈·德兰达主教焚烧了 27 本玛雅抄本，认为它们是“邪恶的著作”。尽管如此，他也发现，玛雅人相当慷慨大方且热情好客。他写道，只要走进他们房子的人，都会被给予食物和水。 22

玛雅的衰落和中美洲的转型

到公元 800 年，一场似乎从一个古典中心波及另一个中心的危机撼动了中美洲的根基。特奥蒂瓦坎，那个时代的罗马，在入侵者的铁蹄下灭亡了，入侵者在大约公元 650 至 800 年之间焚毁了这座城市。再到后来，蒙特·阿尔班(Monte Albán)的重要仪式中心也被废弃。到公元 800 年，瓦解的进程已经到达了古典玛雅的腹地——尤卡坦南部

和危地马拉北部，那些中心一个接着一个被遗弃或摧毁。

从中美洲这个战乱不断的时代开始（大约公元750至1000年），一种新的后古典秩序出现了，有时也恰当地称之为尚武精神。如果，祭司们和仁慈的自然神有时也许会主管古典时代的中美洲社会，武士和可怕的战争神显然控制着在古典世界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城邦。在墨西哥中部，特奥蒂瓦坎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首先以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为基础的，也让位于新兴城邦的竞争，它们彼此之间因为土地、水和贡品而战斗。

最重要的是，特奥蒂瓦坎权力的后继者是托尔特克"帝国"，它的首府在图拉（Tula），距今天的墨西哥城大约50英里。图拉位于墨西哥山谷的外围，也许曾经是特奥蒂瓦坎的前哨，在其边疆守卫，抵抗中美北部的游牧部落。随着特奥蒂瓦坎的崩溃，托尔特克这一部落就从北方突然发动袭击，进入了墨西哥谷地，倾覆了特奥蒂瓦坎那些可怜的幸存者。

托尔特克在托皮尔岑（Topiltzin）的统治下达到了其权力和繁荣的最高峰，他于大约公元980年迁都图拉。此外，托皮尔岑还重新定义了特奥蒂瓦坎人崇拜的古代最高神羽蛇神的威力，羽蛇神用它的光辉支配了他和他的城市19年，使他和他的城市都成为了传奇。羽蛇神的歌曲讲述了图拉奇观，一个真正的乐园，地上生长着着色的棉花，土地的产量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小的玉米秆不再用来当做食物而是作为热蒸气浴的燃料。古代墨西哥的传说讲述了托尔特克人的超人力量和天分。他们被描述成艺术大师和文化的创造者。伟大的神君——羽蛇神统治着这一黄金时期，它也因此使特奥蒂瓦坎的荣耀得到复兴。

到羽蛇神统治的末期，图拉似乎已经成为两支宗教传统激烈争斗的舞台。一支和对特兹卡特利波卡神（Tezcatlipoca）的崇拜相关，它被描画为全能、善变的神，需要人祭。另一支和古代对羽蛇神的信仰完全相同，它赐予玉米、知识和男女的艺术。关于羽蛇神传说的一个版本，也许可以反映后征服时期基督教的影响，神要求人们只用平和的玉石、蛇

和献蝴蝶祭。这两支宗教之间的争斗在当地的传说中能发现各种各样的表述。传说中讲述人们将兹卡特利波卡的巫师怎样用它的黑魔力使神王的神君判断和风度尽失，并迫使它从图拉流放。

无论目前这种传说的实际基础是什么，它都承诺了一种神秘的救赎者，它会在某一天返回拯救它的国家，古代墨西哥人深受这个传说的影响，它在中美洲世界的崩溃中起了重要作用。唯一的巧合是，羽蛇神许诺返回的那一年，正是科尔特斯登陆维拉克鲁斯的那一年。传说中的这有助于弱化土著的抵抗，至少在起初时是这样。

托皮尔岑被一位神性更小的国王代替，他徒劳地努力想解决托尔特克人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危机的原因至今仍不明朗：巨大的干旱也许已经引起了作物绝收和饥荒，这一情况很可能由于托尔特克人忽视农业，而宁愿从其征服的人那里收取贡品而更加恶化。一系列革命的出现加剧了托尔特克的经济和社会困境。最后一位托尔特克国王休马克(Huemac)据说是在约1174年自杀的。托尔特克城邦也伴随着它的统治而衰落，接下来的一年里，托尔特克人大批四散离去。图拉 23
也在约1224年陷落于野蛮人。

位于墨西哥谷地边界的图拉的陷落，打开了说纳瓦特尔语(Nahuatl)的北方人全面入侵山谷的通道。这些新的征服者，被称为奇奇梅克人(chichimecs)，他们也许可以与侵入危在旦夕的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入侵者相比较。像日耳曼人一样，奇奇梅克人的首领尊重并试图吸收被征服的人们的优秀文化。他们渴望与幸存的托尔特克人的皇族和贵族通婚。

这些入侵者在墨西哥谷地的湖周建立了许多后继的城邦。无论是否在法律上，他们的统治者都承认托尔特克血统的尊贵。就艺术和商业发展而言，1260年组建的特斯科科(Texcocan)王国很容易就胜过了它的邻居。特斯科科文明达到其顶点是在两个世纪后的内萨瓦尔科约特尔(Nezahualcoyotl，1118—1472)统治时期，在古代美洲的舞台中他扮演了著名的诗人、哲学家、立法者，以及可能是最杰出的人物。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

在奇奇梅克人后期到达谷地的是阿兹特克人，又名墨西卡人，这是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他们从北方名为阿兹特兰的地方出发。公元1111年，由四个祭司和一个背着装有神像的包裹的女祭司带领，神像就是他们的部落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的神像。在一个多世纪无目标的流浪之后，于约公元1218年到达墨西哥谷地。传统的观点认为，阿兹特克人基本是狩猎、采集生活，对农业只是有一些了解。但这种观点已经受到一些学者质疑，这些学者认为，阿兹特克人到达谷地时，他们在文化、宗教和经济社会组织上已经是典型的中美洲人了。他们发现最令人满意的地方已被其他人占有，便只得把特斯科科湖西部的沼泽地作为避难所。公元1344或1345年，他们在那里建造了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城。此时，阿兹特克人的社会是由以血缘的氏族大家组成的，地主群体称为卡尔普利(calpulli)。

形成阿兹特克领土坚实基础的一块块小土地上，逐渐搭建起了一座座藤条和芦苇茅屋，到后来逐步形成了更宽敞的草皮、砖坯和发亮石头结构的建筑。随着人口的增加，更大面积耕地就成为必要，而且阿兹特克人也采纳了他们邻居的耕种技术"水中田畦"(chinampas)——用土和湖泊沉积物建成的人工园圃，周围用柳条围护。最后，柳条根会扎根于湖底并成长，构成了牢固的基础。阿兹特克人在这种水中田畦里种玉米、豆子和其他产品。

阿兹特克帝国的扩张

很长一段时间，阿兹特克人都屈从于他们强大的邻居阿兹加波扎尔科人(Azcapotzalco)，后者也是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早期那个湖国的统治力量。1428年是阿兹特克历史的转折点。阿兹特克人在他们的军事领袖伊兹科亚特尔(Itzcoatl)的带领下，加入了特斯科科城邦和小一点的特拉科班(Tlacopan)城邦的起义，推翻了阿兹加波扎尔科人的暴政。他们这一结盟的胜利(1430)导致了三国联盟首先征服了谷

叶，后来又征服了中美洲地区的大部分。慢慢地，权力平衡被打破，并逐渐转移到占主导地位的阿兹特克城邦。特斯科科成为主要的合作者，特拉科潘则退居次要地位。阿兹特克岛屿要塞的牢固地位、形成联盟时的外交策略以及审慎地同陆上的城镇分享征服的战利品，都有助于解释阿兹特克人为什么成功地获得了墨西哥谷地的控制权。反过来，对谷地的征服也提供了征服中部美洲的基础。谷地由易于防守的大山作为屏障，有与其他山谷距离近这一优势。面向北、东、西、南，灵活的阿兹特克勇士都很容易利用邻近的山谷。

通过征服阿兹卡波扎尔科，阿兹特克人得到了他们湖滨的第一块土地。大部分被征服的土地和居住在其上的农民被分配给那些战功显赫的武士——贵族。起初分配这些土地是为了生活，但这些土地往 24
往成为可以永久拥有可继承的封地。因此，战争在阿兹特克社会中创造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分裂。在这个过程中，最初基于血缘关系的卡尔普利逐渐衰弱，在墨西哥谷地，它失去了大部分的自主性，变成主要是社会和地区性的行政单位。大部分平民要对阿兹特克城邦纳贡、服劳役和兵役，卡尔普利则继续由世袭的精英家族领导，这些精英家族则完全听命于那些高级的阿兹特克军官，并执行他们的命令。

在墨西哥谷地和其他高度发达的地区，从前和卡尔普利联系起来的所有公共土地关系已经遭到削弱，引起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逐渐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一些成员离开；内部的经济差异；以及在饥荒年代或一些危机出现时需要售卖或出租公有土地。原始的血缘关系的卡尔普利，即地主所有这种类型在那些阶级分层和城邦形成过程更缓慢的地区保存得更好。然而，在西班牙征服时，无土地者和佃农已经遍布墨西哥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和类似农奴的农民一起，很可能构成了阿兹特克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失去自由的农民对土地只拥有使用权，而且必须向拥有土地的贵族服务并交纳贡赋。最近的研究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画面，这一社会“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社会，高度复杂且地区差异大”。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这以观念的形式反映在神话的起源中。人们在神话中声称，阿兹特克贵族有独立的(不同于羽蛇神的)神圣起源。

其他观念上的变化有：把部落神维齐洛波奇特利提高到和墨西哥谷地原来崇拜的伟大的诸自然神同等重要的、最高的位置；焚烧古代图画文本，因为这些书忽略了阿兹特克人；他们还重造了新的、讲阿兹特克人伟大的历史。一个新的重要方面在于，战争中抓捕的囚犯被用来在阿兹特克人的神坛前作人祭，以确保世界的运转。

伊兹科亚特尔的后继者——有时是单独的，有时是和特斯科科联合，扩大了阿兹特克的统治，并使其延伸到墨西哥谷地之外。到蒙特祖玛二世(Moetezuma Ⅱ)于公元1502年成为统治者时，三国联盟已从数不清的大大小小城镇征收贡赋，从干旱的北部高原的边缘地带，到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低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在这一广袤的地区，只有少数的城邦或王国，如凶猛的塔拉斯科人(Tarascans)的城市或者特拉斯卡拉(Tlaxcala)城邦保持着完全独立。其他的城邦，如乔卢拉(Cholula)是以他们尊崇的中立立场或者与阿兹特克人的合作才得以和平保留。根据一些有争议的当代推测，被阿兹特克人和他们的联盟统治的人口大约有2 500万。

阿兹特克人发起战争并不管是否有理由。如果一个城市拒绝向阿兹特克统治者交纳贡赋，或者如果一个地区的保护人伤害了经过的阿兹特克商人，都被认为是发动侵略的正当理由。阿兹特克商人也报告他们做生意的那些地区的资源和防御情况，为征服做准备；有时他们也在敌对区充当间谍。如果这些勇敢的商人安全地返回家乡，统治者也会用琥珀色的唇环(amber lip plugs)和其他礼物给予他们荣誉。可是，如果他们的敌人发现他们，那后果就太可怕了。“他们会被伏击杀死，还佐以辣椒酱上桌”，当地的记录这样说。

注 一些社会学家试图解释阿兹特克人大量人祭的做法，以及与这一仪式伴随着的吃人肉习俗，认为是由于阿兹特克人的饮食中缺乏蛋白质。这一理论与阿兹特克人享有丰富的野生动物食物相矛盾。而且事实是，甚至在大饥荒时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材料中都没有谈到吃人肉习俗这一做法。这一做法也忽视了阿兹特克人仅在节日才吃俘虏的肉。还有，吃俘虏是有计划的，以使参与者都能分享到作为人祭的俘虏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很简单：一个抓捕者不能吃他的肉，因为阿兹特克人认为，抓捕者和他的俘虏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缘关系。


墨西哥各地
墨西哥湾
奇琴·伊察
蒂卡尔
帕伦克
地图所示区域
玛雅人地区
太平洋
萨尔托坎湖
特拉洛克山
特纳尤坎
伊斯华特佩克
特斯科科湖
特斯科科
阿斯卡波萨尔科
特佩亚卡克
特拉科潘
特诺奇蒂特兰
特佩architecture
伊斯特卡尔科
伊斯塔帕拉番
科尔华坎
查尔科湖
查尔科
米斯基克
伊斯塔奇华特尔火山
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
城镇
三方联盟首都
火山
山脉
堤道
0 5 10 15公里
0 5 10 15英里

墨西哥谷地

战争胜利的结果总是相同的：战俘沿着长长的大街被押上去特诺奇
25 提特兰的旅程，然后被放在神祠的祭坛上献祭。在那里，战败方还要被强
迫定期缴纳贡赋，如玉米、棉花、豆类及其他产品，根据各地区的地理和资
源而定。一些土地也被留出来由他们耕种，以扶持阿兹特克人的上族、
神职人员和城邦官员，或者作为封地授予在战争中表现卓著的勇士们。
贡赋管理或征收者常住城镇里，有时要由驻扎军队予以协助。在其他方面，
被征服地的人们通常继续享受着政府、文化和风俗方面的自治。

由于这种非完全融合的特点，其反映就是被征服地的人们享有相
对的自治，阿兹特克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在被征服地区很少出现，因此，
与印加帝国具有中央集中管理、常备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其他融合政
策相比，阿兹特克帝国在传统上只被看做一种层次低的、有缺陷的政治
26 组织。然而，最近有人认为，阿兹特克的政治体系并非层次低的，而是代
表了另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效率并非低下）——它从遥远的国家人们那里
可以最小的行政和军事支出提取剩余物资。阿兹特克的统治模式只是为
了进一步地征服和镇压叛乱。借助于把战败的政权留在当地，而避免了
直接的地区控制——在融合度更高的帝国是这样做的，阿兹特克城邦
节省了费用，却保留了地方行政权、常备军、守备队和[illegible]事。

阿兹特克的文化和社会

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提特兰的人口估计在15万和20万之间。
如同在椭圆形的岛屿上建立的城市威尼斯，它通过三条汇集到市中心
的堤道和陆地相连，这三条堤道也是其主要的交通要道。威尼斯没有
街道，数不清的河道中拥挤着许多独木舟，由小路连接着河道两侧的千
家万户。一条坚固的石头造成的水道从查普特佩克(Chapultepec)山上
引下来清凉的泉水。

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种植水中田畦的阿兹特克农民，划着小型独
木舟把他们的产品运到城镇。他们住在茅屋里，把枝条编起来糊上泥
巴就是墙，屋顶上覆盖的是茅草。每一个茅屋里都有一个三条腿的磨
石(metate)；有一些垫子作为床垫和坐垫；陶器稍微多一点。大多数

[illegible]人[illegible]、文职公务员、士兵和表演者，住在更壮观的房[illegible]的[illegible]岩建造的房子，往往刷上石灰水，并且画上[illegible]整齐[illegible]尔[illegible]利首领、商人和贵族的房子远比大多数房子更富丽堂皇。

[illegible]人的穿着也根据个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illegible]主要的服饰有缠腰带，衣服前后都有[illegible]以及刺绣装饰，以及一个大小约一两码的[illegible]披上，在右肩打结。平民披的普通毯子是[illegible]成的，而有的商人和贵族穿的则是非常精细的[illegible]女性穿的是直筒宽松衣服，白色的棉裹[illegible]长衣衫。无论是直筒衣服还是短袖长[illegible]的刺绣。男人穿着皮的或者龙舌兰纤维织的带子鞋，女的则是赤脚。

食物也[illegible]一样：[illegible]和社会地位决定了食物的充足与否或种[illegible]。一般阿兹特克人的食物构成包括玉米粉、豆子和辣椒酱或调[illegible]。平民的餐桌上很少见到肉，但在节日时，可能会吃狗肉。贵族[illegible]食物[illegible]他们吃的食物在当地的记录中提到了有多种玉米[illegible]、烤火鸡、烤鹌鹑和地南瓜种子、撒上果仁的鹿肉、各种各样[illegible]，还有这样精美的食物，如龙舌兰蚜虫拌小辣椒、[illegible]的蚂蚁[illegible]和加调料的鼠肉。他们以巧克力汁——一种平民禁止喝的极美饮料结束就餐。

阿兹特克人的教育非常正规，而且用于双重目的，即为男孩和女孩在这个世界上的职责作准备，并给他们灌输阿兹特克人的理念。男孩在10岁或12岁上学，平民、商人和艺术家的儿子入青年之家（Telpochcalli），在那里他们接受宗教、好的实用技术以及战争艺术的指导。更高一级的学校是神学院（Calmecac），原则上是为贵族的孩子预备的，但一些商人和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加入。在这里，除了一般的训练外，学生们还受到使他们将来成为神职人员、公职人员和军队领袖的指导。课程包括我们今天所称的修辞学，或者说高贵的讲话方式；学习

27 那些在圣书的圣歌中揭示的宗教和哲学；历史、年代学和天文学艺术；以及通过学习各年代的书（Xiuhamatl）增强在历史方面的训练。圣人（Tlamatinime）在阿兹特克学校的教学中关注的是"真正的面孔和真诚的心"如何形成。对于人性，阿兹特克人有引人注目的定义：自我约束、谦虚、忠于职责、坚忍克己和清醒的意识，因为"人会消逝，花朵会凋谢，所有到来的终将离去"。阿兹特克圣人在他们的正式会谈中表达的这种概念就包括无懈可击的举止、礼仪和谈吐。

女孩儿上特别的学校，她们在那里学习如何纺织、缝纫、献上香以及为崇拜对象准备食物这些庙宇工作；刺绣和其他女红；以及为婚姻做一般准备。男性教育通常在21或22岁时结束，女性教育一般在16或17岁时结束——这也是订立婚姻契约的年龄。阿兹特克帝国式精神的发展也许导致了女性地位的某种下降。阿兹特克"长者的谈话"警告妻子，"服从丈夫是你的义务。你要为他准备饮料、食物、衣服和鞋子。"模范妻子的代表是勤劳的、忠于丈夫的、尽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但在某些方面，阿兹特克妇女的地位不仅仅是服从丈夫，而是具有补充性。例如，孩子出生的象征意义可与战争相比：生下孩子等同于抓到了一个俘虏，出生时死亡就等同于战争中被杀。在其他领域，阿兹特克妇女也以医生、艺术家、商人和祭司为职业。

在这样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争端和侵犯行为的发生不可避免，因此发展出详尽的法典就成为必需。法庭管理制度的最高层是特诺奇提特兰皇宫的两个高级法官。阿兹特克的法律很严厉，偷窃、叛乱、穿异性的衣服和通奸都会被判死刑；偷窃者第一次会被判做奴隶，第二次会被吊死。

阿兹特克的墨西哥人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大规模的密集农业。在水源可靠的地区也采用密集灌溉；水中园圃是非常著名的农耕形式。耕地休耕的火耕在一些地区也是惯例，但几乎在所有地区，玉米和豆子都是最主要的农作物。由于没有大量的驯养动物，因此饮食中肉类缺乏。在墨西哥谷地中，水中园圃农业使用的肥料通常是"大粪"（人的粪便）。为了防止谷地的两条清泉被盐湖的水流污染（后者对水中园圃农业是

[illegible]力)，[illegible]使湖水量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伊兹科亚特尔王时期[illegible]建造精细的排水道、人工水道和输水槽道。这也导致修建了更大[illegible]田，为特诺奇提特兰城生产粮食。然而，尽管产量丰富，[illegible]城市生存所需的5[illegible]，耕地的扩张受到剩余湖[illegible]化的[illegible]。因此，为了平衡粮食需要，特诺奇提特兰必须依赖通[illegible]粮食输入。[illegible]的、城邦控制的贸易和交通网络，[illegible]为基础，专业运输者(tlameme)的货运系统以[illegible]整个[illegible]的独木舟交通，给特诺奇提特兰注入[illegible]其他大批商品。加工过的商品又被从特诺奇提特兰运到它的腹地，形成了核心—外围的关系。

[illegible]交换和服务在特诺奇提特兰巨大的市场上进行[illegible]者科尔特斯大为震惊，他对许多活动都进行了详细[illegible]“[illegible]不同的商品，”他写道，“而且他们也不把任何[illegible]的[illegible]相混淆；因此他们秩序井然。”阿兹特克人缺[illegible]、棉斗篷、装满金粉的羽毛管以及小铜[illegible]，以作为物物交换体系的补充。阿兹特克人没有[illegible]。市场由官员管理，他们检查交易公平与否，审理商人的诉讼并处理买卖双方的纠纷。 28

[illegible]的叙述[illegible]，到征服的时候，阿兹特克人的劳动分工已经发[illegible]了这样[illegible]：[illegible]数量较大的手工业阶层已不再从事农业。手工业阶层包括[illegible]、陶工、石匠、银匠和羽毛工人。属于这一范畴的专业人士还有商人、猎人、歌者和乐师。所有这些专业人士都加入行会组织，每一个行会都有[illegible]会会所和保护神；他们的职业可能代代相传。在阿兹特克社会中，艺术家和工匠享有更高的荣誉地位和责任。[illegible]有的艺术和手工业者都认为本行业起源于托尔特克时期，因此阿兹特克人用托尔特克称呼那些绘画、歌唱、制陶和雕刻的真正大师。

地区劳动分工的发展和奢侈品市场的增长也导致了商人阶层的出现，他们组成了强势的行会。这一阶层的财富和它对阿兹特克承办重要的军队和外交支持，使商人成了阿兹特克社会的第三大力量，仅次于

武士贵族和神职人员。但是，商人的财富有时候也引起阿兹特克统治者和贵族的不信任和敌意。普通人对商人的敌意反映在当地的谚语中："商人是那些富裕、成功的人：贪心的、吝啬的、贪婪的、小气的守财奴，控制着财富和家庭……卑鄙、小气、自私的人。"

神职阶层是阿兹特克社会主要的整合力量。通过拥有多种各方法，他们调节农业活动的实施，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神职阶层也是全部知识积累和阿兹特克部落历史的宝库。借助于神人调节的特殊力量、知识和智慧，祭司被邀请介入到阿兹特克人的一个私人或公共的危机中。独身、简朴、不断从事政治祈祷，神职人员对阿兹特克人民行使着强大的影响力。

和神职阶层共同享有权威和名望的是贵族。这个阶层通过世袭和政治集权获得权力。这个阶层构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许多武士外，还包括贡赋征收者、法官、大使等等。这些官员得到的报酬是通过指定的公有土地的收益支付的。他们的职位并非世袭，但通常授予儿子与其父亲相同的职位。

武士贵族的财富主要构成是地产。最初授予武士地产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这些土地后来称为私有地产代代相传，而且可以出售或交换。土地上的那些农民只是在形式上自由，他们可能转化成了和土地相关的雇农、农场工或租种土地的佃农。随着阿兹特克帝国的扩展，私有地产的数量稳步增长。

生活在阿兹特克社会边缘的是人口众多的奴隶阶层。奴隶是对各种过错的惩罚，包括无力偿还债务，以及为了换到粮食有些人自愿成为奴隶。奴隶主经常带着他们的私人动产到阿斯卡波特萨科(Azcapotzalco)的大市场上，把他们出售给富有的商人或贵族做仆役，或者把他们作为神的祭品。

阿兹特克的政治体系是王权专制和神权政治的混合。政治力量集中在神职人员和贵族统治阶级手中，他们是绝对的统治者。起初，整个阿兹特克社区的人都会被集合起来挑选他们的统治者。后来，统治者由议会或选举团挑选，议会和选举团被最重要的神职人员、官员、武士

以及国王的选[illegible]制[illegible]议会与特斯科科和特拉科班的国王商议，从上[illegible]者[illegible]外甥中挑选他们的元首。新的统治者[illegible]个[illegible]议会辅佐[illegible]西班牙人征服时，其皇帝是倒霉的蒙[illegible]玛[illegible]世，他继承了其叔叔阿维佐特的职位。

在蒙特祖玛[illegible]统治期间，各种[illegible]和繁琐的仪式盛行。在他面前，王[illegible]大贵族们[illegible]下复杂的羽毛、玉石和黄金装饰，还要赤脚，眼睛看[illegible]地面。[illegible]蒙特祖玛在富丽堂皇的单间用餐，木质屏 29
风把他和仆从、与他谈话的四个大贵族隔开。

[illegible]表明，曾经被蔑视的阿兹特克小部落在社会、经[illegible]发生了[illegible]变化。不到两个世纪之前，它才来到特斯科科湖的[illegible]阿兹特克帝国达到了它的富裕和权力的顶峰。然而，[illegible]在[illegible]中，这一点是通过阿兹特克编年史证[illegible]对阿兹特克[illegible]征收者持续增加的要求引起了进贡城镇的叛乱[illegible]的叛乱不断爆发。阿兹特克人脑海中萦绕不断地想[illegible]不存之兆和频频不断的状况，如双头小孩的出[illegible]；波波卡特佩特(Popocatepetl)火山[illegible]变得不常活动；彗星划过天空[illegible]。根据阿兹特克传说，公元1519那一年，神君羽蛇(Quetzalcóatl)会[illegible]与帚星走的地方返回来，收回自己的领地。

秘鲁的印加

在11世纪中期，现在的秘鲁高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个小部落，到公元1500年它创建了古代美洲最强大的帝国。自从皮萨罗(Pizarro)时代发现和征服秘鲁，印加在政治和社会组织上的成就已经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在征服之后不久，一场关于印加社会性质的讨论就开始了，这一讨论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illegible]”；另一些人则把它看做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福利

[illegible]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编者注

社会"的祖先；还有人认为，印加帝国希望的是20世纪的极权专政。可是，最近又有来自殖民地区记录——官方的经济和社会调查、诉讼、遗嘱等的更详尽的研究证据，提供了关于印加社会更确切的画面，并且摈弃了传统的认识。

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这个地区引人注目的文化发展是一个关键要素。在秘鲁，海边前山有着显著的对比，一条下到海岸的狭窄平原是真正的沙漠。洪堡寒流(The Humboldt Current)沿着海岸从南极地带直到北方，使海洋比陆地更冷，因此，云雾笼罩着了海岸。但是，从高山雪域上急冲下来的小河带来了很多的降水。这些小河在沿海不断地创造绿洲，提供了水果蔬菜等必要的生存条件；干燥的气候保存了土壤的自然肥力，这在降雨量大的地区却会流失。海洋中的水产丰富可以发展渔业，它的海上岛屿在印加时代积满了一层厚厚的鸟粪(guano)，为农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肥料。

印加文化的起源

如同古代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一样，秘鲁的印加人也继承了伟大古老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起源不在高地上，而是在沿海。在公元前2500年，主要基于捕鱼和食物采集，并以南瓜、利马豆子和一些其他农作物为补充的乡村生活，已经出现在沿海地区的河谷里。玉米在公元前1500年被引进到秘鲁人的农业中，但直到许多世纪之后，它才成为重要的农作物。

与中美洲相比，秘鲁从古代时期到前古典时期的转换似乎出现更晚而且更突然。在上面描述的漫长的数个世纪的简单乡村生活之后，
30 约公元前900年，一种强有力的高级文化在沿海开始了。这一提升似乎已经和农业的进步联系起来，特别是玉米的更大应用，而且伴随着从沿海地区向河谷上游的迁移——这很可能是人口压力的结果。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一种独特的建筑、艺术、制陶和编织风格，被称为查文(Chavin，以1946年发现的重要仪式中心的遗址命名)，沿着海岸扩展，甚至扩展到了高地。查文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猫，很可

美洲豹被当做神，对猫的崇拜遍布查文影响的地区。

秘鲁的古典文明繁盛期出现在旧世界的基督时代或之前不久，也在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中反映出来，以灌溉和施肥著名。这种取代了查文的其它文化是纳斯卡文化(Nazca)，位于今天沿着秘鲁海岸线区域以及它的高地。纳斯卡制陶显著的特征是对颜色的使用，一个陶罐经常上有多达11种经过柔和的色彩。可爱的纳斯卡编织品展示了丰富的色调。

秘鲁北部海岸的莫奇卡(Mochica)文化更为引人注目。莫奇卡人建造了金字塔、寺庙、道路和大型灌溉渠，他们还发展出了复杂、分层清晰的社会，包括一个有着贵族阶层和强权的祭祀王。冶金术高度发展，这一点通过对模具和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金、铜和银的合金产品得到了证明。但是和其他艺术家一样，莫奇卡最著名的器物是他们的红陶器和黑陶器，现实主义的完美设计绝无仅有。陶器上也经常装饰着有着繁多的现实主义绘画，包括性爱场景，今天它是收藏家的收藏对象。陶器上描绘的战争场面，表明他们长期为了有限的耕地和水资源而斗争，这说明强大的莫奇卡人自己最后也被劫掠他们土地的入侵者击败，于是莫奇卡文化衰退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秘鲁北部。

大约公元600年，安第斯文明的中心从沿海转移到高地。它在一个叫做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的地方，位于玻利维亚高原上的的的喀喀(Titicaca)湖之南。那里有一个壮观的仪式中心，以巨石建筑和人像柱雕像闻名。巨石建筑是用巨大的石块严丝合缝地垒在一起建造的。蒂亚瓦纳科似乎已经成为军事城邦的首府，它实际上控制着从阿雷基帕(Arequipa)向北到玻利维亚和智利高地的整个秘鲁南部。另外一些人，如瓦里人(the Huari)，是从他们的家乡，即今天的阿亚库乔(Ayacucho)附近开始他们的征战生涯；他们的领土最终包括沿海和高地，最远直到北边的卡哈马卡(Cajamarca)，南部到蒂亚瓦纳科边界。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瓦里帝国在公元1000年崩溃，几乎是同时，蒂亚瓦纳科也看来走到了尽头。这些帝国分裂后，安第斯南部地区重新回到了政治和艺术的地区割据状态。

到公元1000年，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它们先辈的古典城邦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控制着秘鲁北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它们的崛起伴随着城市的增长。每一个河谷都有自己的城市中心，而且遍布的灌溉工程支撑起了更多人口的生存。这些城邦中最大的奇穆(Chimu)王国，它的都城昌昌(Chanchan)是个方圆达8平方英里的大城市，房子是用大块用模具压成的土坯砖建造的，分成大的住宅单元或大院。

印加的经济和社会

高地上同时还有大片比较不适宜定居的地方，在那里，一个新的势力正在崛起。印加人（他们是以自己统治者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谦虚朴实。众多小部落之一的印加人居住在安第斯高地的库斯科(Cuzco)地区，这些小部落彼此都要为了获得土地和水资源而奋斗。库斯科山谷有利的战略地形以及比其邻居优越的文化上的优势都有利于印加人开始他们的征服历程。以前的帝国——查文、蒂
31 瓦纳科和奇穆，毫无疑问给印加人提供了建设性的征服程序，以及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技术得以征服。如同其他的古代帝国一样，印加也有许多神话和传说，描述他们统治者的神圣起源，并能给予他们的战士超自然力的偏爱和保护，使人们的安全有所保障。

帝国的真正扩张似乎在15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此时是印加国王帕查库提(Pachacuti)统治的时候，他于公元1438年登上王位。通过运用如宣称神圣救助、许诺公平、威胁和暴力征服等策略，帕查库提和同样也是个伟大征服者的儿子——印加国王托帕(Topa)一起，得到了许多地方的臣服。帕查库提被誉为伟大的组织者和勇猛的战士，许多改革和革新也要归功于他，包括设置地区和详细的行政管理机构，使印加帝国的车轮滚滚向前。到公元1527年，太阳之子的边界记号北部已经到了今天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地方，南部直达智利的毛尔河(the Maule river)。大约有900万人衷心拥戴他们的帝王。当西班牙人到达的时候，统治者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他刚刚击败他

[illegible]斯卡(Huascar),披上帝王斗篷。

印加人用一套有效措施来维持他们的权威,包括推广他们的克丘亚(Quechua)语(今天安第斯地区中部大约有六分之五勤劳的人民仍说这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强迫人们接受统一的城邦宗教信仰,以及把被征服地区的首长合并集中到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中的精明政策。在[illegible]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重新安置政策,或者叫殖民化政策。这些政策包括[illegible]被征服者,用来自帝国比较老的地区忠于他们的殖民者(mitimaes)代替。畅通的道路网和步行道把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使人们能从帝国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些道路是铺设的;有一些是用石头铺成的。沼泽地的道路通过渡槽连接;悬索桥[illegible];还有一些是用有浮力的芦苇架起的浮桥。印加人没有文字,但他们有一套保存记录的方法,这种帮助记忆的辅助物叫"奇普"(quipu)①,是一根木棍或主绳上,上面系着打了许多结的细绳。不同颜色的细绳代表不同的事物、人或区域;系在细绳上的结代表一个、十个、百个、千个单位的增加等等。

印加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它的密集灌溉农业,它毫不费力地支撑起[illegible],并且包括庞大的印加军队、臃肿的行政机构以及许多其他不从事生产的人。印加并没有进一步发展这种农业。到他们崛起的时候,[illegible]灌溉系统很可能已经扩展到了沿海所有适合的地区和耕作土地。但是伴随着政治和宗教机构的建立,印加人引进了灌 32
溉、梯田和施肥这些较为原始的文化所征服的人们的先进做法。梯田广泛推广以扩展耕地,并且避免了狭窄的安第斯山谷中雨季陡峭山坡上的急流对田地和居住地的危害。灌溉渠——有些只是壕沟,有些是有坡度的[illegible]人造的渠,把水输送到需要浇灌的农田和牧场里。

农业工具少而简单。他们主要有犁地和给种植挖坑的脚犁,以及用于一般松土的[illegible]。正如前面提到的,土豆和藜麦是较高的山谷的主要粮食;玉米在较低[illegible]的主要农业做;大量的农作物,包括棉花、可

---

① 意译"结绳记事"。——编者注



天命印加国王库西·尤潘基(Kusi Yupanqui)，帕查库提(Pachacuti)印加，他的名字含义是"世界的救赎者"，继承了他的父亲印加国王维拉科查(Viracocha)的王位，成为库斯科王国的第九任皇帝

可和豆子都种植在地势较低、温度较高的山谷。印加城邦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调节不同地区的产品交换，主要通过征收贡赋，并将其在印加社会不同的人群中重新分配。通过允许特定社区的成员开发安第斯"垂直"经济中不同层级的资源，印加城邦也激励人们自给自足。

印加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艾柳"(ayllu)，一种声称家族成员出

① 尤潘基本是动词，意指"你将讲述"，用作称号，意思便成为"值得讲述其（君主）的丰功伟绩、杰出品德、博大胸怀、慈悲之心和温柔性格"。这一种称呼习惯，与古代罗马人对皇帝称呼为"奥古斯都"相同。转引自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著：《印卡王室述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0页。——译者注

个祖先并在其内部通婚的血缘组织。在婚姻中，两个人的结合使两个成员都以血缘关系联系起来，因此他们两个人“从此以后要像兄弟姐妹那样相互对待”。不仅兄弟姐妹有相同的父母，而且大表姐、表妹、[illegible]表[illegible]（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同一个曾祖父）都要把彼此看做兄弟姐妹。这样，婚姻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断扩展的血缘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希望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会超过一个单一家庭的能力。

村庄社区由几个艾柳组成，每一个艾柳都有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被成批分配给族长们。每个族长都有权使用这些土地或者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但不能卖掉或者以其他方法处理土地。村民在农活、住宅建造和其他私人或公共性质的事务上经常实行互助。印加统治者拿过这一社区原则，并以劳役——即无偿、强制劳动的形式利用它为自己服务。用考古学家纳唐·华德（Nathan Wachtel）的话来说：“印加帝国基于古代公共的生产模式在当地留了下来，它利用对等原则合法化其统治。” 33



印加帝国的扩张（1460－1532）

性别平行开始时伴随着

血缘平行，在艾柳的血缘关系组织和观念形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妇女通过她们的母亲把自己看做妇女那一边的后代；男子则通过他们的父亲把自己看做男子那一边的延续。艾琳·西尔弗布拉特（Irene Silverblatt）在她关于安第斯社会性别关系的名著《太阳、月亮与巫师们》（*Sun, Moon, and Witches*）中写道："通过平行家系构成性别关系和血缘关系的这一组织是内在的，是安第斯女性和男性建造和重建他们的社会存在的方式。性别平行的价值和其调在实践活动中通过他们对生活的建设和经历不断得到加强。"

平等的对话确保了女性可以通过她们的母亲享有土地、牧群、水和其他资源。性别平行也确定了安第斯社会的劳动分工，人们认为特定的活动更适合男性或更适合女性。人们认为，编织和纺织是女性的工作，而犁地和挑担是男性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被看做是相互补充、同等重要的。

然而，在印加人征服之后，西尔弗布拉特说："男性的帝国观念在安第斯山地区成为标准。""士兵"是给予男性市民的称号，已婚男性会被添加到帝国的人口普查册上；与其相对应的女性范畴则是"士兵的妻子"。有证据表明，在印加人征服之前，继承母亲权力的妇女有时候也拥有艾柳这一层次的领导地位。但是，印加帝国的规范——"把男性与政治权力和征服联系在一起，随着帝国的扩张已打破了性别关系的平衡。男性充斥于印加的行政和军队等权威部门，这就否认了妇女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但是安第斯的平行家系传统仍然允许印加贵族妇女有得到她们自己资源的要求，在库斯科地区还有权把土地从上一代贵族女性传到下一代贵族女性。

在印加征服之前，艾柳是由库拉卡们（curacas，世袭酋长们）管理、长老会议辅佐的。一个高级库拉卡或地主（大库拉卡，jatun curaca）管理所有人或城邦。在印加的统治下，通过有计划地迁走它的一些成员和在它们中间安置外来人口（mitimaes 系统），艾柳组织基本的血缘关系被削弱了。各种大量的土地被从村庄收走并在印加的城邦和城邦的教会中行赏。艾柳成员除了要在自己和他们的库拉卡的土地上工作

村民必须耕种印加城邦和教会的土地，印加征服者还强制村民通过修建梯田、水坝和整修旧田开辟新的耕地。新的土地常常作为私有不动产移交给库拉卡们和印加军队的首领以及贵族——那些对印加城邦贡献卓著的人。印加人自己也拥有私人地产，而且那些死去的帝王的后代也有他们的不动产，并用它们来保持对这些先前统治者的崇拜。这些私有不动产并不是由艾柳成员耕种，而是一个新的奴隶阶级——亚纳科纳(yanacona)①，西班牙语的原意将其定义为“永久的仆人”。每一个王室成员都有一些这样的仆人或家臣，他们也在印加的庙宇、宫殿工作，以及作为私家表演者服务。

除了农业劳动，艾柳的成员还必须在一个称为米塔(mita)的制度下进行劳动，包括修建道路、灌溉渠、要塞和矿场工作，后来西班牙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也采纳了米塔这一制度。其他的要求是要村庄给城邦提供一定数量的织物供王室和仆役做衣服之用。所有在某个年龄段之间的体 34
格健全的平民都要服兵役。

在这些制度安排上，并不能发现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的印迹，这些制度安排并不有利于平民，而是有利于印加王室、贵族、神职人员、武士和官员。许多被引用以反映印加城邦的仁慈和远见的活动实际上是传统村庄和艾柳的功能。这种活动中有一种是社区把粮食和布料保存在仓库里以备灾荒年之需。印加城邦只是承继了这一原则，正如它已经承继的为了社区目的而合作劳动的原则一样，并且建造了仓库贮藏那些通过强制农民在城邦和教会的土地上劳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储藏在这些仓库中的布料和谷物主要用于下述那些人的衣物和口粮，即军队、王室艺术家、公共工作的服务者，以及居住在库斯科和其他城镇的官员。

印加王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基于互惠原则，这通过详细的赠礼和回礼体系得到了体现。农民耕种印加王的土地，把毛、棉加工成布料，并且为他做各种各样的其他劳动。印加王——神圣的世界之主——反过

---

① 在克丘亚语(Quechua)中是复数，但西班牙人将其作单数使用。

来也允许农民耕种公共土地，在物资短缺的时候也给村主发放自己仓库中的剩余粮食。因为帝国的赠礼是农民自己劳动的产品，通过印加的统治者和贵族，这种"互惠"等于加强了对平民的控制。但是，我们也不必低估这种观念形态的拥有，从宗教的世界观看，它把印加王看做有责任维护秩序和印加农民精神世界的存在。

在征服时代，平民所承受的严格管理和艰辛生活和印加贵族的奢侈生活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鸿沟。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印加王与其同族人，由十二个家族构成。这些家族的成员有在耳朵上打洞和用大的饰物拉伸耳垂的特权——因此西班牙人把这些印加家族的人叫做大耳朵(orejones)。大耳朵不用服劳役和兵役，和省上的库拉卡人一样，他们曾经是拥有自己的权力的酋长，拥有一批特定人员——仆役、家臣、基普(qiupu)侍卫等其他官员以及歌舞伎。他们和司库成果一起，占有了农民的剩余产品，控制不同地区的商品交换，并管理着许多大型公共事务，这样在印加贵族和库拉卡中就出现了原始的封建主义。他们对印加王的忠诚和服务得到的回报是丰厚的土地、美洲驼(llamas)和数个亚纳科纳等赠品。随着资源的增加，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地方从属者，并且获得了某种王权之外的相对独立，在皇帝死后接下来的继承人问题上有时起着重要作用。

印加王对农民的统治大部分是非直接的，通过地方酋长行使的。这可能因此而没有严重影响村庄里的日常生活规律。高地上典型的农民房屋是一个小茅屋，墙由粗石、或土砖垒成，屋顶覆盖着茅草。家具很少，包括一个睡觉的高平台、泥炉灶、一些泥做的罐和餐具。男人的衣服由腰布、无袖束腰外衣和一个披在肩膀上的大斗篷两个角系在前面；根据社会地位不同，所用布料的细致和装饰都会有所不同。妇女的衣服一块裹布从胳膊下面到脚踝，上边绑在肩膀上并用圆柱针固定。有个环腰的装饰带和披肩就构成了妇女的服装。男子用耳塞和手镯装饰自己，女子则戴项链和使用披肩针。

西班牙人征服前夕，印加城邦看起来似乎拥有无限权力。但是，像阿兹特克帝国一样，深刻的矛盾冲突也使其分裂。被奴役的人们常常

[illegible]起义，再被暴力残酷镇压。其余表面上忠诚的库拉卡人——从前[illegible]统治的地主，也怨怒印加充满戒备的管理，梦想有一天能重获他们失去的自由。 35

印加的宗教和知识

印加[illegible]教和更古老的祖先祭祀以及数不清的瓦卡斯(huacas，[illegible]和地方)崇拜并存。印加的主神是不可名状的创[illegible]维拉科查(Viracocha)和帕查亚查奇科(Pachayachachic，世界的主[illegible]者)。[illegible]崇拜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神职和贵族阶层，似乎已[illegible]教。重要性排在维拉科查之后的是太阳神，印加[illegible]祖先。其他著名的神还包括雷神，它给人们[illegible]，以及月亮神——太阳神的妻子，在调节印加庆祝[illegible]重要作用。印加有许多庙宇供奉他们的崇拜对象，祭司[illegible]指导和安排这些仪式，包括祈祷、献祭、忏悔和占卜活[illegible]。祭司的另一个功能是用魔力治愈疾病。还有一个圣女(mamacunas)[illegible]教活动中辅助祭司们的工作，她们立誓要永远保[illegible]。在[illegible]重大的场合还会举行人祭，比如重要的战争胜利或一些巨大的自然灾难发生时。

印加艺术[illegible]是具有很高的技术成就。建筑坚固且实用，特点[illegible]不美观。[illegible]土地上的石头雕像比[illegible]更多。人们将其描述为笨[illegible]文产品。但是[illegible]的挂毯编织是世界纺织品艺术的杰作之一，织艺优美精细。印加的冶金业也有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库斯科，印加的都城，有大量金饰的物体：王宫有金雕带和金银镶板，太阳神庙有一个花园，里面有栩栩如生的植物和动物造像，全都是由金子打造的。

虽然印加人没有文字系统，因此没有书写的文学，但是叙事诗、祈祷文和故事却世代口口相传。保存下来的印加圣歌和祷文以它们的高[illegible]思想[illegible]而著名。其中一首长叙事诗讲述了印加神话、传说和历史，以[illegible]文散文形式保存下来的只是其概要。

许多传统的[illegible]爱情歌曲中都充满着忧伤和思念的情绪，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仅有的几首音乐作品也是同样悲伤的调子。这种音乐基于五个音，或者叫五声音阶、音列，是由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笛子、喇叭和口哨；锣、铃铛和拨浪鼓；以及各种皮做的鼓和小手鼓。有时候还有舞蹈伴着音乐代表了戏剧的最初形式。

虽然西班牙征服者破坏了印加的政治组织，而且这些致命的打击也波及印加文明的所有方面，但是印加文化要素却在安第斯地区中部的每一个地方都保存了下来。这些保存下来的东西，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包括克丘亚语、大量当地的社区或艾柳，仍然节约地以互助原则为基础；广泛的凡宗教信仰者和人们的习俗；当然，还有萨科萨华曼(sacsahuaman)的纪念碑遗址、奥兰太泰博(Ollantay tambo)、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皮萨克(Pisac)和库斯科城自身。印加文明也存活在秘鲁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政治家的著作中，他们描绘并使人忆起已逝的印加的伟大，并赞扬那些人古老的美德。对于许多秘鲁人而言，正是印加人高超的技术成就和社会管理确保了所有人都拥有适度的财富，这也给他们自己拥有的固有能力提供了证据，证明当今贫穷充斥、分崩
36 离析的秘鲁也许仍然会有的美好前景。

第二章 西班牙背景

焦点问题：

- 征服对古代世界的伊比利亚半岛[1]的发展有何影响？
- 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的制度、传统和价值观中的哪些东西塑造了拉丁美洲的未来？
- 再征服如何塑造了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
- 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的统治有何积极和消极影响？
- 哈布斯堡(Hapsburg)王朝的政策是什么？它们对帝国的衰退有何影响？
- 公社社员(Comunero)暴乱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

很久很久以前，征服就是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不知名的艺术家画了精彩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壁画，半岛的史前居民被含糊地称为伊比利亚人的许多部落和凯尔特人(Celts)控制，人们认为他们可能于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分别来自

---

[1] 伊比利亚半岛，[illegible]欧洲西南的半岛，比利牛斯山脉将它与欧洲其他地区分开，直布罗陀海峡将其与非洲隔开。——译者注

北非和中欧。新的入侵浪潮带来了腓尼基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这些贸易民族在沿海建立了交易中心和城市，但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试图控制内陆。直到后来，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关于贸易主权的重大冲突中成为了帝国的赌注，并在公元前201年以后者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从那以后的6个世纪，罗马在这个地区有决定性的权力。

不像其他更早的入侵者，罗马人试图在新的土地上在当地人中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强制性地推广他们的语言、管理、法规，甚至名字：西班牙(Hispania)。它们抹去了半岛的古方言，有各种各样的方言，而且直到今天西班牙人都被说成有这样的方言。罗马法代替了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其他当地人的习俗法。通过强迫改变居住地、把人们集中在城镇以及建立罗马殖民地充当安抚和同化机构，罗马人摧毁了当地的部落组织。农业、矿产和工业得到了发展，这些罗马殖民地和意大利有大量贸易来往，包括小麦、葡萄酒和橄榄油。罗马工程师建造了大型公共道路和水道，一些到现在依然在使用。罗马人给当地人带来了他们的教育制度、文字文化以及许多罗马市民，包括讽刺诗人马蒂尔(Martial)、叙事诗人卢坎(Lucan)和哲学家塞内加(Seneca)，他们或者出生或者居住在半岛殖民地，对拉丁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5世纪初期，罗马军事力量衰退的结果是，许多日耳曼血统的野蛮人入侵罗马。到5世纪后半期，一群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入侵者已经控制了半岛的大部分。由于长期和罗马人的接触，西哥特人已经吸收了罗马文化，并继续和西班牙-罗马人保持联系。西哥特王国信
37 仰基督教，它的语言构成是拉丁语和一部分日耳曼术语的混合。在管理上，它因循了罗马模式，但是王权的延续则沿用了日耳曼的选举传统，这也常常是内部重大冲突的根源。

伊比利亚基督王国的中世纪遗产

王权争斗造成了哥特人的分裂，这对新崛起的穆斯林势力有利，它

[illegible]已在[illegible]横扫整个北非平原。公元711年，伍麦耶王朝[1](Umayyad)哈里发[illegible]组织的敌人越过海峡并决定性地击败了哥特王国最后一任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短短几年之内，除了坎塔布连山脉(Cantabrian Mountains)的北部地区之外，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落入穆斯林之手。但是，穆斯林人控制的一个位于荒芜丘陵上的基督教王国卡斯提尔(Castile)却从来没有富强过，因此，他们更愿意拥有西班牙南部气候温和的肥沃平原，他们把那里称为安达卢斯王国[2](Al-Andalus)，即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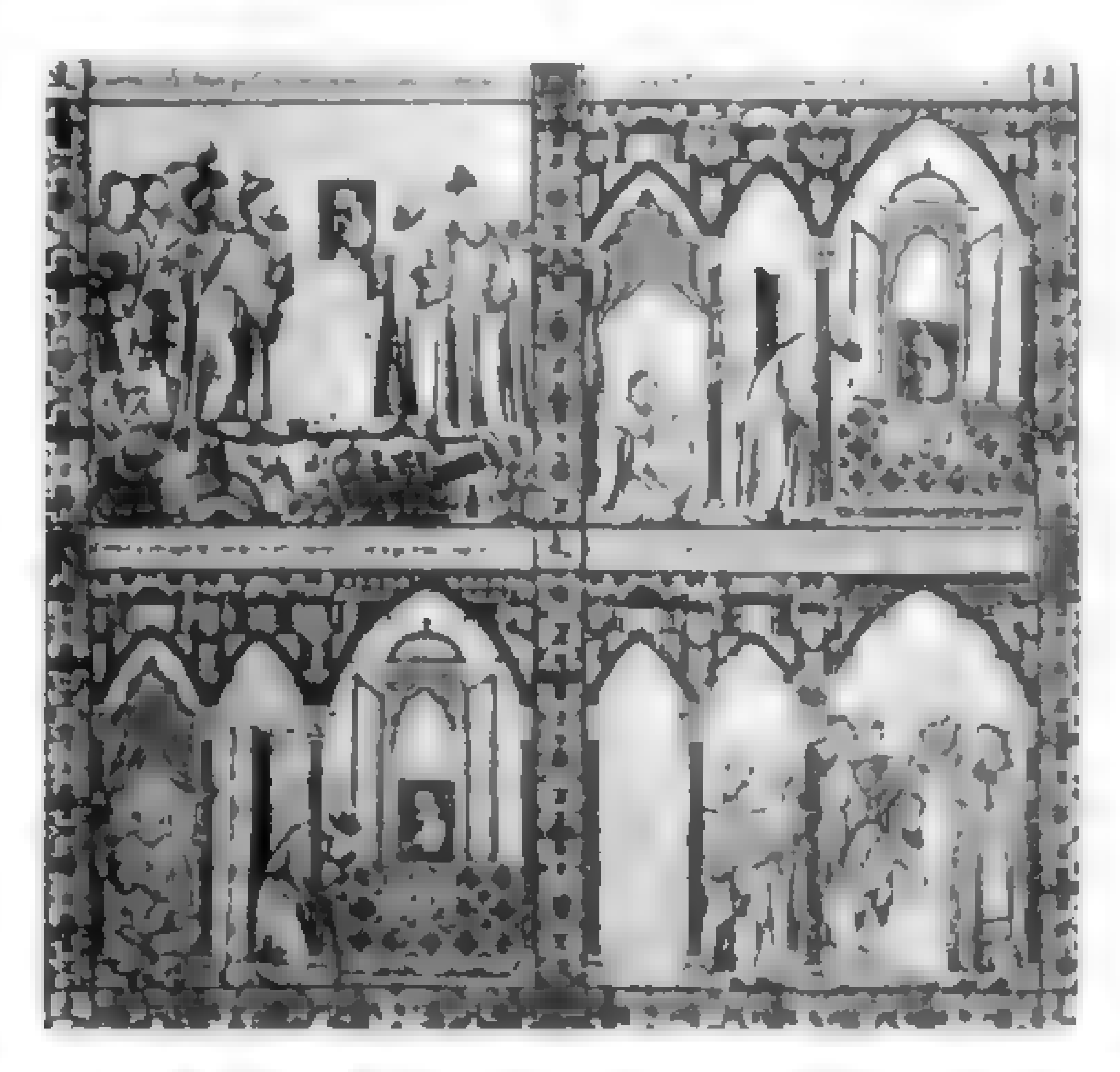
伍麦耶人继承了古代地中海人和亚洲世界积累的文化财富，他们[illegible]进一步[illegible]，对科学、艺术和文学都作出了他们自己的伟大贡献。[illegible]首都设在科尔多瓦(Córdoba)，它就把伊比利亚世界变[illegible]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地，从那里新的知识和观念又涌向基督教的[illegible]。农业上的收获有新的灌溉技术的引进、抽水设备，以及新的作物[illegible]、藏红花、棉花、丝绸和柑橘类水果。通过诸如纸和玻璃这些对于基督教欧洲仍是未知的产品的引进，工业也大为扩展。穆斯林的冶金、[illegible]和[illegible]技艺在整个欧洲都是值得称道的。许多穆斯林统治者是文学和学问的庇护者；学者国王哈库埃姆二世(Al Haquem Ⅱ)建造了一座图书馆，据说里面有共计40万册藏书。

[illegible]，伍麦耶征服者并不坚持要被征服的基督徒改变信仰，而是让他们选择是接受伊斯兰教信仰或者支付特别的人头税。这一相对宽容的穆斯林政策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曾经遭到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严重迫害的犹太人，现在享受着官方的保护并且对医药、[illegible]做出了很大贡献。农民的生存状况也有所改善，因为征服者把西哥特地主的大量土地都分配给了奴隶们，他

① [illegible](661—750)，其首都为大马士革。——译者注

② [illegible]的穆斯林王国[illegible]人不乏[illegible]和建筑家，[illegible]安达卢斯王国的百姓生活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他们平时学习科学、数学、天文、写诗、下棋。

们只需要给穆斯林领主支付一定量的产品，剩下的就可以都留给自己。但是几个世纪后，在穆拉比人(the Almoravid)占领这里的时候，这些倾向却出现了逆转；巨大的地产再次出现，税收增加，对犹太人和莫扎勒布人(Mozárabes，基督徒，吸收了阿拉伯语言和习俗)的迫害已经使许多人逃跑到基督教地区。



借助于基督教王国对伊比利亚犹太人的镇压，伊斯兰军队在8世纪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并且开创了一段和平共存的时期。甚至直到基督教重新征服之后，他们对西班牙的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化诸方面都留下了恒久的多元文化印迹

尽管伍麦耶王朝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它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
38 第一，它在扩展哈里发帝国方面的巨大成功，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冲突。10 世纪之后，稀缺资源耗尽，帝国扩张减缓。第二，由于帝国内部难以控制的激烈的政治和宗教争端，穆斯林世界分崩离析了。一些穆斯林人讥讽伍麦耶人为亵渎者，因为他们不情愿遵从"神的使者"而渴望王国的中央权力。在伊比利亚半岛，这些内在的分歧通过伍麦耶人和穆拉比人，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s)之间的冲突而日趋复杂。柏柏尔人转信伊斯兰教不久，却比他们的前辈们更为狂热虔诚。到 11 世纪中期，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已经侵占了许多王国，王国彼此之间的战争持续

代。这些骚乱使得一些在北部出现的小基督教王国幸存了下来，变得强大并最终发起一场普遍抗衡穆斯林人的攻击。到12世纪中期，西部的葡萄牙王国已经从卡斯蒂利亚中独立出来，并在两个世纪以后获得了其历史性的边界线。中部的莱昂(León)和卡斯蒂利亚联合王国奋力反攻，东部的阿拉贡(Aragon)王国以穆斯林诸城邦的分裂为代价稳步扩张。

再征服开始时，基督教国王和贵族们只是为了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斗争；后来它才承担起了宗教战争的任务。9世纪时在西班牙西北发现的据推测是圣詹姆士(St. James)的墓穴，成为著名的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朝圣中心，同时也成了诸基督教王国的战士在再征服和对新世界的征服中一个很为重要的保护神。但是著名的熙德(Cid)[1]的职业生涯却表明，在斗争最初阶段还没有出现宗教狂热。在熙德那个时代，这一理念是自由的，他对领地的忠诚超过了宗教，而且作为萨拉戈萨(Saragossa)和巴伦西亚(Valencia)穆斯林国王的一个封臣，他与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敌人都同样作战。公元1094年，当熙德夺取并统治巴伦西亚的时候，他允许穆斯林人信仰自由并拥有自己的财产，唯一的要求是要缴纳《古兰经》认可的贡赋。

伍麦耶人徒劳地通过号召新转教的、北非宗教狂热的穆拉比人来帮助他们，以抵制基督徒的进攻。1212年，基督徒在安达卢西亚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sa)战胜了庞大的阿尔摩拉维军队，成为再征服标志性的转折点。卡斯蒂利亚的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 Ⅲ)，穆斯林伊比利亚的主要人物，于1236年夺取科尔多瓦。1248年塞维利亚(Seville)投降，费迪南德三世控制了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 river)河口并和海上建立了联系。到1252年费迪南德去世的时候，穆斯林的地盘已经回缩到格拉纳达(Granada)小王

[1] 熙德，本名为罗德里戈·迪亚斯·德比瓦尔，卡斯蒂利亚贵族，巴伦西亚的征服者和城主，西班牙民族英雄。——编者注

国。格拉纳达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陡峭的山脉和难以逾越的峡谷保护了它，加上基督徒阵营内部出现的分歧，使得格拉纳达赢得了两个多世纪的独立生活。

卡斯蒂利亚

尽管20世纪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们通过认同他们15世纪祖先的历史成就，寻求他们同时代征服的合法化，但是直到相对比较晚的时候才有统一的称为西班牙的城邦国家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前的西班牙是由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基督教王国构成的，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和它们的穆斯林占领者之间都有残酷的冲突，首先是争夺对地中海世界的控制，接着是海上控制权的斗争。卡斯蒂利亚，这个所有王国中最大最强的王国，在再征服中担负着领导任务。伟大的运动在卡斯蒂利亚人的性格中留下了坚忍的印记。数世纪反对穆斯林人统治的斗争使战争几乎成为卡斯蒂利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产生了大批的武士—贵族阶层，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在卡斯蒂利亚人的价值观里，军队的勇敢、坚忍和荣誉这些美德是最高级别的，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接受这些价值观。劫掠、土地和其他回报的诱惑吸引了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加入到再征服的队伍中，而且通过他们把尚武精神和贵族的理念散布于整个卡斯蒂利亚社
39 会。再征服中那些关于宗教战争的精神理念，尤其在其后期，更增添了宗教至上与宗教使命的强烈意味。

再征服帮助形成了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特征。随着穆斯林人的溃败，辽阔的土地成为王权的资产。国王们把土地的最大份额分配给贵族、教会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阿尔坎塔拉(Alcantara)和圣地亚哥(Santiago)的三个军队阶层。结果是，卡斯蒂利亚，特别是从托莱多(Toledo)南部开始的地区(新卡斯蒂利亚)，成为拥有巨大地产且其贵族非常富有和强大的地区。

再征服也保证了在卡斯蒂利亚羊养殖业优先于农业。在战争、袭击和反袭击频繁发生的年代，可以移动的羊比土地在财产构成中显得

头这个也更有价值。随着基督徒战线的推进，更多新的地区——经常由于太干旱只能用于简单农业，向养羊产业开放了。大约1300年，人们从北非引进了美利奴羊，这正好符合了北欧迅速增加的对羊毛的需求，给卡斯蒂利亚的羊养殖业带来了明显的推动。到13世纪后期，羊的牧者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强大组织——梅斯塔(the Mesta)。作为对王权大力支持的回报，这个组织得到了许多特权，包括有权穿过卡斯蒂利亚大批迁移绵羊，从夏季的北方牧场到冬季的南方牧场，结果经常毁坏经过的农田和森林。大贵族们控制着养羊产业和农业。他们的大地产和货币，从羊毛销售中得到的利润支持了他们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权力，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国王的地位。

卡斯蒂利亚人的城镇是这种权力的唯一抗衡力。再征服的推进和再占领征服地的需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为了吸引新的定居者到被征服的地区，国王给了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镇很大的特权(自由的特许状)。这些特许状赋予这些城镇行政自治和大量土地，把它们的管辖权扩展到周围的乡下。这些城镇由选举出来的被称为市长(alcaldes)的大法官以及城镇议会成员(市议员，regidores)共同管理。13世纪和14世纪的经济扩张和羊毛贸易的增长首先使卡斯蒂利亚人的城镇成为繁华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城镇的富有使它们在称为国会(Cortes)的咨询机构或议会的会议中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贵族和神职人员免于纳税，国王必须从城镇的代表那里提取资金，这些人以同意纳税为条件，要求对城镇损失的特别补偿，以前这是以为了公正而请愿的形式呈现的。用历史学家约瑟夫·F.奥卡拉汉(Joseph F. O'Callaghan)的话来说，“除非国王或摄政者许诺公正的统治，否则他们就别想指望国会会盲目地同意征税。”

卡斯蒂利亚人的城镇曾经辉煌一时，但最终的结论是，中间阶层一直又小又弱，它处于大贵族们巨大权力的阴影之下。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弱小，城镇居民联合他们自己的力量组成了民团(hermandades)，即军事社团，以抵抗贵族、有时是国王的侵犯。但是城镇的姿态根本上还是防御性的。如果没有国王的帮助，他们就毫无机会在上层社会表达

自己的意愿。

随着穆斯林势力的衰落，大贵族们从与异教徒的战斗转向和国王、城镇以及彼此之间的斗争。在14和15世纪期间，贵族在和国王的争斗中占了上风，他们篡夺王室土地和收入，而且常常把国王变成他们的人质。王权的衰落在亨利四世(Henry Ⅳ，1454－1474年在位)统治时达到了最低点，那时中央政府和公共秩序几乎已经完全崩溃。然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面，经济生活的持续发展已经激起了对于能够维持和平和秩序的强有力王权的要求在不断增强。

阿拉贡

更小、人口更少的阿拉贡(Aragón)王国中世纪时的历史在许多重
40 要的方面都不同于卡斯蒂利亚王国。阿拉贡的国王统治着三个城邦——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每一个城邦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独立的王国(reino)，每一个王国都有它自己的国会。狭义城邦阿拉贡是三个城邦中最贫穷落后的。巴伦西亚是大量穆斯林农民的家乡，他们服从基督教地主贵族的统治。加泰隆尼亚人在联盟中占支配地位，它的大城市巴塞罗那(Barcelona)已经把它的王权和大部分收益给了阿拉贡。繁荣的工业和强大的舰队已经使巴塞罗那成为以纺织品出口为基础的帝国商业中心。加泰隆尼亚人的军队已经为阿拉贡王室赢得了撒丁岛(Sardinia)和西西里岛(Sicily)。因此，在阿拉贡，统治阶级不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他们相对贫穷，而是巴塞罗那的商业和工业寡头集团。阿拉贡的宪法制度反映了这个阶层的最高地位，他们拥有加泰隆尼亚国会的立法权并为国会设置专门的监督委员会，以防止任何对权利和主体自由的侵犯。

在14和15世纪，黑死病的肆虐、加泰隆尼亚农村农业的动荡、商人寡头和普通大众在巴塞罗那的争斗，以及最重要的，传统的加泰隆尼亚市场被热那亚(Genoese)竞争者夺取，使巴塞罗那的繁荣渐渐衰落了。经济上的衰退使加泰隆尼亚的内部斗争更加尖锐化，王室在斗争中站在了普通大众一边。1462至1472年内战的结果，是以对国王约

二世(John Ⅱ)有条件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却最终使加泰隆尼亚完全衰弱。阿拉贡在它和卡斯蒂利亚联合前夕的衰弱确保了卡斯蒂利亚在联合王国中的领导地位。



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使西班牙成为15世纪欧洲最强大的王国。

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这是以1469年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四世的妹妹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约翰二世的儿子费迪南德的秘密联姻开始的。这桩婚姻是复杂阴谋的产物，年轻夫妇的个人野心、许多卡斯蒂利亚贵族和他们国王的敌对以及约翰二世想把卡斯蒂利亚增加到他儿子的继承权中的欲望都在其中起着作用。当

1474年亨利四世去世的时候，伊莎贝拉在强有力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和城镇这一派的支持下宣告她自己为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并宣布亨利的女儿胡安娜(Juana)是非法的，这一声明导致了和葡萄牙胡安娜的支持者的王朝战争。到1479年，战争以伊莎贝拉的胜利结束。约翰二世已经去世，费迪南德继承了他的统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现在成为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联合统治者，但是他们婚姻合约的条款中详细地规定了在卡斯蒂利亚的管理中费迪南德要服从伊莎贝拉，但在阿拉贡的管理中却把伊莎贝拉排除在外。另外，在卡斯蒂利亚领导下的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合，显示出一个根本性的优势，此后它便进入了一个国内发展、对外帝国扩张的了不起的历史时期。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天主教君主

恢复秩序

年轻的君主们面对的紧迫任务是在他们各自统治的王国中恢复和平和秩序。卡斯蒂利亚一直麻烦不断的是封地领主和决定要结束他们合法奴役的奴隶之间的争斗。费迪南德介入此事并提出了一个相对有利于农民的解决方案。他在瓜达卢佩(Guadalupe)的统治(1486)结束了卡斯蒂利亚的农奴制，并使5万农民都成为了小土地所有者。然而，在改革阿拉贡旧的宪法制度上，他没有做任何努力，旧的宪法给王权设定了严格的限制。结果，尽管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建立了新的联合，但是他们依然沿着政治纷争的道路前行。

恢复秩序的任务在卡斯蒂利亚更为巨大。亨利四世时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把城市变成了战场，把部分农村变成了沙漠。为了铲除盗贼和封地的暴力，伊莎贝拉首先依赖的是城镇和中间阶层的支持。马德里加尔(Madrigal)的科尔特斯(Cortes)(1476)在王权和城镇之间形成了牢固的联盟以平息骚乱。他们的工具是神圣兄弟会(Santa Hermandad)，一种有薪酬的治安力量，主要由城镇的男性构成，但是由王宫直接控制。这一力量的效率、严厉和通过法庭实行的迅速惩罚逐

渐在卡斯蒂利亚恢复了和平。

但是伊莎贝拉的计划远远超出了这一直接目标。她提出中世纪所有卡斯蒂利亚的机构——贵族、教会和城镇都要服从王室意志。托莱多(Toledo)的科尔特斯在1480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削减了大公(高级贵族)的权力。收权行动迫使他们归还了他们自1464年以来攫取的大约一半的王室收入。另一个改革重组了卡斯蒂利亚议会——王国的主要政府机构。这一改革把控制旧的王室议会的大公架空为虚职，把它的责任和权力授予了律法官(letrados，通常经过法律训练的官吏)，他们是从低等贵族、中间阶层和皈依的犹太人(conversos)中选拔出来的。

国王削弱贵族权力目的的是通过建立等级分明的法官和书记来进行控制的，这些人是从地方行政官(corregidor，负责城市事务的国王官员)中提拔起来的，从卡斯蒂利亚的最高法庭(cancillerías)到卡斯蒂利亚议会都有，这两者都是国家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实体。国王在所有案件中都拥有最高司法权，包括介入贵族领地管辖权的权力。然而，这些努力的持久成功要求国王要依靠它的强权而不是其凝聚力，但强权不能永远保证其边界的安全或者维持其对不顺从民众的权威。历史学家杰克·欧文斯(Jack Owens)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当贵族和平民相信国王的司法制度能带来公平裁决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只是认识到了国王“王权的绝对权威”。

骑士团的巨大财富使他们成为卡斯蒂利亚城中名副其实的城邦，因此，国王决定通过加强控制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当1476年圣地亚哥大公位置空缺的时候，伊莎贝拉在政要的名单出来之前亲自赶到那里，并坚持把这一职位授予她丈夫；那些人温顺地同意了。当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和阿尔坎塔拉(Alcantara)大公职位空下来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地把职位授予了费迪南德。通过这些行动，王室获得了新的收益和资助。

城镇在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中为王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两个世纪之后，他们的忠王传统就已经退化，许多地方都沦落到自私的

寡头统治者的统治之下。一些地方，如塞维利亚已经成为贵族各派的战场。这些混乱给了伊萨贝拉借口，使她重新恢复她的祖先先前使用过的政策，即通过把地方行政官们引进城镇自治介入内政事务。这些官员把行政和司法功能联合起来，并且稳步夺取了市长和市议会议员的职责。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也开始转向他们的祖先实施过的另一个活动：拥有国王委任状的市长和市镇议员官员要由国王任免，而不是由居民选举出来。贵族或教会管辖的城镇(Villas de Senorio)许可了传统体制下的功能，只在必要的时候，王权才有权干涉。

城镇的顺从是伴随着市议会(Cortes)重要性的衰退而出现的。这种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王税收的大幅度提高，比如销售税(alcabala)，它使得国王免于过度依赖科特斯人的供给。国王对城镇控制的增强也降低了他们在市议会的代表抵抗王权要求的能力。君主只有在需要金钱的时候才召集卡斯蒂利亚的议会，但是一旦王室统治者和平占优势的时候，国王和王后就忽略了他们。

宗教和经济改革

当统治者正在走向专制权力的顶峰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教会挑战。在这种压力下，这一时期软弱的教皇出让了他的实际任免权(patronato real，在卡斯蒂利亚国内任命所有教会中主要的有俸圣职的权力)。尽管不像英国的亨利三世那样，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从来没有通过从交给卡斯蒂利亚教会的什一税和出售赎罪券所得的所有款项中提取三分之一，而夺走教会大量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确实也榨取了教会的一部分财富。

为了确保教会的忠诚并且使之成为王权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君主们必须清理一下它滥用的权力，如兼任圣职、旷工和纳妾。虔诚的伊莎贝拉在对教会教士(这些人属于修道会或教区)中持异见的那部分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组织。这一群体自称为严守教规的教徒(Observants)，反对同行的俗气，提出回归到严格遵守教会原始教规的纯洁性。改革斗争是在方济各会修士希梅内斯·德西斯内

罗斯(Jimenez de Cisneros)的领导下从方济各会内部开始的，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是伊莎贝拉1495年任命的托莱多枢机主教。后来对于其他修道会，这一改革越来越激烈，以至于400个安达卢西亚修道士宁愿迁往北非成为穆斯林，也不愿接受新的法则。斗争以严守安贫的教徒[illegible]胜利，更宽松的兄弟们而结束。

伊莎贝拉对世俗教士（或非修道院教士）的改革几乎没有成功，但也有进步，大教会事务不再由贵族垄断。伊莎贝拉宁愿从低级别或学术中挑选高级教士，对候选人的道德和学识是很看重的。伊莎贝拉的宗教改革对于新世界有特殊的意义：它确保了信仰通过教士中的精英传给印第安人，这些教士在他们的热情、人性和学识上通常都是卓越的。

君主也认识到了经济改革的需要。他们试图通过一些保护措施保护卡斯蒂利亚的工业。他们禁止出口金银，偶尔禁止进口布料以免和本地的产品进行竞争，还鼓励意大利和佛兰德艺术家在卡斯蒂利亚定居。他们颁布了航海法令，给自己城邦的运输船以优先性，并且资助造船。他们废除了自从1461年以来就在卡斯蒂利亚建立的所有城邦间的通行费，并且努力统一度量衡。在伊莎贝拉前辈统治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货币贬值。为了重新恢复货币信用，伊莎贝拉废除了所有的私人造币厂，铸造了自己的钱币，使它们和外邦的货币等值。所有这些措施都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持续加速了王室收入的增加，从1474年的885 000里亚尔(reales)到1504年的26 283 334里亚尔。

尽管君主看起来基本上是务实的，但是他们对知识和艺术也同样有广泛的兴趣。他们把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如亚历山德罗·杰拉丁尔 43
(Alessandro Geraldini)、卢西奥·马里尼奥·尔奇西库洛(Lucio Marineo Siculo)和彼得(Peter Martyr de Anghera)都召集到城邦教导他们的孩子和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后代。具有启蒙思想的高级教士如枢机主教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成立了能和著名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相媲美的新学校和大学。卡斯蒂利亚自身也出现了

一些著名的新知识从业者，如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词典编纂者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加(Antonio de Nebrija)，他在1492年出版并献给伊莎贝拉一本卡斯蒂利亚的语法书——所有现代欧洲语言的第一部语法书。卡斯蒂利亚语言和生活的生命力体现在现实主义杰作：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写的小说《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1499)中。

外交政策

国内和平的重新恢复使君主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政策问题上。对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而言，对格拉纳达的征服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君主要求格拉纳达统治者缴纳他祖先也支付过的贡赋时，卡斯蒂利亚还没有稳固地恢复其权威。阿卜杜尔·哈桑(Abdul Hassan)回答说，他的铸币厂现在是用钢铁而不是用黄金铸币。格拉纳达王国的富有及其山区地形使穆拉比人(the Almoravids)维持了十年。但是卡斯蒂利亚优势的军力，特别是强大的新式炮兵最后终于突破了穆斯林人的抵抗。1492年1月，格拉纳达向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投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他们"天主教君主"的称号以纪念他们虔诚的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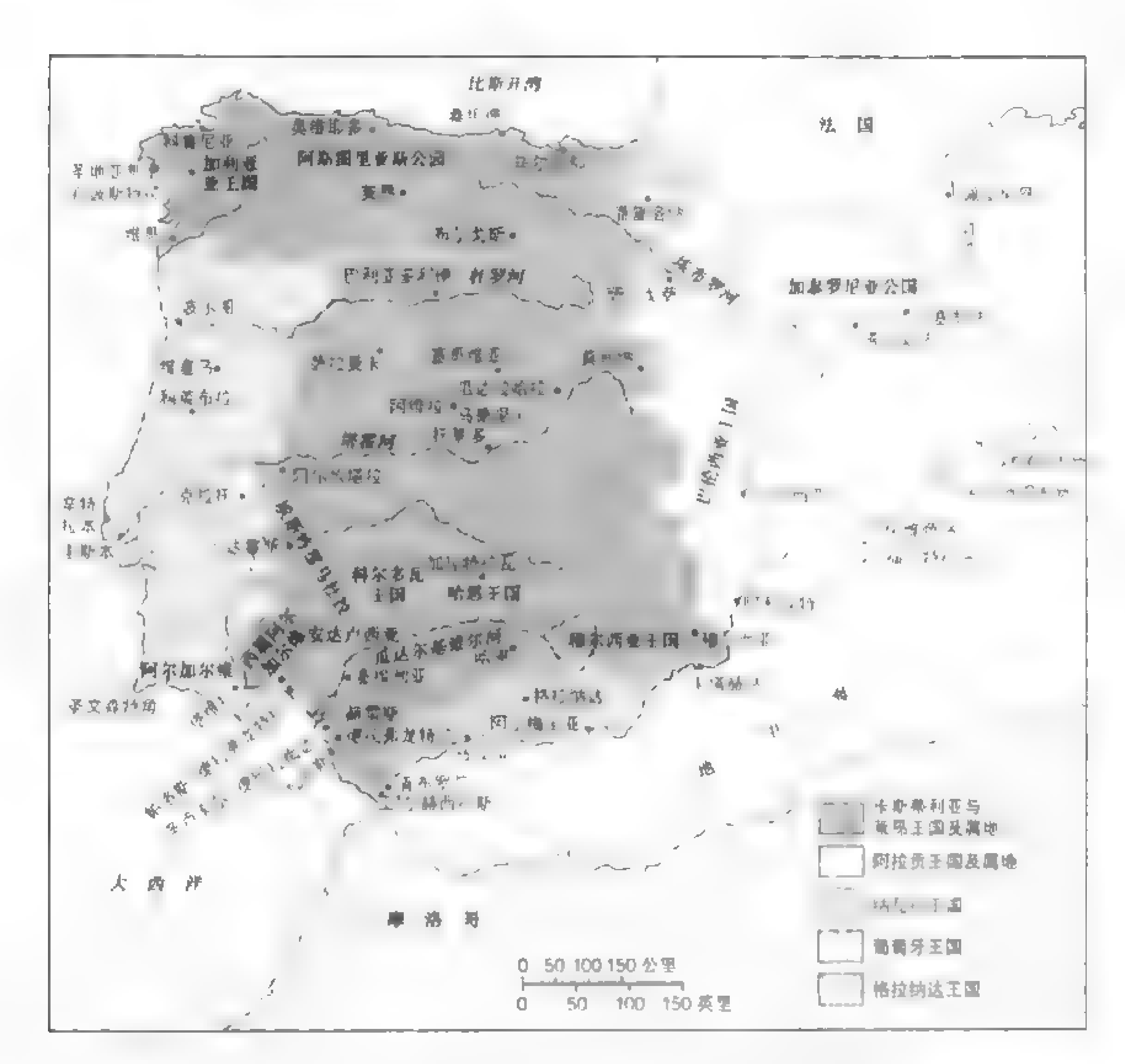
然而当伊莎贝拉的心在征服格拉纳达中安定下来时，费迪南德继承了阿拉贡的地中海帝国。传统上，法国和阿拉贡是敌对的，他于是把目光向东转向了与阿拉贡交恶的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地区。他在1504年伊莎贝拉死后已经实现了他的大部分目标。战争和外交的灵活运用，使费迪南德重新收回了在以前统治者手中被法国夺去的两个阿拉贡地区；使那不勒斯(Naples)王国并入阿拉贡帝国；并和法国一起策划围攻意大利。在费迪南德的意大利战争中，他的指挥官，特别是"大将军"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órdoba)创建的一种新型军队火力装备引人注目，进攻和防守的武器都很强大。这一新兴系统首先在意大利战争中实验，确立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在欧洲的军事优势。在他去世前，费迪南德以取得纳瓦拉(Navarre，1512年)而圆满

地带来了他的王国，纳瓦拉也是他的联合王国防御法国的牢固壁垒。尽管他的王权继承者以官方名义继续统治着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等王国，但是它们那些后来逐渐增加的欧洲对手还是用它的罗马名字“Hispania”或西班牙称呼这一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新政权。

天主教君主为他们的人民做了大量的事。他们驯服傲慢的贵族、击败伊斯兰教的军队，并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组建起了封建的基督教王国。他们鼓励贸易和工业的增长，并使自己成为令人聪明的知识和艺术的资助者。他们精明的外交政策使卡斯蒂利亚成为欧洲最高权力的殿堂。正是在这一时期，美洲在卡斯蒂利亚人的支持下被发现，加勒比海成为卡斯蒂利亚的内陆湖，到他们统治结束的时候，这个王国的探险者和冒险家已经处于发现伟大的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帝国的边缘。因此，这些取得了如此成就的君主们成为后代们膜拜的国家偶像和传说的对象，这一点并不奇怪。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政策的再评价

对于近代历史学家而言，天主教君主的名声已经失去了些许光彩。这些历史学家指责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错误政策抵消了他们统治的许多有利部分。其中一个错误显然是偏倚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如果贵族在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统治时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经济领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统治时期集中在贵 44
族手中的土地大幅度增加了。1480 年议会强迫贵族交出他们大约一半的土地和收益，这是他们自 1464 年以来从国王手中篡夺的，但是贵族又得到了明确的授权，可以拥有在那一日期之前得到的庞大财产。从对穆斯林人的再征服中得到的地盘，其中最大份额分配给显贵的政策也有利于土地垄断的增长。而且，在格纳拉达战争之后，大贵族应用他们的私人军队和增强的政治影响力以扩展他们的领地和加强领主的控制。这种“贵族的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来自王权的抵抗。结果，到 1500 年时，大约占人口 2% 或 3% 的人口拥有全部土地的 95%。



克里斯多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时期的西班牙

这种土地垄断使绝大多数卡斯蒂利亚农民沦为背负着沉重负担的佃农，要缴纳租金、领地费、什一税和其他税。虽然到1480年时，奴隶
45 身份在严格的意义上显然已经从卡斯蒂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消失，而且卡斯蒂利亚的农民从法律上讲也可以离开他们的村庄自由迁移，但是贵族一直实际上拥有所有的土地，因此农民的“自由”，正如西班牙历史学家海梅·维森斯·比维斯(Jaime Vicens Vives)指出的那样，是“死于饥饿”的自由。

有利于养殖羊而不是农业的王室政策同样伤害了卡斯蒂利亚的长远经济利益。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君主们也受到税收、由于养殖者缴纳的出口税以及购买他们的羊毛的黄金流量的影响。结果是，他们就

授予了羊养殖协会，即梅斯塔(the Mesta)更多的特权。这些恩赐的最高峰是1501年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那些曾经放牧过迁移羊群的所有土地都永久保留为牧场。这一措施使得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的大片辽阔土地都不能用于农业。牧羊者被授予特权可以砍伐树木用做燃料、筑篱笆或者开垦牧场，这些都使森林砍伐和土壤侵蚀更为严重。而且，羊群从他们的土地上合法迁移对庄稼和土壤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在人口增长的时代，这些政策和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长期的粮食短缺在16世纪早期发展到顶峰成为毁灭性的粮食危机。

近代历史学者也质疑传统的观点，即在天主教君主统治下西班牙工业发达程度惊人。这些历史学家认为，那一时期仅有的真正工业是巴斯克(Basque)省的铸铁工业和卡斯蒂利亚中心区的织布业，它们从美洲的贸易和美洲市场的开放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工业繁荣的成果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后不久。但是工业产品从来没有达到英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水平。可怜贫穷的农民占人口的80%，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商品的需求有效市场。资金和熟练劳动力的缺乏也遏制了工业的扩展。

工业发展的其他障碍还包括使用骡车和牛车运输穿过崎岖的半岛的高额成本，以及持续把基督教王国分离的海关阻碍。君主的那些家长式作风措施并无益于工业。在费迪南德的影响下，基于严格的加泰罗尼亚模式的行会体系被引进到卡斯蒂利亚的城镇。在这个方面，君主对卡斯蒂利亚工业并没有做出贡献，因为行会组织牢牢地束缚住了工业发展，而这时正是发现美洲，开垦美洲殖民地以保证王国富有的时候。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入以及经济掠夺的结果都对卡斯蒂利亚的工业形成了挑战，使得它要转换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出和质量，从而确立了它在欧洲经济和政治上的霸权地位。

君主们政策中最粗暴的是他们反犹太人的措施。在中世纪早期，犹太人在卡斯蒂利亚成为举足轻重的富裕群体。到13世纪末的时候，相对宽容的精神盛行在诸基督教王国中。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关系密切亲如一家以致激起了教会的抗议。到14世纪，他们的关

系开始恶化。在教士的努力下，产生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普遍的憎恨，而犹太人的高利贷和包税这样的经济活动，对农民和其他群体也造成了更深的苦难，对这个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犹主义的出现导致国王采取压制措施以及袭击犹太人社区的暴乱。许多犹太人为了活命，接受了洗礼，最终形成了数量巨大的皈依者群体(conversos)。

皈依者不久就作为税收包收人(tax farmers)、商人、医生、律师而获得了显著成功和威望。富有、不为封建传统所束缚、求知欲和强烈的野心，这些都使皈依者引起了不仅农民而且教会和许多贵族和市民的敌意。无论是否为异教徒，他们都对基于地产、世袭地位和天主
46 教的封建秩序造成了威胁。他们引起的嫉妒和敌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君主周围环绕着犹太人和皈依者顾问，其中一个人(费迪南德)的血管中还有犹太人的血，但最后还是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并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的王国。当王权制服了贵族和城镇议会，当它获得了更大的新的收益来源的时候，它对犹太人和皈依者的依赖就减少了。犹太人和皈依者的牺牲使专制王权、教会和贵族之间的联盟更为巩固。

皈依者首先嗅到了宗教迫害气息是1478年在卡斯蒂利亚设立宗教裁判所。这个裁判所的任务是侦察、审理和惩罚异端邪说，它打击的目标尤其针对皈依者，许多人由于坚持信仰犹太教而受到怀疑。宗教裁判所活动的结果是，大约有2 000名皈依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 002万人逃到国外。当一些卡斯蒂利亚的城镇在请愿书中提出反对设立宗教裁判所时，这一清洗已经造成皈依者和他们资产的大量外逃，进而对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花费巨大的格拉纳达战争期间，犹太人获得了12年的喘息时间，因为他们是王室财政的最大支持者之一。然而格拉纳达的投降又注定了他们的命运。稍作犹豫之后，君主就向反犹主义的压力屈服了。1492年3月30日，他签署了法令，犹太人只能选择皈依或被驱逐。

16世纪末大量皈依者的破坏或逃走以及驱逐犹太人肯定在王国经济上呈现出的是一幅荒凉的画面。对皈依者的清洗也从卡斯蒂利亚人的生活中去除了非常重要的商业和艺术要素，这些人聚集在英国和



正当他们不再秘密监视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时候，犹太人也公开地皈依基督教以避免遭受在这幅14[illegible]年木版画上描述的迫害和火刑，这表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在格拉纳达起作用了。

行业，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皈依的手工业者的外逃给当地的手工业以重创，有目[illegible]报影响了王室的这条法令(1484)，即邀请外国手工业者到卡斯蒂利亚定居并免除10年的赋税。

君主的反犹政策也对科学和思想造成了普遍伤害。宗教裁判所破坏了自由质疑和讨论的精神，而那个时候文艺复兴正在给欧洲所有的知识领域以重大的推动力。君主奠定的伟大帝国的基础只是暂时的，而且他要为它过早的衰退承担更大的责任。 47

哈布斯堡时代：胜利和悲剧

1504年伊莎贝拉的去世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除了葡萄牙之外都处于费迪南德的统治之下。伊莎贝拉的遗嘱让她的女儿胡安娜作为继

承者，万一胡安娜被证明不能胜任，作为摄政，应当由费迪南德辅佐。因为胡安娜逐渐变得精神不健全而不适合统治，费迪南德便成为摄政者。胡安娜的丈夫，勃艮第英俊的菲利普在许多卡斯蒂利亚贵族的支持下，挑战费迪南德统治卡斯蒂利亚的权力；但是菲利普1506年的突然去世，使费迪南德成为无可争议的王国主人。费迪南德自己于1516年去世。卡斯蒂利亚的王位就由他的长孙查尔斯，胡安娜和菲利普的长子继承。通过他的母系的祖母，查尔斯继承了卡斯蒂利亚、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以及卡斯蒂利亚拥有的非洲和美洲。通过他父系的祖父，勃艮第的玛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兰(Maximilian)，他继承了勃艮第名下的领土和日耳曼哈布斯堡名下的财产。

查尔斯的统治

天主教的君主无论他们有什么过失，他们都是试图要加速王国的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部分的联合；审慎的政策也限制了他们的目标。他们小心谨慎地提出专制王权，尊重敏感的民众和与他们对立的地区传统。

一个具有下巴向前突出特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年轻人查尔斯(Charles)在弗兰德斯(Flanders)出生和长大而且不会说西班牙语。成长在勃艮第的王宫中，浸染在王权专制主义的精神中，查尔斯具有不同的王权概念。当他一到达卡斯蒂利亚，就用他傲慢的举止和他的弗兰德斯朝臣的贪婪疏远了他的下属。他在所有重要的位置上都安排了他的弗兰德斯朝臣。他试图让卡斯蒂利亚人出钱为他作为他祖父马克西米兰的继承者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这招致了更大的憎恨。他通过巨额花费满足了野心，但这也使他深陷德国福格尔(Fugger)银行的债务泥潭，查尔斯匆匆赶赴德国。

对卡斯蒂利亚人而言，选举似乎意味着国王缺席和更重的税收负担。在1520至1521年间，人民的愤怒引爆了卡斯蒂利亚城镇或村社的叛乱。村社社员(Comuneros)的叛乱已经被称为欧洲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它开始时根本上是保守运动。反叛者要求查尔斯返回

卡斯蒂利亚在日常事务中定居，结束在国外消耗金钱，并且不能再有外国人在本国任职。许多贵族在这一阶段支持叛乱，尽管那些大公们依然保持着中立或敌意。但是革命的领导权不久就落入了更加激进的人手中。同时，在巴伦西亚也发生了手工业者和中间阶层反对大地主的叛乱。作为这些叛乱的结果是，村社社员运动几乎完全失去了贵族的支持。1521年4月，村社社员军队遭到了完全的溃败，叛乱也开始解体。1522年7月，查尔斯在4 000人的德国军队的保护下回到了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人民试图挽回政治倒退，以阻止由天主教君主开始的一人集权和专制主义政策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查尔斯在位统治期间，查尔斯五世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令人炫目的成就带卡斯蒂利亚人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之中。他们庆祝科尔特斯(Cortes)和皮萨罗(Pizarro)的征服，以及他们战无不胜的步兵在欧洲的胜利。他们梦想着传说中的黄金国(El Dorados)、世界帝国以及世界教会。诗人埃尔南多·德阿库纳(Hernando de Acuna)表达了对王国的赞扬：

> 大地上只有一个羊圈、一个牧羊人……
>
> 一个君主、一个帝国和一把剑。

查尔斯的统治以战争为主——和法国的战争、反对德国新教领袖的战争、和土耳其的战争，甚至和教皇的战争，因为他的扩张主义计划威胁到了教皇把持着的意大利的核心。实际上，这些战争中只有一个严重地 48 与王国的利益有关：和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因为后者逐渐扩张的海上势力危及到阿拉贡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资产，甚至威胁攻击王国的沿海地区。然而查尔斯从新教问题和与法国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这次斗争中只寻求反对异教徒而不坚持其他；最后就沦落到只是维持现状。

卡斯蒂利亚军队在陆地上和海上的伟大胜利几乎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因为查尔斯卷入了太多的事务中，以致他不能充分利用他的成功。1556年查尔斯宣布把王位让给他的儿子菲利普。查尔斯在他的所有

主要的目标上都失败了。新教异教徒仍活跃在北方，土耳其人在北非稳步扩展，他们的海盗船游弋在地中海。查尔斯让菲利普继承其帝国王位的计划也在德国王子、新教和天主教以及查尔斯自己的弟弟费迪南德的反对下流产了，因为他弟弟想让他自己这一系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查尔斯的其他梦想，如通过菲利普和玛丽女王(Mary Tudor)联姻而把英国并入帝国也随着1558年玛丽的去世而告破灭。

与此同时，平民在帝国的发展中由于债务和赋税的沉重负担而痛苦地呻吟着，因为卡斯蒂利亚承担了大部分负担。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商人和银行家用上全收益为担保贷款的那部分不断增值，拿走了卡斯蒂利亚经济的大部分。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s)接收了军事修会的地产管理和阿尔马登(Almaden)汞矿的开发。他们的对手韦尔瑟家族(the Welsers)控制着加利西亚的矿产，并且接受了委内瑞拉作为他们的封地，那里的居民遭到了他们的野蛮剥削。为了给他幻想的国外企业找到资金，查尔斯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他从卡斯蒂利亚的科尔特斯和阿拉贡抽取的赋税越来越大，课以数倍的赋税，并且把美洲运来的钱款掠为私有，用债券(juros)补偿受损失者。当1556年他的儿子菲利普登基的时候，王国已经破产。

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和残存的哈布斯王朝

菲利普(1556－1598年在位)的统治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延续着其父亲的政策，一般而言，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西班牙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并没有使菲利普摆脱债务危机，或者因为一些新危机而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菲利普希望通过离间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从而控制法国的愿望也遭受挫折。当纳瓦拉(Navarre)的新教徒亨利进入天主教教堂的时候，这一举动已经把法国在亨利身后联合了起来，他迫使菲利普和他签订了《韦尔文合约》(the Peace of Vervins)。和土耳其的战争在海上取得了巨大的勒班陀(Lepanto)胜利(1571)，这一胜利冲破了土耳其的海上防线，但是当菲利普结束其统治的时候，土耳其人依然控制着大部分北非。在繁荣的荷兰，他的帝国

最富饶的珠宝产地，菲利普的宗教压迫和专制主义激起的反抗持续地打击整个统治，而且使西班牙的国库几乎耗尽。和英国战争的结果：新教的伊丽莎白登上王位并暗地支持荷兰叛乱，以及英国的海盗船和走私船侵占美洲水域。

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的溃败给了帝国的自信重重一击，而且事实上也确定了菲利普反对北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的注定要失败的命运。菲利普在另一件事情，即吞并葡萄牙王国(1580年)上的胜利，大大增加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使得在反对北方新教的斗争中可以利用长长的大西洋海岸。但是菲利普并没有抓住这些战略机遇，而且葡萄牙的殖民地居民和船员现在已经成为荷兰和英国水手嘲笑的对象，而且由于在联邦中的不利要大于好处，他们的不满也逐渐增加。

1598年菲利普去世时，给菲利普三世留下的帝国已军力涣散，但 49
它有强大的军队，足以在疆域内产生震慑和尊重。在他的后继者手中，西班牙进入了迅速衰退期，首先显示出的迹象是在外交和战争领域。1609年不得不休战并默认荷兰独立，这是西班牙力量衰微的早期信号。在著名的罗克鲁瓦(Rocroi)战役中步兵的溃败表明西班牙的军事组织和策略已经落后了，它标志着帝国在大陆的军事优势的终结。到了17世纪的后半期，西班牙已经沦为防御性国家，而且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条约的签署使西班牙失去了荷兰、一部分弗兰德斯、卢森堡和一连串较小的资产。

危机不仅存在于国内而且也蔓延到国外。缔造更多基督教王国的努力使卡斯蒂利亚人承担了部分战争负担，这在卡斯蒂利亚国内产生的不满和抵抗酝酿已久。能干但傲慢、讨人喜爱的菲利普四世——奥利瓦雷斯(Olivares)伯爵的努力引起了暴风雨，即要在加泰隆尼亚地区驻扎军队，否则这里就要为卡斯蒂利亚的战争努力做出贡献，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封地原有的司法权(fueros)①或特权。1640年，可怕的叛乱爆发并持续

① Fuero，西班牙的法律术语和概念，来源于拉丁语，本指市场、贸易和集会场所的一块开放地。这里是指赋予或得到承认的权力。——译者注

了12年之久，加泰隆尼亚的经济瘫痪了[illegible]，葡萄牙对联合带来的损失大于收入忍无可忍，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叛乱。比斯开湾、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都发生了暴乱。

经济和社会的衰退

卡斯蒂利亚统治者能力的退化无疑对其政治上的衰退雪上加霜，但根本上还在于帝国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削弱。到16世纪90年代时，在代价高昂的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外交政策的重压之下，卡斯蒂利亚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菲利普二世几次借助于破产来免于支付外国银行的债务。他的后继者没有了菲利普的资源，迫于通货膨胀，大量的金银流失国外，直至国家货币主要是由铜铸造。但是，对于国家经济危机的发展造成主要影响的，则是17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从美洲得到的钱财大幅锐减。1591至1600年这10年，从美洲殖民地得到的收益大约是13 500万比索，但是一个世纪后收益则只有一半，1651至1660年这10年时间减少了1 900万比索(关于减少的复杂原因将在第四章讨论)。

到1621年，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比比皆是。塞维利亚的丝绸和羊毛生产商已经从一个世纪前的1.6万家减少到只有约400家。16世纪时，托莱多成立的羊毛加工厂有50家；到1665年已经只有13家。农业的困境表现在长期的粮食短缺，有时几乎接近饥荒时的状况，随之农民们也大批离开农村。卡斯蒂利亚成为荒无人烟的土地。在1600至1700年期间，它还遭受了人口的绝对减少，从大约800万减少到600万人。接近饥荒的环境使传染病肆虐并日益恶化；1609至1614年间对摩里斯克人①(Móriscos)或皈依的穆斯林人的驱逐，以及移民到印度都加重了人口的减少。

经济衰退导致王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缩小，从而强化了贵族

---

① 摩里斯克人(Morisco)，意思是"像摩尔人一样"的人，是指从穆斯林皈依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居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术语成为贬义词，被用来指那些名义上皈依天主教，但可能暗地里秘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译者注

值观的优势，促进了寄生生活的增长。在 17 世纪，有理想的年轻人为了追求稳定的生活首先选择去教会和法庭。1626 年，卡斯蒂利亚有[illegible]个修道院；在世纪末，在 600 万人口中大约有 20 万修道士和神父。贵族形成了另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阶层。到 17 世纪末，据统计西班牙的贵族数量已经是法国的 4 倍，虽然法国的人口要比西班牙多得多。[illegible]贵族最上层的是伯爵、公爵和侯爵，他们坐拥巨大财富手握无上权力。地位最低的贵族是大量的伊达尔哥(hidalgos)、小贵族，他们的单独资产经常是他们的荣耀，而且珍贵的文字专利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illegible]下的平民(pecheros)，如农民、手工业者和市民们的地位。贵族对劳动的鄙视传染给了所有阶级。流浪的人持续增长； 50
同时农业却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去耕种土地。



迭戈·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少女的荣耀》(*The Maids of Honor*)是西班牙 17 世纪学院派的巅峰之作。可以注意到，委拉斯开兹用完全冷漠的方式来处理王室的成员，如站着的女士、矮个子，以其他人为衬托轻松地强化了一个人的高贵或美丽。

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颓废(Decadencia)扩展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也催生了悲观主义、宿

命论和玩世不恭的情绪。西班牙社会表现出极端的对比：巨富和赤贫，狂热的虔诚和造谣中伤的行为，孤注一掷地努力要复兴一去不返的往日的荣耀，但君主们有时甚至没有钱付给他们的仆役和支付日常开销。西班牙人生活的矛盾，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比都刺激了文学的想象力。此时的西班牙在其他方面如此贫乏，只有文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早在1554年，就有不知名的作者写了第一部流浪汉小说《托马斯河畔的小孩子》，描绘了丑恶的社会现实，里面充满了幽默和流浪汉。小说的英雄在冒险经历中接连遇到了一些如何的人、乞丐、吝啬的牧师、饥饿的小贵族(hidalgo)；最后终于实现了他的最高愿望，作为城镇传令员的美差，和为他提供过保护的牧师的情妇结了婚。

流浪汉这一题材的最高峰是《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
(1599)，它的调子是忧郁的悲观主义："所有人都偷窃，所有人都撒
谎，……你不会发现有一个人的灵魂是属于人的。"卡斯蒂利亚人的灵
魂是分裂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冲突，这在米格尔·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es de Saavedra)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1605)中获得了
普遍意义和象征主义的表达。佛兰西斯科·克维多(Francisco
Quevedo，1580－1645)刻薄的讽刺表达了17世纪许多有识之士痛苦
51 的声音，"这里有许多事情，"克维多写道，"似乎存在并且活着，然而他
们除了名字和外表，什么都不是。"

与文学相比，戏剧的黄金时代只是模糊地反映了国家危机。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的剧本充满了创造力、发人深省的对话以及优美的诗篇；他描述的时髦的小贵族、勇敢机智的女英雄和值得尊敬的农民都以一种奇特的对悲惨当下的漠然态度唤起卡斯蒂利亚昔日的优良传统。然而，17世纪后期卡斯蒂利亚的失败主义也反映在卡尔德龙(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的戏剧中，他强调现实的悲剧性和虚幻特点："生命是一场梦，我们的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绘画的黄金时期和文学一样，反映了从16世纪早期的自信和赞扬情绪到17世纪末理想破灭的精神。绘画的伟大时代自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的，他的作品混合了自然主义、刻意变形，以及传达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卡斯蒂利亚忧郁的宗教热情的强烈情绪。然而，格列柯的一些肖像画也表现出华丽的现实主义。格列柯的神秘主义在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599 — 1660)的油画作品中[illegible]光、色和运动，委拉斯开兹全方位地捕捉了两位西班牙国王的[illegible]生活，表现出王子公主们、矮人和宫廷小丑们同样的尊严。

如我们将要在第五章看到的，17 世纪的颓废深刻地影响了卡斯蒂利亚和它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一体化在本质上是松散的，随着殖民地的自足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就出现了有利于后者的力量平衡的转化——这一变化即使帝国付出最大的努力也难以逆转。

无嗣的查理斯二世于 1700 年的去世使哈布斯堡时代走到了它的尽头。即使在多年的衰亡之前，也出现了西班牙人口和经济的复兴，[illegible]的表现是[illegible]业到 17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已经从大萧条的深渊中逐渐地恢复。在新的统治王朝——波旁王朝对王国所有进步方面的支持下，帝国得以开始进行[illegible]、多方努力的帝国重建。 52

第三章　美洲的征服

焦点问题：

- 欧洲的什么状况导致了对美洲的征服？
- 征服对美洲土著和欧洲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 西班牙征服者的动机、心态和社会背景是什么？
- 什么原因造成了少数西班牙人相对轻松地征服了伟大而又人口众多的当地帝国？
- 什么是“被征服者的视界”，与欧洲人和美洲土著人“遇到”的传统解释相比如何？

欧洲和美洲接触的结果导致了寻找通向东方的道路的努力，这将打破埃及和威尼斯在香料和其他亚洲产品的贸易中获利丰厚的垄断地位。他们把为数不多的金银榨取殆尽，这些金银都跑到意大利人和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商的口袋中，这越来越让西欧的商人和统治者无法忍受。葡萄牙在寻找通向香料之国的水路的竞争中起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它在这场竞争中优势明显：长长的大西洋海岸优良的海港，人数众多的渔夫和水手阶层，以及贵族已经明白用贸易和造船的收入能补充内陆的收入不足。葡萄牙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最先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在一个能干的王朝——阿维斯(Avis)家族的领导下形成了商人

[illegible]获取个人利益的人的牢固联盟。这让葡萄牙在发现[illegible]上[illegible]一步。葡萄牙在阿勒祖巴洛特(Aljubarrota)(1385年)的胜利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结束了一段时间以来,卡斯蒂利亚想吞并它的不懈的努力,给葡萄牙野心勃勃的海上扩张计划输入了力量。

伟大的航行

亨利王子的探险

著名的亨利王子(1394—1460)开启了葡萄牙的探险和征服时代。亨利,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误称为“航海家”,因为他的航行从来没有远至摩洛哥之外。他将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精神和更现代的探寻未知陆地、海洋秘密以及从贸易扩展中获取利润的欲望结合了起来。1415年,亨利参加了夺取摩洛哥的休达(Ceuta)海港的战争,后者是一个重要的穆斯林贸易中心,商队从这里出发穿过沙漠到达廷巴克图(Timbuktu),又从那里带着用盐和布匹与当地的黑人换回来的象牙和金子。拥有非洲人的财富的诱惑打开了葡萄牙人的[illegible]视野。只有进入休达的黄金资源,他们才能缓解葡萄牙人严重缺乏贵金属的状况;亨利也希望到达传说中的基督教统治者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土地上,人们认为他就是 53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皇帝,尽管没有人知道他的帝国究竟有多远。亨利希望能和这个统治者联合起来,用强大的基督教城邦联盟包围北非的穆斯林。

然而,扩展摩洛哥据点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如果葡萄牙人不能突破穆斯林人的屏障,这一屏障把他们和南方的黄金资源以及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分隔开来,他们就不能通过海上达到那些目标吗?1419年,亨利在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的萨格雷斯(Sagres)——葡萄牙西南的机头建立了一个据点。在这里,他召集了一批专业水手和科学家。在拉各斯(Lagos)港口附近,他开始建造更结实更大的船,配备有指南针和改进的星盘。从1420年开始,他派遣了几批船队探索非洲西海

岸。每个船长都被要求记录他的航海日志，关于海流、港口和季风状态以及海岸线的略图。一个著名的皈依基督教的制图者——耶胡达·克雷斯普斯(Jehuda Crespes)，用这些数据画出了更精确和科学的图表。

前十年探险的结果是发现了马德拉群岛(Maderas)和亚速尔群岛(Azores)。但是向南的进程缓慢：想象中的[illegible]气候区和[illegible]的海洋等障碍使水手们极度小心谨慎。1434年越过了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非洲西部海岸的首要地标的航行，证明了[illegible]世界[illegible]是子虚乌有。到亨利1460年去世时，葡萄牙人已经推进到了[illegible]湾的地区，已经在金粉和奴隶——[illegible]来的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亨利的去世延误了探险的进程，但是沿着非洲海岸线的探险仍在继续，在私人赞助下成为奴隶[illegible]。这是欧洲人海外扩张的第一个恶果。1469年，一个富有的商人费尔南·戈麦斯(Fernao Gomes)获得了对几内亚(Guinea)(后来整个西非海岸都以此命名)的贸易垄断权，条件是他要以每年100英里[illegible]线向南探险。遵照这个约定，戈麦斯的船队向东沿着[illegible]、象牙和奴隶的海岸线，然后再向南几乎到达了刚果河河口。

海上东方航线

在1481年即位的精力充沛的约翰二世统治下，王室重新控制了开发非洲事业。在黄金海岸的米纳(Mina)，若昂建立了一个要塞，这里成为奴隶、象牙、金粉和大粒胡椒的交易中心，以及进一步探险的基地。亨利曾经梦想着发现金子和祭司王约翰，但是若昂国王对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项目更感兴趣。1483年，迪奥戈·曹(Diogo Cao)率领的一次探险发现了刚果河河口，而且航行了这条大河的一部分。1484年的第二次航行，曹向南推进到西南的克罗斯角(Cape Cross)。葡萄牙的君主感觉到胜利在望了。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率领的船队离开里斯本，任务是要航行到比曹到达的更远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绕过非洲最南端。迪亚斯确实航行得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船长都要远，一阵如有神助的大风把迪亚

[illegible]过了好望角，并且在非洲东海岸登陆。他已经解决[illegible]的[illegible]，于是就返回里斯本向国王约翰报告他的喜讯。

[illegible]了，但是国内和国外的问题分散了约翰对印度事[illegible]去世，也没有再进行他已经精心策划好的[illegible]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著名的幸运儿，执行了[illegible]，一支4艘船的船队，在顽强果敢的贵族瓦斯[illegible]（Vasco da Gama）的率领下从里斯本出发开始了航行，[illegible]殖民主义时代。在绕过好望角以后，达·伽马继[illegible]了非洲东部海岸，在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达（Malindo），[illegible]一个阿拉伯的向导，指导着船队到达了印度西海岸[illegible]（Calicut）。尽管遭到了占支配地位的阿[illegible]地的有权势者也对他不感兴趣，并嘲笑他的礼[illegible]达·伽马仍然坚持设法把他出发时四艘船中的两艘装[illegible]，于1499年返回了里斯本。佩德罗·阿尔瓦[illegible]（Pedro Alvares Cabral）指挥的一支新船队很快装备 54
[illegible]在大西洋南部向西航行得更远，于1500年[illegible]了[illegible]艘船在继续向印度航行之前返回里斯本[illegible]发现[illegible]香料和与阿拉伯商人混战的故事返回葡萄牙，因为那些商人决定要阻止葡萄牙人的入侵。

[illegible]和管理者阿丰索·德阿尔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于[illegible]年出发去完成由达·伽马开创的工作，他知道[illegible]埃及和[illegible]竞争者的唯一方法是得到香料贸易的完全垄断权，[illegible]通过[illegible]航线中的几个重要据点来实现。马来半岛上马六甲的攻占使葡萄牙人控制了东印度的香料进入印度洋的海峡。占领马斯喀特（Muscat）和霍尔木兹（Ormuz）阻断了通向波斯湾的通道，关闭了欧洲船队在其他国家的航线。尽管葡萄牙人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完

[illegible]1618年被葡萄牙占领，1741年成为阿曼首都。——译者注

全成功地达到，但它已经把里斯本变成了比较大的香料供应基地。

一段时间以来，葡萄牙一直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繁荣气氛下。但是，维持东部建立起来的巨大防务任务的压力对葡萄牙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言太大了，而且支出开始超过收益。更糟糕的是，在西班牙人的压力下，国王曼努尔在1496年颁布了驱逐所有未受洗礼的犹太人的法令。这样，葡萄牙就失去了这群人，只有他们能够通过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胜利，从资金上提供投资探险的机会。佛罗伦萨和德国的银行家迅速跟进并且转移走了海外东方香料贸易的大部分利润。里斯本本身只是成为个储藏库，货物从东方运到那里之后，马上就被装船运到了安特卫普或者阿姆斯特丹，那里的位置对欧洲顾客而言，是更好的分发中心。荷兰和英国的竞争对手及时地从没落的葡萄牙手中抢走了东面的大部分殖民地。

进军大西洋

大西洋东部有一些群岛——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很早就引起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注意。这些岛屿在对美洲的殖民中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提供了穿过大西洋的落脚点和驿站。而且，对他们的征服和殖民经济组织也为伊比利亚在新世界的政策建立了一种模式。

马德拉群岛在1425年被开垦成殖民地，成为葡萄牙在大西洋东部最重要的殖民地。马德拉群岛的土壤和气候都适合种植糖，那个时代利润最丰厚的植物，而且随着一代代的经济和技术支持，糖产业已经在马德拉建立起来，使用的奴隶来自加那利群岛和后来的非洲。到1460年，马德拉有了第一家糖厂，到1478年，它已经是西方世界最大的糖制造厂。葡萄牙人把同样的成功模式——糖和非洲奴隶劳动力的联合运用到他们对巴西的殖民地开垦中。

从14世纪早期以来，欧洲人就已经知道加那利群岛，但是准确地说，该群岛被卡斯蒂利亚征服是在1402年。岛民古安切人(Guanches)过着游牧和农耕生活，是由许多相互敌对的部落组织起来的。由于遭到了

的抵抗，卡斯蒂利亚人的征服直到约1497年也没有完成。不到两个世纪之后，对加那利群岛的征服又开始了，人口也许曾经在5万至[illegible]之间的岛上[illegible]灭绝了，主要是由于虐待和疾病。对加那利群岛的征服也是在加勒比海类似开发的预演。

和马德拉群岛一样，加那利群岛成为测试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试验场，这些制度后来传到了美洲。尽管群岛的统治权在于王室，君主和每个先遣官(adelantados)签订协议书(capitulaciones)，先遣官被授权征服[illegible]，并被授予重大的管理权和其他各种特权。这些协议类似后来西班牙在征服时期与各个首领们，以及和哥伦布、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等征服者和当时其他重要先遣官们签订的合同。

和马德拉群岛一样，加那利群岛也成了建立在糖和奴隶劳动的农业出口经济基础上的试验场。到16世纪早期，那里已经有29个糖厂在运

加那利群岛作为欧洲和美洲之间糖产品的中间站这一特点，通过从加那利群岛传到加勒比海的糖加工技术和使用扦插的方法种植甘蔗 55
得到了证实。

哥伦布的航行

寻找到达印度的航线曾引起多种解决途径。如果说有些人相信，绕过非洲的航线已经解开了到达东方的谜底，另一些人则更赞成向西航行，穿过大西洋。这一观点得到了著名权威人士佛罗伦萨科学家保罗·托斯卡内里(Paolo Toscanelli)的支持，他在1474年建议葡萄牙人尝试向西航行，以"缩短你们正在开发的绕经几内亚的航线"。他的信引起了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注意，他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封信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即从欧洲到达日本(Cipangu)和中国(Cathay[1])会有一条便捷的通道。这一想法大大低估了地球的周长，并同样高估了亚洲的面积和向东部的延伸。所有有

1 [illegible]中世纪对中国的称谓。它通常只指扬子江(长江)以北的地区。——译者注

学识的欧洲人都相信地球是圆的，这一问题没有进入哥伦布和他的反对者之间的讨论议程。主要的问题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域，在这一点上，反对者是正确的。

对于哥伦布而言，通过向西航行到达东方这一想法真让他像着了魔一样挥之不去。作为从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和科学世界过渡时期的人物，一个把神秘主义和实践行动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人，哥伦布相信上帝已经启示他，"从这里航行到印度是可行的，而且在我心中种下了去执行这个计划的炙热愿望"。

约1484年，哥伦布那时居住在里斯本，他向约翰二世提出要探索向西航行的航线，但是专家委员会听了他的计划后，建议国王拒绝。哥伦布并不因为国王的断然拒绝就灰心丧气，而是接下来去了卡斯蒂利亚。经过八年令人丧气的耽搁和谈判，伊莎贝拉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同意支持"印度事业"。女王和哥伦布签订了合同(capitulación)，任命他为海军上将和他将要发现的土地的总督、统治者，并承诺他在探险收益中分享巨大份额。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领他三艘船的小船队——品塔号(the Pinta)、圣玛利亚号(the Santa María)和尼娜号(the Niña)从帕洛斯港(Palos)出发了，驾驶船的并非传说中的囚犯，而是精明能干的船长领导下的有经验的水手。航行非常顺利，一路顺风。但航行很久还看不见陆地使一些人开始焦虑起来，到9月末，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上的水手们开始不满抱怨。据哥伦布的儿子费迪南德说，一些水手提出把海军上将抛到海里，返回西班牙报告就说他在观星时失足落水。哥伦布设法平息了不满，而且不久就发现了漂流的马尾藻以及热带鸟这些陆地的信号。10月12日，他们在今巴哈马的一个岛上登陆，哥伦布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

经巴哈马向南航行，哥伦布到达了古巴的东北海岸，他认为这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派去寻找大汗的使者没有找到大汗，但是回来报告说他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给西班牙人使用"他们吸抽的某种草"，即一种很早前提到的烟草。接下来哥伦布又向东航行探索一个

[illegible]（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并命名为“伊斯帕尼奥[illegible]”（Espanola）。在这里，西班牙人[illegible]发现了一些冲积金矿和金[illegible]他人拿这些[illegible]和西班牙人换一些小东西。

[illegible]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在岛的海岸失去了旗舰，就返回西[illegible]了猜想中的印度。君主收到了他令人尊敬的信息[illegible]他进行第二次探险继续他的发现。葡萄牙人指控西班牙[illegible]，因为根据以前与卡斯蒂利亚的合约，这一地[illegible]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这一指控的反应是，请求本是[illegible]人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帮助。通过1493年签发的一系列法[illegible]已发现的或者将要发现的所有土地分给西班牙，[illegible]角以西一百里格①从北到南画了一条线，这[illegible]西班牙的探索范围。对约翰二世而言，这一分界[illegible]葡萄牙在南大西洋和有希望绕过非洲向东的航线的利[illegible]力，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1494年签署了《托德 56
[illegible]（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确定了界线以西270里格[illegible]了这条线以东独立发现和征服的权力；卡斯蒂利亚则获得了这条线以西的同样权力。

[illegible]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17条船的船队搭载了[illegible]人，大多数[illegible]者和农民，以及为数不多的“被金子和那块土[illegible]小贵族和其他有身份的人”。移民者很[illegible]作为一个出身不明的[illegible]个人素质去控制这种攫取财富的混乱局面。

[illegible]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北海岸建立了伊莎贝拉镇以后，就又出[illegible]南下几乎到达了它西部的端点。那个岛[illegible]到达了亚洲大陆。为了打消所有的疑虑，他要[illegible]“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否认”古巴就是[illegible]大陆，“[illegible]自次鞭打和割舌之痛。”哥伦布于1496年返

① 里格：一长度单位，相当于3.0法定英里(4.8公里)。——译者注

回西班牙报告他的发现，并忍受不满的移民们对他的抨击。他把他的弟弟巴塞罗谬(Bartholomew)留了下来，后者从伊莎贝拉将首府迁到了南部海岸一个更有活力的地方，并命名这个新点为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

尽管前两次航行哥伦布并没有交付上帝承诺的财富，但君主仍然对哥伦布有信心，并且于1498年装备了第三支船队。在这次航行中，他在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奥里诺科河(Orinoco)，引自这样一条大河的淡水洪流使哥伦布相信，他已经登上大陆海岸。但是他执于幻想的神秘主义也使他认为，奥里诺科河是天堂的四大河流之一，它的源头就在伊甸园。

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发现那里一片混乱。贪婪的卡斯蒂利亚探险者欲壑难填的需求已经激怒了温和的土著泰诺人(Taino)，战争一触即发。西班牙人由于迅速发财的希望破灭，就把他们的不满迁怒于哥伦布的弟弟，并且在一个名叫罗尔丹(Roldán)为首的领导下发起了叛乱。为了安抚叛乱者，哥伦布发布了赦令，承认叛乱者的土地和土著奴隶。与此同时，反对哥伦布的一系列抱怨也起作用了，君主已经派遣了一个特使，弗兰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Francisco de Bobadilla)去接替哥伦布，并调查针对他的诉讼。到达岛上以后，性情暴躁的博瓦迪利亚就把哥伦布和他的弟弟抓了起来并遣送回西班牙监押。尽管伊莎贝拉马上推翻了博瓦迪利亚的鲁莽行为，但是哥伦布再也没有行使过他在新世界的总督和管理者职能。

哥伦布仍然沉湎于他巨大的幻觉中，继续梦想着发现到达香料之都的西行航线。他被允许再航行一次，这一次是所有航行中最困难和损失惨重的。他现在相信，在他最近登上的大陆和古代地图上的马来半岛之间有一个海峡，从那里可以到达印度洋。1502年他出发去寻找这条海峡和到南亚的航线。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在那里他没有被获准登陆，于是他穿过加勒比海到达中美洲海岸，然后又接着向南到达巴拿马地峡。这时，他相信他再有10天的航程就可以到达恒河。在巴拿马他发现了一些金子，但是寻找海峡的希望继续诱惑着他。最后，他

他乘剩下的两艘船离开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但由于深受虫洞困扰，只好一直漂行，搁浅在牙买加海滩，在那里他和他的船员被困了一年以等待直接援助的到来。1504年11月，哥伦布返回欧洲。忘恩负义的君主们而此时他的身体不行了，1506年，这个富有而饱经苦难的人离开了人世。

发现美洲的历史透视

在纪念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500周年时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学者们试图寻找那一里程碑事件的新意义。学者们的争论仍然集中于哥伦布发现的巨大后果，以及它们是否应该成为庆祝或遗憾的原因。

西班牙编年史家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德葛梅拉(Francisco Lopez de Gomara)，充满帝国主义的骄傲，毫不怀疑那一成就。他在 57
1552年写道，“自创世(除了上帝道化肉身的创造)以来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发现西印度群岛。”但是，1600年被作为异端烧死的意大利激进哲学家布鲁诺在当时持强烈不同意见，他攻击哥伦布是那些“胆大妄为的海盗”中的一个，只是“扰乱了其他人的和平……增加了民族罪恶，通过暴力传播它无数的恶行，并且……教会人们以一种专制的新方式和方法自相残杀”。

然而，直到最近，也几乎没有欧洲人和美洲人质疑过哥伦布成就的性质和价值。在19世纪，他的航行被看做先驱和起因，在他之后展开了西方伟大的经济扩张和全球统治。美国关于哥伦布的庆典活动尤其丰富，因为在这里，人们看到了那一事件和伟大的西方共和国强盛崛起之间的神秘联系。在这一时期，哥伦布几乎被转化为神秘的英雄，一个大于其生命存在的人物征服了置于他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以偏执和无畏的探险精神完成了上帝的旨意。

直到完全进入20世纪，这一“发现”应该唤起真正的骄傲和满意的观点仍很少受到挑战。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由此实行的反殖民改革才导致了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发现”和它的影响。那种新的参照框架通常被称为“被征服者的视界”，因为把它作为出发点，哥伦布的航行不仅影响了欧洲而且影响了

美洲的人们和文化。由于意识到发现这一术语导致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论调，许多学者已经用更中性的术语相遇（西班牙语的encuentro）代替它。毕竟，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的时候，美洲并不是个空的大陆；它真正的"发现者"是数万年前那些从亚洲经过白令海峡穿越过来的人们。但是相遇这个词，表明了人们和文化的和平相遇，几乎不适合欧洲人入侵美洲当地的残酷现实。因此，除了没有找到更好的词，我们会继续使用发现这个词。

"被征服者的视界"提出了对发现美洲及其后果的更悲观的评价。对于美洲土著而言，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是一个灾难。他们对多种组合的新疾病完全没有免疫力，还遭到野蛮剥削，并由此引起社会崩溃，从而使人们失去生活意愿，这也许是有历史记录以来人口统计学上的最大灾难。估计1492至1575年间，当地减少的人口在[illegible]到[illegible]之间。

发现和征服也切断了如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之类文明的独立发展。许多学者都相信，这些帝国并没有穷尽它们进一步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可能性。最后，发现也通过引进欧洲的动物、植物和农业实践，改变了长期稳定的生态系统，从而在新世界开始了生态灾难的进程。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了这一进程，他引进了西班牙使用的密集农业系统和家畜放牧，导致迅速的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这一从哥伦布开始的进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已经通过拉丁美洲雨林的迅速毁坏得到了证明。这也是"哥伦布遗产"的一部分。

发现对欧洲及其长期发展有更多积极的影响。那种影响，正如很久以前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提到的，最清晰地表现在经济领域。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讨论美洲珍贵的矿产对欧洲16世纪"价格革命"或者奴隶贸易对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影响。然而，无可争议的是，这些因素和其他因发现美洲所涌现的事件联合起来给欧洲的经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崛起以强大的刺激，这反过来又加速和促进了它对全球其他地方的控制。

发现对欧洲的智力影响更难以测量，但似乎人们一致认为，发现美

洲而产生的地理上的视界扩展伴随着精神视界的扩展以及涌现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对智力发展有贡献。伟大地理发现的首批受损者便是古代作家甚至教皇的权威。为此，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米·德拉斯·卡萨斯(1484—1566)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不适宜居住区的传统信念，在一个段落中试图颠覆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和古代作家的权威，“毕竟，他们知道的也不多”。 58

对美洲及其居民的发现也引起对他们的起源和本性的争论，因而产生了人类学的基础。为证明根本人性和这些土著美洲人的平等要求，16世纪西班牙的一些传教士深入研究了他们的文化。这些人中一个最伟大的修道士-人类学家是巴托洛米·德拉斯·卡萨斯，他的一部著作收集了大量人种志学的资料，用来证明土著美洲人完全满足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美好生活的要求。卡萨斯使他的案例首先基于经验和观察，提出了文化差异的环境主义解释，并且用科学的超然态度看待那些偏离欧洲标准的人祭和食人仪式。

对一些事实是新鲜和奇特的当地方式的反思，以及修道士-人类学家们理解和解释这些方式的努力，也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比如排斥权威，代表了和过去的决然分裂。例如，卡萨斯对野蛮人(barbarian)这一术语进行了细致的语义学分析，认为当人们把这个词用于先进的文化如阿兹特克或印加文化的时候，此词便失去了它的最大抨击意义。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美洲土著的风俗描述，在他著名的关于巴西土著的随笔中观察到，“从读到的内容看，除了每一个人都把不是自己做法的无论什么都称之为野蛮之外，我认为在这个民族中没有什么野蛮和未开化”。

美洲及其居民的发现也启发陷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不公正麻烦中的欧洲人提出了激进的政治经济组织新框架。例如，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了《乌托邦》，它描绘了一个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机构是通过公正和理性来管理的，这与其同时代的欧洲国家不同，莫尔将后者描述为针对穷人的“富人的阴谋”。莫尔书中的讲述者，讲了关于乌托邦居民和他们的制度，声称自己是个水手，跟随亚美利哥·韦

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航行过三次。莫尔思想关于私有财产的罪恶和大众政府益处的主要来源，出现在韦斯普奇的"第三封信"和关于当地风俗和信念的关键段落中：

> 他们依据自然生活，没有法律也没有宗教可说，他们对灵魂的不朽一无所知。这里的人不拥有任何私人财产，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他们没有国王，也不服从任何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没有司法，这是他们不需要的……

但是，如果发现美洲对欧洲的智力生活产生一个有益影响的话，其反映就是对权威的新排斥、文化相对主义的增强以及对非正统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推动，这也加强了欧洲人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肯定态度。伟大的弗兰德斯地图绘制者亚伯拉罕·奥特琉斯(Abraham Ortelius)在他1579年的世界地图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在欧洲地图上，奥特琉斯附加了一条注释，表明了欧洲征服世界的历史使命，西班牙和葡萄牙完成了这一过程，"他们统治了世界的四个部分"。奥特琉斯宣称欧洲人总是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身体更灵敏，因此保证了他们去管理地球上的其他部分。

卡萨斯的宽阔视野使他声称"个体人类是一个人"，蒙田激烈谴责欧洲人的残暴，并提出欧洲人和新世界人们之间恰当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关系和理解"，他们都不是当时典型的对待这一主题的思想。殖民竞争者也许会谴责西班牙对土著美洲人的行为，但是他们通常赞同把土

59 著美洲人看做被罪恶玷污的人和"可怜的野蛮人"。

把"被征服者的视界"的观点和历史研究的新态度结合起来，使我们对哥伦布本人和他对待被误称为"印第安人"的态度有了更好的理解。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现代冒险精神的奇特混合也显示为哥伦布思想的矛盾，这可以通过他对金子的评价体现："噢，极好的金子，拥有金子的人就拥有一个宝藏，他可以用它得到想得到的，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世界，甚至帮助灵魂到达天堂。"在《美洲的征服》一书中，茨维坦·托多罗

夫（Tzvetan Todorov）把哥伦布的观念形态（它代表了欧洲入侵者的观念）进行了非常精微的剖析，并揭示了其他的矛盾。哥伦布有时把“印第安人”看作“高贵的未开化者”，有时根据情况不同，他又把他们看作“卑劣的狗”。托多罗夫解释说，这两个虚构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对“印第安人”的蔑视并拒绝承认他们是和他自己一样具有人权的人类。在最后的分析中，哥伦布把土著人不看作人类，而是看做物体。这通过他在1498年写给西班牙君主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 以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名义，我们从这里运送的所有奴隶和巴西木材都可以出售。如果我的消息准确，若一个人卖出4 000个奴隶，他将会得到至少2 000万……而且我相信我的消息是准确的，因为在卡斯蒂利亚、阿拉贡、意大利、西西里、葡萄牙和阿拉贡的岛屿以及加那利群岛，他们所需的大量奴隶已经耗尽，来自几内亚的奴隶数量正在减少……尽管印第安奴隶现在也倾向于逐渐绝亡，但并不总会是这样，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来自非洲和加那利群岛的奴隶身上。

事实上，哥伦布想实施探索的初衷是为了寻找从西方通向印度的航线，为了用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奴役和在卡斯蒂利亚售卖他们而换取金子。为了使这个想法更对西班牙君主的胃口，他提出寻找奴隶仅限于假定的“食人”族——加勒比人。当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起义反对他们的残酷对待时，这又为他们的奴役提供了一个合法借口。1494年至1500年期间，哥伦布运送了大约2 000个“印第安人”到卡斯蒂利亚的奴隶市场上。与传说的相反，大多数这样的运送，女王伊莎贝拉都同意了。

当然，哥伦布是从投机商人的背景看待奴隶制度的。他非常熟悉葡萄牙的非洲奴隶贸易，从前的热那亚商人们曾经非常热衷于这样的贸易。他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奴隶制在某种条件下还几乎被

普遍看做是合法的和适当的。他对生命已经缺乏关心，麻木不仁，奴隶的死亡没有使他成为恶人。如果他热切地渴望金子，那不仅是由于他的粗鄙贪婪。可以肯定的是，正如西班牙学者胡安·吉尔(Juan Gil)观察到的那样，他"着迷于铜币(maravedis①)的叮当声"。他艰苦地和西班牙君主讨价还价，为了从他的发现中寻求可能的最大利益。尽管他在上一年还悲叹他的贫穷，说个人头上连避风雨的屋顶都没有，但他死时已是个有力富翁。但是哥伦布还有另外一面。他把金子看做是推进基督教全面胜利的一种方式，敦促他皇室的主人用从西印度群岛得到的收入发动宗教战争，以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神圣的土地，并且以身作则招募十字军战士。在哥伦布身上充斥着一种永恒的挣扎，即相信世界要在155年之后终结的中世纪神秘主义和文艺复兴时人们充满了为获取权力、头衔、财富和名誉的动力之间的永恒挣扎。

为了确切评价哥伦布成就的意义，人们必须承认他是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历史力量的工具，这一历史力量就是从衰亡的中世纪封建制到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转换，资本主义的成功就在于征服和全球市场的创建。这一过程反过来又要求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证明，即要狂热地坚信白种欧洲人要比所有其他的人民和种族都要优越。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的工作代表了那一意识形态在新世界的第一种策略的运用。他如果不是殖民主义的鼻祖，至少也是鼻祖之一，而且对那一统治体系毁
61 灭性的后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巴波亚(Balboa)和麦哲伦(Magellan)

一些追随哥伦布船队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南美洲大陆海岸的巨大潜力。1499年，阿隆索·德奥赫达(Alonso de Ojeda)在水手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和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伴随下，向奥里诺科河(the Orinoco)河口航行探索委内瑞拉海岸。韦斯普奇还于1501至1502年参加了葡萄牙派出

① 西班牙硬币。——译者注

……第一次是在……这次探险借着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的发现从巴西出发,沿着巴西海岸在返回之前探索了从巴伊亚的萨尔瓦多(Salvador da Bahia)到里约热内卢之间的……。亚美利哥在写给他的赞助人乔万尼(Giovanni)和洛伦佐·梅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信里,这个文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用他敏锐的头脑对新世界的动物群、植物群和居民做了活泼的……描述。他的信在16世纪早期发表并且广泛流传。……在……中,讲述了1497年并不存在的一次航行,并赋予他登上美洲大陆第一人的名声。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决定通过在地图上用"亚美利加"命名新发现的巴西地区,以纪念韦斯普奇。这个名字很快流行起来,现在已用于称呼整个新世界。

由于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新移民也普遍缺乏经济机会,这导致了西班牙的奴隶贩子和冒险家去征服剩下的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1509年到1511年间,波多黎各、牙买加和古巴被征服。同一时期,发现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北部海岸殖民地的努力失败,剩余的两个探险队联合起来,由精力充沛的征服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Vasco Nunez de Balboa)带领,在巴拿马地峡形成了其为达连(Darien)定居点。据当地的传说,大海的河口处有……地上到处都是金子。巴尔博亚在这一传说的鼓动下,带领探险队穿过巴拿马的森林,翻过高山到达了太平洋海岸。如果他没有引起他的……——"两条腿的老虎"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Pedrarias Davila)的嫉妒,他也许已经和秘鲁的印加帝国建立了联系。达维拉由西班牙斯……于1514年派出作为地峡的总督。巴尔博亚被控告试图通敌和叛逃罪而判刑,并于1519年被斩首。

巴尔博亚发现太平洋存在之后,接下来的欧洲人航行集中在寻找通过或绕过美洲大陆通向东方的航线。麦哲伦,这个曾经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战斗过的人,相信在巴西南部有一条到东方的捷径。葡萄牙国王对他的项目不感兴趣,麦哲伦转向西班牙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从 1519 至 1922 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结果写进了历史，代表了巨大的航海壮举并极大地增加了欧洲的地理学知识储备。然而，除了为西班牙偶然得到菲律宾之外，麦哲伦的探险很少有直接价值，因为他们东向的航线太长而失去了商业意义。最后的结果是揭示了美洲在西班牙人眼中的价值。很容易到达东方的幻梦破灭后，西班牙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扩展美洲的征服，以及掠夺新世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上面。

征服墨西哥

早期和蒙特祖玛的接触

1518 年，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阿兹特克人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从墨西哥湾海岸的北边急匆匆赶来的贡赋征收者品诺特(Pinotl)告知国王蒙特祖玛，带翅膀的塔里载有白面孔、大胡子的人正从海上靠近。品诺特已经和这些人用手势交流过了，并且还与他们的首领交换了礼物。在离开之前，神秘的来访者还许诺不久要返回(品诺特对他们手势的解释)，并且要拜访山中这座城里的蒙特祖玛。

阿兹特克的记录支持这一点，即这个消息使蒙特祖玛沮丧。这些陌生人的首领是救世主羽蛇神返回来收复他失去的王国吗？根据阿兹特克的一个资料，蒙特祖玛大声叫嚷，“他出现了！他回来了！他会来
62 到这儿，到他的王座和华盖这里来，因为这是他离去时许诺的！”

“带翅膀的塔”就是西班牙船长胡安·德格里哈尔瓦(Juan de Grijalva)的船队，是由古巴总督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派出，探索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1517 年)在寻找奴隶的探险时已经发现的海岸。科尔多瓦在尤卡坦半岛登陆，那里居住的是玛雅人，他们的棉斗篷和华丽的羽毛装饰、石金字塔、庙宇和金饰物都表明，当地的文化要比西班牙人迄今为止遇到的所有居民都要先进。科尔多瓦惨败在遇到的玛雅人手里，返回古巴后就因伤死去。但是，他带回的大量金子和其他富有的信号激励委拉斯开兹又准备了一次新的探险，这次他托付给了

他的同族胡安·德格里哈尔瓦。

1518年4月，格里哈尔瓦从圣地亚哥出航，沿着科尔多瓦的航线到达了蒙特祖马帝国的边界，在那里他受到了挥舞着白旗的当地人的欢迎，因为蒙特祖马命令他们靠近。在那里，阿兹特克人的官员品诺特登上了格里哈尔瓦的船，他的报告曾在特诺奇提特兰引起惊恐。贸易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了，阿兹特克人用金子和西班牙人物物交换绿色珠子。格里哈尔瓦现在确信，他已经来到了拥有许多大城镇的富有王国。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港附近，格里哈尔瓦把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送回了古巴，带着通过物物交换得到的金子。阿尔瓦拉多向委拉斯开兹报告已经完成了任务，并请求当权者建立一个殖民地以提供增援。格里哈尔瓦自己和另外三艘船继续航行，可能远达标志着阿兹特克帝国的北方边界的帕努克(Pánuco)河。然后，他又循原路返回，于1518年11月到达古巴。

科尔特斯——羽蛇神①

委拉斯开兹已经在计划征服墨西哥大陆的第三次探险。他不再理会格里哈尔瓦，而是挑选了31岁的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省麦德林(Medellín)人，作为探险的首领。科尔特斯1485年出生于一个中等收入的小贵族家庭。他在14岁的时候到了萨拉曼卡，在这所西班牙著名的学校申请到了位置，

---

① 在本节中，我们把带有神奇古怪的要素都加到对阿兹特克人事件的说明中，这些内容是在传教士—学者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un*)在其不朽的巨著佛罗伦萨抄本(*Florentine Codex*)中读到的，因为它提出的对阿兹特克人心理和行为的描述引人注目。在传说的版本中，预言要回来的神君羽蛇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据称，蒙特祖马把科尔特斯似乎已经视为回归的神或者是神的使者。然而，最近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已经提出，神话是阿兹特克人失败后当地人后征服的合理化行为，或者是西班牙人把阿兹特克人的命运合理化，或者甚至纯粹是科尔特斯的发明，他曾两次引用蒙特祖马告诉他的神话故事。这对怀疑主义观点作为非历史性的让我们印象深刻。历史记载的许多神话都预言了救世神的归来：中世纪的德国人相信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会归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人相信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王会归来，为什么阿兹特克人不能相信神君羽蛇神的归来？

准备攻读法律，但是他在几年后离开并准备参军。一边是意大利，欧洲重要的战场，在那里西班牙军队在伟大的指挥官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órdoba)的带领下赢得了名声；另一边是西印度群岛、黄金之地、亚马孙和黄金国(El Dorados)，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1501年，在他19岁的时候，他乘船前往伊斯帕尼奥拉岛。

科尔特斯到达岛上不久，就取得了他的第一次战绩：镇压了因为西班牙的虐待而绝望反叛的阿拉瓦克人(Arawaks)。他得到的回报是赐封委托监护地(encomienda)。1511年，他在委拉斯开兹的部队里服役，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古巴。接下来的一年，他在古巴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圣地亚哥市市长。1518年，他说服了委拉斯开兹让他指挥墨西哥大陆的新探险，但在最后时刻，不信任他的首领决定召回他。科尔特斯对委拉斯开兹的命令不予理睬，1519年2月，他带着大约600人的
63 兵力从古巴出发。因为委拉斯开兹还没有完成和令他满意的王室的谈判，以便有一个协议授权对内陆的征服和殖民，所以科尔特斯得到的指令是他只可以进行贸易和探险。

科尔特斯的船队首先到达的陆地是科苏梅尔岛(Cozumel)，在那里他们救起了乘船遇难的西班牙人杰罗尼莫·德阿吉拉尔(Jerónimo de Aguilar)，他已经在玛雅生活了八年。1519年3月，科尔特斯登上了塔巴斯科(Tabasco)海岸，在一场尖锐的冲突中击败了当地土著，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个友谊的信物——墨西哥女孩马琳切(Malinche)①，作为翻译、向导和情人为他服务。4月，科尔特斯在今维拉克鲁斯附近停船。他策划了一个使自己摆脱委拉斯开兹令人讨厌的权威的方法。表面上看，他只是顺从了大多数跟随者的愿望，声称征服

---

① 在墨西哥成功独立之后，马琳切对科尔特斯有目共睹的服务以及西班牙人的征服都使她的名字臭名昭著，成为出卖给外邦人的同义词，而且对许多墨西哥人而言，她的名字直至今天还仍然有这一含义。然而，从公道的立场谈马琳切，我们就会理解，那时候，在中美洲的各个种族中，并没有墨西哥人的国家或统一意识。一个天资聪颖的年轻女孩虽然拥有卓越的语言能力，马琳切发现自己被不情愿地扔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弗朗西丝·卡特朋(Frances Karttunen)写道，她生存的最大希望，就是为科尔特斯服务，而且她"忠实地为他服务。相反，她的一贯性不是背叛的体现，而是可以被看做一个忠诚地履行了职责。"

和移民已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王室利益。科尔特斯建立了里卡韦拉克鲁斯镇(*Villa Rica de la Vera Cruz*),并任命了镇的第一批官员,并把从委拉斯开兹那里得到的权力交到这些人手中。这些官员又授予科尔特斯陆军总司令的头衔,并有权力征服和开垦殖民新发现的土地。这样,科尔特斯就用西班牙中世纪的市政自治传统给他的不服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几天以后,蒙特祖玛的使节出现在西班牙的营地。特使们带来了珍贵的礼物,伟大的特拉洛克(Tlaloc)神、特兹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神和羽蛇神的华丽衣装。他们虔诚地给科尔特斯穿上华丽的羽蛇神衣服。给他戴上镶有绿松石的蛇面具,把交叉的绿咬鹃羽毛和金耳环悬挂在面具的两边。在他的胸前,他们又系上了装饰着绿咬鹃羽毛的背心;还在他脖子上戴上中心有个金盘的珍贵石头做成的项链。手上的防护物装饰有金子、贝壳、流苏和绿咬鹃羽毛垂饰。他们还放在他面前了一双做工精致、柔软的豹皮系带鞋,犹如黑曜石那样黑。

阿兹特克人显然对这些并不满意。“就这些了吗?”据说科尔特斯这样问,“这就是你们的欢迎礼物吗?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胆战心惊的特使们走了,又回来时带来了更多神喜欢的礼物,包括车轮那么大的太阳形金盘、更大的月亮形银挂件,以及一个镶满了天然金块的头盔。

特使们向蒙特祖玛报告他们听到和看到的,添油加醋地描画神的形象以及他们的动物。他们描述了加农炮的火力,阿兹特克的使者们报告说是科尔特斯下令展示的,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一个像石球一样的东西从它的内脏出来,发射出火光和火雨。冒出来的烟有让人讨厌的气味,闻起来像烂泥……如果大炮瞄准的是山,山就会哗啦一声被劈开。如果它瞄准的是树,树就会被打成碎片。

他们还鲜明生动地描述了其他武器、盔甲和西班牙人的装备。

关于西班牙人可怕的战狗,特使们是这样说的:

他们的狗体形庞大，耳朵竖立，拖着长长的舌头。它们的眼睛是发亮的黄色；眼睛炯炯放射出火光。它们的腰部是宽的，侧面长而窄。它们不知疲倦非常有力。四处蹦蹦跳跳，并伸出的舌头喘息。而且它们身上的斑纹像豹猫一样。

蒙特祖玛的特使们向科尔特斯保证，他们会在他停留海岸期间为
64 他提供一切服务，但是请求他不要会见他们的国王。这一请求是蒙特祖玛可悲策略的一部分，用不断地给科尔特斯羽蛇神礼物而希望他会放弃继续向内地推进并收回他失去的王位。科尔特斯温文尔雅地告知使者们，他已经越过了许多海，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要见到蒙特祖玛并和他会谈，因此不会无功而返。

进军特诺奇提特兰

当科尔特斯得知阿兹特克附属各国严重不满阿兹特克的法律时，就决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鼓励沿海的托纳克人(Totonacs)抓住并囚禁蒙特祖玛的收税官，但是要马上释放他们，并把他们送到国王那里，表达他的问候和友好。然后他派了一艘船送一封信件给查尔斯皇帝，在信中他描述他发现的地区的范围和价值之大，试图使他的行动获得准许。为了得到皇帝的好感，科尔特斯说服他的人不仅送给查尔斯王室第五税(quinto)①，而且包括他们从蒙特祖玛那里得到的全部财宝。然后他又坚决果断免除他的随从偷漏的所有税，还凿沉了所有剩下的船，借口是它们不适合再航海了。最后，科尔特斯和他的小部队开始向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进军。

进军到山区时，科尔特斯已经进入了阿兹特克人传统上的对手强硬的特拉克斯卡兰人(Tlaxcalans)地区。西班牙人在和这个强大的民

① 王室第五税是一种古老的王室税，缴纳掠夺得来的贵金属和其他物品(包括奴隶)的20%。它在中世纪的穆斯林城邦、基督教伊比利亚王国[illegible]，都被采用，并且在其海外殖民地实行。——译者注



著名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描绘了可怕的奴役、压迫和种族灭绝，这些都是科尔特斯和西班牙征服者为了搜刮财富和扩张西班牙帝国而强加在土著人身上的

取得政权之前，必须在战斗中证明他们的武器和战斗能力的优越性。接着科尔特斯攻进了古代古典文化传统和羽蛇神的崇拜中心乔卢拉。 65
据说乔卢拉人一直密谋在这里攻击他，科尔特斯就把他们集合到大院子，制造了一场对乔卢拉贵族和战士的大屠杀。当这一消息传到特诺奇提特兰之后，恐惧传遍了全城。

西班牙人继续他们无情的进军：

> 他们作为征服者列队行进到战场，所到之处扬起的尘土形成了旋风。他们的长矛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们的旗帜像蝙蝠一样摆动。由于他们的铠甲和武器碰撞而发出声音，因此所行之处吵闹喧嚣。一些人从头到脚穿着亮闪闪的钢铁；每一个见到他们的人都胆战心惊。

蒙特祖玛的恐惧和疑虑至今为止已经使他因绝望而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他在投降和抵抗之间摇摆，在相信西班牙人是神和半信半疑他们缺乏神圣性之间摇摆。他派了新的使者，给科尔特斯带去了丰富的礼物，但是敦促他放弃访问阿兹特克都城的计划。蒙特祖玛天真地努力贿赂和哄骗可怕的"渴望和贪恋金子"的异邦人，而他们"像饿狼一样扑向金子"，一个阿兹特克人用痛苦的字眼这样描述。这些做法当然是无效的。国王派了一群巫师和占卜者去对西班牙人念咒语，但这被年轻的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神阻止了，它用魔法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被烧为废墟。蒙特祖玛的力量最后耗费在欢迎科尔特斯进入都城上，并将其看做返回收回其宝座的合法统治者。通过允许让科尔特斯把他从自己的宫殿中绑架，而且和几个朋友一起作为人质在西班牙的驻地待遇被囚，阿兹特克国王完成了他的谢幕。

对阿兹特克民族的征服并没有结束。在科尔特斯离开城到海岸去面见总督委拉斯开兹派来逮捕他的探险队之后，他的助手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下令进行了一场无谓的屠杀。在阿兹特克的酋长们和战士们用唱歌跳舞以祝纪念大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的宗教节日时，阿尔瓦拉多下令杀死了他们。这件事的结果是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迫使西班牙人退回到他们自己的驻地。这一情形是在科尔特斯已经争取到了大多数追来者，并击败了其余人，当他返回到特诺奇提特兰与他的同志们会合时发现的。他试图安抚阿兹特克人的努力失败了。阿兹特克议会废除了被囚禁的蒙特祖玛并选举了新的首领，新首领对入侵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战争正激烈的时候，蒙特祖玛死了。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述，他是在呼吁和平的时候被他自己的人们用石头砸死的；或者依据阿兹特克人的材料，他是被西班牙人绞死的。由于担心长期围攻和饥荒，科尔特斯在人员损伤严重的时候从特诺奇提特兰撤离。活下来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当地同盟军最后到达了友善的特拉斯科拉(Tlaxcala)。

通过与从古巴赶来的西班牙援军以及数千阿兹特克帝国内当地对

说服合作集团力量，科尔斯特于1520年12月又重新进军特诺奇提特兰。8月23日，在围攻并和阿兹特克人激战4个月后，他们的最后一位皇帝、英勇善战的考乌特莫克(Cuauhtémoc)在饥民的恸哭声中投降了。科尔特斯占领了曾经是特诺奇提特兰城的那片废墟。

征服的后果

征服的浪潮从墨西哥山谷向各个方向扩展。阿尔瓦拉多征服了危地马拉，科尔特斯征服了洪都拉斯。1527年，佛兰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 de Montejo)开始征服尤卡坦。但是直到1542年，玛雅人在一场斗争中发动起义又在被以大屠杀镇压。同时，达里恩(Darien)的探险者征服了尼加拉瓜人(Nicaraguans)。这样，西班牙征服的两支主流都以伊斯帕尼奥拉岛为起点又走到一起。

在很短的时间内，科尔特斯成为古老的阿兹特克帝国无可争议的主
人，并被命名为“新西班牙王国”。他授予他的士兵们委托监护地
(encomienda)，把最富有的城镇和地区的贡赋留给自己。作为对他服 66
务的回报，国王授予他瓦哈卡谷地的侯爵头衔以及2.3万家臣；他的生
活几乎是国王式的，就餐时“有人歌唱并吹奏喇叭”。但是，王室对这位
伟大征服者的不信任不久就显示出来。就在他任总督的时候，他被剥
夺了管理权，检审法庭(audiencia)被授予权力，严密审查他的所有行
为。他于1539年返回西班牙，并在第二年以他享有的声誉参加了对阿
尔及尔(Algiers)的远征，但是遭到了国王的忽视和冷落。怀着满腔悲
痛，他退隐在塞维利亚。1547年去世后，他的头衔和资产都留给了他
法律上的大儿子，马丁·科尔特斯(Martín Cortés)。

征服秘鲁

墨西哥的征服挑战给其他西班牙人去建立像科尔特斯和他的同伴们那样的功绩。发现流传的黄金王国在“南海”之外的工作是从巴波亚(Balboa)开始的，但由于他死于佩德拉利亚斯·达维拉(Pedrarias Dávila)之手而中断。1519年，达维拉在地峡西侧建立了巴拿马镇，这

个镇成为沿着太平洋海岸探险的基地。一年后，帕斯夸尔·安达戈雅(Pascual de Andagoya)穿过了圣米格尔(San Miguel)海湾，返回时带回了更多关于叫秘鲁(Biru)的黄金之国的信息。

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

达维拉把向南的航行委托给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一个目不识丁的贫穷士兵，人们对于他知道得很少。皮萨罗征召了两个去秘鲁人那里探险的伙伴：迭戈·德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一个同样出身不明的探险者和赫尔南多·德卢克(Hernando de Luque)，一个神父，他的任务是充当一个人的财务代理。最初的两次探险，分别在1521年和1526年整装从巴拿马出发，他们得到了足够多的金银，证实了难以捉摸的王国的存在。于是皮萨罗动身去西班牙以获得王权批准从事秘鲁的探险事业。当他返回巴拿马时，已经得到了大将军和先遣官(指挥官)的头衔，还带回了他的四个兄弟和其他随从者。阿尔马格罗不满意合同中的头衔和报酬分配，因而控诉皮萨罗轻视他为国王的服务。尽管争执被平息下去，但已经种下了致命的仇恨种子。

1531年12月，皮萨罗带着约200人的兵力从巴拿马向南方航行，并于几个月后在秘鲁的海岸登陆。西班牙人一到达就获悉，印加帝国内战正酣。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即上一任皇帝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apac)与他第二个妻子的儿子已经开始起义反对另一个试图登基者：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Huascar)。阿塔瓦尔帕正向帝国的都城库斯科(Cuzco)挺进的时候，他接到了信使带来的白种异乡人到达的消息。在两个首领交换了信息和礼物之后，两支军队前进到群山之间的卡哈马卡(Cajamarca)镇会合。

也许是直接效仿科尔特斯，皮萨罗计划先抓住印加的阿塔瓦尔帕赢得迅速且相对而言不流血的胜利，通过他也许还有希望统治这个国家，这正如科尔特斯对蒙特祖玛所做的那样。可是秘鲁人的情况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墨西哥的情况。如果蒙特祖玛的无所作为是他对

在个入侵者的权力接受，那么阿塔瓦尔帕的错误在于，他低估了小规模西班牙兵力的集中打击力。他曾经被误导并相信，刺刀并不比妇女纺纱用的纺锤更危险，火器只能发两枪，战马到了晚上就派不上用场了。也许，就是这最后一个误判导致他把进入卡哈马卡的时间推迟到傍晚而不是上午，正如皮萨罗被告知并希望的那样。

当阿塔瓦尔帕和他的护卫出现在约定的会面地点卡哈马卡广场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因为皮萨罗已经和他的人隐藏在面向广场的大建筑里。然后神父文森特·德瓦尔弗德（Vicent de Valverde）在翻译的陪同下走向前，向慌乱的印加人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要信教，服从和向西班牙国王的义务，直到恼怒的皇帝扔掉瓦尔弗德递给他的《圣经》。皮萨罗一声令下，他的披着铠甲、装备有大炮的士兵冲 67
向前去，杀死了数百人并俘获了印加王。“太壮观了，”一个西班牙观察者写道，“看到一个伟大的国王走过来时还权倾一时，转眼间就成了俘虏。”

阿塔瓦尔帕[illegible]地祈求要用满满一屋子比人还高的金子物品作为来交换自己的自由。皮萨罗接受了这个出价，数百头骆驼驮着金子从帝国各处赶来，直到达到规定的高度。但是皮萨罗并没有放走皇帝的意思；阿塔瓦尔帕仍然被“保护性地拘留”，因为这个傀儡统治者能确保新命令被普遍接受。然而不久，西班牙人就开始怀疑阿塔瓦尔帕正成为了一场密谋反对他们的焦点，因而决定他必须死。他被指控叛国罪而被判处火刑，用这个判决代替绞刑是因为他接受了洗礼。

印加灭亡后，西班牙人进军印加的都城库斯科，并于 1533 年 11 月占领并洗劫该城。这一成功和后来的西班牙战役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借助于印加皇族已故的瓦斯卡（Huascar）那一支以及库拉卡们（curacas），他们看到了重获失去的独立和权力的机会，在阿塔华尔帕被捕后就加入了西班牙一方，并给西班牙提供了军队和其他帮助。从库斯科掠夺的金银和阿塔华尔帕的巨额赎金一起都被融化并分给了士兵们。弗兰西斯科的弟弟赫尔南多·皮萨罗（Hernando Pizarro），带着给皇帝查尔斯的那一份战果回到了西班牙。赫尔南多带着成堆的金



阿塔瓦尔帕，独立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用黄金物件，包括无袖长袍、耳坠和头饰带奢华地展示了他的帝王权力

银回来引起了一阵狂热的兴奋，掀起了西班牙人到新世界寻找宝藏的新浪潮。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已经开始建造一个全新的西班牙人都城——利马，众王之城，靠近海岸使其和巴拿马联系

后殖民的麻烦

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就装腔作势要扶持印加王室中具有合法地位的那一方，宣布瓦斯卡尔的弟弟曼科(Manco)为新印加王。但是曼科并不满足于扮演西班牙的傀儡角色。曼科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暴动在帝国的许多地方爆发。大批军队围攻库斯科达10个月，但最后在几乎就要占领城市的时候失败了。由于西班牙人先进的武器和策略以及军队食物短缺，曼科撤退到安第斯山脉偏僻的要塞中，在那里他和他的继任者维持着一个印加流亡政府直到1572年。该年，西班牙的军事探险队进入山区，冲进帝国宫殿，抓住了最后一个印加皇帝——

[illegible]克·阿马鲁(Tupac Amaru)，在库斯科一个庄严的仪式中将他斩首

[illegible]的一帮征服者和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illegible]人因争控库斯科城财物而发生内讧的时候，印加[illegible]几乎要被攻下。阿尔马格罗战败后被判处绞[illegible]他留下[illegible]了和一大帮支持者还是对他们的贫穷和所谓的错[illegible]其中的12个人，因为声称只有一件斗篷，而被皮萨[illegible]"斗篷骑士"的称号，在1541年6月计划并实施了[illegible]对秘鲁征服者[illegible]。但是他们的胜利没有持续多久。查[illegible]卡斯特罗(Vaca de Castro)充当皮萨罗[illegible]为了向支持者多的那些主要将领表达自己的忠诚，瓦[illegible]了对阿尔马格罗的儿子的战争，在"楚帕斯(Chupas)[illegible]的军队后，[illegible]对他进行审判并以国王叛徒的罪名将之斩首

[illegible]的终结。1544年初，一个新总督布拉斯科·[illegible](Blasco Nunez Vela)到达利马，公布了被称为东印度群[illegible]法令。这些法律为印第安人的贡赋、释放土著奴隶以及禁[illegible]了[illegible]制度。那些征服者们义愤地哭喊说受到侵害，[illegible]对秘鲁的[illegible]地上暂停这些法令。当这些请求得不到关注的时[illegible]，[illegible]的征服者们揭竿而起并找到了一个领导者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被谋杀的弗兰西斯科的兄弟。

秘鲁人叛乱的第一阶段随着总督努涅斯·维拉在基多(Quito)附近的一场战斗中失败并死亡而显然有利于贡萨洛·皮萨罗。皮萨罗现在成为这个国家的无冕之王。叛军领导者把他最初的胜利归功于足智多谋、有魔鬼般充沛精力的阵地指挥官和首席顾问，弗兰西斯科·德卡巴雅尔(Francisco de Carbajal)。卡巴雅尔异常残忍，把这些特征结合在了一起成为秘鲁的一个传奇。

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后，卡巴雅尔和其他顾问一起敦促皮萨罗自称自己为秘鲁国王。但是皮萨罗比他具有钢铁意志的中尉软弱，对

 68

自己革命行动的意义也就像不大。国王代表佩德罗·德拉·加斯加(Pedro de la Gasca)到达后在瓜马地上岸，宣布执行[illegible]，所有对叛乱忏悔的人都将得到赦免和奖励。这引发皮萨罗军队中不断有少数人逃走，并很快发展为退军大潮。

最后，叛乱几乎不战自溃，叛乱领导者也被处决。在秘鲁内战之前这一恩怨一直在继续，皮萨罗四个"倒霉的兄弟"和阿尔马格罗家族，父亲和儿子，都因暴力致死；一个总督被杀；无数人在内战中丧生。直到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总督执政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和平和秩序才稳固地建立起来，他在1569年来到，即在大约战斗开始的四分之三世纪之后。

少数西班牙人如何赢得了两个帝国

西班牙人的征服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小部分西班牙人，起初只有几百人，如何征服了人口数量上百万、有高度发达且有自己军事传统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相对轻松地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这些人以城邦为组织，以密集农业为基础过着稳定的生活，完全服从皇帝的管理。另一方面，边缘部落的文化，如墨西哥平原北部游牧的奇奇梅克人或者智利的阿劳坎人，实行简单的轮耕农业和放牧，他们异常顽强；阿劳坎人几百年间不断和西班牙入侵者及他们的后代战斗，直到1883年。

16世纪的西班牙士兵和才智非凡的编年史家，佩德罗·奇扎·德莱昂(Pedro Cieza de León)对印加帝国的迅速崩溃和西班牙人未能征服"野蛮的"哥伦比亚丛林部落两者间的对照进行了思考，给出的解释是部落简单的社会和经济组织中的人们在西班牙人进攻之前逃跑成为可能，并且很快就在别处重建村庄生活。与之相对照，大部分的印加人，是温顺的主体，他们把皇帝的失败看做自己的失败，并很快服从了新的西班牙主人。因为对这些人而言，从印加肥沃的山谷逃到在地球上由沙漠、荒凉的高原和冰雪覆盖群山为主要的地区，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奇托[illegible]的见解深刻，但是人们并不满意关于这些伟大帝国迅速灭亡的解释。他们认为招致这一结果至少有四个原因： 69

1. 西班牙的[illegible]弩和大炮，尽管依据现代标准而言是原始的，但是使入侵者的装备比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有决定性的优势。印加人的装备是弓箭、木头长矛和飞镖、投石器、装有石头或铜头的战争棍棒，以及一边装有锋利石头的木刀。而且对西班牙人更具决定性的是马，一种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都不了解的动物，它至少在起初让人畏惧。[illegible]矛和剑，裹着铠甲和锁子甲，力量强大令人吃惊足以抵挡当代印第安人的攻击力。一次又一次，少数西班牙骑兵部队击败了人数多得多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勇士。

2. 疾病，尤其是天花，不知不觉被入侵者带进来，成为西班牙人的有效盟友。举其中一个例子，西班牙人围攻特诺奇提特兰城的时候流行天花，国王奎特拉瓦克(Cuitlahuac)和许多阿兹特克士兵、市民都因之死去，因此也加速了它的陷落。

3. 西班牙人的观念基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时的世俗观念，而他们的对手则代表了一种更古老的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中仪式和魔法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征服者部分是被宗教热情驱动的。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战争基本上是一门科学或艺术，是以欧洲数世纪以来军事战略和策略的研究和运用为基础的。对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来说，战争有重大的宗教成分。比如，阿兹特克人的战争策略强调抓到西班牙人并把他们拖到神前祭祀，而不是当场杀死。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战争也包括有组织的仪式和风俗习惯，要求人们要给予袭击目标适当的提醒。西班牙人则不受这种风俗的限制。[1]

4. 内部分化是这些帝国迅速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进贡国的人们或者未被收服的人如特拉克斯卡兰人仇恨阿兹特克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最后对特诺奇提特兰的战斗中形成了科尔特斯兵力中的

---

[1] [illegible]（Requerimiento），作为满足西班牙王室的道德良心而设计的文件，它包含着[illegible]的要求。对于这一文件的滑稽运用，参见第四章。

大部分力量。在今天的秘鲁地区，在印加的两个王位觊觎者和他们的随从之间的冲突使王权直接落到了皮萨罗的手里。印加帝国是一个诸城邦的组合体，一些城邦刚刚合并到帝国，因此这些城邦的前任领主或库拉加们渴望重新获得独立，因此和西班牙这一方联合起来，等他们发现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更糟糕的压迫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因为西班牙人优势的兵力和带来的导致大量死亡的致命性疾病、和当地帝国人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帝国自身的内部分歧，这些发达、高度组织化的帝国就败给了西班牙人。

寻找黄金国(El Dorado)

在北美的失败

从其最初的西印度基地和从两个新的墨西哥和秘鲁中心，西班牙人伟大的征服运动向四面八方辐射。当西班牙人的舰队从太平洋水域出发寻找香料之岛的时候，寻找新的黄金王国的陆上探险运动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内部正甚嚣尘上。

北美洲大陆早就吸引了以西印度为基础的西班牙淘金者和奴隶贩子。1513年，波多黎各总督庞塞·德里昂(Ponce de Leon)向西航行并宣称他发现了一块亚热带土地，并将其命名为拉·佛罗里达(La Florida)，但接下来要殖民化这个地区的努力因他的死亡而告终。16世纪20年代的另一次探险由能力不足的潘佛罗·德纳尔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带领，探险队在广阔无垠的佛罗里达遇到了灾难，只有四人活了下来。这四个人中有后来的编年史记载者，诚实而仁慈的阿尔瓦·努涅斯·卡布扎·德巴卡(Alvar Nunez Cabeza de Vaca)，他在迂回徒步穿过得克萨斯平原后，安全地抵达墨西哥。

卡布扎·德巴卡的冒险故事和他们提供的远在地平线之外的人口
70 稠密的城市的线索，激起了具有征服秘鲁的丰富经验的征服者赫尔南
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热情，他试图得到佛罗里达的财富。
1542年，经过三年无益的游荡和与当地土著的战斗，在到达今天的卡

在穿越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斯州之间的广袤地区时，德索托因高烧而死于荒野中。

卡韦扎·德巴卡和他的三个同伴在1536年抵达墨西哥后讲述的故事，甚至有个叫弗雷·马科斯(Fray Marcos)的人宣称，他已经看到过七个神秘黄金王国中的一个——西勃拉(Cibola)，使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总督信以为真。他于1540年派出了一支由弗朗西斯科·瓦斯奎兹·德科罗拉多(Francisco Vásquez de Coronado)带领的北方探险队。西班牙装备盔甲的骑士团为了搜寻那七个黄金王国，经过了后来的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可能还有内布拉斯加州。西勃拉原来只不过是现在亚利桑那的祖尼布洛人(Zuni pueblos)简陋贫



在这幅大卫·阿法罗·西奎洛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所做的壁画《与神话相反的考乌特莫克》中，他使考乌特莫克成为不朽。考乌特莫克是阿兹特克的最后一任国王，在抵抗西班牙人的征服中死去。对于许多墨西哥人而言，他已经成为了反叛和抵抗外来入侵与压迫的象征。

穷的现实使科罗拉多的梦幻破灭了。他又继续向东推进以寻找另一个黄金国，这次被称为基维拉(Quivira)。入侵者在他们的行程中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西班牙人被广袤无际的大平原击退，带着挫败的失望
71 痛苦返回了家乡。

南美的挫折

虚幻的黄金诱惑西班牙骑士们进入西南沙漠，同时也在南美洲的丛林和山脉中召唤着他们。从奠基于1525年的现代哥伦比亚海岸的圣玛尔塔(Santa Marta)镇出发，贡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Gonzalo Jimenez de Quesada)带领的一支探险队于1536年开始了穿越马格达莱纳河(the Magdalena River)，寻找黄金和通向太平洋通道的艰苦行程。他们最终出现在奇布查人居住的马格达莱纳高原东部之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奇布查人主要是农民，在铸造金饰和铜饰方面技术娴熟，他们生活在栅栏围起来的镇子里，接受叫做齐帕(the Zipa)的酋长统治。打败他们之后，希门尼斯·德克萨达在1538年建立了圣菲波哥大(Santa Fe de Bogota)镇，即后来的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省的首府。从奇布查人那里掠夺的大量黄金和翡翠财宝激发了西班牙人的想象力，也燃起了他们关于其他黄金王国的幻想。这些传说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黄金国(金人)的传说。

香料梦也给西班牙征服者的冒险事业带来了灵感，他们被东方生长着大量肉桂树的说法所吸引。贡萨洛·皮萨罗带领了一支探险队，于1539年从今天厄瓜多尔的基多(Quito)出发，翻过安第斯山脉来到了森林密布的东面山坡。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肉桂，但令人失望的是数量太少。西班牙入侵者在当地关于天边富有王国的荒诞故事的诱惑下，鼓舞精神继续前行，以致使这些寻宝者陷入旷野深处。贡萨洛的一个中尉，弗兰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Francisco de Orellana)被委派带着几个人沿着一条河流寻找食物，结果因河流湍急无法返回，他们只好继续沿着一条大河前行。他们乘着两条勉强可称为船的船行进了1 800里格，终于出现在河口，到达了西班牙在委内瑞拉的定居点。在

上游大河的岸边，奥雷利亚纳和当地人发生了冲突，连当地的妇女都加入了冲突中。他给这条河命名的西班牙名字是亚马孙河，说明了在西班牙人的征服中制造神话的过程。

他们到过的大陆南部几乎没有金银，那里只有新的农业和游牧定居点。1537年，皮萨罗的战友和对手，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在穿过崎岖的安第斯山脉、阿蒂普拉诺高原(Andean altiplano)和阳光炙烤的智利沙漠寻找金子但一无所获之后，极度失望地返回。两年后，皮萨罗命令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承担了征服秘鲁以南地区的任务。穿过智利北部的沙漠之后，瓦尔迪维亚到达了富饶的中部谷地，并在那里建立了圣地亚哥镇。在和阿劳加诺人的持续斗争中，瓦尔迪维亚奠定了以其他更温和的当地人的奴役劳动为基础的智利殖民地的基础。他在1553年的一次南方探险中被阿劳坎人抓住并杀死。

同一时期(1536)，西班牙殖民地的先遣官佩德罗·德门多萨(Pedro de Mendoza)的14艘船带了2 500名殖民者，在拉普拉塔河(the Río de la Plata)河口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镇。但是不久，饥饿的居民就放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迁移到约1 000英里外的上游，并在巴拉圭建立了新的亚松森(Asunción)镇，那里气候温和、食物充足，而且大量温顺的瓜拉尼(Guaraní)人也对西班牙人的定居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亚松森成为巴拉圭以及南美东南部所有西班牙人地区的都城。

征服者们

对美洲的征服吸引了大量的探险者，有些具有在意大利战争中服役的背景，有些想要忘记他们过去经历的专职士兵们组成了这支队伍。老资格的征服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曾经对人有这样的看法，他告诫探险的组织者要提防“衣着华丽者和夸夸其谈者”，他们“或者会杀死你、或者会卖了你、或者会在他们发现你在西班牙许诺的比你能产生的更多时背弃你”。在塞万提斯《模范故事集》的一个故事中，他把美洲描述为“绝望的西班牙人的避

难所和庇护地，反叛者的圣地，谋杀者的通行区”。难怪这一类型的人
72 们在玷污西班牙征服的暴行中比他们分内的贡献更大。但是征服者的背景非常不同，几乎涉及西班牙所有的社会阶层。大多数是平民，但是也有一些处于边缘的西班牙低等贵族依达尔哥和一些希望增加财富的穷绅士。1532年，168个人在卡哈马卡捉住了阿塔瓦尔帕，其中38人是希达尔哥，91人是平民，其余的人背景不明或不确定。根据研究卡哈马卡事件中人物的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 Lockhart)，这群人中有51人肯定有文化，大约76人“几乎可以肯定有识字功能”。这群人中有19名手工业者，12名公证员或职员，以及15名“买卖人”。

到16世纪20年代，一个从西班牙再征服中承袭的机构战友会(compana)，其成员根据一定的规则分享征服的利益，已经成为西班牙在新世界扩展的首要工具。其领袖是军队首领，通过拥有王家协议，被授予“先遣官(adelantado)”的头衔并且拥有被征服地的统治权。这些人有时利用自己的权利变富并且贡献巨大，有些人也由于探险的巨大支出而背上了巨额债务。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商人资本家和王室官员变富是通过奴隶贸易或其他方式提供装备船队需要的大量资金，或而获得马匹和奴隶，他们还供应武器和食物。

原则上，战友会实行军事民主，战利品的分配是由一个从整个团队中选出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执行的。在扣除王室第五税(the quinto)和共同债务之后，剩下的战利品就被平均分配。阿塔瓦尔帕的财宝被分为217等份，每份价值5 345金比索，在那时是个小数目。分配与个人的级别高低和贡献相符。标准是雇佣兵(peón)或者步兵一份，绅士(caballero)或骑兵(一份给骑士，一份给马匹)两份，军官更多。

尽管有其民主的方面，但是军官、大投资者和王室军官控制着征服事业，而且他们自己攫取了其中的最大份额。战友会中，有些人是军官们或投资者们的仆役或奴隶，他们的全部或部分份额都属于他们的雇主或主人。另外的情况是，征服者必须借用或者借钱买他们自己的装备，因此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还给了他们的债主。今天的一些人埋怨一些军官的掠夺性方式，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以可观的价格把装备卖给

的第一个时期，每一次征服都有赐封式的分配。手工业者和其他人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后都得到了赐封地；然而，后来只有探险的领导者们和希达哥成员才被授予此种奖励。

许多征服者贪婪、残忍，彼此之间相处困难，和土著更难以相容。皇家编年史学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一个狂热的帝国崇拜者写道，一些征服者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之为“这块大陆的刽子手和毁灭者”。征服者的残酷也反映了形成其性格的条件：从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反对摩尔人的战争中形成了西班牙对暴力的崇拜，大多数西班牙人在财富分配极其不均的社会中苦苦挣扎，以及血腥的殖民战争的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征服者都符合这种负面的评价却是不对的。一些征服者也由于他们的经历而转变了，变得谦虚起来，尊重当地土著人的价值观，或者甚至承认“印第安人”在道德上比西班牙人更有优越性。这是卡布扎·德巴卡从得克萨斯到墨西哥海湾 73
的艰难徒步旅行八年的过程中认识到的。他在叙述这次冒险经历时说，西班牙人表现得像野蛮人，而“印第安人”则表现人道而文明。另一个征服者西扎·德莱昂，“编年史者中的王子”，曾高度赞扬印加文明，批评征服的残忍，并且同情赞同拉斯卡萨斯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征服者，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Alonso de Ercilla)，16世纪西班牙最好的叙事诗《阿劳加那》(*La Araucana*)的作者，在诗中讲述了智利的阿劳加诺人反对西班牙人的斗争，赞扬甚至歌颂阿劳加诺人，他们在整首诗都是作为一定要自由的英雄人物出现的。然而，胜利的西班牙人则被刻画为胆小、贪婪和自私。

西班牙征服者通常被认定的动机有三个(上帝、黄金和荣耀)，第二个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肯定是最重要的。“不要说你去印度群岛是为国王服务，或者说为证明自己在服务期间是个勇敢的人，或者是一个希达哥应该做的事情，”奥维多在一封给未来征服者的公开信中评论说，“因为你知道事实恰恰相反：你去只是因为你想比你的父亲或邻居有更多财富。”皮萨罗在他回答一个敦促他传播信仰的必要性的神父时更

为直白："我来这里没有其他原因，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拿走他们的金子。"征服者和墨西哥征服的编年史家，伯纳尔·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ullo)坦率地宣称，征服者死于"为神及其威权的服务中，给那些仍在黑暗中的人以光明——同时也获得了大多数人垂涎的金子"。

大多数征服者的最终梦想是带着足够的金子返回西班牙，建立一个家庭，过着能赢得尊敬和被他们邻居羡慕的生活。只有一少部分人，主要是大商人和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s)，才要得到资产满足他们的野心，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会返回西班牙。大多数没有赐封地或其他财富来源的人，保持着日常常和更强有力的西班牙人联系或依赖关系。他们通常作为艺术家、雇佣军人，委托监护地和其他地产的看管人为委托监护主服务。1535年之后，越来越多未来的征服者来到美洲，那时加入获利丰厚征服的机会已经减少。结果，大量无业和骚乱的西班牙人的问题引起了官员以及国王的严重关切。

大多数征服者和其他早期定居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人是单身的年轻男性，也有少量已婚男性把妻子留在家中自己出来寻找财富。除了偶尔的女性或随军家属之外，几乎没有西班牙妇女陪同探险。然而，一旦战争停止，就有少数西班牙妇女渡过大西洋，一些是和她们的丈夫会合的妻子们(一般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已婚男子必须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或者他会被驱逐回西班牙)；另外一些是定居者的母亲、姐妹或者侄女、外甥女们。和当地妇女通婚并不常见；即使希达哥们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富有的当地贵族女性结婚，如蒙特祖玛的女儿，德丰希珀(Tecuixpo，又名 Isabel Moctezuma)先后有过三个西班牙丈夫。然而，16世纪中叶之后，各个社会阶层的大部分西班牙人都更愿意和西班牙妇女结婚，无论她们是移民过来的还是在西印度群岛出生的。到1575年时，以牢固的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西班牙家庭和家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

在成千上万勇敢的军官和他们骑马或行军在卡斯蒂利亚旗帜下去征服美洲的随从中，几乎没有几个能活到享受他们的勇气、苦难和残酷

与可成果。“我不喜欢先遣官的称号，”奥维多写道，“因为荣誉和称号在西印度群岛天生就是罪恶的预兆，许多拥有它的人都没有好结果。”因此在战争和冒险中活下来的人中，很少能得到最好的战利品、土地和劳力；大多数人仍旧在简朴甚至更糟糕的环境中生活，而且常常举债度日。①征服者之间的贫富冲突对征服后几十年西印度群岛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74

诺普·德阿吉雷——征服的受害者

那种不满是激起反抗情绪的主要因素，并导致了印加帝国陨落后，由失意的冒险者领导的秘鲁西班牙人的叛乱。虽然贡萨洛·皮萨罗的叛乱于1548年被击败，但是并没有给秘鲁带来持久和平，因为它遗留下来了许多满腹不满的探险者，他们曾经从西印度群岛的四面八方拥到这里来加入了反对皮萨罗的斗争。这些人希望从国王那里得到适当的回报。相反，他为打败皮萨罗的拉·嘉斯卡(La Gasca)给那些早在皮萨罗来到前就站在这一边的富人和有权势的朋友们增加委托监护地。许多战士都有被出卖的感觉，佩罗·洛佩兹(Pero López)表达了这一情绪，他指责嘉斯卡抛弃了“陛下所有的穷仆役，但是让陛下的许多敌人保留他们的全部财产，甚至给他们更多。”

总督卡涅特(Canete)在他1551年写给查尔斯五世的一封信中清晰地描述了经济问题的实质；他报告说，在秘鲁只有480个委托监护地，但西班牙人的数量是8 000人。即使把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在内，也只有1 000个西班牙人可以“维持生计”。卡涅特提出解决秘鲁失业灾难的办法就是打发他们到新的征服地，“因为众所周知，他们不会工作，不会开垦，不会耕耘，而且他们说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皇帝同意了这个方案，允许新的征服，他在1555年12月写给总督的信中说，要“根除并清理那些当前仍旧在乡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将出发去从事那一事业……”为此，查尔斯废除了1549

① 即征服者之间的贫富冲突。——译者注

年签发的法令，那一法令是在拉斯·卡萨斯的强烈催促下禁止新的征服的。

著名的洛普·德安吉雷(Lope de Aguirre)的"流浪者"生涯，给丧失继承权的以主人自居的征服者的心理和精神上都投射了一丝诱人的曙光。安吉雷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征服者，50岁，一条腿上伤残了。有关于亚马孙的旷野中心有一个迷人的黄金国的传言在秘鲁被人们谈论的时候，他已经花费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西印度群岛为了寻找黄金四处奔波。无论传说中的王国是否存在，它都为潜在的一些不安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解决途径。1559年，总督安德列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Andrés Hurtado de Mendoza)任命佩德罗·德乌苏亚(Pedro de Ursúa)带领一支探险队寻找"奥马瓜族(Omagua)和黄金"的地区。当探险队从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瓦亚加(Huallaga)河出发寻找黄金王国的时候，安吉雷在他年轻的混血女儿的陪同下，加入了远征。事实证明，乌苏亚是个无能的领导者，加上难以忍受的热、疾病和食物短缺，加重了不安情绪，不久就演变成兵变，领导者被安吉雷推翻，乌苏亚被杀死，而且尽管叛乱者推举西班牙贵族费尔南多·德·古斯曼(Fernando de Guzmán)作为他们的名义领袖"王子"，但是安吉雷很快就成为探险队无可争议的领导。

他制订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这一计划不寻找黄金国而是……他在计划中号召征服秘鲁，推翻当前的统治者，交给老的征服者们自己：

> 这是为了我们在征服中以及镇压那些王国中土著印第安人付出的劳动。因为尽管我们不辞辛劳、长期艰苦地战胜了那些印第安人，但我们付出了代价却一无所获……相反总督却用欺骗和假象流放我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口最稠密，但实际上却是环境恶劣的无人居住区……

在亚马孙河岸建造了两艘大船之后，探险队沿着这条大河出发，准备去征服秘鲁。安吉雷不信任古斯曼，他不久就杀死了"主

人"和秘鲁王子"以及他的情妇和随从们。1561年7月，当安吉雷和他的人进入大西洋的时候，其他的一些杀戮已经使西班牙人从370人减少到230人。他们航行经过圭亚那海岸的时候，夺取了玛格丽塔(Margarita)岛并杀死了地方长官。9月，他们在委内瑞拉海岸登陆，占领了巴伦西亚(Valencia)镇，并且宣布要以"火炮和刺刀的残酷战争"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第四章　殖民地生活的经济基础

焦点问题：

- 西班牙对土著居民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又如何影响到殖民地经济以及王室、教会和殖民者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
- 什么因素推动了殖民地劳动制度由委托监护制和奴隶制向劳役摊派制或米塔制、向理论上的自由劳动或债务劳役制演变？
- 哪些因素促使了委托监护制向大庄园制和采矿转型，并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经济活动的基础？
- 殖民地经济被确定为资本主义性质或者封建主义性质，它们的典型特征是什么？
- 西班牙商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的结构性弱点又是如何影响走私和海盗的？

西班牙政府从征服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协调征服者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与国王希望保留大规模的土著居民以便向其进贡之间的矛盾，征服者却通常以极其浪费和破坏性的方式使用劳动力。殖民地前几十年的经历表明，因殖民者怜悯之心留下的土著居民，要么灭绝了，像曾经发生在人口密集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即今海地岛）上的

相；要么起义反抗，直接威胁到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存在。国王自然不喜欢出现这两种情况。

国王还害怕西班牙殖民者对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性控制，有可能导致独立于王室政权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上升。对于这种事态发展，西班牙王室决定要进行阻止。教会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大兴趣。如果土著居民因西班牙人的虐待而灭绝，拯救异教徒灵魂的伟大任务将会无法完成，且教会良好的声誉也会受损。此外，谁又能接着建造教堂、修道院，并且支持印第安人中上帝的仆人呢？

对于土著居民政策的争论很快引发了各种思想激烈的斗争。由于深深根植于西班牙的中世纪历史之中，西班牙人 16 世纪的思想理念是极其坚守成规和经院主义的[1]。当经院主义在其他西方土地上逐渐消失的时候，在西班牙却被作为哲学方法和解决私人和公共问题的手段，保持了十足的活力。为使王室行为符合自然和神的法则，“履行王室良知”的需要就可以解释西班牙占领殖民地时的政策学说基础。土著居民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他们在本性上是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奴隶吗，即一个次等种族，可能需要被征服并且为西班牙人服 77
务？教皇把美洲授予西班牙国王，对土著居民要履行什么样的权利和责任？经常被国王们传唤回答这些或类似问题的法学家和神学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们引用亚里士多德、教父和中世纪哲学家的话，互相攻击。他们很少使用以直接观察为基础或者描述土著居民生活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西班牙殖民地的贡品和劳动力

然而，在西班牙对土著居民的责任进行争论的背后，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劳动力和贡品作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基础，应该由谁控制？国王、教会和殖民者是这场斗争的主要角色。

---

[1] 经院主义：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学校中形成的一种哲学学说与要义体系，主要是以教父、亚里士多德及其诠释者的权威为基础。

委托监护制和奴隶制

伊斯帕尼奥拉岛是西班牙政策的第一个试验场。当哥伦布在第一次探险到达该岛时，岛上的情况被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to Morison)恰如其分地概括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简直就是地狱”。为了急切向国王证明他这个“发现”的价值，哥伦布强迫土著居民上交金粉作为日常贡品。当处于高强度劳动压力下的阿拉瓦克人起来反抗时，他们被穷追猛打，成百上千人被送往西班牙当奴隶。后来，哥伦布对难以控制的殖民者做出妥协，向他们分配阿拉瓦克人，并保证他们有权使用土著居民做强迫劳动。

这个临时性的安排，在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as de Ovando)总督时期被正式确认，并得到国王的批准，最终变成了委托监护制。这项制度源于西班牙中世纪的实践，即给予士兵对从摩尔人那里俘获的土地和人的管辖权。委托监护制规定了殖民者要对土著居民负应有的责任。土著居民要向殖民者提供贡品和劳动服务，反过来，殖民者要承担保护土著居民、支付教区牧师工资及协助保卫殖民地的义务。实际上，委托监护制在西印度群岛证明是可怕的奴隶制。这种虐待的后果基本上是使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人口在20年内从几百万下降到了29000人。人口下降不是因为流行病，因为1518年前安的列斯群岛没有任何流行病的记录。

第一个反对这种状况的声音来自于1510年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他们的领导者安东·蒙特西诺斯(Antón Montesinos)神父，在1511年“降临节主日”(Advent Sunday)登上教堂的布道台，谴责了岛上的西班牙人会因对土著人的冒犯行为而遭受诅咒。愤怒的殖民者与“多明我会”传教士很快在法庭展开了辩论。费迪南德国王对此给予回应，批准了《布尔戈斯法》(Laws of Burgos 1512—1513)。这项法律仅仅是认可了现存状况，并加以合法化。

这些事件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西班牙拥有西印度群岛的合法性问题。为了使王室的良心得到满足，一位出色的法学家胡安·劳

斯·德巴拉西奥斯·卢比奥斯(Juan Lópes de Palacios Rubios)博士起草了一份名为《请求书》(Requerimiento)文件，要求征服者在对土著人发动战争之前，要认真阅读。这个奇怪的声明要求土著人承认教会和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西班牙国王们对他们土地的主权，这些土地是通过教皇慷慨捐赠而获得的，而且建立在痛苦的战争和奴役之上。只有当土著人拒绝由翻译传达的那些要求时，才能合法地对他们发动战争。一些征服者漠视这个"请求书"，在进攻土著人之前，只是含糊其辞地背诵一下，或者在突然袭击后，才向捕获的土著人阅读。编年史学家奥维耶多讲述道，当卢比奥斯听到他的文件如此奇怪地使用后，自己都尽情地大笑了。



与西班牙艺术中描绘的征服和殖民化的英雄主义文明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玛雅人的图画强调了西班牙人的野蛮，以及沦为奴隶的玛雅劳动力在殖民地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一个以前的委托监护主，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忏悔，后来成为了修道士，并加入了反对土著奴隶制度和卢比奥斯教条的行列。对于《请求书》的规定，德拉斯卡萨斯说，当他阅读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是笑还是哭。他还争论道，教皇把美洲赐予卡斯蒂利亚国王，只是为了皈依的目的；他授给西班牙国王的不是暂时的权力，而是对西印度群岛的完全占有。依据自然法则和国家的法律，印第安人理所当然地应拥有他们的土地。所有西班

牙人在新世界的战争和征服都是违法的。西班牙只能用一种方法把基督教带到土著那里,就是"对人们是合适、自然的……也就是,爱、和善和仁慈"。

德拉斯卡萨斯渴望在新世界以和平的方式搞殖民化,让西班牙农民和土著人生活居住在一起,教他们欧洲的耕种和生活方式,并慢慢地变成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区。一系列使幻想破灭的经历,包括1521年委内瑞拉海岸一个实验性的殖民地遭到破坏,这些都使得德拉斯卡萨斯在思想上寻求更为激进的解决方式。他最后的计划要求废除所有的委托监护权,把印第安人从所有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除此之外,土著人自愿给国王少许贡品,以作为对基督教这个"礼物"的补偿,而且还要恢复土著人古国、统治者以及本应属于他们的合法土地。在这些国家之上,西班牙国王可担当"众多国王的皇帝",履行把人上教徒的忠诚和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带给土著人的神圣职责。实现这个任务的工具应该是修道士,这些修道士可享有对土著人的管辖权,并且保护他们免受世俗西班牙人的堕落影响。尽管德拉斯卡萨斯的建议看上去很激进,实际上还是服务于王室的目的,通过控制征服者的权力,阻止新世界中强大的殖民封建主义上升的趋势。总之,不是人道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部分地解释德拉斯卡萨斯的改革努力为什么在查尔斯五世(1516－1556年在位)统治期间得到了官方支持。

随着对富裕、人口众多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的征服,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国王最基本的利益是要求曾发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灾难不要在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重演。1523年,德拉斯卡萨斯看似获得了重大胜利。查尔斯国王给科尔特斯下达了一个命令,禁止在新西班牙(指以前的阿兹特克帝国)实施委托监护制,因为"上帝创造的印第安人是自由的,不是受别人支配的"。科尔特斯已经给他自己和他的同僚们分配了委托监护权,所以并没有强制执行这个命令。在他那些顽强士兵的支持下和基于士兵们的需要,他振振有词地为委托监护制辩护,这项制度是殖民地福利和安全所必需的,因而王室的命令就被取消了。委托监护的贡品和劳动力,不断由战争中抓捕的奴隶作为补充,继续作为

征服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并持续到 16 世纪中期。

西印度新法和委托监护制

尽管对科尔特斯的不服从做出了让步，国王还是试图努力把土著人的贡品和劳动力纳入到王室的控制之下。国王小心翼翼地遏制征服者的权力。继第一个"匪徒式"的检审庭狂暴统治之后，公元 1531 至 1532 年新西班牙成立了第二个检审庭(audiencia)，专门掠夺科尔特斯，并无情地镇压土著人。在采取对贡品和劳动力管理的第一个步骤中，第二个检审庭减少了许多土著城镇所要交纳的贡品，提供贡品评估登记，而且原则上不经过他们同意，禁止把土著人当做运输工具来使用。随着 1542 年《西印度新法》(New Laws of the Indies)的宣布，王室的干预达到了高峰。这些法律似乎预示着委托监护制将寿终正寝。它们禁止把土著人当做奴隶，命令释放无法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奴隶，严禁强迫印第安人提供私人服务；管理贡品，并且宣布既存的委托监护权在监护主死后失效。

在秘鲁，新法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而在新西班牙，也引起了委托监护主和大部分教士的抗议风暴。迫于这些压力，王室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尽管法律重申禁止奴役土著人和强迫劳动，但是委托监护主后代的继承权利被认可了，可传给第三、第四代，有时候甚至传给了第五代。自此之后，或此前没有继承人的，委托监护权将转到王室名下。随着事态的自然发展，委托监护权的数量持续下降，而王室的城镇越来越多。

截至公元 1560 年左右，委托监护主局部地被"压制"住了。王室的干预制约了委托监护主的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贡品和劳动力的供应，至少在殖民地的首府是这种情况。现在贡品在多数地方由检审庭评估，并且一直努力根据土著村庄人口和收成状况调整贡品数量。为此，设立了"巡查"(Visita)和"账目"(cuenta)制度。巡查是对一个土著人城镇进行检查，获取该城镇有关进贡的资源或能力，从而决定每个人的进贡额。同时，还要确立"账目"，确定进贡者人数。在 1560 年左右，在新西班牙，每对已婚的进贡者每年通常向国王或委托监护主进

贡一银比索和五分之四蒲式耳玉米，或者等量的其他作物

这种评估机制和内容翔实丰富的保护性立法并没有给土著人带来重大的或持续的解脱。委托监护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夸大人口数量，滥用权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在进贡者人数迅速缩减后，对重新确立"账目"和进行评估一直被拖延，导致幸存者不得不为已死去或逃跑的人承担进贡的负担。另外，在1556年菲利普二世(Felip Ⅱ)登上王位之后，西班牙政策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增加王室收入，以减轻国王的严重金融危机。自此，免除进贡的土著人失去了他们曾享有的优惠待遇，且进贡定额持续增多。这些措施，再加上委托监护权逐渐归王室所有，使得王室每年在新西班牙收到的贡品额在1550年至18世纪末期间，由10万比索上升到了100多万比索(这些数据没有考虑到同期价格上涨对贡品价值的影响)。

然而，对殖民者来说，委托监护权的经济价值不断下降。1549年，他们失去了从进贡者那里获得劳动力的权利，而且使委托监护权永久化的斗争也失败了。16世纪后半期土著人人口灾难性的下降，是对委托监护主阶层最致命的一个打击。在墨西哥中部，人口由1519年的大约2 500万跌到了1605年的100万多一点。在秘鲁海岸中部地区，到1575年，进贡的人口只占征服前人口的4%。原因尚不明确，墨西哥和秘鲁的人口下降率，似乎沿海地区要高于高山地区。疾病，尤其土著人对来自欧洲的疾病没有免疫力，比如麻疹、天花、斑疹伤寒和瘟疫，是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的主要直接原因。但是，过度工作、缺乏营养、严重的社会混乱以及丧失了生存意志也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在秘鲁，毫无疑问，1535至1550年间的内战和混乱，在物质方面，加剧了人口减少。

随着进贡人数的减少，委托监护主从贡品中获得的收入也相应下降了。然而，他们的开支仍保持原样，甚至增加了，其中包括保留收取贡品的管家、支持教会牧师等费用，以及缴纳沉重的赋税。结果是，很多委托监护主，连同没有委托监护权的西班牙人，都开始从事农业、畜牧业和矿业这些有利可图的行业。土著人口的下降，急剧减少了食物和金属

市中，刺激了生产粮食和肉的大庄园(hacienda)的迅速发展。

因此，到16世纪70年代，在墨西哥中部，以及在16世纪末期的安第斯山地的北部和中部，委托监护制失去了它原有的使用土著劳动力而不必支付工资的主要特征。它作为西班牙殖民者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并且随着委托监护权不断收归王室所有，通过这种方法，委托监护制也就消失了。然而，这些变化没有在所有的地方发生。在缺乏贵金属的地区，或在农业产量很低的地区，以及在不存在殖民者权力扩张的地区，国王继续允许委托监护主继续剥削土著人，强迫他们劳动。在智利就是如此，以私人服务为基础的委托监护权一直延续到1791年；在委内瑞拉，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在巴拉圭，一直到19世纪初，委托监护制还依然存在。国王还允许委托监护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在新西班牙一些地方如瓦哈卡和尤卡坦继续存在。

在巴拉圭，委托监护制表现出一个独特的形式，反映了瓜拉尼人的文化和社会组织。试图对阿根廷殖民的尝试失败后，西班牙人就迁移到了现在亚松森城市附近，并发现了有人居住的村庄，每个村庄有四至八个公共建筑物。每个建筑物里居住着由几户人家组成的父系宗亲，经常是一夫多妻。他们没有世袭的首领阶级，首领的任期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且也没有高于村庄级别的政治组织。西班牙人赢得了瓜拉尼人的友谊，因为帮助他们打败了瓜拉尼人好战的邻居，一个游牧狩猎的族群。瓜拉尼人还以食物和女人作为礼物回报西班牙人。实际上，西班牙人变成了瓜拉尼人社会的首领阶层。由于妇女在瓜拉尼人农业和社会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了西班牙人的姘妇，作为亲属关系中的一项义务，这些妇女的亲戚都要为西班牙人提供劳动服务。宗族或家庭由此演变成了巴拉圭人的委托监护制的基础——用这个称谓是说明，西班牙人对其周围的姘妇及她们亲人的控制正规化了，并让他们提供服务。因为西班牙人可想方设法得到更多的姘妇，从而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官方试图阻止殖民者入侵土著人村庄抢掠妇女，或者阻止用妇女与马或者狗交换，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同样，试图限制瓜拉尼人必须为西班牙人工作人数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这类安排就是初始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 originaria),它一直延续到殖民地末期。与此同时,1556年,出现了第二类委托监护制——米塔亚(mitaya)。生活在以亚松森为中心、139英里为半径的区域范围内的瓜拉尼人被分配给西班牙人,根据受让人的社会等级或功劳不同,进贡者的人数也有所不同。巴拉圭不像帝国中部地区,这里不存在向劳动者支付费用,或交纳以钱或商品衡量的具体数额的实品。截至1688年,因为疾病的灾难、混血的影响以及迁徙,只剩下21950名被委托监护权控制的瓜拉尼人登记在册。到177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几百人。结果是,西班牙人的后代混血种梅斯蒂索人(mestizo)开始用黑奴补充少数存活下来的瓜拉尼人,用巴拉圭茶的出口支付他们。巴拉圭茶是这个地方的主要特产,在南美洲南部极其珍贵。到1782年,该地区的黑人数量超过了瓜拉尼人。

劳役摊派制,土著仆役制(又称亚纳科纳制,yanaconaje)和自由劳动力

在1550年之后的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高地的主要地区,劳役摊派制(Repartimiento)这一新的制度取代了强迫劳动的委托监护制。在这个制度下,所有印第安人成年男性必须每年轮流在西班牙的矿区或作坊、农场和畜牧场以及公共工程中劳动一段时间。王室希望这样能够调节使用日渐减少的土著劳动力资源,并使得委托监护主,特别是日益增长的没有委托监护权的西班牙人能够获得劳动力。印第安人收到了象征性的工资,但是像委托监护制一样,劳役摊派制实质上是奴隶制的一种伪装。那些逃避劳役和未能按时上交定额贡品的社区领导被关进监狱或罚款,甚至体罚。

在秘鲁,土著的状况似乎比新西班牙还要糟糕,劳役摊派制(这里被称为米塔,Mita)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6世纪70年代,由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发展出来的这个制度规定,在实施米塔制的所有地方,所有健全的土著男性必须在波多西(Potosi)或其他矿区中心工作六个月,或者被分配给其他西班牙雇主。在米塔

之下，对矿工来说，波多西银矿和万卡维利亚(Huancavelica)水银矿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陷阱。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米塔制是矿业和农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一直延续到殖民地末期。

在安第斯地区，还存在从印加社会继承过来的土著仆役制度，作为对劳役摊派制的补充。这项制度把土著人从他们的社区中分离出来，使他们以私人奴仆的身份为西班牙人服务。像欧洲的奴仆一样，这些奴仆们作为庄园财产的一部分，在庄园主之间相互转让。估计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人庄园中的奴仆人数几乎与生活在他们社区中的土著人的数量旗鼓相当了。

虽然劳役摊派制暂时解决了严重的劳动力供应问题，但是很多西班牙人雇主对此并不表示满意，因为它不能提供一个可靠、持续的劳动力供应来源。很久以前，新西班牙的矿主和大庄园主就开始越来越多使用需要支付工资的劳动力。繁重的贡品和劳役摊派的负担都落在了不断缩减的土著人头上，再加上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社区土地的侵占，迫使很多人愿意接受大庄园主的邀请而成为农场的劳动力，因为可以获得工资，大多数情况都是以实物支付的。很多人在他们的社区和大庄园之间奔走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变成了大庄园的常住雇农。然而，还有一些人被吸引到工资相对较高的北部银矿区去了。

当国王1630年废除了墨西哥中部的农业劳役摊派制时，几乎没有激起任何反抗，因为大多数大庄园主依靠带工资的劳动力。然而，劳役摊派制仍在新西班牙的矿区保留着，一直沿用到了18世纪，但其重要性微乎其微了，因为新西班牙的矿区主要靠合同制劳工运转。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付工资的劳动力不占重要地位，因为土著仆役制作为米塔制的补充，为高成本的银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在17世纪的波多西矿区，矿主雇佣了4万名土著人自由劳动力，被称为“民咖”(minga)①。

---

① 在17世纪初，由于传染病的肆虐以及实施米塔制地区土著的迁移逃离，土著劳动力逐渐短缺，导致了米塔劳动力被提供白银所替代。这些银子是从土著社区收取的，并由他们的头领(curaca)直接付给米塔制下的矿主，矿主们用这些银子支付“民咖”自由劳动力，并雇用弥补“民咖”劳动力不足的米塔制下的劳动力“米塔幺”(mitayo)。

从一开始，这种支付工资的劳动力就常与债务劳役制相联系。17世纪后半期，劳役摊派制或商品摊派制(repartimiento de mercancias)发展了起来①，后者指土著村庄必须强制性地从督办(corregidores)、市长(alcaldes mayores)那里购买商品。除了其他负担外，摊派制是土著被迫接受西班牙大地产主预付的现金和货品的一个强有力的诱导因素；而贡品的支付通常也应计算在内。一个负债累累的土著人必须为他的雇主工作，直到偿还所有债务。不管债务劳役有怎样的恶名，不管是否为债务所迫，它还是有其绝对的优点。它通常把印第安人从周期性的贡品和他们社区摊派劳役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并且可获得小块土地，为他们自己和家人劳动。但是，如果说大庄园提供了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逃离的机会，那么它却加重了仍然生活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上的人们的困难。大庄园通过合法或非常的方式扩大，牺牲了土著印第安村庄的利益，吞并了一个个城镇，并没有给其他人留下足够的土地。大庄园主从印第安村庄里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使得土著城镇很难完成他们的贡品和摊派的劳役。在通常被西班牙文献称作为印第安人城镇(republica de indios)和西班牙人城镇(republica de espanoles)两种城镇之间，横贯着一道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的鸿沟。

债务劳役制作为一种保护和维持劳动力的重要方式，似乎与支付工资的劳动力供应有所不同。在劳动力稀缺的墨西哥北部，债务劳役被广泛采用，但是在劳动力充足的墨西哥中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些近期的研究强调，债务劳役制“更多是激励，而不是束缚”，它的发展规模反映了劳动力与雇主的讨价还价能力，且大庄园主有时候几乎根本不会费力去找回没有偿还债务而逃跑的劳工。对这种相对很少关注逃亡劳工的事实主要来自18世纪后期的墨西哥，那时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充足。在之前的劳动力稀缺时期，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印第安人被强迫留在大庄园，直到还清债务才能离开。的确，大庄园主和官员有时候把墨西哥的债务农看作为欧洲的奴仆，他们所拥有的债务农提

---

① 劳役摊派制这个术语也被用于定期招募土著人作为西班牙人社区的劳动力。

服务的权利，随着大庄园的转让而转交给新的主人。

债务劳役在农业和矿业上被广泛应用，在很多生产布匹和其他商品的作坊(obraje)里，呈现出了最为苛刻的形式。这些作坊在16世纪和17世纪在很多地区涌现出来。西班牙法官向作坊的主人们分配被判刑的劳动力，这也是早期“免费”土著劳动力补给方式，他们通过各种欺骗手段引诱土著人来获得这种劳动力。土著人通常被一些酒和一点钱引诱到作坊里去，一旦进了大门，就再没有被放出来。“用这种方法”，17世纪的一位观察者写道，“他们聚集和欺骗了很多已经有家室的已婚印第安人，他们被关在这里长达20年，或者更长，甚至他们的妻子或儿女都对他们的生活毫不知情；即使他们想逃出去，也没有办法，因为警惕性极强的看门人把守着出口。”

黑奴制

与印第安奴隶制——劳役摊派制和债务劳役制同时存在的还有黑奴制。之所以如此，有诸多原因，其中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习惯于使用黑奴，并存在着这种信仰，即黑人是《圣经》中含①的后代，忍受着 83
上帝的诅咒，且最好能够承担种植园里艰辛的劳动；“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保护者也没有对沦为奴隶的非洲人表示出同样的热情。

实际上，16世纪初甘蔗农业在西印度群岛迅速发展，造成对黑奴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以补充不断减少的土著人劳动力。就此，出现了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主要是由外国私人或公司与西班牙国王签署合同来实施。由于购买奴隶费用高昂，对他们的使用也就更多地局限于高利润的种植园，或者在富人家中提供家政服务。多数黑奴居住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沿海海岸，在这些地方被雇佣，从事可可、糖和烟草等农作物生产。在秘鲁沿海边山谷里，他们在糖和棉花种植园里劳动，但在印第安人居住的所有地方，都能发现小规模的黑奴聚居地。在第五章，我们会讨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即在西班牙美洲的非洲人奴

① 含，《圣经》中诺亚的次子，传说是非洲人的祖先。——编者注

隶制是否比在其他欧洲殖民地的"更温和"。

概括来说，所有的殖民劳动制度都依赖不同程度的奴役和压迫。尽管合同制劳动力作为理论上的规范慢慢出现了，但本文描述的所有劳动制度在整个殖民地期间都是共存的。例如，1542年，对土著人的奴隶制被合法地废除了，但在边远地区，它依然以各种借口一直存续到了18世纪。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地区，哪种劳动制度占主导地位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比如，该地区的自然资源、欧洲人的数量和他们经济活动的特征、当地人口规模和文化水平以及王室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等。最后，应注意的是，在16和17世纪，由于梅斯蒂索人、自由黑人、穆拉托人及贫困白人的加入，劳动力规模逐渐扩大了。这些人大多免除了委托监护制和劳役摊派制规定的义务，通常从事支付工资的工作，并且自由迁徙，但是，像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因债务而被控制。在第七章，我们将讨论18世纪劳动制度的变化。

殖民地经济

征服打断了土著人社会群落传统的仅"勉强维持生存并进贡"的经济。战争和疾病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以致危害了生产。在一些地区，由土著人中央权威建立和维护的复杂灌溉网络遭到破坏或化为废墟。征服还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节奏。随着金银物品已被搜刮殆尽，对财宝的疯狂争抢也就随之结束了，委托监护制变成了从被征服者那里榨取财富的主要途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人们习惯了用劳动力和商品向统治者和贵族进贡。但是，尽管在征服前夕贡品的数量明显增加了，但是，这些传统的统治阶级对进贡的需求要受到风俗习惯和统治集团利用贡品能力的限制。这些贡品大多是为了消费或展示，而不是贸易。另一方面，新西班牙主人的需求却是无限的。主要是想获得金银物品，如果不能直接获得，委托监护主就会提出，在本地或远处的市场销售他们的贡品，以换取金银。受对财富无限想象的刺激，西班牙人没有考虑土著人的进贡传统，并无情地剥削他们。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传教士，在1554年的记述中指出，征服前，土著人在他所在的墨西哥

教区的生活是这样的：

从来不需要给他们这么多棉布匹，也从来没听说过床、精美的棉布织物、或做成千种便宜而俗艳的东西，如床单、桌布、衬衣和裙子。他们从事的一切就是耕种地上的田地，给他们盖房子，修建寺庙，并且当地主要求的时候，就向他们上交一定的实物地租。

作为商人的科尔特斯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的商业生涯则说明了一些委托监护主经济活动的不同种类和规模。到 1528 年，科尔特斯的身价已达到 50 万金比索，一部分财富是他在征服期间前和征服刚刚结束后从特诺奇蒂特兰（阿兹特克帝国首都）及其他地方掠夺来的。但他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其拥有的委托监护权。他把阿兹特克帝国最富有的进贡地区分配给了自己。到 1547 年他去世的时候，尽管他的委托监护权已急剧减少，且贡品估价也大大降低，他每年仍可收到 3 万金比索。他从受委托监护的村镇里收到了大量的金粉、纺织品、玉米、家禽和其他产品。仅仅奎尔纳瓦卡（Cuernavaca，靠近墨西哥城）的印第安村庄每年就要向他进贡价值五千金比索的布料。科尔特斯的代理人把布料和其他贡品卖给贸易商，贸易商再把这些东西在墨西哥城和其他西班牙城镇零售。科尔特斯在墨西哥城拥有大量的房产。在市中心广场及其附近，他建造了店铺，一些店铺供自己使用，还有一些被租了出去。

用经济和政治词汇来衡量，科尔特斯是一个帝国的创建者。他把从委托监护领地获得的贡品和劳动力等财富投向了很多行业。尤其矿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瓦哈卡和米乔阿坎（Michoacán）地区，他拥有大量的土著奴隶为他淘金，每个地区都超过了 1 000 人；很多奴隶因过度劳累以及食物不足而死去。1529 年，这些矿区给他带来了价值 12 000 比索的黄金。除了他自己的矿区财产外，科尔特斯还有其他合伙经营的矿业，如在墨西哥的塔克斯科（Taxco）地区的银矿。在这些合伙经营中，他的投资通常包括商品、家畜、委托监护权或黑奴劳动力。

除了从委托监护领地上交的贡品，农业和家畜养殖也是科尔特斯

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墨西哥的很多地方拥有大量土地，一些是王室赐予的，另外一些则是侵占土著人的。他使用受其委托监护的劳动力在他的土地上耕种玉米，仅仅是靠近瓦哈卡的土地每年就能生产1万至1.5万蒲式耳玉米。他把部分谷物在西班牙人的城镇和矿区出售；一部分用来供给洗金厂的奴隶食用。科尔特斯饲养了大量的牛和猪，并在自己的屠宰场宰杀。在特万特佩克(Tehuantepec)附近，他有超过1万只的野牛群，生产的牛皮和牛油出口到巴拿马和秘鲁。

不安分的科尔特斯还是墨西哥制糖工业发展的先驱。到1547年，他的种植园每年可生产的糖超过了30万磅，大部分卖给了欧洲的出口代理商。正如他宣称的那样，他不是第一个在新西班牙实验生产丝绸的人，否则，他一定会大规模进入这个行业，利用土著劳动力种植成千上万的桑树，对他们支付现金或可可豆就可以了。然而，实际上，在这次商业冒险中，他损失重大。科尔特斯多样化广泛的商业利益则表明，把大家熟悉的征服者仅仅描绘成投身于战争和掠夺的纯粹封建主义形象，而鄙视所有的贸易和工业，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大庄园的发展

在第一代殖民者中，像科尔特斯拥有如此大规模的产业的人很少。典型的委托监护主满足于占领一小片赐予的土地，并从土著那里收取贡品，而土著则继续在他们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生活、劳作。由于土著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和国王的严格立法都使得委托监护制下的贡品收益减少，在1550年之后，出现了从依赖委托监护制下的贡品向发展西班牙商品农业和牲畜养殖业的重大转型。西班牙人城镇严峻的食物短缺为西班牙农民和牧场主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同时，人口下降留下了大片辽阔的未被占用的土地，西班牙殖民者们竞相占领，用来种植小麦，更常见的则是作为羊或牛的牧场。

到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拥有的大庄园促成了农业的商业化生产，而且强势排挤殖民地经济中不断萎缩的部门。西班牙殖民者用各种方式把土地从土著人手中“释放”出来：购买、侵占和人口聚集居住

(congregación，即让土著人集中居住在新社区，显而易见方便控制他们和教化）。尽管西班牙的政策宣称是为了保护社区土地，大量的法律禁止侵占这些土地，但并未能阻止大庄园的扩张。大庄园主中有王室官员、传教士和[illegible]，他们的权力一般都凌驾于政策之上。

在17世纪，随着严重漫长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国王鼓励了以定[illegible]了侵占土著人的土地，通过对国王支付一定费用就把侵占者的[illegible]合法化了。不仅仅是土著社区，而且西班牙人的社区或梅斯蒂索人[illegible]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不断扩张的大庄园吞[illegible]。这个[illegible]不是获得土地以供使用，而是通过剥夺他[illegible]者之间的竞争，来获得日常的劳动力和债务[illegible]（Mayorazgo）的建立确保了固定财产在主人的后代中[illegible]这种封建主义的手段需要得到国王的许可和支[illegible]，只有一小部分非常富有的家族从中获利。

[illegible]较为通用的策略是在家族内部通婚，通常是表兄[illegible]多数情况下，这种或其他确保家族地产永久占有的[illegible]都不会成功。[illegible]继承法要求应在后代中平均分配地产，但[illegible]大量消费和对教会捐赠的导致投资资金不足等诸多[illegible]不稳定，且地产所有权的转手率很高。[illegible]苏珊·拉米雷斯(Susan Ramírez)研究过300年的生活在秘鲁[illegible]的殖民地精英家族的集体传记。她发现，与传统相反，这些[illegible]是“不稳定的、失败的、并且不断流动”，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会[illegible]过两代或三代。历史学家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作为墨西哥[illegible]殖民地精英家族的一分子，就提及了这种不稳定性，并引用墨西哥[illegible]指出：“父亲是商人，儿子是绅士，孙子是乞丐。”

土地集中程度在不同地区因其资源和距离市场远近有所差异。以墨西哥[illegible]为例，到殖民地末期，大量土地都被掌握在大庄园主手中。另一方面，土著人及其首领仍保留着瓦哈卡省的大部分土地，农作物的市场[illegible]。近期对殖民地大庄园的研究强调，不同地区的大庄园在规模[illegible]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广阔的西班牙美洲帝国，这

种规模和生产率的差异也反映了地区间的潜在生产力的多样性，它取决于附近的水源、土壤质量、劳动力供应和市场等多个因素。

尽管土地集中是长期趋势，但是也慢慢出现了一个大多由混血人种构成、土地规模不定的小农阶级。在墨西哥，这些小农主要是梅斯蒂索人，被称为"农场主"(ranchero)；他们广泛分布在墨西哥中部及南部高地的土著村庄和商业地产中。一些人是以前大地主的管家或工头，从地主那里租种或租借他们不使用的部分土地，生产农产品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他们的资源有限，并且高度依赖大地主，这使他们的处境总是任人摆布；在土地升值繁荣时期，他们仅有的财产甚至也被富有的邻居吞并了。很难看到，有成功的农场主能够扩大财产规模，并进入土地精英行列。

新世界的西班牙农业

西班牙农业与土著人的土地使用在很多方面都不同。第一，西班牙的农业规模很大，用犁和畜役耕种大面积土地，这与土著人小规模的木棍挖掘种植农业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西班牙农业主要是商业性质的，生产的产品向本地或远方市场出售；相比之下，土著人的传统农业特征只是为了维持生计。为了满足进贡和履行其他义务需要支付现金，土著人进行市场化生产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一般来说，由于大庄园主拥有更为优势的资源，土著人很难与之竞争，除非是在大丰收的时候，而且他们还很可能跌回到只能维持生计的农业水平；在农业歉收期，他们有时候还不得不为当地的大庄园主工作。

西班牙殖民地农业早期大规模生产小麦，并在城市中心销售，如墨西哥城、利马、韦拉克鲁斯和卡塔赫纳。玉米在大庄园也被广泛种植，供给墨西哥城和利马规模相当大的土著人消费市场。像小麦一样，蔗糖是欧洲带给美洲的农业礼物之一。西班牙人把它从加那利群岛带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在这里很快成为该岛繁荣的基础。到1550年，有20家糖作坊把甘蔗加工成糖，这些糖用船被大量运往西班牙。"蔗糖工业是那些岛上的主要工业，"何塞·德阿高斯达(José de Acosta)在

16世纪末这样写道："人们培养出了这样一种对甜味的喜爱。"从西印度群岛开始，种植园传播到了墨西哥和秘鲁。继银矿开采之后，炼糖是西印度群岛上规模最大的商业，并且伴随着大量的设备和黑奴投入。

在秘鲁沿海的灌溉谷地里，葡萄酒和橄榄也像蔗糖一样被大量生产。丝绸业在墨西哥曾一度繁荣，但很快就衰退了，原因是劳动力短缺以及来自马尼拉大帆船从菲律宾转运到阿卡普尔科港口的中国丝绸的竞争。西班牙断断续续地试图努力阻止葡萄酒、橄榄和丝绸的生产，因为这些产业会干扰西班牙同类产品的出口，但似乎没什么效果。西班牙人在美洲的种植园里种植的其他农作物还包括烟草、可可和靛青。胭脂虫是墨西哥和中美洲出口的一个独特产品，欧洲的布料工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是一种鲜红色的染料，由寄生在胭脂仙人掌上干燥的昆虫躯体制造而成。

通过引进鸡、驴、马、牛、猪和羊等许多家畜动物，西班牙对美洲的经济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驴和马给交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负载着货物的土著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的景象由此慢慢消失了。马和驴变成了矿业开采中拖、拉和运转机器的重要动力。牛和更小的家畜动物极大地增加了大量的食物来源。肉是矿业开采中不可或缺的食物，因为矿工只有吃肉才能维持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所有的矿山都开发了"，一位西班牙法官在1606年写道："这要归功于大量便宜的家畜供应。"除了肉之外，养牛业还向西班牙和其他欧洲皮革生产中心提供了出口的牛皮，同样，牛皮和用来照明的牛油还自制使用，尤其在矿区。随着纺织作坊在殖民地很多地方的兴起，养羊人为他们的羊毛找到了一个大市场。

在过度放牧的地区，如墨西哥中部，西班牙人的牛羊群爆炸性增长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动物成群地涌向田地，不仅入侵那些因土著人口下降而腾空的土地，而且还入侵了按照他们的制度所保留的用于轮流耕种的土地。牛群践踏土著人的庄稼，造成数不尽的破坏；暴雨侵蚀了大量的山谷坡地，因为这些山坡上的植被早被羊群啃食了。然而，到16世纪末期，墨西哥养牛业稳定下来了。原始牧场早已枯竭，为获得

牛皮和牛油进行了大量屠宰，西班牙官方努力禁止在土著人的庄稼地里放牧，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牧群明显减少。在17世纪，中部谷地的土地不断朝西班牙人手中累积，导致这一地区进一步西化。这些人建立了生产龙舌兰酒（很受当地人欢迎的发酵饮品）和小麦的大庄园。新拓地，牧牛场和羊群就搬迁到了零散地位于北部半干旱的开阔的永久性牧场。

同样，在阿根廷拉普拉塔河宽广富饶的潘帕斯草原上，也迅速出现了
88 了大量的马、驴和牛。在这个近乎无边无际的草场上，这些畜群的增长超过了潜在的需求，像在西班牙美洲其他地方一样，宰杀四处闲逛的野牛群成了拉普拉塔地区普遍的现象。这个偏远省份的居民，被西班牙法律禁止与外部世界进行海上运输贸易，且缺乏价值高的商品和充足的劳动力，为摆脱贫困，他们只能与荷兰和其他一些商人从事走私贸易，由这些商人把牛皮和牛油运销到欧洲。此外，他们还把马和骡、牛皮和牛油运到"上秘鲁"（现玻利维亚）的矿区销售。

另一个牛养殖业中心是西印度群岛。1590年，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写道：

> 在圣多明戈和其他岛屿，牛群繁殖如此之快，在森林和田野里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它们没有主人。人们猎杀这些牛仅仅是为了牛皮；白人和黑人骑着马出去，带着弯曲的砍刀，去追赶牛群，任何落在他们刀下的动物都是他们的。他们杀牛，把牛皮带回家，牛肉被留下任其腐烂；没有人想要肉，因为肉太多了。

殖民地矿业和工业

矿业，作为王室以"五一税"[1]形式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受到了国王的特别关注和保护。银，而不是金，是美洲矿区的主要产品。西班牙

---

① "五一税"(quinto)指西班牙王室对美洲殖民地的金、银等贵金属征收的五分之一的税收。——译者注

在"新世界"中最富豪的财产就是在"上秘鲁"的波托西大银矿，在1579—1635年间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1545年，波托西银矿被发现，墨西哥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瓜纳华托(Guanajuato)银矿也分别于1548、1558年开采。同一时期，在智利中部和新格拉纳达(现哥伦比亚)内陆发现了重要的黄金漂沙矿床。

众所周知，银是由简易、低廉的熔炼技术加工生产的，其工艺是使用人力捣碎和石磨粉碎矿石，然后投进使用碳或其他燃料的熔炉里冶炼。这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且高度依赖燃料的充足供应，这就给安第斯山区的矿业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例如，波托西位于山区的林木线之上，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则位于半干旱地区，且远离人口密集的中心区。于是，1576年，引进了混汞法工艺，是用水银把银从矿石中分离出来，这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矿业。波托西银矿所用水银的主要来源是秘鲁的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水银矿，那里的健康隐患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劳动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墨西哥的银矿主要使用来自西班牙的阿尔马登(Almaden)矿生产的水银。

由于矿石耗尽，且采矿的深度越来越深，但缺乏资本改进技术，还有劳动力及其他问题，再加上王室垄断的水银成本高昂，这些都造成了1600年之后波托西的银产量急剧下降。但是，这种下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秘鲁的奥鲁罗(Oruro)和塞罗德帕斯科(Cerro de Pasco)新银矿的产量抵消了。在墨西哥，银产量水平也是波动的，像萨卡特卡斯这样的老银矿产量是下降，而像帕拉尔(Parral)这样的新矿的产量却增加了。就整个17世纪来看，银产量的长期趋势还是上涨的。尽管早期的历史学家曾宣称，土著人口灾难性下降造成的劳动力的短缺是新西班牙银产量下降的根源，但现在看起来，矿主在弥补劳动力短缺时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1650年之后，在秘鲁和墨西哥，银矿出现了从萨卡特卡斯和波托西这样的大中心矿区向小型、分散和人员可移动的矿区转移。同一时期，很多矿主抛弃了以稀有昂贵的水银为基础的混汞法工艺，而转向使用冶炼方法。因为一个矿主购买的水银量变相告诉了王室官员他的银子的精确产量，而使用冶炼技术，矿主不仅能减少花费，而且还

能逃部分税，如"五一税"、营业税和其他税收等。这也提升了王室的财政收入。大量没有征税的白银或留在本地流通，或用来支付商品走私流向了欧洲或亚洲。王室对银质量和大多数产量的严格控制后，使得殖民地长期以来的银币短缺和质量不可靠的问题恶化，由此导致更多地依靠物物交换和地方上的货币替代，这增加了远途贸易的困难。

17 世纪银矿开采业还造成了其他后果。一个就是使原来出现的向大矿区中心提供谷物、牛皮、牛油和畜役的商业农业网络崩溃。像在新西班牙北部，商业农业和家畜养殖业的萎缩促成了这一时期具有典型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大庄园的兴起，里面住有一个庞大的精英家族，由族长来领导，他统治一切，管理他自己的小世界，包括劳力、教堂、监狱、作坊、仓库和私人军队。

学者们继续讨论 17 世纪是否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危机和衰落时期。几十年前的主流观点持肯定态度，但是目前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殖民地的自治权都在扩大。殖民地经济危机论的支持者引用的论据是 1630 年之后输往西班牙的银明显下降。然而，近来对殖民地财富记录的研究表明，这种下降的原因大多是西班牙官员为支出当地行政费用和防卫需要决定把大量的银子留在了美洲。另外一个原因是殖民地自给自足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大规模的走私，都急剧降低了对西班牙高价商品的需求。到 17 世纪初，墨西哥、秘鲁和智利在粮食及部分葡萄酒、橄榄油、五金器和家具等方面都实现了自给自足。17 世纪，美洲市场的丧失使得西班牙的工业已奄奄一息。

1985 年，一位名叫米切尔·莫里诺(Michel Morineau)的法国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彻底改变了对殖民地"经济危机"的争论。根据荷兰商业杂志记载的从殖民地运往欧洲港口的贵金属和商品，他表示运往西班牙港口的贵金属的下降，被同一时期走私到北欧港口的金银抵消了。如果把走私的金银和合法流入到西班牙的金银加总起来，可清楚地看到 17 世纪运往欧洲的贵金属总量并没有下降，因而基于假设殖民地"经济危机"的命题也就失去了它的分量。

争论仍在继续，但有关殖民地经济趋势的事实大多混杂不清，甚至



西奥多·德布瑞(Theodore de Bry)1590年的版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对在波托西银矿沦为奴隶的劳工的剥削，他们创造的财富非同寻常地刺激了欧洲的经济发展。

自相矛盾，难以对17世纪经济"萧条"的真实性做出判断。比如，在新西班牙，营业税作为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其持续增长一直到1638年，之后才略有下降。如果17世纪的经济危机果真发生了，它的影响就是平均的，有些地区和部门的经济会上涨，而另外一些则会衰退。因此，在中美洲，伴随土著人口下降，可可产业崩溃了，但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之间出现了繁荣的可可贸易。简而言之，并不存在所有行业的生产和国内贸易水平都下降的证据。至于国外贸易，莫里诺的发现表明相反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文化发达的地区，发现了一个兴旺的手工艺品行业。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大多数土著人继续供应着自己生活需要的瓷器、衣物和生活用品。在西班牙人城镇，为了应对从西班牙高价进口的产品，出现了模仿西班牙的手工艺品行会。为防止来

自很快学会工艺品技术的土著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工匠的竞争，他们被纳入了由西班牙人控制的行会中，并被禁止成为能够带领徒弟的师傅。然而，由于长期缺乏有技术的劳动力，这些种族限制很快变得没有实际意义。这些行会试图小心翼翼地对服务于殖民地上层阶级需要的工艺品质量和数量进行控制。

一直到1630年，这一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生产供大众消费的棉花和羊毛产品作坊。大多数作坊是由私人拥有的，但也有一些为土著社区共同所有，生产应交纳的贡品。很多新西班牙的城镇（如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等城市）都是纺织业中心。其他的作坊，生产香皂、瓷器和皮革这类产品。17世纪末的人口增长也有利于扩大制造业的发展。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为试图限制殖民地制造业发展，西班牙断断续续的立法努力取得了成功。

商业、走私和海盗

殖民地的商业制度

91 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业制度是以限制、排斥和垄断为特征，这与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者标准相一致。在西印度群岛皇家委员会（Royal Council of the Indies）的管理下，殖民地的所有贸易都由1503年在塞维利亚成立的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on）①来控制。该机构批准和监督所有船只、乘客、船员和来往于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它还征收进出口税收和王室对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贵金属和宝石的应有份额，给领航员颁发执照，并维持西印度群岛贸易船只的航线都应得到遵守。它还创办了一所航海学校，培训跨大西洋贸易船只所需的航海员和官员。

直到18世纪，与殖民地的贸易仅操纵在塞维利亚和加地斯（Cádiz）的富有商人手中，他们以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对与殖民地贸易相关的所有事务都可施加巨大影响。为阻止走私和维护塞维利亚的

① 又称"贸易商会"。——译者注

在殖民地中，贸易被集中在3个港口：新西班牙的韦拉克鲁斯、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及巴拿马地峡的迪奥斯港(Nombre de Dios)。塞维利亚商人行会和与西印度群岛相关的商人集团，尤其是墨西哥城和利马的商人行会，都会巧妙地保持殖民地市场供货不足。总之，他们以牺牲殖民者的利益为代价互相勾结，殖民者被迫购买以合法渠道从欧洲进口的高价商品。不可避免的是，这个制度引发了殖民地的不满，并刺激了走私贸易的发展。

为了实施港口垄断政策和保护商船不受外国攻击，16世纪发展了一种定期的护航舰队制度。16世纪中期，这种舰队制度得到改善，它要求每年派出两个武装舰队来护航，每个舰队有50艘或者更多的船只。一个舰队在春天开始，驶往韦拉克鲁斯，并且带着这些船只往来于安的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之间；另一支舰队从8月开往巴拿马，护航船只驶往卡塔赫纳和南美洲北部海岸的其他港口。维拉克鲁斯向墨西哥和大部分中美洲地区提供商品；从波托韦洛(Portobelo)起航，商品通过巴拿马地峡被运往利马，利马则作为西班牙商品的分销地点，从这里可以运往智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装满回程的银和殖民地商品后，舰队会在哈瓦那会合，并在飓风季节到来之前开往西班牙。17世纪，因为西班牙经济衰退和走私贸易的大量增长，舰队航行变得越来越不规律。

16世纪70年代，墨西哥商人成为开拓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贸易的先驱，并得到了丰厚的利润。每年马尼拉大帆船远航到墨西哥用中国的丝绸、绸、瓷器和香料，交换中国有巨大需求的墨西哥银。一个外国观察者估计，控制贸易的墨西哥商人每年可以赚到双倍的钱。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随着信风，船只航行时间八至十周。然而，返程时，因要穿过风向多变、台风频繁的海域，可能需要四至七个月；在漫长的航程中，"饥饿、口渴和坏血病会把一只船变成一个漂浮的墓地"。西班牙官员不喜欢贸易，因为贸易吸干了产于秘鲁的金银，且秘鲁到处充斥着中国丝绸，减少了对西班牙纺织品的需求。但是，对丝绸的需求是如此难以满足且供应不足，大量丝绸由驮畜队运载，穿过墨西哥到达韦拉克鲁斯，再从那里由船只运往西班牙。随着跨大西洋贸易的发展，西班牙试

图管理和限制与亚洲的贸易,1593年把船只规模限制到300吨,并且每年只允许两只船航行。马尼拉大帆船在1811年进行了最后一次航行。

一艘船从塞维利亚驶离,前往西印度群岛,要小心翼翼地通过从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到地中海的浅滩,整个漫长航行都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海上的饥饿、口渴、晕船和坏血病以及像在韦拉克鲁斯和波托韦洛等热带港口的黄热病和疟疾都是常见的折磨。海上风暴给船只带来了巨大损失;外国海盗和武装的海盗船也构成了长期的威胁。外国走私导致殖民地市场上商品过量供应,国王频繁没收金银,但还是不予补偿或补偿不足,这些常常使商人无利可图。

西班牙的工业因受行会组织和技术落后的制约,不能向殖民地提供低廉、充足的制造品,并换回殖民地的食品和原材料。确实,允许大量的制造品流向殖民地不符合塞维利亚和加地斯的垄断商人的利益,他们是在确保商品稀缺和高价的制度下获取财富的。大量的税收也同时提高了殖民地消费者要支付的价格,包括护航税(averia)、进口税(almojarifazgo)及营业税(alcabala)。不可避免的是,北欧发达工业国家的制造商和商人试图通过武力或欺骗的方式,进入这个巨大没有满足需求的西班牙美洲市场。北欧强国的国王们野心勃勃,藐视西班牙对整个西半球的统治,除了部分属于葡萄牙的领土,他们公然反抗西班牙禁止外国人在美洲水域航行或与美洲海岸进行贸易的法令,否则,船只和船员将受到攻击惩罚。据说具有讽刺性的质问是,在法国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信中,他概括总结了外国人的观点:"我请求你们,给我看看我们亚当之父的遗嘱,这样我就知道他是否真的让你们做他唯一的全权继承人。"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海盗和外国掠夺

英格兰很快上升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主要威胁。在都铎王朝(Tudor)的推动下,资本积累和制造业的发展使英格兰的商业能量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爆发出来。旧世界无法给这些迸发的商业能量提

之后的岁月里，来自英格兰的商业冒险急切渴望走向美洲。1562年，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开辟了驶向西印度群岛具有历史意义的奴隶贸易航线，由此开启了英格兰打入西班牙美洲封闭市场的动力。一半是正当贸易商，一半是海盗，霍金斯全副武装来到西印度群岛，在枪炮下与当地殖民者们进行贸易，但在与西班牙人的交易中，他表现为纯粹的诚实商人，甚至向当地官员支付费用和缴纳海关税。霍金斯的成功要归功于[illegible]，它们满足了西班牙定居者的需求。这些西班牙人已做好准备，与这个马丁路德教的异教徒或魔鬼进行交易，以满足他们对奴隶劳动力和欧洲产品的急迫需求。为掩盖这些违反西班牙法律的贸易活动，当地官员煞费苦心假装做了一些微小的抵抗。到1567年，这种假装不复存在了，以致西班牙政府有所警觉，下达愤怒的命令，要赶走英国走私者。当西班牙人的抵抗不断加强，西班牙海军1568年在韦拉克鲁斯近海击毁霍金斯全部的贸易舰队时，这种抵抗达到了高潮。

只有两艘英国船只设法成功逃脱：一艘是由霍金斯指挥的，另一艘是由他表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指挥的。四年后，德雷克只带着1艘小船离开英国，前往巴拿马地峡。经过他大胆和仔细的筹划，他抢劫和控制了迪奥斯港，并在黎明时逃走了。后来，他捕获到从地峡太平洋一侧去往迪奥斯港的运载着秘鲁银的驮畜队，完成了海盗史上最为丰盛的收获。1577年，德雷克又一次启程去完成得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秘密资助和支持的远征。它的目标是通过掳获西班牙国王运载宝藏的船只，并抢劫他的殖民地城镇来“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探索整个美洲的太平洋海岸，掌控西班牙占领区之外的地区；借助第二次全球环绕旅行，展示英国高超的航海本领。由德雷克领导的1577年的舰队实现了这些目标。16世纪80年代，德雷克完成了对卡塔赫纳、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圣多明各的报复性掠夺航行。毫不惊奇，德雷克成为让殖民地海岸城镇居民感到恐惧的一个名字。

1670年，英格兰和西班牙签署《马德里条约》之后，海盗活动开始减少。根据条约，英国政府同意帮助镇压海盗；作为回报，西班牙则要承认英国对西印度群岛中一些岛屿的主权。然而，法国的海盗活动依

然猖獗，直到1697年签署了《里斯维克条约》，西班牙才正式承认法国拥有圣多明各。

尽管以往的海盗使西班牙的繁荣和声望蒙受巨大损失，但与外国悄无声息的走私相比，这种损失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在整个16和17世纪，走私贸易持续增长。欧洲人在牙买加、圣多明各和其他加勒比群岛都建立了据点，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走私贸易。布宜诺斯艾利斯则是另一个“漏斗”，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商在此聚集了大量物资，其中也运回到秘鲁市场。到17世纪末期，法国公司能够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也假借西班牙人商号的名义来运作，甚至干脆有与西班牙商人直接进行非法贸易。

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一个精明的英国人，点出了西班牙不幸的主要根源：它的经济枯竭了。他指出，西班牙人实际上只是为欧洲其他地方服务的乘务员：

> 他们的大帆船把银子带到西班牙，但是有谁获得了这些银子呢？银子就像进来时一样，又很快地流走了，甚至比它来时还要快……乍看似乎很奇怪，且不可思议；但当我们仔细观察时，这个秘密就不难以理解了。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银子和贵重的商品并不是白白来到这里（除了国王的税收），而是为了支付被运往西班牙王室控制的商品和制造品。因此，显而易见，西班牙商人除了只是代理人之外，什么也不是，大部分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利润都归属于与他们谈判的外国人了。

17世纪西班牙的经济学家理解造成西班牙困境的原因。他们的著作不折不扣地批评了当时的现状，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但是，他们的主张无力改变西班牙的政策路线，因为一小撮商人和贵族集团支配了政策，他们的特殊利益和特权与改革动机完全不相容。

殖民地的经济框架

殖民地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抑或介于二者之间？

[illegible]本问题，学者们[illegible]激烈地争论过。一些人认为，为市场进行生产[illegible]主义的[illegible]，由此认定自从1492年起拉丁美洲经济就是[illegible]主义性质[illegible]。其他人则否认以取自欧洲背景下有关封建主义和[illegible]主义的概念[illegible]殖民地的特殊现实。然而，多数学生承认，殖民[illegible]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更古老的因素，比如前哥伦比亚[illegible]土地所有制。西班牙努力保留和保护这种古老[illegible]，尽管这种努力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它有利于国王直接[illegible]，[illegible]自己的利益和政策，因而可把土著劳动力[illegible]的精英们[illegible]。因为西班牙农业部门的扩张，集体[illegible]受到了严重冲击，但是在殖民地末期，在很多地区仍保留着这种土地制度。

[illegible]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因素包括以不同程度奴役和[illegible]，很多非货币特征的经济交易[illegible]，以及技术落后[illegible]反映了低水平的生产投资，并与高水平支出形[illegible]奢侈、教会和慈善事业。管制制度，例如禁[illegible]拥有自己的私有土地，都严重阻碍了市[illegible]特征也许可称之为封建主义。

[illegible]封建主义的突出特征反映了西班牙自身的落后性。实[illegible]，在殖民过程中，西班牙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封建、更加领主化(seigneurial)。[illegible]是多数从西印度群岛流向西班牙的财富被用来支付[illegible]的战争[illegible]费用，维持一个寄生的贵族阶级，并且从北欧进口[illegible]品，这样，用来发展的财富便所剩无几了。西班牙依赖殖民地的[illegible]及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主导性的贵族意识形

[illegible]“[illegible]主义”这一[illegible]主要倡导者是安德烈·冈德·弗拉克(Andre Gunder Frank)，[illegible]《[illegible]资本主义和欠发达》一书。该观点受到一些学者[illegible]，[illegible]劳动力[illegible]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模式。例[illegible]科林·[illegible](Colin Moores)[illegible](1991)pp. 5－17。

[illegible]根据[illegible]约翰·科茨沃思(John Coatsworth)的研究，直到18世纪中期，新西班牙[illegible]概[illegible]的[illegible]，各地[illegible]是在贸易中使用代金券。

态，并且阻碍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实际上，贵族头衔的继承制度影响到了中低阶层，他们很快放弃了贸易，并把财富传给了长子们。如果整个国家贵族阶层的封建权力被国王与城市削弱，他们将会设法得到补偿，约翰·林奇(John Lynch)说道："这个过程是他们通过扩大经济权力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王权本身就是一个自愿联盟。"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还保留了他们的封建权力，例如，征收封建税收，任命官员，并且进行司法审判。的确，在后期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贵族重新获得了大部分原有的政治权力。"到17世纪后期，"亨利·卡曼(Henry Kamen)写道："毫无疑问，西班牙大概是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完全由贵族控制的国家。"这个贵族霸权提供了经济衰退和贫困的处方。我们看到西班牙在18世纪挽回这种趋势的努力太微不足道了，也太迟了。

殖民地经济还包含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尽管以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如奴隶制和债务劳役制为基础，但金银矿和大庄园、牧场以及生产糖、牛皮、胭脂、靛青和其他商品的大种植园已完全融入了扩张的世界市场。这些商业反映了价格波动和市场兴衰，并促进了资本积累，这不仅是在西班牙，而且在英格兰和其他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也在殖民地出现了，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型矿区中心、糖磨坊及其他作坊里雇佣劳动和劳动分工得到了发展。

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其进一步发展被多种因素抑制住了。例如，封建主义关系和态度的力量非常强大，殖民地的财富被西班牙抽空，而且西班牙本身愈发成为西北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卫星国。殖民地种植园的双重特性——内部交易常常自给自足，采用非货币的形式，但是生产却是以欧洲市场为外部导向的——却都反映了殖民地经济的双重性。

第五章 国家、教会与社会

焦点问题：

- 在殖民地运行的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 为什么西班牙王室不能执行殖民地的法律？
- 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对改革后的传教士、教会内部分歧以及传教士的道德下降有什么影响？
- 殖民地的阶级和社会等级结构是什么？它是如何反映种族的社会构造的？
- 殖民地妇女的地位、殖民地社会内部性行为和对自由选择婚姻不断变化的观念是怎样的？

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政治组织是集权、专制的，它本身对国内的统治也是如此。美洲被征服后，卡斯蒂利亚议会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的权利和义务豁免都失去了昔日的生命力。在哈布斯堡王朝最早的两个国王执政时，天主教君主的权力达到了历史巅峰，中央集权过程也由此正式开始。在卡斯蒂利亚出现了一系列由皇家委员会掌管的繁冗的行政官僚体制，他们由国王任命，并直接为国王负责。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区阿拉贡顽固地抵制王室对它的司法权的侵蚀，这使得它直到 18 世纪还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权。然而，甚至在卡斯蒂利亚，哈布斯堡王朝

的专制也给大贵族们原封不动地留下了对农民的领主式和封建式的权力。在阿拉贡，封建土地关系更为根深蒂固，傲慢的贵族们在其领地拥有广泛的司法权力，包括掌握对农奴的生杀大权，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最后几十年。权力在王室官员手中的正式集中与地方大地主实际执行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了对比，这也是对建立在西属美洲政治体制特征的概括。

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制度

殖民地管理的形成

95 1492至1550年是西班牙对殖民地管理模式开发和实验的时期。最终的结果反映了西班牙国内中央集权的稳步增长，并通过运用不断摸索的方式来解决殖民地政府的问题。西班牙国王们授予了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其他伟大的远征领导者全面的政治权力，使它们几乎成为自己所征服的领土内的君主。但是，一旦这些征服的重要性显示出来，王室很快就会对征服者产生猜疑，征服者的权力会马上被撤销或受到严格限制，那些曾在西班牙被用来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工具机构也以同样的目的被移植到了美洲。到了16世纪中期，西属美洲的政治组织一直保持着固定的形式，直到18世纪末才略有变化。

西印度事务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he Indies)是于1521年特许成立的一个独立机构，最初是卡斯蒂利亚所有委员会的事务委员会，几乎到了殖民地末期，一直是西班牙帝国行政管理的领导者。尽管贵族和王室的亲信大都被安排到这个委员会，但到了17世纪，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律师了。在国王的领导体制下，每个国王积极参与委员会工作的程度则因人而异，委员会是最高的立法、司法和政府执行机构。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向国王提名到殖民地任职的所有高级官员。委员会还为西印度制定了许多法律，其中包括著名的1681年《西印度法》(the Laws of the Indies)，这项法律包含了最重要的法令，同时也有一些琐碎细节。在哈布斯堡王朝早期，很多有良知和能力的官员被任命到委

[illegible]，但是在17世纪无能的国王统治下，官员的素质开始出现下降。[illegible]西印度委员会对殖民地历史、地理、资源[illegible]搜集。对研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学生而言，包含这些信息的报告是极为丰富的资料宝库。

王室代理人

[illegible]主要代理人有总督、都督和检审庭。总督、都督有[illegible]，区别仅在于分配给前者的管辖区域更为重要、范围更大。[illegible]，两者均是至高无上的民事和军事长官，负责诸多[illegible]收入、防卫和土著人福利及其他很多责任。[illegible]中期设立了两个美洲总督辖区——一个是新西班牙总督辖区，[illegible]城为首府，包括巴拿马地峡北部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另一个是秘鲁总督辖区，以利马为首府，包括除委内瑞拉沿[illegible]有的所有地区。从理论上说，都督隶属于总督，但[illegible]总督，管辖属于他们广阔领地的各个细分地区。[illegible]地，由检审庭管辖，检审庭的法官一般充当管[illegible]，但[illegible]在总督手中。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管辖权的重[illegible]，这也是造成王室官员之间经常发生争端的主要原因。

殖民地总督通常被看做是王室主人的形象代表，被授予无限的权力，[illegible]都放大了总督的权力。总督可能是律师[illegible]，或甚至是一个有背景的牧师，但绝大多数是来自西班牙的富有的贵族家庭。为显示自己的高贵地位，他们效仿卡斯蒂利[illegible]建造宫殿，使用众多随从，生活排场奢华。理论上说，西印度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指示制约了他们的自由行动度，但意识到法律要适应当地环境需要，[illegible]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总督们的一个行事准则是：我接受，但不执行。即对不切实际和不能执行的法律置之不理。

16世纪，在新世界出现了一些有才干甚至著名的总督，如弗朗西

斯科·德托莱多总督(Francisco de Toledo，1569—1581年在位)——"秘鲁最重要的创建者"，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勤劳工作的管理者，他在秘鲁巩固了西班牙的制度，并强制实施王室权力。然而，弗朗西斯科实施的再殖民计划和在矿区采用的"米塔"强迫劳动制度，严重地打乱了土著人的社会组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新西班牙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如安东尼·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1535—1550年在位)和他的继承者，路易斯·德贝拉斯科(Luis de Velasco，1550—1564年在位)都致力于解决征服者遗留下来的问题。他们力争约束西班牙征服者的权力，促进经济发展；有时还试图在一定限度内维护土著人的利益。但是，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成性的精神、王室对殖民地高级官员的不信任以及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反对都阻碍了这种努力。17世纪，在金融危机、腐败、西班牙王室犬儒主义的影响下，总督们的素质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了。比如，1695年秘鲁和墨西哥的总督辖区，实际上都出售给了出价最高的竞标者。

每任总督和都督在履行职责时由检审庭协助，检审庭是他们辖区内的最高上诉法院，并且作为总督的政府委员会发挥作用。在行政会议上，由总督和检审庭联合做出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就给予了检审庭立法权，这大致可比得上国王授予西印度委员会的立法权。虽然总督有最高的执行和行政管理权，但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必须听从检审庭的建议。尽管如此，检审庭的至高威望和直接同西印度委员会联系的权力，对总督权力形成了事实上的潜在监督。王室一度不信任殖民地官员，逐步建立了对他们的监督和制衡制度，从而确保对所有重要问题有充分的审议和磋商，但是，这又助长了优柔寡断和办事拖拉的风气。

除了听取上诉案件审理和同总督或都督召开磋商会议外，法官还需要定期视察所属省区，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条件、土著人的待遇和其他涉及国王利益的事项进行彻底调查。尽管总督和法官都是按照殖民地标准领取薪水，但他们职位所需要的生活花费非常高昂，如果他们不能利用职权谋取财富，就会希冀很快返回西班牙。

省区管理

[illegible]，省区的管理委托给了王室官员，他们以各自的首府为中心，[illegible]着规模大小和重要性不同的地区，这些人的头衔为督办或市长。一些人由总督（他们常常从总督那里花钱买来这个工作）任命，另一些人则由[illegible]任命。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不但拥有至高无上的司法和行政权力，而且在市政会（cabildo）里代表着王室的利益。对于确[illegible]民事和刑事案件，则由市政官员向督办上诉，再由他继续上诉至检审庭。如果督办不是律师，在司法案件审理过程中，必须有一名法律顾问协助他。

督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掌管西班牙人城镇；另一种则称为印第安人督办，掌管向王室进贡的印第安人城镇，通常任期3年，主要职责之一是保护土著印第安人不受欺骗和勒索。但是，现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印第安人督办本身就是最坏的侵犯者。印第安人部落酋长通常是他们的帮凶。督办滥用权力最严重的方面与劳役或商品摊派有关，要求土著居民必须从督办那里购买物品。表面上看，本来设计是为了保护土著人免于西班牙商人的欺骗，而督办同土著人交易的特权实际上却变成了他们自[illegible]自己快速致富的手段。

国王运用了大量的规章制度确保殖民地官员能够很好和诚实地履行职责。总督和大[illegible]被禁止从事贸易，在自己的管辖区内，不能持有土地或接受财物，甚至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受到了诸多限制。自总督以下王室所有官员在任期结束时，都要面临对其行为的留任审查（Residencia）。审查采取公开听证的形式，人们在法官面前对有问题的官员提出控告或对[illegible]作证。在最后环节，法官会对官员是否有罪进行裁决，并做出宣判，有时一些诉讼要向西印度委员会申请裁决。另外一项制度是巡查（Visita），通常由国王任命的巡查官（visitador）对官员的行为进行额外审查；对于级别较低的官员，由总督同检审庭协商巡查。

在西印度群岛，满足地方自治愿望的唯一的政治机构是市政会。然而，任何提出市政会包含了许多种民主特征的看法实际上都是没有任



17世纪早期，菲利普·瓜曼·保玛·德阿雅拉(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一位自学成才的印第安人作家，记述了督办们的腐败和不受法律惩罚的事件。他写道，督办们"不害怕正义，对上帝也毫不畏惧"，利用权力通过盘剥贫困的印第安人、拷打他们的酋长和偷盗印第安人社区创造的财富来聚敛私人财富

何基础的。早期，市议员(regidor)和市长由国王任命。在菲利普二世及其继任者时期，国王将这些职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已经成为既定惯例，同时，中标者仍有权转售和遗赠，条件是每次转让收益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上交国王。但是，在一些城镇，市议员选择他们自己的继任者。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市政会是封闭的，由富有的庄园主、矿主和商人组成的政治寡头贪恋职位，把"市政会变成一个排外的俱乐部经营

产。这些人通常不领取薪水，但会利用职权获得土地和土著劳动力，服务于他们所在阶级的有限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公务包括监管当地市场、公产、城市土地和当地税收。他们也选举市长，市长履行着一审法官的司法管辖权。由于受到省长或督办的严密监督，市政会早期就很快失去了自治权。尽管市政会存在非民主特征、效率低下、声望和自治权逐渐下降，但它还是有一定的潜在意义。作为唯一的政治机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克里奥尔人（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的利益，它注定在后来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上文描述的官员和机构仅仅只代表了殖民地政府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的公证人(escribano)从事不同部门的文书工作。他们没有工资，但会向雇主收取服务费作为对所提供服务的补偿。此外，警官、王室"左[illegible]和"[illegible]收税者、拥有特定司法权的市长等官员也都人数众多。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这些官职都是掌握在西班牙的高官手中，并出售给前往美洲担任收取服务费的个人。从菲利普二世开始，很多职位的任命权被收回，由王室直接出售给最高价的竞买人。17世纪后半叶，由国王直接出售的官职，从以服务费为报酬的职位发展到了更高的工资职位。[illegible]后，这些交易的受益人尽可能在投资中获得最大利润，试图返回西班牙，成为富人。因此，在这个时期，腐败成为政府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殖民地官员不管官职大小，以多种方式、精明地滥用赋予他们的权责。

如果说王室的权威在首都及周边农村是至高无上的话，那么在相对较远、封闭的地区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些地区，王室的权威微乎其微，而大庄园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规模宏大、自给自足的大庄园里，庄园主们以封建地主的方式管理司法，开庭审理案件，在自己的监狱里囚禁雇工；豢养和维持他们的私人军队，并通常以君主的姿态处理所有的事情。有时这些权势人物把实际掌握的军权和司法权力与官职头衔相结合，使自己成为附近一带地区的国王代表。17世纪末期，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衰落，弱化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使得这种分权面临着有利的环境。

近乎无效的殖民地法律

100 违反西班牙殖民地法律是殖民地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常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现状反映了王室官员在对殖民地精英执行法律时所面临的困境。强大的殖民地精英们与官员们既有着紧密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又强烈反对执行这些法律。这种困境最突出的表现是王室希望保护、管理西印度真正的财富土著劳动力与殖民地精英谋求利润最大化之间发生的冲突。然而，结果是这些保护性法律遭到了有组织的违抗。国王经常对违反行为视而不见，不仅是因为希望避免和强势的殖民地精英之间发生对抗，而且还因为这些法律有时会与他自己狭隘的、短期的利益相冲突（需要获得收入资助战争、外交和支持贵族们的奢华生活）。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为西班牙在美洲的行为辩护时经常引用的保护性立法与殖民地土著人生活和劳动的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阿隆索·德索里塔（Alonso de Zorita），一位在西印度从事19年行政管理的法官，于1561年退休时，仍是可尊敬的穷人。他在给菲利普二世的一份报告书中写道：

> 陛下和王室议会的愿望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每天颁布法律都已明确阐释，应支持和保护贫困印第安人及其人口增长。然而，这些法律仅仅是被遵守，而没有强制实施。因而，对印第安人的毁灭是无止境的，更没有人会在意陛下您的任何法令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殖民地的法律都是如此松懈执行的。相当一部分充满剥削和歧视的法律依然有效，其中包括要求土著人纳贡，支付象征性工资的强迫劳动，货物以固定价格强行卖给他们，把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却允许西班牙人的地产无限扩大。

在整个17世纪，西班牙作为一个遥远的欧洲国家，实力不断衰退，又如何解释它统治美洲殖民地的时间如此之久？答案不在于西班牙的军事力量，因为直到18世纪西班牙在西印度只维持了很少的军队。西

班牙统治得以持久的原因看起来在于王室的政策，为获得和保持殖民地精英的忠诚，王室对他们做了大量妥协。总督、检审官、督办及类似人物的政治设置对执行王室计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常不能执行保护性立法，剥削性法律被严格执行，通过向国王支付一定费用使侵占土著人的土地合法化以及忍受殖民地政治寡头滥用权力等都是说明上述王室政策的实例。可以肯定的是，国王与殖民地精英之间存在未明文规定的协议，即共享权力和剥削西印度土著人、黑人和混血人的果实，此外，他还一直努力约束殖民者的权力和野心。直到18世纪，这种努力仍不能对已有的制度安排起到威胁作用。

西印度教会

在与穆斯林长达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西班牙教会崛起了。当时，穆斯林非常富有，其权威仅次于国王。天主教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特别倾向于将传教士及其传播影响力作为国家统一和王室专制的手段。他们建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具有政治和宗教用途，在他们的曾孙腓力二世时期，成为国王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西班牙城镇陷入政治经济衰退，贵族沦为取悦国王的朝臣时，教会却不断获得财富和影响力。在哈布斯堡王朝末期，教会甚至对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了威胁。18世纪开明的波旁王朝的国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教会过多的权力。

王室对西印度和西班牙教会事务的控制是牢固地建立对其资助的基础之上的。如同在殖民地的实施一样，西班牙国王拥有绝对权力任命美洲的教会官员、征收什一税、修建教堂和修道院。迫于来自费迪南德国王的外交压力，罗马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于1508年授予了西班牙统治者特权，宣称使新世界的异教徒在皈依方面提供协助。西班牙君主们将对教会重要职位的任命权视为最宝贵的特权，一旦有人冒犯，他们就进行激烈的反抗。

对美洲的精神征服

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开始，每次驶往西印度的远征船队都带着几

个传教士，此后，大量的传教士涌向了这片被征服的土地。紧跟征服之后，修道士组成了第二次宗教入侵的先锋部队。总的来说，在征服后前十年到达美洲的第一批传教士都是宗教精英。他们是中世纪教会禁欲主义和戒律周期性复兴的产物，特别是由西班牙天主教君主发动、经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Cardinal Cisneros)全力以赴实施宗教改革的结果。这些传教士的先遣队常常把敏感的社会良知和热爱学习的习惯与传教士的热忱结合为一体了。土著人都很朴素，没有欧洲人的贪婪和野心，这些令人钦佩的品质给传教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斯克·德基罗伽(Vasco de Quiroga)曾是一位王室法官，后来的墨西哥米却肯(Michoacán)主教，他写道：

> 你无论如何对这些人，他们大都很温顺、勤勉，并且很容易接受灌输基督教义。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谦卑和顺从的本性，并实行了基督教徒的贫困、赤裸和藐视世间万物的做法的教规。他们也赤脚出门，光着头不戴帽子，长长的头发就像耶稣的十二使徒长度一样；总而言之，他们大脑一片空白，时刻为留下印记做好准备。

相信千年至福的人①和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对征服后前十年来到西印度的新传教士有着深远影响。受众多土著人的灵魂需要拯救的鼓舞，他们梦想在基督教教义的引导下，能够实现土著文化与西班牙文化的完美融合，回归到原始的纯洁状态。胡安·德苏马拉伽(Juan de Zumárraga)，墨西哥第一位主教及枢机主教，巴斯克·德基罗伽(Vasco de Quiroga)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都深受伊拉斯谟(Erasmus)的人道主义和新教思想以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德基罗伽曾向西班牙国王提议，应按照莫尔所设想的政治实体建立和组织土著人城市，这样土著人的优点就可以在基督教教

---

① 千福年说是基于《启示录》的一种基督教信仰，它认为在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将返回地球实现一千年的和平和正义，之后便是世界末日进行最后审判。

[illegible]和文化的[illegible]得以维持和完善。当国王不理睬他的提议后，德基罗伽由自己亲手创建了印第安人村庄，或在米却肯州建立了圣塔菲[illegible]。在这些工作里，德基罗伽确立了财产集体所有制、有组织的农业和手工艺劳动轮换、六小时工作日、女性的工作、按劳分配、避免奢侈浪费等规划。德基罗伽梦想在剥削的委托监护制和大庄园制的海洋里建立一个充满仁爱和互助的岛屿，这种梦想终究注定要破灭，但是，直到今天，米却肯州的土著印第安人仍崇敬“巴斯克老爹”的名字和[illegible]。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谴责了征服者们的种族主义态度，针对欧洲人的蔑视，他极力维护印第安人的文化。他的教义强调了所有人的尊严。

革新派传教士的这些态度不可避免地与委托监护主和世俗西班牙人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要求无限制地剥削土著人，并把他们称之为“狗”。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传教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是相同

的。其中一些人，如著名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里维奥·德贝纳文特·莫托利尼亚(Toribio de Benavente Motolinia)，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者"或"温和主义者"。这些传教士认为，委托监护制对保护土著人的福利作了周密的规定，这对保证西印度的繁荣和稳定都是必要的。其他的人，如由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领导的多明我会，认为委托监护制和土著人的福利不相协调，必须废除。

如第四章所述，在查尔斯五世(Charles V)统治期间，他担心以委托监护制为根基的殖民地封建主义将会上升。德拉斯卡萨斯派传教士获得了胜利，在他们的推动下《西印度新法》诞生了(1542)。在激进分子为保证法律的实施而努力的过程中，德拉斯卡萨斯和他的门徒们通过激进的措施，确保这些法律能够实施，结果招致了委托监护主致命的敌意。德拉斯卡萨斯多次遭到威胁。1550年，以总督儿子为首的一群人暗杀了尼加拉瓜主教安东尼奥·德巴尔迪维索(Antonio de valdivivieso)，生前他曾经试图依据新法强制废除土著人奴隶制。今天，这些和其他勇敢的印第安人利益的维护者可能仍被视为天主教进步潮流的先驱，比如哥伦比亚主教胡安·巴耶(Juan del Valle)、秘鲁主教弗赖·多明戈·德桑托·托马斯(Fray Domingo de Santo Tomás)。拉斯卡萨斯强烈要求西班牙人"结束以血统和以被悲惨压迫的人的血汗成为绅士"的做法，他的这种思想似乎预期到了当今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并成为"穷人的优先选择"。

尽管拉斯卡萨斯在查尔斯五世执政期间赢得了局部胜利，但这种势头在菲利普二世1556年即位后就开始下降了。对违反保护印第安人法律的西班牙人，拉斯卡萨斯和他的宗教同伴们曾拥有是否赦免的权力，并以此为武器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但后来却被王室的一些法令取消了。教会只关注礼拜仪式和布道，而把西班牙人与土著人的经济社会关系问题留给了当权者。当权者通常都是迎合了委托监护主、大庄园主和其他统治阶层的意愿，征服者的后代们最终获得了对土著人直接的、不受挑战的统治权，这项权力曾是他们的先辈们为之而奋斗过的。尽管委托监护制处于衰落，劳役摊派或米塔制，甚至是奴隶制靠多

[illegible]，这些仍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基础性制度。这[illegible]多[illegible]天然奴隶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认[illegible]人[illegible]。此[illegible]拉斯卡萨斯和西班牙其他的神学家几乎都谴责了这一理论。

[illegible]传教士[illegible]力保护土著人免于奴役和剥削，与[illegible]任务不是相分离的；他们主张，为使得皈依更为有[illegible]在自愿[illegible]中幸存下来，与原有的旧宗教相比，[illegible]会繁荣和生活得更好。尽管遭到了异教徒和[illegible]反对，但修道士们还是教化皈依了不计其数的土著[illegible]地接受了侵略者的新的、更强大的神祇。在墨西[illegible]，到1531年，他们已教化了100多万人；[illegible](Motolinia)宣称，他曾经在一天时间内教化了[illegible]多人！[illegible]失败，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压力接踵而至，被用[illegible]人皈依。[illegible]进行了洗礼却陷入盲目崇拜的土著人以接受了[illegible]；一些土著人贵族被处以绞刑或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传教，修[illegible]学习当地语言，编写了对当今学者仍有学术价值的语法和词汇表

修道士，尤其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非常重视设立学校，让来自土著上层社会的青年在学校接受包括拉丁文、逻辑学、哲学和基督教义在内的人文学科方面的教学。其中最著名的是方济各会在墨西哥的圣克鲁斯学院(Colegio de Santa Cruz)。由于土著人的世俗敌意或缺乏兴趣，以及修道士们自己本身的热情也有减退，16世纪60年代，这个学校开始衰落了。[illegible]在此之前，很多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他们对欧洲文化很狂热，同时也[illegible]用他们自己以往异教徒的生活。这些人的价值在传教[illegible]重建土著人古老文明的历史、宗教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是无可估量的。

尽管[illegible]些传教士毁坏了异教徒所有的历史遗迹，如神像、神殿和图画，但第一代传教士却深信，如果不对被征服前异教徒的生活方式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理解，将难以战胜异教徒们的宗教信仰。在墨西

哥，出现了一所名副其实的人种史学校，致力于收集哥伦布时代前的丰富文化。如果这些努力的动机与传教士所需要发现异教徒隐藏的仪式与惯例知识相武装起来，那么知识分子在发现消失的帝国的物质、艺术和社会方面的成就的好奇心和快乐求知也发挥了作用。

传教士们后来自己承认教化并不完全成功。针对墨西哥的情况，历史学家路易斯·M.布格哈尔(Louise M. Burkhar)得出结论，阿兹特克人“在没有放弃他们基本的思想和道德导向的前提下，在殖民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也足以成为一名基督徒”。这里传教士的努力的结果是新旧宗教理念相互混合，有时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和对异教神的崇拜混淆不清。在征服墨西哥半个世纪以后，多明我会的迭戈·杜兰(Diego Durán)看到，在土著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异教徒的信仰和实践，他写道：“在他们的舞蹈、市场、浴场及歌曲里，都有对失去古老神灵们的哀悼。”同一时期，学者型传教士萨哈贡(Sahagun)抱怨道，他们继续庆祝他们古老的节日，所演唱的歌曲和所表演的舞蹈都表达出了隐藏着的异教徒的意味。在秘鲁，教化更为不成功。内森·瓦克特(Nathan Wachte)写道：“如果印第安人承认存在一个基督教神，他们认为，他的影响力也仅局限于西班牙人的世界；他们向自己的神灵寻求保护。”直到今天，危地马拉和秘鲁的土著还在举行从玛雅和印加时代延续下来的仪式。

传教士们还必须为他们的内部分歧而斗争。不同教会之间会因为对皈依者所要求的受洗前教诲的程度不同而发生激烈的争执。譬如，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与方济各会相比，他们的要求较为严厉。对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或城镇，由哪个教会管辖也会出现争端。更为严重的冲突是在世俗传教士和受教规约束的传教士之间。在美洲，应由受教规约束的传教士履行牧师和圣礼的职责常常只委托给了教区里的神父们了。教皇的特殊立法(1522)要求将这些职能授予受教规约束的传教士，这是早期达到西印度的一小部分世俗传教士做出的必要妥协。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以后，他们的人数激增，而且主教越来越热衷于开创由世俗传教士管辖的新教区。在对皈依者的精神指引方面，他们会

[illegible]代替[illegible]来的传教士，后者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教会[illegible]分裂的来源是美洲出生的传教士和半岛传教士之间[illegible]。[illegible]17世纪，由于克里奥尔人日益增多，在省级地[illegible]地位，半岛人的职位越来越受到威胁，因他们更努力[illegible]获取[illegible]教职在他们与克里奥尔人之间轮流担任的教令。

传教士的堕落和传教的推进

[illegible]传教士们的使命感和道德感的逐渐丧失，和其他因素[illegible]造成了神职人员的知识和精神影响下降。随着帝国中心地区教[illegible]与教区信徒们的热情不可避免地消退了；后来到达的传教士[illegible]安逸的生活和获利，而不是禁欲苦行、服务众生。到了16世纪[illegible]，修道院的数目和财产过度增加，经常受到指责。[illegible]人的遗产和捐赠：如果一个富人死后，在遗嘱中没有[illegible]教会[illegible]，倍是一件丑闻。向教会、女修道院或其他宗教机构捐[illegible]的一般做法是，地主以一定数量的财产为抵押，每年将5%的收益支付给神职人员。在西班牙，这种表达虔诚的方式广为使用，“据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哪个大庄园不需要承当一个或更多的抵押捐赠。”另一种能够满足捐赠者虔诚或家庭兴趣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可用来长期做宗教的小教堂，以颂扬他或她的灵魂。通过委派一位家族成员作为牧师，捐赠者确保了对捐赠财产收益的控制权仍保留在家族手中。所有这些方式不断消耗了大庄园主的收入，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Enrique Florescano)写道：“这对动摇已经不稳定的大庄园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上让宗教组织成为了真正的大庄园主、农村收入的受益人。”

教会获得的财力以永久所有权或经营的形式存在，不可剥夺。如果把这些财力投入土地或者抵押，便能谋得更多的财富。惊人的经济实力赋予了教会比其他竞争者有着显著的优势，尤其在经济衰退时期，使它能够兼并相对较弱的地产者，最后达到西班牙美洲最重要的教团

是耶稣会(1572)，它是最为富有、拥有最多庄园和地产者，它在许多事业也最有成效，基本上是用这些收入来支持它的传教。

传教士们的精神生活，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退，并恶化了他们与印第安大众的关系。早在16世纪和17世纪，就有对教会征收费用过高和神职人员过度剥削土著劳动力的现象发出了指责的声音。1667年，新西班牙总督马塞拉·德·蒙特克拉罗侯爵(Marques de Monteclaros)向国王菲利普四世报告，在传教士的管理之下，印第安人遭受了最为严重的压迫，一个土著人口向在教区收取的费用比他们一年上交给国王的20倍。随着物质主义不断上升，道德日益衰落。殖民地后期的传教士与女性姘居十分普遍，似乎并没有引起官方的干涉或责难。到了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十年，传教士的道德堕落达到这么一种地步，被独立时期一位教派的领导人、墨西哥历史学家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描述成可耻的形象。从这些谴责中，一般可以把耶稣会传教士排除在外，他们以高道德水准和严格的纪律而闻名；此外，在修道士和世俗传教士中，也有一些杰出的有社会良知的人物。

第一批修道士的传教推动最远波及未曾开发的边疆地区，被认为是基督教界的边缘地区。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最先渗透到了新西班牙北部内陆地区，遇到了怀有敌意的"野蛮的印第安人"。他们是伴随1598年奥纳特远征队到达新墨西哥的，直到殖民地末期，一直坚持着他们的使命；对远在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的西班牙前哨据点，也能发现他们的足迹。在1767年耶稣会修道士被驱逐出西印度后，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代替了他们，指导在加利福尼亚的传道工作。

传教是与三个制度紧密相连的——另外两个是要塞(presidio)和移民定居点——目标是为西班牙帝国的扩张和防御北部边境服务。希望传教能够把土著皈依者聚集起来成为独立的宗教社区，训练他们耕种土地、饲养家畜和掌握各种技能，直到完全被基督教化和西班牙化。要塞据点为周围的传教活动提供了军事保护，并保证了印第安人对修道士的合作态度。最后，在免费土地的诱惑下，低收入的西班牙人蜂拥而至，聚居在这些地区，形成了繁华的生活和贸易的移民定居点。针对外国入侵，他

们用尽一切办法要么收回失去的边境,要么保持和平,或奋力抵抗。

这种对传教士著三合一的进攻并不十分成功。北部边境的一些部落,比如,强大的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的阿帕切族和得克萨斯的卡曼其族,从来没有向传教士屈服过。但传教士们在定居的印第安人地区取得了成功,如在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墨西哥西北部及得克萨斯东部。然而,即使在这些和平的社区中,暴乱、逃亡也十分常见。1680年,按照有多已被基督教化的新墨西哥普韦布洛人却发生了暴乱,修道士被杀死,并针对西班牙人的再次征服做了长期的顽强抵抗。其领导者声称,古时的神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这次起义导致人们大规模逃亡。由于受到附近驻防士兵的虐待和对阿帕切族和卡曼其族的恐惧,很多人也都逃离了教区。

移民定居点显然也不是很成功的。到殖民地末期,北部边境也仅有几个零散的城镇,并且频繁的袭击使得生命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新墨西哥的定居者中离开的人数超过了所招募前来定居的人。最终,保护西班牙人的全部任务要依靠在现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立的一系列驻防据点。连续的军事挫败迫使西班牙军队躲到驻防据点高墙后面避难。西班牙最后被迫采取新的政策,定期向阿帕切族和卡曼其族赠送礼物,以缓和矛盾。然而,独立战争爆发后,这种礼物也中断了,他们又回到敌对状态,西班牙的军事据点防线毫无用处,他们一直打到墨西哥境内。

传教士最为著名的成功例子是耶稣会在巴拉圭的传教活动,至少从经济的角度看是这样。巴拉圭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耶稣会修道士在这个国家组建了30多个布道团,这是他们在美洲的主要活动。纪律严明、组织集权以及对数以千计温顺的瓜拉尼劳动力的完全控制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剩余,使得耶稣会把他们的传教变成了有高额利润的商业。大量的棉花、烟草和皮革由巴拉那河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向欧洲出口。耶稣会传教制度或许应被更准确描述成“神权资本主义”,而不是“基督教社会主义”。

1767年,继王室颁布敕令把耶稣会逐出殖民地之后,耶稣会在巴拉圭的统治和在殖民地其他地方的传教活动也就随之终结了。王室的

这种做法有多个动机，即波旁王朝的民族主义教会政策和耶稣会强调的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发生了冲突，王室怀疑耶稣会干预国家事务，并且坚信他们的传教制度将会建立国中之国。将耶稣会驱逐出巴拉圭也导致了西班牙官员和庄园主对瓜拉尼人更为严重的剥削，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之前繁荣的耶稣会村庄衰败殆尽。

新世界的宗教裁判所

106 1569年，菲利普二世在墨西哥和利马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正式进入西印度。在此之前，它的职能由主教或者拥有主教权力的传教士来行使。宗教裁判所具有的特权、独立于其他机构以及西班牙人对异教的恐惧，使得宗教裁判所成为对抗新教、违背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危险思想"进行有效审查的制度。然而，宗教裁判所审理的大量案件与对道德的冒犯或略微偏离正统宗教的行为有关，如亵渎罪。

从伊莎贝拉女王开始，西班牙的统治者都禁止犹太教徒、穆斯林、新基督教徒和被宗教裁判所宣判有罪的人进入西印度。但是，许多新基督徒希望能够获得财富和逃离西班牙国内到处充斥着的猜疑和敌意的氛围，他们大都以商贩或以获得批准的乘客服务员的身份来到西印度定居，有时甚至直接从国王那里购买特许权。有些人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到16世纪末，许多新基督教徒定居在秘鲁和新西班牙。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后，宗教裁判所的势力开始扩展到那里，很多葡萄牙人被迫来到了西印度。第一个达到新西班牙的人是路易斯·德卡瓦哈尔(Luis de Carvajal)，后来成为北部地区新莱昂的军官和统治者。卡瓦哈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的儿子和其他亲戚则是狂热的犹太教徒，他们还劝说新西班牙天主教会信徒们皈依犹太教。由于有人向宗教裁判所揭发了他们，他们被审判，以异教徒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判决于1635年在墨西哥以公开行刑的方式执行。1635年，利马的宗教裁判所打击了该城市的新基督徒，一些人被处以火刑，所有的人都被判处没收财产。利马的新基督徒大多是富有的商人，宗教裁判所没收他

们的财产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机构。

如同在西班牙一样，西印度的宗教裁判所主要依靠告密者揭发和严刑逼供。宗教裁判所造成的破坏不只仅局限于剥夺生命、没收财产，而且还包括制造恐怖、怀疑、僵化的精神顺从的气氛。伟大的女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认为调查和进行宗教裁判所的一项重要事务。作为一个品德高尚、诚实的高级女教士，她遭到了种种刁难，常常暗中提及这种残暴的气氛。刚开始，土著人也需要对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负责，因最新的皈依者智能有限以及没有能力分清异端信仰的越轨行为负责，后来也就取消了法官们对土著人的审判权，转交给主教管辖的法庭审判、惩罚。

教会和教育

教会对殖民地不同层次的教育有着实际上的垄断权。除少数情况外，由传教士开办的小学和中学仅对西班牙上层社会和土著贵族的孩子开放，而使广大的土著人和混血人种陷入文盲状态。到殖民地末期，大约有了25所大学，但入学的权利却更多的仅限于富裕家庭和血统"纯正"的青年人。

1551年西班牙王室特许在利马和墨西哥城建立的大学成为第一批永久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模仿西班牙的类似机构，殖民地的大学忠实地完全复制了他们中世纪的组织、课程和教学方法。与实践或科学研究不同，对圣经权威的奴性崇拜、亚里士多德、教父、某些中世纪学者以及对神学或经院哲学吹毛求疵的辩论激情构成了殖民地学术生活的特征。神学和法学是两门主要的学科；到18世纪，科学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对图书出版的严格审查(未经王室议会批准，任何书刊都不可在西班牙和其殖民地出版发行)限制了新学说在殖民地社会的传播。在最近几十年里，相关资料显示，禁止小说进入西班牙殖民地的法律完全是无效的，但这种容忍并没有允许为异端邪说或颠覆性作品的流入。殖民地宗教裁判所的记录揭露了许多悲惨的囚禁、拷打案件，一些人因私

藏或阅读禁书而被处死。至少到了18世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精神铁幕开始消散，殖民地的人民可以触及到了异教学说或非传统的政治倾向。

尽管受到官方审查的限制，殖民地学者在他们自己能力范围内仍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土著人史、人类学、语言学和自然史等领域。16世纪是这些学科在西班牙美洲研究的黄金时期。在墨西哥，一大批传教士，尤其方济各会的成员对当地语言、宗教和历史富有耐心地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在土著人提供信息的帮助下，修道士伯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un)完成了《新西班牙史》这部不朽的作品。它是一本可称得上有关阿兹特克文化所有方面的百科全书，学者们现在仅开始对他的作品中丰富的人种志材料进行挖掘。另一个方济各会修道士是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Toribio de Benavente)，他通常以土著名字莫托利尼亚(Motolinia)的闻名，他写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是研究被征服前后土著人生活的珍贵的入门书。以他对阿兹特克绘画和编年史（由一位阿兹特克贵族用当地语言撰写，但现已失传）的研究为基础，教父迭戈·杜兰写了一本古代墨西哥史，该书保留了阿兹特克的叙事诗和传奇故事的内容和精神。为满足西班牙人对新世界和阿兹特克与印加的好奇心，耶稣会修道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e de Acosta)撰写了《西印度的自然和道德史》。全书行文简单欢快，展现了那个时期少有的批判精神。这本书很快在西班牙流行起来，并且翻译成了西欧的主要语言。

土著人或梅斯蒂索贵族写了不少历史著作，他们的写作受不同的动机所驱使：对他们本土遗产的兴趣和自豪感，以期证明他们祖先曾对征服提供过重要的服务以及他们要求贵族头衔和土地的合法性。教会学校的作品通常把基督教徒的虔诚与对他们祖先以往荣耀的怀念融合在了一起。一位特斯科科国王的后代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斯奥齐特尔(Fernando de Alva Ixtlilxochitl)写了很多史学著作，显示了他对欧洲历史方法的娴熟掌握。这些作品把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高度理想化的特斯科科文明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17世纪早期另一位作家是梅斯蒂索人加希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他既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也是印加王子,他提供了《王室述评》一书以及大量有关印加物质文化和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著作展现了秘鲁人在印加国王仁义统治下田园诗般的生活图景。他的西班牙语行文雅致、流畅,其作品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著作,也可以算作是一流的艺术品。在欧洲,再也没有像他这本如此流行的写印加帝国的书了,讨人喜欢的印加文明形象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影响我们对古代秘鲁人的看法。

17世纪初印第安人贵族菲利普·瓦曼·普马·德阿亚拉(Felipe Waman Puma de Ayala)完成的《新编年史》是一部信息量很大、反映征服后秘鲁社会环境的很有价值的著作,书中配有作者自己以欢愉朴素手法画的插图,但这本书手稿直到20世纪初期才为世人所知。他叙述道,他写这本书是为了"了解贫困的印第安人,并去解救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国家不存在正义",他还希望菲利普三世能够读到这本书。瓦曼·普马费力地使用着自己不熟悉的卡斯蒂利亚语说话方式表达想法,这是一种由克丘亚语点缀的富有激情的表达方法,忧思和幻想破灭表现了作者的真诚和他对残酷现实的谴责。

科学、文学与艺术

17世纪后半期,殖民地学术性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这是巴洛克文学风格盛行的时代,强调双关、精巧和造作,内容从属于形式,意义让位于过分修饰的表达。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位是墨西哥人卡洛斯·西哥恩萨·贡戈拉(Carlos Sigüenza Góngora),另一位则是秘鲁人佩德罗(Pedro de Peralta Barnuevo),他们以自己广泛的兴趣和对科学实际应用的关注预见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到来。西哥恩萨是数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抨击旧有的但当时仍盛行的占星术迷信,这些都体现在他与天主教神父基诺(Kino)关于彗星的争论中。为了科学研究的兴趣,他还抛开偏见,在遗嘱中捐献躯体以供解剖。

佩拉尔塔·巴尔努埃诺(Peralta Barnuevo)作为宇宙学家和数学

家，他的天文观察曾刊登在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年鉴上，并被选为他们的通讯员。他还指挥了利马防御工事的建设。这位有才能、对科学的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学者还向巴洛克风格神秘主义作了让步。在他晚期的著作里，他总结道，真正的智慧是对上帝的认识，人类是"很难理解的"。

尽管有些例外，但殖民地文学是母国文学衰退趋势的苍白反映。孤立于外国影响、对各种读物的严格审查以及有限的读者群都使得文学创作比较艰难。丧失信心的墨西哥诗人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Bernardo de balbuena)因此将墨西哥描述为"一个焦躁不安、没有休息的世界"。更糟糕的是，17世纪殖民地文学中充满了对"贡戈拉式"的矫饰文体(Gongorismo)的追求，模仿这种晦涩、做作和过度修饰的文学风格。

正如一位文学史学家所描述的，17世纪的墨西哥诗人犹如一群"吵闹的乌鸦"，在这种气氛中却出现了一个天才人物——"凤凰"，即为当代人所熟知的"第十位缪斯女神"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著名的修女和诗人。她在女修道院纪律约束下的诗作是拉丁美洲最好的之一。但胡安娜并不能逃离她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她广泛受到了普埃布拉主教的责难，这使她最终放弃自己的写作以及对文学的热衷，并把余下的短暂生命时光奉献给了宗教和慈善事业。

由于胡安娜修女极力维护女性受教育和享有知识生活的权利，并抨击盛行的不理性的男女性行为(她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写道："愚蠢的男人们，为什么你们在煽动她们变坏时，还想她们成为好女人？")，她的作品属于"殖民地颠覆性的作品"，挑战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教会和政府提出的理想化的殖民地生活方式。殖民地的批评家们以讽刺和嘲弄为武器，揭露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空洞性，常常以极端的怪诞扭曲方式来反映殖民地生活理想化的图像与现实堕落的差距。他们从西班牙以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和以西班牙社会中的丑事和缺点为主题的讽刺诗中寻求灵感。由于对出版物的严格审查制度，殖民地的讥讽作品主要以手稿形式流传，而讽刺作家经常采取措施隐藏身份。

第一位西班牙美洲讽刺作家是在半岛出生的马特奥·罗萨斯·德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Sor Juana Ines de la Cruz)，经常被称为殖民时代西属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她在18岁时进入修道院，44岁去世。她的诗作既有世俗题材的也有宗教题材的，但人们最为推崇她的爱情诗。

奥肯多(Mateo Rosas de Oquendo)，他的作品《对1598年秘鲁纪事的讽刺》披露了秘鲁的社会弊端、在殖民地首府所炫耀的财富以及广大民众生活所经历的"苦难的海洋"。在另外一首讽刺叙事诗里，在叙述用枪打击英国海盗时，罗萨斯把庆祝西班牙舰队击败一艘英国船的仪式描述为"一群母鸡围绕一只鸡蛋咯咯乱叫"。朱莉·格里尔·约翰森(Julie Greer Johnson)总结道：贵族统治阶级与社会底层有着共同的"虚荣、腐败和虚伪的基本特性"，差别在于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法庭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诈骗如同他们在大街上一样，这次通过收买权力和

影响，金钱再次支配了生命。"

同样有嘲讽传统的作品是《羊皮书》（El Carnero，这个书名的意思至今还尚未确定），讲述了西班牙对新格林纳达进行征服的第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个过程始于一个贫困的克里奥尔夫的儿子胡安·罗德里格斯·弗雷利（Juan Rodríguez Freile）的觉悟，于1638年还未结束。格里尔·约翰森指出，这部作品的讽刺同时反映了"走在美洲中心，克里奥尔人对被认为是二等西班牙人感到不满和屈辱，更多的是感到自己被殖民，而不是如殖民者对待"。罗德里格斯·弗雷利一改同时代史学家对征服和西班牙在美洲的作用之褒，质问"征服的合法性、殖民的有效性甚至西班牙征服者的品质"。

政府官员看起来好似笨手笨脚的傻瓜，"在各自履行职责时，一个个弓张地互相倾轧"。罗德里格斯·弗雷利充当一名"无所不在的官员"，对一系列犯罪和丑事进行评价，但他能够自嘲，甚至乐于"追随征服者探寻虚幻的黄金国"。

1645至1648年期间，胡安·德尔·巴雷·卡维埃迪斯（Juan del Valley Caviedes）从西班牙来到秘鲁，他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殖民地讽刺作家，且作为一个诗人仅次于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显而易见，由于作为病人时一段不幸的经历，利马的医生成为他主要的辛辣嘲弄对象，他还对利马的妇女、贵族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进行了猛烈的言语攻击。在他的诗集《帕纳萨斯山的牙齿》中，不合格的庸医们互相串谋对付病人，他们被形容成由死神将军领导的一支军队。卡维埃迪斯把秘鲁17世纪的医生等同于16世纪的征服者和不断对殖民地构成威胁的现代海盗，给自己的嘲讽赋予了颠覆性的色调，他视征服者、医生和海盗对造成西半球的死亡和破坏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更为大胆的是，当死神将军点名介绍医生时，他还给利马一些最为有名的"庸医"命名。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科·贝尔梅约·罗尔丹（Francisco Bermejo y Roldán），秘鲁的主治医师。卡维埃迪斯给他赐予了首席刽子手的头衔，并指控他通过"开出要当面操作的针剂来奸污他的女病人"。

阶级结构和种姓制度

西班牙美洲社会秩序的出现是在对原有的印第安人社会破坏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同在西班牙，它以贵族的或封建的准则为根基。种族、职业和宗教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准。当时人们认为所有的手工劳动都是低俗的，但从事大规模交易则是和贵族身份相符的，至少在西班牙美洲是如此。其中强调的是血统的纯正性，这意味着最重要的是出身于"旧基督教徒家族"，没有与新基督徒或穆斯林混血。这种出身证明经常被谨慎地保存着，有时甚至是人为制造的。

各种种族和种族混血加以仔细区分，然后按等级制度予以分级。有黑人血统的人在法律上就被剥夺了他担任公职或从事其他职业的权利，以及其他种种权利和特权。对人数众多的梅斯蒂索人，也是如此。当然，西班牙法律赋予了婚生儿完全平等的合法权利，但直到殖民地末期，一些殖民地社会和学校的章程还不加区分地把所有的梅斯蒂索人排除在外。

缺乏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历史学家关于被征服前人口规模存在重要分歧，使得只能对1650年西班牙美洲总人口数以及各种族群体中占比例进行估计，这些都是严格推测的。数据显示，在当时甚至更早，土著居民人数长期下降的趋势已经结束，并出现缓慢恢复。另外，欧洲人所占比例迅速扩大，但数量增长最快的是混血人种，且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婚生。

正如前面说明的，西班牙的法律和舆论以财产和特权为标准将所有人种族群的社会地位按降序排名，其中欧洲人居首，然后依次是混血人种、土著人和黑人。虽然正式的排名不一定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完全相符，但它为殖民地的统治阶层的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还制造了一个冲突性的社会，土著人和黑人、混血人之间都相互对立，贫穷的西班牙人对其他人种的优越感也出现膨胀，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受剥削劳动阶层的团结，并促成、维持了一个压迫性的社会秩序。和其他地方一样，拉丁美洲的"种族"理念是社会构建合理化的，并维护了少数精英的权力。

统治阶层

实际上，种族的界限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在西属美洲，白色皮肤是上等社会的一个标志，近乎与西班牙贵族头衔的意义相当，但它并没有现金价值。并不是所有的白人都属于享有经济特权的群体。殖民地的资料证实了存在一大批贫困的"白人阶层"，包括流浪者、乞丐。更糟糕的是，他们鄙视工作，经常以损害印第安人为生。这类西班牙人因贫穷所迫选择混血人为配偶，一般也就决定了大体他们的后代处于低等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是，富有的西班牙人大地产主经常同意承认他们的梅斯蒂索或穆拉托儿子，如果被承认或称为合法的继承人，就可以进入殖民地的贵族阶层。如果土著人或非洲血统的痕迹过于明显，就常可与掌管洗礼证明的教区神父达成谅解；另外，对富裕的梅斯蒂索人或穆拉托人来说，可以从国王那里购买一份文件，证明他是合法的白人。财富是区分殖民地贵族的主要特征，而非出身名门和血统纯正。尽管有这种事实，毫无疑问，白人以绝对优势占据了殖民地金字塔的顶端。

白人统治阶层本身因各团体之间的妒忌和敌意造成了分裂。西班牙人把他们地区内的竞争和世仇也带往了新世界，包括旧卡斯蒂利亚人和安达卢西亚人、卡斯蒂利亚人和巴斯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西印度这种无政府的氛围下，竞争经常会爆发为争吵，甚至出现战斗。但是，上层社会中不变的裂痕是在殖民地出生的被称为克里奥尔人与在西班牙出生被称为半岛人之间的分歧。在法律上，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是平等的；实际上，在担任公职时，西班牙法律倾向于征服者的后代或早期的移民者。在整个殖民地事情，克里奥尔人确实遭到一系列的制度歧视，他们在高级教会、政府以及大规模商业方面的就业机会都被剥夺了。

与克里奥人相比，偏袒半岛人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宫廷、各种特权的继承以及王室对克里奥尔人的不信任。16 世纪后半期，征服者的儿子或孙子们开始抱怨国王的偏心，他的官员倾心于从西班牙刚刚到来没有财富的新人。克里奥尔人怨恨这些新来的人，他们常常夺走了市长和其他政府职位。弗朗西斯克·德特拉

斯(Francisco de Terrazas)，这位墨西哥诗人用一首押韵诗表达了克里奥尔人的抱怨：

> 西班牙：对我们来说，你曾经是严厉的继母；对陌生人，你却又是一个温柔、慈爱的母亲；对他们，你挥霍了所有宝贵财富；而与我们，你分享你的烦心事和危险。

随着时间的推进，殖民地上层社会中的矛盾越来越深。两大集团都在为维护各自的立场辩护。半岛人常常以克里奥人的懒散、无能和轻浮作为参照，证明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有时把这些归因于美洲的气候及其他环境因素。克里奥尔人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把欧洲人形容为吝啬、贪婪的暴发户。克里奥人从矿山、种植园及牧场积累的财富日益增多，使他们对所遭受的歧视的怨恨更加强烈。

梅斯蒂索人：一个模糊的身份

自从征服的第一天起，梅斯蒂索人在种族混合过程中就出现了。在征服初期，由于西班牙女性较少，国王和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西班牙人和土著人之间通婚；当时混合婚姻是常见的现象。但是，随着王室采取了一种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态度很快发生了变化。17世纪前25年，西班牙殖民地立法的官方立法起草人胡安·索罗萨诺·佩雷拉(Juan Solórzano Pereira)这么写道：“有体面职位的西班牙人很少与印第安人或黑人妇女结婚。”结果是，众多的梅斯蒂索人都是源于非正式的婚姻结合。这一不合法的污名，不能获得财富补偿，使得大部分人注定要沦为社会底层。一些人沦为了苦工，过着和土著人一样的生活；另外一部分人却加入了本已庞大的流浪者队伍；还有一部分应征入伍。梅斯蒂索人还是构成牧场工人、中低等艺术家、监工、店主的主体。由于在土著人和西班牙人社会没有根基，并受到了他们的鄙视和不信任，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低等的梅斯蒂索人有着暴力和动乱的名声。

土著人：一个分裂的民族

与梅斯蒂索人相比，在西班牙的法律和实践当中，土著的地位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分裂的民族——印第安人社会，属于世袭的纳贡社会阶层。然而，土著统治者的后代和世袭贵族却受到了特殊照顾，一方面，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人尊重这个自然的或合法的主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们可以作为西班牙统治者和当地纳贡者之间的调解人发挥作用。这些贵族允许保留全部或部分祖传的地产，并且享有骑马、穿欧式服装、携带武器等特权。

大量的证据表明，土著贵族是他们自己人民最坏的剥削者之一。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时代，就已出现了封建制度，类似农奴的人构成了人口的主要部分，一些阿兹特克地主利用因征服带来的动荡侵占公共土地、向租户征收过量租金、强迫平民为其工作。在墨西哥和秘鲁，他们的新角色是西班牙人的贡品收缴者和劳动力的招募者，这为土著精英提供了与市长、委托监护主以及神父之间不惜牺牲平民的利益玩弄手段的机会。例如，部落酋长与市长伪造贡品名单，然后共享其中的利益；他们可能隐瞒米塔或劳役摊派所需的劳动力数量，让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里工作。在秘鲁，传统的亲属、宗教仪式和相互依存的传统关系强有力地把头人(Kuraka)和艾柳(Ayllu)平民联系起来，大部分头人首先要在以下三者之间保持平衡：服从新统治者对劳动力和纳贡的要求、保护艾柳平民免受西班牙人的过度强征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然而，总体上来说，为适应新的商业气氛，他们开始剥削平民，以饱私囊。

许多头人凭借本身的条件成为大庄园主。据秘鲁史学家路易斯·米洛尼斯(Luis Millones)所述，到16世纪末，一些头人控制了庞大、复杂的商业，为秘鲁内部市场生产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他们也开始雇佣西班牙人来协助生产。伊莲娜·西尔韦布拉特(Irene Silverblatt)写道，土著农民妇女更是头人的主要剥削对象，因为她们特别容易失去土地和水源。17世纪印加编年史学家瓦曼·普马·德阿亚拉声称，无论殖

[illegible]当权者[illegible]著人精英对贫穷男性农民进行了怎样的剥削，"他们从[illegible]农民妇女那里[illegible]掠夺得更多"。他还指责头人们在他们的管辖权内[illegible]引诱妇女，并对她们实行性侵犯，这些人与西班牙官员、委托监护主以及神父的做法一样。

史蒂夫·斯特恩(Steve Stern)写到，头人和艾柳平民之间对立趋[illegible]其结果是[illegible]了"一种更为紧张、不信任的关系，在其中获得了更为[illegible]、暴力[illegible]的重要性"。比如，1737年一个艾柳社区的[illegible]人，指控他非法掠夺公共土地，建造自己的辣椒种植[illegible]道："在他们的证词中，所有证人都说头人的主要目标是农民妇女。"

[illegible]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所说的墨西哥的情况[illegible]也是[illegible]写照：墨西哥酋长无节制的需求和侵犯行为[illegible]秘鲁头人对下层的做法都反映了在面对西班牙人侵占土地和剥夺[illegible]特权[illegible]的"一种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安全的紧张反[illegible]"。[illegible]面，16世纪末期，[illegible]大部分贵族处于衰落期，尤其是小贵[illegible]中，[illegible]墨西哥比秘鲁衰落得更快。很多阿兹特克贵族在[illegible]中失去了他们的侍从，或者西班牙的立法要求以前的下等社会阶[illegible]为自由的[illegible]人。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拒绝承认许多人的贵族身份，并将他们变为纳贡者。贵族破产的一个原因是西班牙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做出的反应要么是进行法律诉讼反抗，但成本高昂，往往毫无希望；另一个选择就是替西班牙人向平民收缴贡品。由于传染病或其他原因，当纳贡者数量下降时，酋长或头人必须自己补足纳贡欠款，或被投进监狱。为了弥补赤字，他们可能需要出卖、抵押自己的土地，或者[illegible]平民，向他们谈判额外的纳贡任务。

然而，殖民地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完全西班牙化的酋长和头人家族，他们除了做西班牙精英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调解人之外，还经营着大地产和各种商业，最终成为有产阶层的正式成员。例如，在18世纪后期的墨西哥，阿梅卡美卡(Amecameca)的一位酋长拥有一座大庄园和其他财产，生产小麦和龙舌兰，每年能产生成千上万比索收

益。查尔斯·吉本指出："和其他西班牙人庄园主一样，酋长能够收到印第安人的贡品，他们还需要在酋长的庄园里伐木、饲养动物。酋长的宅邸装饰着西班牙的家具、银质餐具和昂贵的挂毯；他拥有私人军械库、手枪、钢制和银制刀剑。他的马厩、仓库及其他财产可与富有的西班牙人相媲美。"

在18世纪的秘鲁，库拉卡·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尔坎基(Kuraka 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是当时阶层规模较小的富有土著或梅斯蒂索贵族的著名代表。莉莉安·费希尔(Lilian Fisher)写道，他的生活和西班牙贵族一样，身穿"长外套和及膝天鹅绒马裤，马甲由透明金丝做成，价值七八十美元；内衣由亚麻布镶边内衣，长袜也是丝绸的，鞋子带有金扣；他头戴一顶价值25美元的海狸皮帽，头发被编成了小环卷曲，几乎可伸展到腰部。"他的财富资产包括拥有350头骡子，用来向波托西、可可种植园或其他地方运输水银和其他货物。

与土著统治者能享受的特权相比，广大平民承受着贡赋、劳役、教会费用等沉重负担。他们在本质上被看做是劣等民族和需要受西班牙保护的人，因此他们有义务为西班牙监护者纳贡和提供劳动力。在殖民地的文献中，"缺乏头脑的人"(Gente sin razon)是经常被用来描述土著人。在法律上土著人下等和被监护者的地位体现为：禁止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或订立多于5比索的债务契约，并尽力减少他们和其他种族之间的接触。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和很多其他对土著人活动的限制是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一位开明的墨西哥高级教士，曼努埃尔·阿巴迪·奎博(Manuel Abady Queipo)主教争论说，这些给予他们的所谓"特权"大多数情况是有害而无益：

> 印第安人被限制在一个600平方杆面积的狭小空间里①，根据法律对印第安人城镇的规定，他们没有自己个人财产，被迫在公共土地上劳作……被禁止和其他种族交往，他们被剥夺了从别人

① 一平方杆约为30平方码。——译者注

孩子获得教育和帮助的机会。他们因自己的语言和一个无用、独裁的政府而被隔离起来。

[illegible]出结论，这些表面上的"特殊照顾"是白人阶层用来侵犯印第安人的武器，而从来都不不是保护他们。

然而，土著平民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无差别的贫困、受剥削的社会群体，有一小部分人在新殖民地制度下发现了通往成功道路的职业。[illegible]掌握了手艺和运输，当时需求量很高。工匠们很快以银器匠、瓦匠、木匠等身份进入了西班牙人的职业。史蒂夫·斯特恩谈到，16世纪末的秘鲁，一个独立的印第安人工匠能挣到相当可观的收入：一个石匠可在两个月以内做成一个价值60比索的石轮。一个赶[illegible]可挣130或160比索。一些人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就开始购买土地，[illegible]畜群和其他的商业产品。为保护不被征用（当时官方定期检查公共土地，并把"多余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西班牙人申请者），依据西班牙人的法律，这些农场主需要获得个人的所有权，使土地所有权[illegible]不像公共土地那样被合法地充公没收了。沉重的纳贡额和劳役摊派使得平民难以积累足够的资本，购买土地或经营其他商业，但是，贫民可通过获得一些纳贡义务豁免，可以成功抵制西班牙人的盘剥。除了印第安的酋长和夫人外，得到豁免的人还包括独立的女户主、工匠、市议会的土著人官员以及天主教神父的助手们。

然而，一小部分成功平民为取得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在写到16世纪后期秘鲁的情况时，史蒂夫·斯特恩注意到："印第安人成功的悲剧在于那样有活力、权势和富有的人们接受了西班牙人的风格和关系，也就巩固了殖民地制度的支配地位。土著个体的成功是在一个对印第安人有组织的剥削社会中实现的，受教育的印第安人视西班牙人为上等人，而把安第斯人看作低等人。"

大多数土著人居住在自己的市镇，其中一些是征服前遗留下的，另一些则是由分散人口集中定居而组建的新城镇，称之为"土著村落"（Reduction）或"教会聚集地"（Congration）。为方便西班牙人的控制和

收缴贡品。这些市镇按照半岛模式进行了重新规划。市政厅也是以西班牙国内市镇的设置为模型。墨西哥和秘鲁的土著地方政府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墨西哥，在16世纪中期，市政会逐步取代了征服世袭土著统治者的政府制度；市政会有各自己的议员和法官，其中法官审理较小的案子，而首长负责收缴贡品，并选送劳力给委托监护主。西班牙殖民地法律规定要对这些人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定期选举，但投票通常仅限于男性社会精英的小群体，而且按照法规，候选人要从范围更小的世袭贵族家族之中选拔。对于官员的选择通常由长者聚会讨论、协商，直至最后达成共识。然而，选举的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常常反映了精英内部的宗派分歧。尽管妇女被禁止参与投票和担任公职，但很多时候在她们在争端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何塞法·玛丽亚·弗朗西斯卡(Josefa Maria Francisca)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她是18世纪20年代一个墨西哥城派系的领导人。何塞法通过法庭请求要求免除该城镇土著人应承担的可怕的采矿劳役，作为主要诉讼当事人她已"臭名昭著"；她还被对手们指控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会鼓励人们加入她的永无止境的案件诉讼"。

115 在秘鲁，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总督实施了地方政府的两级行政结构。在土著市政会里，关键人物是市长(一个社区有一或两个市长，取决于社区内家户数量)，他负责一般行政事务，并有两个市议员和其他官员协助。所有这些官员每年都要选举换届，不能连任。这些官员视为西班牙政府的工具，很难在当地社会赢得尊重。据凯伦·斯伯丁(Karen Spalding)所述："西班牙人强加的新权力结构切断了安第斯传统的以年龄和地位继承基础的世袭制度。"托莱多不信任安第斯的传统精英——头人，但又不能免除他们；这些人的地位最后在法律上被定位为省级贵族，其工资以他们社区上交的部分贡品和提供的劳役进行支付。头人在官场上担任着重要职位，并且经常作为以西班牙人行政长官、神父和委托监护主的盟友和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但是，他们要为整个社区的米塔制和贡品义务承担责任，有时使他们陷入必须出售自己财产的险境，或者因地方长官征收，失去了自己的财富。

典型的土著城镇通常由一个或多个近邻或有亲属关系的村社组成，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世袭长老，他们代表本村社处理与外部的争端，并负责婚姻媒人角色，并监督土地在村社成员间的分配；此外，还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平民在一定程度上的西班牙化，最重要的不仅表现在宗教方面，而且还体现为接受了不同的工具和衣食物品。西班牙人打破了各个不同村社之间树立的障碍以及他们互相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并加速了他们之间的彻底文化同化过程。为反抗西班牙人的侵犯和不公正，土著村社内部更加团结，他们不仅为了保护土地，而且也为了捍卫其身份、语言、社会组织和传统歌舞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除了亲属外，维持集体认同和安全最重要的工具便是“教友会”(Cofradia)，其成员负责维持宗教活动。

征服及其后果不仅在物质上给土著人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西班牙人的叙述中经常引用土著长老们对失去以往的严格纪律、牢固的家族关系、高道德标准等方面而悲恸的事例。有位西班牙修士曾引用了一位土著长老对西班牙人来到墨西哥所做的评论：“所有事情开始完全颠倒……撒谎者、作伪证者、通奸者都不再像以前一样受到惩罚，原因是贵族失去了惩罚犯人的权力。印第安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谎言、动乱和不道德女人的原因。”

黑人、穆拉托人和桑博人：社会最底层

黑人、穆拉托人和桑博人(非洲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处于殖民地的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到16世纪末，大约有75 000名非洲奴隶被运往西班牙殖民地。臭名昭著的“中间通道”(非洲黑奴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耶稣会传教士阿隆索·德桑多瓦尔(Alonso de Sandoval)负责奴隶的皈依工作，曾写了一本贩卖黑奴的书，对刚刚运到新格拉纳达卡塔赫纳港口的奴隶，做出了如下令人痛苦的描述：

> 他们到来时，骨瘦如柴；完全赤裸地被带上岸，随后被关闭在一个院子里或围墙内……看到这么多生病和需要帮助的人却又被

剥夺了任何照顾和帮助的机会，真是令人痛心。通常而言，他们被丢下躺在地上，光着身子没有任何遮盖物……我记得曾经看到两个人，已经死了，像动物一样面朝天躺在地上，嘴巴张着，里面全是苍蝇，两只胳膊抱着，好像在做痛苦的挣扎……看到他们死于这样非人道的暴行，我感到非常震惊。

到18世纪末，大约950万奴隶被输往美洲。奴隶高度集中分布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种植园是这里的主导经济。历史学家们曾对拉丁美洲的黑奴制度是相对温和或是严酷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新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么一种观点，即经济活动节奏是对奴隶的剥削程度和种植园主惩罚残酷性的决定因素。毫无疑问，和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殖民地相比，在西班牙美洲，对奴隶有一定的解放。这种结果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在某些情况下奴隶制无利可图了，而不是传统文化导致的结果。不管何种原因，在殖民地时期结束时，奴隶只占了黑人和穆拉托人总人口的一小部分。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奴隶都保持着对自由的渴望。对奴隶反抗的恐惧一直困扰在西班牙统治阶层的心头，并且奴隶经常从主人那里逃跑。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偏僻的热带丛林或高山里组成了自己独立的社区，成功地抵制了西班牙人向他们发起的惩戒性征战。

黑奴们频繁的起义、逃跑和其他形式的反抗都反映了他们对自由不屈不挠的追求，这表明对拉丁美洲黑奴制度是否残酷的争论回避了最主要的问题：即使"最温和"的奴隶制度在本质上也是没有人性的。这些背井离乡的非洲人在暴力下被强行带到这里，与亲人相分离，在新环境中经受着文化消亡(deculturation)的痛苦。考虑到安全问题，奴隶主倾向于购买不同种族来源、语言有别及宗教信仰各异的奴隶，并有意扩大他们之间的种族矛盾。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要求绝大多数进口的奴隶应当较为年轻，大概在15至20岁之间。这也加速了黑人奴隶文化的消亡，因为年老的黑人是非洲社会民间传说和传统的"储存器"，他们鲜有以奴隶的身份来到这里。

因缺乏女性(1716至1822年间，女性占古巴种植园中奴隶人口的比

…9…至1…之间)，奴隶们的生活被扭曲，造成严重的性压抑和家庭不稳定。教会只能坚持奴隶拥有权利享有正派的基督教婚姻和婚姻的神圣性，但直到19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才开始禁止分开买卖奴隶家庭中丈夫、妻子和儿女。奴隶主很难再随便卖出或开除男性奴隶家庭成员以及与女性奴隶发生性关系，如此一来，奴隶也可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种植园体系更像一个监狱，而不是社会，给拉丁美洲留下的是种族主义、歧视和落后，很多问题在大部分国家仍在等待亟解决的答案。

非人的待遇、贫困的生活条件以及缺乏女性都使得奴隶的出生率很低。另一方面，由白人主人和女性奴隶杂婚而出生的穆拉托人却在上升。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为殖民地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但是，他们也被要求纳贡。



这幅16世纪的肖像画是由当地画家安德烈斯·桑切斯(Andres Sanchez Gallque)所画，描绘的是厄瓜多尔某个有身份的黑人统治者唐·弗朗西斯科(Don Francisco de Arobe)。这名统治者于1597年向西班牙军队投降。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当地的反叛活动仍然持续挑战着西班牙人的统治。

城市和大庄园的生活

除了印第安人村社外，西班牙殖民地的社会生活有两个中心：殖民地城市和大庄园。与欧洲不同的是，殖民地城市通常不是自发形成的贸易和工业中心，而是以计划的方式发展，以满足西班牙人定居和对周边

地区管理的需要。有时，一些城市是建立在古时首都的废墟之上，墨西哥城就是这样的例子。更多的时候，城市的选择考虑的是战略或其他方面的优势，如利马城。与西班牙混乱的城市布局相比较，美洲的殖民地城镇通常遵循格子式规划，包括一个巨大的中央广场，其四面建有大教堂、总督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从这个中央广场，延伸出狭长、宽阔、笔直的街道，然后互相交叉形成了统一的矩形街区。对这种一致性的酷爱反映了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作品在建筑方面的影响以及王室对规范管理的热衷。与仔细规划的殖民地核心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著人的街区布局混乱不堪，贫民窟里居住着大量的土著人和梅斯蒂索人。在饥荒或其他困难时期，他们为西班牙人城内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燃料。

矿山、种植园以及周边的畜牧场产生的财富大都流入了首府城市。在这些城市里，矿主和大地产主所住的房子大小和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反映了他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他们以豪华的住宅、陈设、着装和马车，以及众多的仆人和奴隶来展示自己的财富。到16世纪末，墨西哥城已经名声显赫，这里的女性、马匹和街道异常美丽，店铺种类多样，人们的花销毫无节制，娱乐生活丰富，贵族们也是慷慨无比。诗人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Bernardo de Balbuena)，在《伟大的墨西哥城》这首长诗里写道：

每个家族都慷慨地给予
没有人在乎代价多大
珍珠、金、银和丝绸
.

到17世纪末，据估计，墨西哥城的人口达到了20万人。

利马，建于1534年，秘鲁总督引以为豪的首府；波托西，秘鲁的矿业中心，它的财富成为了传奇。这是殖民地的另外两个主要城市。到1650年，它的财富开始下降时，波托西的居住人口达到了16万，成为南美的最大城市。

[illegible]、[illegible]管政府更替和风俗习惯能够带来一定的稳定，但[illegible]，西班牙不同派别之间的决斗、暗杀，甚至[illegible]史记和私人日记中被提到。在令人感到恐怖的[illegible]大人会发生暴乱。1624年，因人饥荒和投机[illegible]教会，墨西哥城发生了骚乱，出现了“邪[illegible]“教会万岁”的口号。他们到处破坏和抢劫财物来发泄[illegible]。1692年，类似的情景也引发了更大的暴乱，结果造成很[illegible]、总督的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被毁坏。

[illegible]了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另一中心。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大[illegible]、劳动制度及其他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由于经济[illegible]、产品和所有权也会发生变化，大庄园有时会[illegible]个[illegible]之亦然。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总体趋势是土地所有权[illegible]数人手中，通常是以牺牲小农场主为代价。然而，由于[illegible]多形态特性，下面对它社会生活的描述可能被认[illegible]“传统”[illegible]园，主要分布于墨西哥和秘鲁的特定地区，而不是任何地方都有这种庄园。

[illegible]大庄园主[illegible]常住在乡里[illegible]，因为他们无力应对城市生活的[illegible]，或者因他们的地产位于偏远的省份或边远地区。到17世纪末，许多地区的大庄园基本上变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拥有可耕土地、[illegible]牧场、提供燃料和建材材料的林地，甚至还有制造和修理庄园设备的作坊。庄园通常还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位，里面有教堂、商店和监狱。教堂由庄园的牧师照管，工人使用工资从店铺里购买物品，监狱里关押着不服从的苦工。在大庄园主宽敞、陈设豪华的大房子里，居住的不仅是他的直系亲属，还有许多需要他保护和供养的亲戚。

大庄园里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土著村庄，他们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现在却以农奴的身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他们居住在用泥砖砌成的只有一居室的房间或茅草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些睡觉的草垫、磨玉米的石头（在新西班牙被称为磨盘）。他们不像那些独立的土著村社继续以造反或旷日持久的诉讼等形式抵制大地产主的侵犯，这些常驻雇农

通常学会了对他们的主人进行适当的反抗。具有经济和社会组织特征的大庄园最真实地体现了殖民地社会封建性的一面。

婚姻、性行为和女性的地位

精英社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男性占主导地位，表现为父亲有安排女儿婚姻的习俗权利和财产继承上的双重标准，责令妻子和女儿严格遵守贞操，而对丈夫和儿子则没有相应的约束。宗教道德的守护者——教会，关心婚姻的政治和经济后果的政府，都想要对其实施监督和控制。在整个16和17世纪，教会倾向于支持子女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但又承认父母在这件事上的发言权。然而，在18世纪中后期，由于财产利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政府和教会均改变立场，支持父母反对不“门当户对”的婚姻，以保护家族“荣誉”。尽管1778年王室法令只认可父母反对跨种族的“不平等”婚姻，但殖民地检审庭清楚地解释认为，富裕的穆拉托家庭与富有的白人家庭是平等的。帕特里西亚·西德(Patricia Seed)写道：“对一个穆拉托人或穆拉托人的后代来说，只要他是穷人，他就不会和西班牙人是平等的。这种趋势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种族不平等，而是经济不平等和种族不平等固定在一起了，才造成了惊人的社会不平等。”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在精英上层，因为他们选择婚姻伴侣的标准几乎是一成不变地以保持或增加他们贵族家庭的财富为目标。

同时，女性的贞操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当一个年轻女子因婚前性行为而失去“贞操”，并且要求通过结婚或其他赔偿来恢复荣誉时，教会倾向于坚持男性应承担责任，要求他与女性结婚，或对她的损失作出补偿。然而，到了18世纪中期，贵族家庭的父母们认为，女孩婚前性行为会使她“不平等”，而不是“他”，因而也就对婚姻造成了障碍，而男孩则不然。帕特里西亚·西德指出：“与性别有关的贞操新观念设置了一项复杂的双重标准，即允许年轻男性可以夺走年轻女性的贞操，而不损害他们自身的名声或家庭，但同时对女性同样的行为又倍加谴责。”

尽管西班牙有关贞操的法令强调了贞洁和婚姻忠诚，但包括上层社会在内的许多殖民地女性漠视传统道德和教会守则，有婚前性行为是普遍现象。在订婚情侣中，发生性关系也非常普遍。婚外生子的上层社会女性有很多办法掩盖这种失矜行为，并使这些子女合法化。很多社会民众[illegible]少手段，甚至可能不愿恢复失去的“贞操”。在17、18世纪，私生现象在殖民地域内无处不在。私生，意味着耻辱，对谋求社会地位构成了障碍，难以在教会、军队和政府中获得更高职位。不过，对个人富裕的财产以及有机会接受教育都减轻，甚至消除了私生造成的污名。例如，史学家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以是西班牙贵族征服者的亲生子为荣；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发现自己是非婚生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在文学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在奴隶制与种植园地区，如委内瑞拉，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实际性行为与官方的贞操法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地方大规模的奴隶制普遍存在，且有强大权力的大地产主往往忽视法律和习俗对性行为的约束作用。1770年，委内瑞拉主教马蒂(Martí)在主管教区做了一次巡视。为了解教民的道德健康状况，他邀请了他走访过的每一个村镇的人，让他们私下里诉说关于他们及其邻居的罪行。马蒂这些详细的记录报告以及他自己的评价和判断都反映了当时性行为的泛滥。凯西·沃尔德伦(Kathy Waldron)写道：“1 500多人被指控，主要原因是不当性行为”，“省内近乎十分之一教职人员遭到指责，甚至马拉开波政府也受到了谴责。这些指控包括通奸、私通、纳妾、乱伦、强奸、重婚、卖淫、淫乐、同性恋、兽奸、堕胎和杀婴”。

殖民地的女性在经济、社会和身体上从属于男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男性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班牙财产法的限制，法律要求财产应在继承人之间平均分配，而妇女在婚姻期间和婚后有权管理自己的嫁妆和所继承的财产。一些殖民地女性还开办了独立于她们丈夫的商业；女性通常是丈夫遗嘱的指定执行人，并且在其丈夫去世后接管他的生意。该研究领域的两个专家阿桑奇·拉弗林(Asunción Lavrín)和艾迪斯·考图里耶(Edith Counturier)得出结论，

殖民地女性比人们想象的要享有更多的经济独立。"但是……，但这不是全部现实，女性的表达能力并没有这个改变。"

对精英和社会上层女性而言，修女生活是她们进行自我表达和免于男性主导和性别角色的一种特殊重要的方式。上层家庭将一个或多个女儿送进女修道院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17世纪，利马的13个女修道院接纳了该城市20%的女性。女修道院是自我管理的机构，为女性在管理、理财中展现各种能力提供了机会，有时修道院也成了为获得控制权而进行派系斗争的场所。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在他为伟大的女诗人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写的传记中提到，



一些天赋极高的女孩子，如伊莎贝尔·弗洛雷斯·德奥利瓦(Isabel Flores de Oliva)，在修道院中找到了在艺术和思想上独立的可能。她后来被称为利马圣玫瑰(Saint Rose of Lima)，是美洲第一位女圣徒

“女修道院的政治生活经历了叛乱、争端、阴谋、结盟和报复。”修女们频[illegible]教[illegible]抱怨女修道院院长的苛政，而且有时会发生不为人知的暴力。女修道院也是繁忙社会生活的一个写照；修女们揭开面纱接见来访者，尽管规定有外人在场时，她们不准露出面庞，当见面由木头栅[illegible]开时，这个规定就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帕斯还写道：“这些修女[illegible]在精美[illegible]艺术品方面非常卓越，但在折磨她们自己及其姐妹[illegible]面同样也毫不[illegible]。”帕斯想知道，胡安娜修女作为对17世纪欧[illegible]义[illegible]有着透彻认识的知识分子，她是如何在鞭笞和神秘主义[illegible]保持[illegible]的。她在给普埃布拉主教的一封信中，承认修道院[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与我性情相抵触的很多义务”，她还指出“修道院的[illegible]”剥夺了“我书中的宁静”。以某种方式，她成功地在自己的才能和[illegible]和[illegible]之[illegible]保持了距离，这种做法不是她的天性，但她自我控制的压力也会偶尔爆发。帕斯讲述了一位来自上层社会母亲的故事，她向胡[illegible]的大主教控告胡安娜修女傲慢，并指责她言语粗鲁：“安静，母亲，你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大主教是胡安娜修女的朋友，他在诉讼书的空白处写道：“与此相反，我将作出判决。”

尽管有这些缺点，修道院对向胡安娜这样的年轻女性而言仍意味着非常难得的[illegible]机会，她们家庭出身一般，也没有独特的宗教倾向。她才华横溢，使她难以找到合适的婚姻伴侣，且无论如何，她也没有足够的嫁妆来吸引一个这样的男人。然而，修道院为她提供了逃脱性剥削[illegible]的机会，使她能够培养自己的才能。路易斯·马丁对殖民地秘鲁的西班牙女性所做的一项最新研究，将秘鲁女修道院形容为“一座女性的堡垒，一个真正的女人岛，在这里，女人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腐蚀和非人性化势力的迫害”。但要适当地指出：马丁的书针对的是绝大多数上层社会的西班牙女性，她们蔑视，甚至有时虐待身边的奴隶和仆人们。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土著人女性的生活正在慢慢被人所知。有事实表明，尽管有西班牙家长式社会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土著人妇女并没有成为消极的牺牲品。她们作为商品的生产商和贸易者，有着重要的经

济地位，她们也有自己的财产，使用各种策略，从动员家族到使用巫术，起诉或反抗男人们的虐待。她们在有组织地反抗西班牙威胁她们的公共利益的举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威廉·泰勒对墨西哥殖民地142起叛乱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女性所起的作用。他写道："至少在四分之一的案例中，女性明显地表现出更有进攻性、侮辱性和反叛性。"

第六章 殖民地巴西

焦点问题：

- 葡萄牙的殖民制度有哪些主要特征？与西班牙的殖民制度相比，又有何不同之处？
- 跨大西洋市场、国外竞争及葡萄牙对土著居民的政策是如何影响大种植园的经济、社会组织的？
- 在殖民地时期的巴西，黑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 大地产主和殖民地高官、教堂权贵及富有商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确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①为两国海外势力的分界线，这就把南美洲大 122
片广阔的海岸线划归为葡萄牙人的探险和定居地区。而此时，巴西的存在还不为欧洲人所知。1500年，为跟随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辟印度的伟大航程，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与一支大型舰队也起航了。根据一种说法，因风暴影

① 约合1770公里或1100英里。——编者注

响，他偏离了原来计划的航线，向西航行了很远，并于4月22日在巴西海岸登陆。一些历史学家推测，他是故意改变航线，是为了调查有关向西方存在着土地的传闻，或者为了让其队员们发现。不管他向西航行的原因是什么，卡布拉尔宣称占有这片土地为他的国家所有，并派一艘船返航，向国王汇报这一发现。

巴西殖民地的开始

葡萄牙有限的资源全都投入到对非洲和远东的贸易开拓中，已无法对巴西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但是，葡萄牙并没有完全忽视巴西，有一支王室考察探险队发现了一种珍贵、称之为巴西红木的染料木材，它们大量地生长于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和圣保罗(Sao Paolo)之间的海岸上。商人资本家很快获得从事巴西红木贸易的特许权，并建立了一些零散分布的贸易栈点。在这些地方，用欧洲的小装饰物及其他商品可以与当地人交换巴西木材和各种有异国情调的商品。于是，小规模的定居者开始出现了，一些是乘船遇难而被抛弃的人，还有一些是被驱逐出葡萄牙帝国的犯人们。这些流放者多数被当地人接纳了，并繁衍了大量的混血后代，这些人对于葡萄牙的殖民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法国人的商船也被巴西红木所吸引，出现在巴西海岸。这些闯入者引起了葡萄牙的警惕，国王若昂三世(King Joao)在1530年派遣一支由马蒂姆·阿丰索·德索萨(Martim Affonso de Sousa)带领的探险队赶走了入侵者，并在巴西建立了永久定居点。1532年，巴西在现今的桑托斯(Santos)港口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名为圣维森特(Sao Vicente)的葡萄牙城镇。

都督辖区制度

葡萄牙王室资源有限，加之在香料丰富的东方所承担的沉重义务，迫使国王把对巴西殖民化的主要责任分配给了私人个体。这种责任采用了为都督辖区制度(captaincy system[①])，该制度已在马德拉群岛、亚

① 又译为"将军辖区制度"。——译者注

[illegible]方使用。巴西海岸线被分成15条平行的条[illegible]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的不确定边界线[illegible]为世袭的辖区分配给12个人，每个人都答应自[illegible]保护各自的辖区。都督辖区制度表现了[illegible]因素的混合。接受封地的人或受赠者不仅是[illegible]而且还是一个商人，企图从自己的领地中获得大量



殖民地时期的巴西

利益，并通过出卖土地从殖民者那里获得税收。这种封建制度和商业元素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刻画了葡萄牙殖民事业在巴西的特点。

不管是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没有都督辖区被证明是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哪个被授封地的人同时具备投资的资本和相应的行政管理能力，能够吸引定居者，并且保护他们的辖区不受土著人袭击和外国人的入侵。其中最成功的一位是杜阿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他曾是一名西印度公司有经验的老手，获得了伯南布哥都督辖区。他在殖民地的大量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到1577年，他的儿子成为巴西最富有的人，从50个糖厂里征收了中央免役税（替代支付封建劳役的一种租金费用），并每年出口50多艘船的糖。

到16世纪中期，糖取代了巴西红木，成为巴西经济的基础。受益于当地的土壤和气候，东北区域（伯南布哥州和巴伊亚州）发展为甘蔗文明的中心，具有三个特征：大种植园、单一作物经营和奴隶劳动力。那里很快涌现出一个大地主阶级，广阔的种植园和甘蔗厂把他们与远不够富裕的邻居们区别开来。只有最大的农场主才能建得起榨甘蔗加工厂，小农场主必须把他们的甘蔗拿到这些工厂去压榨，为此要支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成。因为欧洲对糖的需求似乎难以满足，所以生产糖能够快速带来巨大利润，故而种植园主们也就没有动力推广农作物的多样化，而食品农业基本上局限于小农场来生产。

尽管制糖业的基本技术从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几乎保持不变，但巴西制糖业获得的传统和落后的名声看起来并不公正。17世纪，巴西制度被认为是模范，其他国家企图效仿。直到18世纪中期时，当巴西糖的需求和价格下降并造成危机，并且巴西的竞争对手加勒比国家也发展了新的制糖技术时，巴西的那种落后性才出现。甚至后来，历史学家斯图尔特·施瓦茨(Stuart Schwarts)也说："这种指责是不应当的。"

葡萄牙的土著人政策

劳动力问题首次得到解决是袭击当地的村社，袭击者带回了大批俘虏，并卖给农场主和其他需要劳动力的雇主们。这些挑衅行为是造



有混血背景的士兵，如这个穆拉托人士兵，在深入巴西内陆探险、寻找黄金、土著奴隶和逃跑的黑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了土著人和葡萄牙人之间长期战事不断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劳动力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土著人缺乏种植园农业所需要的有组织性的劳动传统，尤其容易受到旧世界疾病的传染，他们对那些疾病缺乏相应的免疫力；同时，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抵抗，从试图逃跑到自杀（从最后一点来看，当然，他们的反应和后来逐步取代他们的非洲奴隶没有太大区别）

结果是 1550 年之后，大种植园主开始大量使用从非洲进口的黑奴。然而，由于荷兰海盗和其他外国人的活动，黑奴的供给经常被切断，或剧烈减少；巴西的奴隶猎手们在整个殖民时期不断地为自己的“商品”寻找市场。最著名的奴隶“猎手”是来自圣保罗高地定居点的“捕奴队”（来自葡语 bandeira，意思是“旗帜”或“武装团队”）。无法在

制精非功与占据优势者作战[illegible]，这些人[illegible]斯普索人，在内陆主要占领区内掠夺奴隶。在拿起武器的同时，[illegible]自很的永恒信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抵抗[illegible]，或在入侵者到来之前逃离，"捕奴队"深入到[illegible]中，慢慢地扩大了巴西的边境。

尽管没有斗争，巴西土著并不接受丧失土地和自由的事实，但是，他们的抵抗严重地被部落之间致命的相互斗争削弱了，而这一状况恰好被葡萄牙人加以利用。葡萄牙人的先进武器和组织[illegible]内陆，而他们经常对孤立的葡萄牙人村社进行袭击[illegible]世纪初，巴西海岸的延伸地区还由于这类持续不断的战争[illegible]。

但是，像西班牙殖民地一样，这种不公平的战争最终还是在这里结束了，以土著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过度劳累、失去自由的[illegible]、欧洲疾病的肆虐，造成沦为奴隶的土著人大量死亡。对抵制奴役的人或寻找其他借口而实施的惩罚性远征，也造成了人口减少。[illegible]安东尼奥·埃维拉(Antônio Vieira)对残暴的葡萄牙人的谴责[illegible]想起拉斯卡萨斯对西班牙的控诉，他声称葡萄牙人10年中对土著人的虐待在亚马孙地区造成200多万人死亡。[illegible]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鲍克瑟(Charles R. Boxer)认为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他承认葡萄牙人"经常用非常野蛮的方式灭绝整个部落"。

唯一发出反对奴役和虐待土著人的声音是那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了。最初的传教士们由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Manel da Nobrega)带领，跟随托梅·德索萨(Tome de Sousa)将军于1549年到达这里。4年后，另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若泽·德安谢塔(Jose de Anchieta)到达巴西。远至南部的皮拉蒂宁加(Piratininga)平原，诺布雷加和安谢塔为葡萄牙人、混血儿和土著人儿童建造了学校，并成为这类机构的典范。围绕这个定居点，逐渐形成了圣保罗城镇，此处是"探险家寻找黄金，而传教士寻找灵魂"通往内陆的重要的起点。

耶稣会制定了一个计划，把皈依的土著人安置在村社中(aldeias)，他们生活在这里由牧师保护，完全隔绝于葡萄牙殖民者的伤害性影响。

这个计划激起了很多奴隶"猎手"和大地产主的抵制，他们考虑的是另外的目标。在一场对负责殖民地宗教事务的王室"道德宗教委员会"（Mesa da Consciencia e Ordens）的愤怒抗议中，大庄园主企图扭转局势，宣称在耶稣会村舍里居住的人是"真正的奴隶，不仅是作为学校的劳动力，而且也是所谓西印度大陆的劳动力，最终还会变成耶稣会神父们的大庄园和糖厂的劳动力"。

在17世纪中期，大庄园主、奴隶猎手和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益冲突达到了顶峰。就圣保罗地区而言，捕奴队的活动最为激烈。在巴西的大部分地区，大庄园主用武力发起叛乱，驱逐耶稣会，公然反抗王室宣布的解放土著人法令。1653年，安东尼奥·埃维拉，这位拥有出色演说才华和文笔的神父到达巴西，带着国王的全权授权，用他认为合适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在大斋期，埃维拉为马拉尼昂人（Maranhão）人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布道，他谴责对土著人的奴役，他的措辞堪比1511年蒙特西诺斯在圣多明各的演说。但是，他强烈的批评却被他的建议削弱了，因为他希望奴隶制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耶稣会团体中本身就有土著奴隶和黑奴。当然，毋庸置疑，在耶稣会传教区村舍生活的土著人的条件要比生活在葡萄牙人城镇和庄园里的奴隶要好得多。一个更为强硬的反对耶稣会的争论是隔离制度，尽管它原本是善意的，但却表现出了把不相容文化模式独断，机械地强加给了土著人，它阻碍而不是促进了真正的社会融合。

尽管王室总是同情耶稣会的立场，但迫于大庄园主阶级的压力，在近两个世纪中一直采取一种妥协的政策，使耶稣会和大庄园主都不满意。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在逢巴尔（Pombal）侯爵内阁（1750－1777）改革期间到来了，他把耶稣会驱逐出了葡萄牙和巴西，并使传教活动世俗化了。他禁止奴役的立法接受了耶稣会关于土著人的权利的观点，同时还接受了帮助土著人过上文明生活的必要性的思想；他甚至接受了这样的偏见：即把土著人集中在由行政官员管理的社区内，并对他们的教育和福利负责。但是，他的政策没有把土著人和葡萄牙人社区分离开来，而是使土著人成为殖民者能雇佣的有薪劳工，实际上，这促进

了两个种族的联系和交融，包括跨族婚姻。同时，受蓬巴尔的支持，非洲奴隶贸易的增加减少了对土著劳动力的需求。尽管蓬巴尔的立法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土著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值得商榷的，但对同化殖民地人口，直至最终形成巴西这一整体国家，具有极大贡献。这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种族融合，该过程在耶稣会士失去权力之后不断加快。

法国和荷兰的挑战

巴西的染料木、糖和烟草很早以前就对外国势力很有吸引力。法国人首先向葡萄牙在殖民地的控制权提出挑战。在土著人联盟的帮助下，他们通过断断续续的努力，在沿海建立据点，并于1555年建立了里约热内卢，作为他们称之为"南极法国"(Antarctic France)的首都。法国人同土著人交往产生的一个文化副产品是为他们创立了一个"高贵的野蛮人"法国式形象，并在16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的随笔《论食人族》中成为永恒。但是，法国对巴西的侵犯被国内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Catholic-Huguenot)之间的斗争所削弱。1567年，葡萄牙指挥官麦姆·德圣(Mem de Sao)把法国人驱逐了出去，占领了里约热内卢的定居点。

荷兰人对葡萄牙在巴西的主权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他们的西印度公司争取和占领了巴西海岸糖种植业最富饶的地区近四分之一世纪(1637－1654)。在荷兰莫里斯王子(Prince Maurice)执政时期(1637－1644)，荷兰在巴西的首府累西菲(Recife)成为杰出的科学和艺术活动中心。起初，葡萄牙对荷兰的斗争是联合巴西各地的所有种族，已获得独立。这些混杂的力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瓜拉拉佩斯(Guararapes)战役(1648－1649)中战胜了荷兰。受到巴西的顽强抵抗，以及同时与英格兰发生战争，荷兰于1654年撤离了伯南布哥。但是，他们也带走了所学会的制糖和烟草的生产经验，并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了重建。不久，在巴巴多斯和其他加勒比岛屿上的大种植园和糖厂，同巴西的制糖业在世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价格下跌

了，17 世纪最后 10 年，巴西的糖业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期。

矿业周期、畜牧业和商业制度

在这段经济低迷期，1695 年在西南部，即现在的米纳斯吉拉斯，发现黄金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沿海地区。这一发现开启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使内陆建立了第一个有效的定居点，巴西的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开始由东北方向南方转移。大批来自巴伊亚、伯南布哥和里约热内卢的殖民者们，带着他们的奴隶和仆人，涌向了矿区。他们大规模地从原来的地方迁移出来，导致农业劳动力急剧短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淘金热"进入了一个发展繁荣的 18 世纪中期。王室试图通过立法或制定政策来限制人口迁移，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在 20 年(1700 — 1720)里，王室在矿区内行使其权威和收取五一税从来没有成功过。敌对群体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尤其是来自圣保罗的开拓者们和出生在欧洲的新来者之间的冲突更是暴力频发，最终于 1708 年达到了爆发内战的程度。这些斗争的结果导致双方实力都被削弱，最终使王室能够重新恢复秩序。

1710 年，一个新的名叫"圣保罗和金矿"的都督辖区建立了；1720 年，它被拆分为"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1729 年，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石头，以前都被认为是水晶，而实际上却是钻石，这是一个令人疯狂的惊喜发现；很多探险家又带着奴隶，从淘金转向了钻石热潮。使得欧洲的钻石大量增加打乱了市场，造成价格大幅下跌。最终，葡萄牙政府制定了对"钻石生产区"进行严格控制的制度，限制开采，防止走私，以维持钻石价格。这个制度实质上把"钻石生产区"与外部世界隔离开了。

像糖业生产一样，矿业周期的特征是，随着新资源财富迅速和粗放地被开采，紧接着的却是急剧衰退。矿业收入大约在 1760 年到达顶峰，从那以后，米纳斯吉拉斯河床上的金矿和"钻石生产区"的矿藏量逐渐出现了枯竭。至 1809 年，英国旅行家约翰·马威(John Mawe)把维拉利卡(Villa Rica)金矿中心描绘成"几乎没有留下丝毫曾经辉煌踪迹的小镇"。

然而，矿业周期给巴西留下了永恒的烙印。在内陆地区，形成了新的定居点中心，不只是在米纳斯吉拉斯，而且扩展到了后来成为巴西西部的戈亚斯(Goias)和马托格罗索(Matto Grosso)省，这些地方都是淘金先驱们所开拓的。即使矿营被废弃了，但城镇却能保留下来，尽管失去了活力。矿业的下降也刺激了这个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经济和政治重心由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向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的转移最终于1763年被正式承认，当时里约热内卢成为总督区的首府。

当米纳斯吉拉斯和戈亚斯省逐渐衰退时，由于欧洲对糖、棉花和其他热带产品需求的增加，东北部地区经历了局部复苏。1750至1800年间，巴西的棉花产量大幅增长，但因来自美国更有效率的棉花种植者的竞争，产量又很快下降了。咖啡产业的兴起，作为巴西未来经济的支柱，也同样始于殖民地末期。

养牛业也对巴西的边疆扩大和内部地区的重要性作出了贡献。沿海的集约性农业和诸如巴伊亚及米纳斯吉拉斯这些沿海城市的人口集中，创造了对新鲜肉类的需求，刺激了养牛业的最初发展。由于大种植园农业在沿海地区没有为放牧留下足够的土地，养牛业必然不可避免地向内陆发展。

17世纪下半叶，人们的活动已从巴伊亚和米纳斯吉拉斯深入至遥远的圣弗朗西斯科峡谷(Sao Francisco Valley)。强势的牧场主，带着他们的牛群、牛仔和奴隶进入偏远地区，驱赶土著人，建立了有防御工事的牧场，同时，还为仆人修建了村庄。在官方向牧场主赠予了这些实际上是封建领地的大片土地的前后，上述的占领已经被合法化了，对养牛大亨而言，在他们的地产里，他们的话简直就是法律。大牧场主向沿海城市和矿区提供牛肉，向大种植园主提供畜力，皮革则向欧洲出口。

畜牧业后来扩展到最南端的南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 do Sul)地区，这个地方的殖民政府是考虑到抵御西班牙扩张而专门设计的。这里大片的土地被分配出去。在南部与牛仔(vaqueiro)对应的是加乌乔人(gaucho)。和牛仔一样，加乌乔人是专业的牧马人，但在他们的语言

中表现出[illegible]拉塔地区的混合文化，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当地方言的混合[illegible]；他们的穿着是阿根廷牛仔宽松肥大的裤子；他们的主要工具是一根[illegible]子系着的石头球，该物品是被潘帕斯草原土著人用来套住和击倒动物的。

[illegible]一样，葡萄牙追求重商主义的商业政策，尽管不能始终如一，也不[illegible]；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580至1610年间，出现过松散的[illegible]。这一时期，巴西的贸易非严格地仅限于葡萄牙的国民和船只。荷兰人，作为[illegible]糖和烟草输往欧洲的主要承运者，对这种限制给予了[illegible]，进行[illegible]，直接进攻巴西最富饶的糖种植地区。

在葡萄牙[illegible]家走向[illegible]之后，与英格兰结盟，于1703年签署了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根据该条约，英国商人被允许在葡萄牙和巴西[illegible]从事贸易。但是，英国船只经常忽视履行在里斯本的手续，直接与殖民地定期进行走私贸易。因为葡萄牙的工业不能满足殖民地在数量和质量上所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驶往巴西的[illegible]货船载运的都是外国的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其中英格兰的货物占据了最大份额。[illegible]，巴西的主人葡萄牙，自身变成了荷兰和英国商人的殖民地，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里斯本。

18世纪，在唐·何塞一世（Dom Jose Ⅰ）执政时期（1750－1777），他的总理大臣蓬巴尔侯爵是一位有能力、思想开明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葡萄牙帝国开展了行政和经济改革，可与当时在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进行的波旁王朝改革相提并论。蓬巴尔的方案是通过建立拥有足够资本、能与英国商人竞争的葡萄牙商人阶层，且发展民族产业，能够把英国的产品排挤出巴西市场，并以此对葡萄牙和巴西之间的贸易实施国有化。这项计划需要国家积极干预，在帝国经济中设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对在葡萄牙和巴西的商业金融家以利润丰厚的特许经营给予补贴；建立公司，被授权垄断与巴西特定地区的贸易，以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家对新、旧产业的扶持，建立进口替代的政策制度。尽管犯过错误、遭受过失败，以及1777年蓬巴尔被迫辞职后出现过局部的倒退，但蓬巴尔改革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为葡萄牙收复了巴西市

场。1796至1802年间，运往巴西的3/4的商品都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尤其是棉布。但是，1808年因拿破仑的入侵，葡萄牙王室从里斯本逃往巴西，两年后同英格兰签订条约，给予英帝国要求的所有贸易特权，实际上也就"惨痛地拆毁了自1750年建立起的脆弱的保护性建筑"。英帝国再一次享受到了对巴西的真正贸易垄断。

政府和教会

葡萄牙王室在巴西首先建立的政府辖区制度很快就已经令人失望了。在受赠者的个人权力和君主的权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鲜有受赠人能解决他应负责的防卫和殖民问题。结果就是政府改革。1549年，托梅·德索萨以总督的身份被派往巴西，创建一个中央殖民地行政机构。位于伯南布哥和圣维森特这两个繁荣定居点之间的巴伊亚，成为了他的首府。随着国王委派的官员代替受赠者，这些人的世袭权力和特权也就被逐渐取消了。随着殖民地扩张，也设立了其他的都督辖区。1763年，像前面提到的，里约热内卢的都督取代了他在巴伊亚
129 的同事，并以总督的头衔成为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领导。实际上，与其他都督相比，他并没有什么特权。

管理者们和他们的缺陷

葡萄牙的巴西政府和西班牙的殖民政府在精神、结构和缺陷上具有广泛的相似性。然而，明显的区别就是葡萄牙的行政管理机构规模要小得多。两个帝国的经济差异可解释这种差异。西班牙的西印度有着相对多样的经济，不仅能够供应当地和整个地区，而且还能满足海外市场和大量土著人的需求。1600年，加上30万西班牙人（当时巴西只有3万葡萄牙人居住），上述条件创造了成百上千城镇的崛起并创造了需要大量官员负责管理劳动力、收取贡品及其他财政和行政管理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葡萄牙美洲，以下几个因素使得精心设计的官僚体系显得没有必要：出口，特别是糖具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但在里斯本卸货时，应交纳税收；大种植园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却阻碍了城

济的发展；土著人作为劳动力和王室收入来源的作用不大。

在与西班牙结盟期间，葡萄牙1604年成立了西印度委员会(Conselho da India)，其职能同西班牙的西印度委员会类似，两国在殖民政策上保持了合作。1736年，这个委员会的职能被新成立的海外委员会所取代。在国王领导之下，该机构制定巴西的法律、任命官员，并监督他们的行为。首长、都督或总督集军事、行政，甚至司法权力于一身。他们似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也受制于一些因素：母国政府持续不断地干预，以其广泛、严格和详细的命令对他们构成了束缚；其他权威部门的介入，尤其是检审庭同时兼具了行政和司法功能；还存在一些特殊的行政机构，比如在金矿和钻石矿区设置的监督官，他们完全独立于总督。与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一样，在巴西运行的监管和制衡行政系统是通过政府职能的重复设置和官员们的相互监督来实现的，这个制度反映了母国政府对其代理人的不信任。其他削弱总督权力的因素包括地域辐员辽阔、人口分散、社会不稳定、土地集中度高，大种植园主和牧场主拥有的封建权力实际上难以撼动。

市政府最重要的机构是市政议会(Senado da Câmara)。该机构的组成与城镇规模大小不同而各异。不管选民是否仅限于财产拥有者，还是由国王来选择，它的成员都代表了由商人、大种植园主和特定职业人士构成的统治阶级。选举的特征经常表现为敌对的派系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大庄园主和克里奥尔人为一方，另一方则是商人和半岛人。市政议会的权力扩展到它管辖的整个地区，通常地域异常广阔。但是，它的权力经常受到王室法官(ouvidor)的干预。总的来说，城市的规模越大，财富越多，且距离总督的首府越远，它的权力也就越大。

王室和市政议会都征收了大量的税收，而征缴通常被分配给了个人。这些人为王室收税，作为回报，除了向国库上缴固定数额外，只要能满足规定的收入额，他们就可以留下剩余的税收。当然，这个制度助长了各种各样的欺骗和敲诈。另外一个严重的负担是什一税，税率高达10%，最初以实物支付，后来只能使用现金。巴西历史学家卡伊奥·普拉多·真尼奥尔(Caio Prado Junior)认为，什一税"同征兵齐头

开道，是殖民地政府中人们抱[illegible]的最大[illegible]之一。”

西班牙殖民行政机构的缓慢[illegible]低效[illegible]拖拉和贪污和重难返——在葡萄牙的殖民体系中也是如此[illegible]不仅文书冗长，而且让人难以置信地拖拉和复杂[illegible]提交到检察官、最后直至王室申诉委员会，至少要花费1至1[illegible]个月[illegible]

然而，殖民地区域广大，官员行政权力[illegible]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除了个别的大城镇，当地政府[illegible]他们对政府部门施加个人影响，因为主要的地方官员总是从他们中间产生[illegible]司令(capitae mor)[illegible]民兵司令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包括征兵、命令、逮捕和惩罚，它成为专制和压迫的象征。有时候，这些人使用民兵作为发动封建战争的工具，持有武器的家族之间的纷争[illegible]经常以决斗的方式解决，或两个家族的仆人们进行决战。

腐败从上到下都渗透到了政府机构中[illegible]以多种方式出卖他们的权力：挪用公款、贪污、受贿几乎普遍存在。在极具能力、精力充沛的蓬巴尔侯爵的支持下，至少在更高级的机构中，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时期，波旁王朝的殖民政策特征是集权化，葡萄牙的政策同样也出现了这一趋势。蓬巴尔废除了依然存在的世袭都督辖区，限制市政当局特权，同时加强了总督的权力。

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蓬巴尔改革是为了促进巴西的经济发展，以实现葡萄牙的重建，当时葡萄牙的状况确实较为悲观。这些开明总督的典型代表是拉瓦拉迪奥(Lavradio)侯爵(1769—1779)，他的成就包括把咖啡从帕拉移植到圣保罗，使其在这片肥沃的红土地上生长得异常繁茂。然而，蓬巴尔改革对于巴西行政机构的影响甚小，在拉瓦拉迪奥给继任者的信中曾提到过，他忧郁地观察到：

> 由于这些法官的薪酬很少……他们试图利用诉讼和煽动纷争扩大收入；这不仅让人们不得安宁，而且还使他们承担沉重的费用；他们的行为与自己的职业背道而驰，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和部下的卑劣私利。这些人是动乱的主要策划者。

这位总督声言，在巴西执政的12年中，他从来没有发现这些法官做过一件有用的事。

教会和国家

像在西班牙殖民地一样，在巴西，教会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与西班牙的君主们相比，葡萄牙的国王们似乎对教会疏于管理。他们通过保教权(padroado)控制教会事务，教皇授予了葡萄牙国王在其王国内和海外领地中拥有教职任命权。国王通过一个专门的道德宗教协会(Mesa da Consciência e Ordens)实施权力。但是，罗马通过耶稣会的神父们仍然保持着强健的间接影响。耶稣会在葡萄牙法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直到1759年被驱逐出葡萄牙和巴西才结束。

除了个别令人尊敬的案例外，耶稣会神职人员在巴西卑劣的道德行为引人非议。因为勒索费用以及在神职岗位上表现的粗心大意，教士们经常受到指责。有时，他们把神职工作和世俗活动混淆在一起。其中很多人是大庄园主，其他人则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一位高级官员总结了他对牧师的印象："他们想要的一切就是钱，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好名声。"

然而，教会和教士们还是为巴西殖民地的生活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传教士们在殖民地建立了教育和人道主义场所。尽管存在特别的教规要求，这些地方还是向那些有才华的人开放的，甚至招收混血儿。从它们的各级机构中，殖民地巴西出现了很多科学、学问和文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在他们中间，耶稣会作家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缺乏大学和印刷出版机构，巴西殖民地的文化贫瘠还是暴露出来了。

主人和奴隶

种族融合在巴西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殖民地缺乏葡萄牙妇女，清教徒式生活态度的缺失，大庄园主对土著人女性和黑奴妇女的暴虐，都促进了不同种族间的通婚。三种可能的种族结合是：白人和黑人、白人和土著、土著和黑人，其中第一种情况最为常见。这

种结合大多数都是在婚外进行的。1755年，庞巴尔侯爵，为增加人口和加强巴西的秩序，颁布了一道命令，鼓励葡萄牙男性和土著女性通婚，宣称他们的后代有资格享有荣誉和尊贵的地位。然而，这种恩惠并没有扩展到其他族际间。

肤色、阶级和奴隶制

一般而言，种族的肤色界线被严格地划分出来。例如，一个"纯种"的白人妻子或丈夫，是上层阶级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婚姻之外大量的跨种族结合产生了庞大的后代群体，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得到了葡萄牙父亲的慈爱和相应的教育及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肤色界限模糊不清和上当、频繁的肤色"代传"现象。当时存在从种族上对人进行划分的倾向，如果肤色不算太黑，通常按社会和经济地位来划分，而不是他们的外表。英国旅行家亨利·科斯特(Henry Koster)在他的趣闻轶事中提到了一位民团司令，暗示了这种"文雅的虚构"。科斯特怀疑他是穆拉托人。针对他的质疑，他的仆人回答："他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他要仆人解释，仆人继续说道："民团司令能够是一个穆拉托男人吗？"

在种族形成过程中，奴隶制如同种族混合一样，在巴西社会组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制度的社会后果完全是负面的。奴隶制使非洲奴隶遭到了残酷对待，使奴隶主和奴隶都堕落了，助长了有损劳动者尊严的态度，也扭曲了巴西的经济发展。把劳动力等同于奴隶的倾向极大地限制了葡萄牙人或其他混血人进入社会能接受的大量职业。如此一来，就出现了由流浪者、乞丐、"贫穷白人"，或其他被降职和混乱人群构成的一个人口众多的阶层，他们不愿也不能与奴隶竞争农业和工业的工作职位。不可避免的是，就奴隶而言，工作没有激励，他们的劳动效率和生产率非常低下。

很多史老的历史文献形成了这么一种观点：与其他殖民地相比，巴西的奴隶制是比较温和的。部分原因，这个传统认识之所以流行，应归因于巴西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弗莱雷(Gilberto Freyre)的著作，他

[illegible]了在巴西东北部甘蔗种植园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存在的家长式关系。但是，弗莱雷所描述的奴隶通常是在室内工作的奴隶，他们处在一定的特殊地位，与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甘蔗及烟草种植园的大多数奴隶相比，他们的境况非常不同。查尔斯·鲍克瑟说，在庄稼收获季节，[illegible]的时候，有时奴隶整日工作，至少从日出工作到日落。在非生产季节，工作时间没有那么长，但仍要“保持严厉的纪律，[illegible]会遭受残忍的酷刑”。1700年，王室的一份快报指责了[illegible]残暴的[illegible]肉体惩罚虐待奴隶的野蛮行径，并特别谴责了女奴隶主强迫女性奴隶从事卖淫活动的行为。



一幅巴西奴隶制的场景 从非洲新到的奴隶在奴隶交易站里等待，而坐在椅子上的奴隶主与一位可能的顾客就小孩子的买卖讨价还价。

大种植园苛刻的劳动纪律反映了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斯图尔特·施瓦茨说：“奴隶主估算过一个奴隶一年平均能生产750公斤的糖。按照当时的价格，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奴隶两三年内糖产量可相当于当初购买奴隶的价格和工作期间的生活花费。因而，一个奴隶只活五六年，那么大庄园主的投资就要翻倍了，就可以购买一个新的精力充沛的替代品了。”这种推理证实，奴隶主没有改善工作条件，或提高奴隶生育

率的动力，因为幼小的奴隶需要抚养到12或14岁，才能成为生产性劳动力。施瓦茨总结了奴隶管理的基本理论似乎是"让他们拼命工作，赚取利润，然后再购买"。

显然，奴隶受到的待遇因奴隶主个人的性格而截然不同。尽管王室赋予了奴隶可获得赔偿的合法措施，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对奴隶摆脱困境是有效的。牧师作为教会在种植园内的代表，由大地产主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提供住宿，他们可能在奴隶待遇的问题上也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奴隶的低生育率和频繁的自杀现象充分地说明了他们的状况。很多奴隶逃跑，并在丛林中形成了逃亡奴隶的定居点"茅屋"(quilombos)。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被称作帕尔马雷斯(Palmares)共和国，于1603年在东北部阿拉戈斯(Alagoas)都督辖区内陆建立。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非洲人王国，有上千居民居住在10个村庄里，延绵分布在90英里领地里。帕尔马雷斯的"茅屋"，无论是在规模和组织的复杂程度上，还是在抵抗殖民地当局对他们的反复征战都存活下来的能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1694年，经过两年的围困，还是被捕奴队武装消灭了。但是，"茅屋"一直让大种植园主和殖民当局感到恐惧，到了1760年，对巴伊亚附近的"茅屋"构成威胁的抱怨已司空见惯了。

解放是奴隶获得自由的另一种方式。奴隶主们根据他们的意愿或奴隶洗礼时，经常会释放一些喜爱的奴隶或在大房子(Casa Grande)里抚养大的孩子们(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奴隶用家庭和朋友的财富，赎回自己的自由。获得自由是有条件的，要保证以后仍继续提供某种服务。因此，以经济的、文化的和宗教动机等不同方式，出现了自由人及其后代的这一阶层，他们到18世纪，在巴西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奴隶制是巴西殖民地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都留下了烙印。然而，除了奴隶主和奴隶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由不同种族构成的自由农民群体，他们生活在大庄园和村社里，这些小村子零星地分布在整个巴西的农村。一些是小农场主，有几个自己的奴隶，

他们的甘蔗带到“糖磨坊”压榨或出售。他们经济上的劣势，使得他们难以独立，他们的土地和奴隶在土地集中和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落入大地产主的手中。他们绝大多数人是租佃农或收益分成佃农，要对大地产主忠诚，并为其劳动，作为回报，而获得一小块土地的经营特权。其他自由农是在 17 和 18 世纪被赶出沿海地区，而在偏远地区定居下来的人却被那些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牧场主和大地产主看做是“入侵者”。

其他自由民是工匠，包括很多黑人或穆拉托自由人，他们满足了农庄人口的需要。一个重要的有薪工人群体——监工、机械师、桶匠和熬糖的人们——为制糖业提供了所需的专门技术。

大地产和殖民地城镇

巴西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核心是大地产或大庄园，通常建立在黑奴制的基础之上。大庄园以“大房子”为中心，构成一个家长制的社区，包括大庄园主和他的家庭、牧师和监工、佃农和仆人；还有社会底层的自由人，受到大庄园主的保护和帮助，作为回报，他们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在这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里，在主人、奴隶及白人或混血下属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毫无疑问，长期的接触有时会使这些关系变得更亲近和人性化，给这种纯商业的关系添加了感情纽带。主人的保护角色在教父(compadrio)关系中得到体现，他成为了受洗礼的孩子或见证新婚夫妇的教父。这个制度暗含着在大庄园生活里的互助关系和家长制所维护的利益。但是，它绝没有排除对这些人的严厉剥削，或实施最残暴的酷刑，如果他们反对或对抗大庄园主的绝对权威。

在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区，大庄园主变成一个特殊的贵族阶级，拥有家族传统，以家族的名号和血统而深感荣耀。在赛尔唐(sertao)和南部的养牛地区，奴隶人数不多，牛仔或加乌乔人性格独立，工人们的活动更为自由，这些因素都共同营造了一个相对更为民主的氛围。然而，

巴西历史学家卡伊奥·普拉多·胡尼奥尔(Caio Prado Junior)认为，每一个地方都“明显地存在社会差别，所有者和工人绝对的、家长制的主导权不可避免地总是与殖民地大地产主密切相连”。

与大庄园的重要性相比，殖民地的大多数城镇只是乡村的附属物，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被乡村权贵们所主宰。即使像在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这样少数的几个大城市，社会的主导阶层也是由大庄园主和制糖厂主所构成的。这些人通常把照管大庄园的任务交给管家和监工，比起乡下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他们更喜欢城市的享乐和热闹。但是，在城市中也居住着与大地产主争夺或分享权力的其他社会阶层：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官、教会的重要人物、富有的职业人，尤其是律师；还有大商人，几乎都是半岛人，他们控制着进出口贸易，为大庄园主提供融资。

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是很高，因为中世纪以来对于非贵族的偏见也从葡萄牙传到了这里(这个偏见并没有阻止高官进行贸易，尽管是暗中进行的)，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商人成为市政议会的成员。本地出生的大地产主和欧洲出生的商人之间的冲突，被反对暴富移民的民族主义的不满所激化，有时还会引发武力冲突。一个例子就是商贩之战(War of the Mascates，1710－1711)，一方是奥林达(Olinda)，由甘蔗大庄园主控制的伯南布哥都督辖区首府，另一方是由商人们所支持的新兴港口累西腓。

这场巴西土生白人和半岛人之间的斗争预示着后来要产生更为广泛的巴西民族主义和早期的巴西独立计划。到18世纪后期，米纳斯吉拉斯，巴西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拥有了最多元化的经济。由于政府为加强该地区对葡萄牙出口商的依赖、征收大量非法税收、开征新的人头税，这个地区成为了动荡不安的温床。一群不同政见者1788至1789年密谋造反，筹划以北美为榜样成立共和国，其中的大多数人是殖民地社会上层的精英。其中唯一一个不是贵族成员的密谋者是何塞·达·席尔瓦·哈维尔(José da Silva Xavier)，一个低层的军事官员，业余从事“拔牙”，他以此名在巴西历史上被人所知。作为美国革命

[illegible]谋者，[illegible]·哈维尔显然拥有独立宣言和美国政府宪法的复制[illegible]谋被发现[illegible]，所有的主要密谋者都被判死刑，但最后所有的人[illegible]到赦免，除了[illegible]民蒂拉[illegible]·哈维尔。他以极大的勇气面对残暴[illegible]，成为[illegible]，从而成为了巴西独立的先驱。

第七章　波旁王朝改革和西属美洲

焦点问题：

- 波旁王朝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
- 克里奥尔人的民族主义如何利用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古代美洲土著社会的“古典传统”？
- 波旁王朝的改革对土著社会、非洲奴隶和混血人种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 为什么波旁王朝时期在殖民地历史上出现了最大规模的民众起义？
- “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词如何与波旁王朝时期殖民地经济相联系的？

135　1700 年 12 月，病重的查尔斯二世去世，在西班牙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美好时代的开始，尽管出现新时代的迹象还比较渺茫。临终时，不幸的查尔斯在弥留之际才更像一个国王，他不顾一切奋力阻止了三个有继承权的人之间分裂西班牙帝国的阴谋：巴伐利亚王子、奥地利大公查尔斯和路易十四的孙子——昂儒的菲利普。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查尔斯签署了遗嘱，任命法国的菲利普，即后来

菲利普五世(Philip V)，继承他的所有领土。

英国对法国和西班牙联合的前景深感恐惧，于是加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战争以签署《乌得勒支条约》(1713)宣告结束，规定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割让给英国；在西属美洲，给予英国黑奴贸易特许经营权；在菲利普五世统治下，禁止法国和西班牙王国的任何联合。第二年，签署了另外一个和平条约，把西属尼德兰和西属意大利的领地授予了奥地利。

改革和复苏

当时帝国失败蒙羞，加深了当时弥漫着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但也有一些积极方面：王位继承战争的失败驱使国内要求对西班牙政府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高涨，失去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给西班牙留下了一个更好管理的、更加西班牙化的帝国，这个帝国由卡斯蒂利亚王国、阿拉贡王国和西印度组成。

波旁王朝改革

和平的到来使得新王朝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实施改革计划。这项计划受到了法国模式的启发。改革和接下来的西班牙复兴与波旁王朝的三个王公有关：菲利普五世(1700—1746年在位)和他的两个儿子费迪南德六世(1746—1759年在位)和查尔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在"开明专制"的庇护下，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对已有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国家生活焕然一新。只有这样全面的改革才能缩小西班牙与欧洲强国的距离，才能以强大的工业、繁荣的农业和稳固的中产阶级为武器把国家武装起来。它需要防止被英国及其联盟打败，以争夺主导18世纪的帝国地位。

尽管改革运动是在王室权力和天主教正统框架范围内实施的，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教会和贵族内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对。结果是，尽管受到如佛罗里达布兰卡(Floridablanca)伯爵和阿兰达(Aranda)伯爵这样开明贵族的支持，波旁家族还是从低层贵族和中下阶层中招募主要

大臣和官员。这些人深受法国百科全书派①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他们反对法国的反教权主义和自然神论。他们代表了西班牙启蒙运动的特征，在宗教和政治上是固执的正统派，同时热情追求有用的知识，批判教会和教士的缺陷，坚信有教养的理性力量通过遵从更为理性的路线重组社会从而能够改进它。

国家重建始于菲利普五世，但在查尔斯三世执政时达到顶峰。这位伟大的改革国王试图消除人们对于手工劳动的蔑视，建立了纺织厂、工厂，邀请外国技术专家到西班牙，鼓励技术教育，以复兴西班牙的工业。为扶持农业发展，他限制了畜产业者团体的特权，[illegible]移民，并在半岛被遗弃的地区安置外国农民。[illegible]努力鼓励造船业，通过修建道路和运河，促进贸易和交往。1767年驱逐耶稣会和颁布限制宗教裁判所权力的结果，是教会的权力日益下降了。在有能力和忠诚的大臣们的感召下，政府官员中开始出现为公利服务的新精神。

但是，不应夸大波旁王朝统治时期西班牙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程度。王室同封建贵族和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并没有触及现有秩序的根基——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后者必然导致贫穷的蔓延和农业技术的落后。这些缺点连同缺乏资本发展工业以及中产阶级的脆弱，都使得西班牙与英国、法国或荷兰相比，仅是欧洲一个次要的国家，尽管其人口和生产有了显著进步。

1788年12月，查尔斯三世去世后几个月，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际上让改革戛然而止。受法国君主政体被推翻和王室亲属被处刑的惊吓，查尔斯四世和大臣们流放或逮捕了主要的改革者，并严禁法国理性主义和革命文学流入西班牙。然而，不管在西班牙，还是在殖民地，时间不能，也不会倒流。譬如，在查尔斯四世腐败政府的统治下，弗朗西斯科·赛维尔·巴尔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1803年从西班牙

① 著名的《百科全书》(1751－1780)撰写者们，[illegible]启蒙运动，支持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

[illegible]带着接种技术和方法来到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这一举措可能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

波旁王朝在殖民地的改革缓慢而谨慎。考虑到原有的秩序符合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很自然的。从来没有想到要赋予殖民者更大的政治自治权力，或允许他们更自由地与非西班牙语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相反，波旁王朝进一步集权化管理殖民地的行政机构，目的是提高其效率。但[illegible]商业改革是为了减少走私和加强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为西班牙“重新征服”殖民地。

殖民地商业的复苏和贸易垄断的瓦解

第一个波旁王朝国王费利佩五世主要是集中精力减少走私和复苏17世纪后期衰落的贸易体制。随着《乌得勒支条约》的签订，英国商人阶层获得了一大胜利，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被授予向西属美洲输入奴隶的专门特许权，此外，每年还有权向波托韦洛(Portobelo)派一艘船参加交易会。众所周知，像每年驶往美洲的运送供给的船队一样，运奴船都装载有走私货物。南海公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的贸易货栈成为英国商人大量倾销走私商品的又一通道，这些商品甚至远销到秘鲁。

为制止在加勒比海的走私，西班牙政府委托海岸警卫队(guardacostas)在主要的贸易通道上巡逻，查扣装载走私商品的船只。政府也试图终止加的斯贸易商会(consulado)的垄断权，这种权利规定，只有其成员才可以装卸西班牙[illegible]商船。这面垄断之墙被加拉加斯公司(Caracas Company)于18世纪20年代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该公司是在比斯开地区的资本家资助下组建的。作为对获得与委内瑞拉贸易特权的回报，这个公司负责在海岸打击走私者，并开发当地资源。尽管公司声称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很成功，但它其实未能阻止与附近的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Curaçao)之间活跃的走私贸易，也未能平息委内瑞拉大种植园主和商人们的敌意，他们控告公司支付的可可价格极为低廉，对烟草和其他产品的购买量太少，但所出售的西班牙产品价格却很高昂。

比斯开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利用资本成立了类似的公司，与哈瓦那、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其他一些在殖民地贸易体系中未开发的地区开展贸易。这些企业在经济上都失败了，一部分原因是缺乏资本，一部分原因是管理不到位。这些由加的斯贸易商会的垄断出现裂缝的新组织并没有给克里奥尔商人带来好处，这些商人完全被排除在外，不得参与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合法贸易。

第一代波旁王室成员们几乎没有变革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结构，而是满足于通过更细致地甄选官员来努力提高行政能力。一项主要的改组是把安第斯地区（现在的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北部从秘鲁总督辖区分离出去。1739年，它变成了名为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的总督辖区，首都位于圣达菲（Santa Fe，现在的波哥大）。这个改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显示出为加勒比海岸，尤其是卡塔赫纳要塞提供更好保护的愿望。它还同时反映了哥伦比亚中部高地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这个新的总督辖区内，委内瑞拉被设为都督辖区，首府为加拉加斯。这个辖区实质上独立于圣达菲。

像国内改革项目一样，殖民地的改革运动在查尔斯三世时达到高峰。这项改革的部分内容在一名杰出的西班牙经济学家——何塞·坎皮略（Jose Campillo）的著作中早已提到。何塞·坎皮略还是费迪南德六世手下的财政大臣，他于1743年去世前不久，撰写了关于殖民地事务的回忆录，提倡废除加的斯贸易商会的垄断，减少向运往美洲的商品所征的税收，成立与美洲正常通信服务的机构，鼓励殖民地之间进行贸易，并发展殖民地农业和经济活动，但前提是不与西班牙的制造业产生竞争。1765年，这些建议的大多数被写入一份递给查尔斯三世的王室委员会报告中。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使它失去了佛罗里达，差点失去了古巴，这个打击给帝国改组和改革提供了动力。

在这一时期，加的斯贸易商会的垄断贸易慢慢消失了。1765年，西印度群岛打开门户，允许同包括加的斯和塞维利亚在内的其他七个港口开展贸易。这项改革在古巴糖业开始扩张的时刻到来，对岛上的经济产生强烈的刺激。这个特许权慢慢延伸到其他区域，直到1778年

[illegible]自由贸易法令允许所有被认可的西班牙港口和所有美洲行省间[illegible]委内瑞拉。1789 年，新西班牙和委内瑞[illegible]下互通贸易。这项贸易要征收的繁重的[illegible]从价税(ad valorem)代替了，其税额只有原来的 6%或[illegible]

[illegible]的限制也被逐步去除，但是贸易被极大地限制为[illegible]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拉普拉塔河地区，它在 1776 年[illegible]地区开展贸易。同时，作为古老秩序象征的贸易商[illegible](Casa de Contratación)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直到 1789 年关门歇[illegible]事务院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作为一个咨询机[illegible]，但是它的大多数职责却被国王任命的一位殖民地大臣接管。

“自由贸易”政策的成功反映在西班牙与西属美洲交易商品的价值[illegible]在 1778 至 1788 年间达到了 700%。新的[illegible]人进入西印度开展贸易，税收的减少，以及令人厌烦的限制的去除，都开始产生影响，增加了生意的数量，降低了价格，也许[illegible]少了走私(不过这点在此不能完全肯定，因为减少限制不可避免会有利于走私者的活动)。

但是波旁王朝改革的成就不能被过高评价。这个改革最终没有达到其主要目的——为西班牙重新征服殖民地市场，其中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是西班牙的工业缺陷，这是波旁家族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其次，在与英格兰的战争时期，西班牙无法保持通往美洲的海运线畅通，外国商人于是又一次涌向了西属美洲的各个港口。确实，西班牙政府也公开承认了自己无法在战时为殖民地提供所需的商品，其表现为：在 1797 至 1799 年间和 1805 至 1809 年间，两度取消针对来自中立国的外国船只(主要是指美国船)的禁令，允许殖民地同中立国开展贸

[illegible]的垄断统治地位，以及在殖民地贸易中的美洲代理人身份。直到 1796 年，依赖于它在船运、保险、仓库和通信方面的先进设备，超过 85%的贸易是通过加的斯的。

易，这增进了美国、加勒比地区和拉普拉塔河地区之间的贸易活跃。

经济活动的增长

也许，波旁商业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对西属美洲经济活动的刺激。很难确定这些经济活动的增长有多少要归功于波旁改革，或者18世纪西欧普遍的经济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世纪的后半叶，西属美洲的农业、牧业和矿业生产都出现了增长。受波旁改革和欧洲对糖、烟草、皮革和其他特产需求增加的刺激，这些产品的产量在这一时期大幅增长。一个明显的趋势出现：区域趋向专门化，即专一种植某种经济作物。1770年以后，生长在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咖啡，加上烟草和糖，成为了加勒比区域主要的出口作物。人口的逐渐增长也刺激了本地市场的粮食作物生产，尤其是小麦，因为比起玉米，欧洲人更喜欢小麦。什一税的收取成为农业增长的指标：从1779年到1789年的10年间，在主要农业区收取的什一税比10年前增长了40%。

然而，农业的繁荣似乎被极大地限制于生产出口作物和谷物能运到国内市场的地区。大卫·布拉丁(David Brading)描绘了18世纪墨西哥庄园经济状况的暗淡景象。除了墨西哥谷地、巴希奥(Bajio)①和瓜达拉哈拉地区外，市场太小使这些庄园难以收到满意的回报。遥远的距离，不完善的道路，高昂的运费都阻止了庄园生产发展超越当地市场的需求。个体庄园比教堂庄园更糟，因为他们要付什一税和买卖税，还要忍受地主和居住区行政长官造成的双重负担。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因为在不同地区拥有多处庄园，为不同市场生产各种产品，就显得幸运多了。他们的利润平均占到18世纪后期资本价值的6%到9%。幸亏有了廉价劳动力，即使生产率很低也可以得到大量收入，这也使庄园保持着领主式的奢华生活。但很多庄园仍欠下当时的主要"银行"——基督教机构大笔债务。

---

① 一个达到一定城市化程度的地区，拥有多样的经济(农业、矿产业、制造业)，位于现代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和克雷塔罗两州境内。

应该提到的是，农业生产的提高，不只是因为劳动工具和技术的提高，更多是依靠了土地和劳动力的广泛利用。低效率的大庄园(latifundio)，大力使用报酬微薄的苦力还有奴隶种植，对农业生产贸易的落后负有主要责任。普鲁士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评论过墨西哥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他写道：“新西班牙的财产，像旧西班牙一样，大部分掌握在一小部分有权势的家族手里，他们渐渐地吸纳了小庄园。在美洲，像在欧洲一样，大量众多的百姓沦入了放牛和永远贫瘠的境地。”

18世纪下半叶，在墨西哥和安第斯中部，土地所有权集中化的加速表明，大庄园希望在受限制的市场中消除小生产者的竞争，同时让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农场主把他们的庄稼收获了存在谷仓里，在粮食最紧缺、价格最高的时候，再拿到市场上卖。鉴于殖民地农业的低生产率，诸如干旱、早霜或者降水过量这样的自然灾害，很容易就打破了粮食供应和人口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从而造成可怕的饥荒，比如1785至1787年在墨西哥中部发生的饥荒。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荒引起的饥饿和疾病。

糖、咖啡和烟草对加勒比地区意味着什么，皮革就对拉普拉塔河地区意味着什么。欧洲对皮革需求的增长（主要用于制鞋和工业目的）；1735年允许非登记船只与西班牙直接通商，这些引起了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潘帕斯草原无管理的捕杀野牛行为很快让位于在建好的养牛场(estancias)饲养牛。直到18世纪末，这些养牛场都很大，面积有15至20平方甲格，通常有8万至10万头牛。到179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年大约出口150万张皮革。动物的肉以前大多没用，只有小部分能被马上消费掉，但现在因为人们对咸牛肉的需求，可以卖上不错的价格。咸牛肉在大规模的腌制工厂(saladeros)生产，其主要还是在加勒比地区找到了市场，尤其是古巴，用来作为奴隶的食物。拉普拉塔河地区养牛量的增加，受惠于土地集中到更少人的手中，是牺牲农业而得来的，农业在那里一直保持着低迷的状态。

18世纪同样见证了西班牙殖民地银矿的显著复苏。秘鲁和墨西哥 140

哥共同分享了这个进步，但是在波旁时期，墨西哥矿业区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秘鲁对手。矿主包括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但是提供资本设备的西班牙商人获得了最大的利润。像农业的生产一样，生产增长并不是主要依靠改进的技术，而是因为许多新矿和旧矿的开采，以及劳动力的增加。王权统治，尤其是在查理斯三世时期，为矿业提供了许多物质条件，包括给企业家更多的鼓励刺激，并且努力完善生产的各个方面。刺激政策包括减少税收，稍降政府的垄断。

在新西班牙，王权促进了一个矿业行会的建立(1777)，行会的职能包括经营银行向给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在这个行会的支持下，第一个矿产学校于1792年在美洲建立了。该校聘请了有能力的教授，提供了现代化的设备，同时也提供了优质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从而代表了墨西哥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外国和西班牙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墨西哥和秘鲁向矿场主介绍新机器和技术流程。这些值得赞扬的努力被矿场主的传统主义，缺乏资本进行技术改革，以及不当的管理极大地遏制了。但银的产量还是持续增长，和巴西的金一起，银矿业促进了北欧的工业革命，并在世界范围内刺激了商业活动。另外，美洲的银产业填补了波旁王室常年战争的花销。

1774年，一名财税改革家何塞·安东尼奥·阿列切(Jose Antonio Areche)来到了新西班牙总督安东尼奥·马利亚·布卡雷利·乌苏阿(Antonio Maria Bucareliy Ursua)的领地，准备递上一份关于墨西哥经济状况的报告。他把墨西哥的经济描述为落后的，它的实践和理念将会给现代化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人们抛弃农村，来到城市，使城市充满了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造成这个飞跃的原因是低效率的农业，这种农业因为原始的耕作方法，负债累累的庄园和恶劣的工作环境，造成生产率低下而且没有利润。阿列切抱怨地主用商品而不是现金付工资，工人待遇不好，只愿意集中进行少部分基本商品的生产，而不愿尝试新的产品和市场。因为给工人付商品而不是现金作为工资，而且流通的硬币太少，零售贸易滞后。他还批评商人们喜欢把商品强卖给当地村庄，却意识不到这些社区巨大的潜在市场，它们可以消费大

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但是阿列切没有看到西班牙利用墨西哥作为“提款机器”(John Coatsworth)的话，从殖民地的银产量中抽走一大部分[illegible]西班牙的财政，在殖民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大概为5亿至6亿比索)，导致了墨西哥缺乏足够的资本，经济结构滞后。

阿列切的报告也指明，波旁时期增长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带来殖民经济重大的质变，“没有发展的成长”这句话适用于现代拉丁美洲的经济表现，也同样适用于波旁时期的殖民地经济。

殖民地制造业在长期稳定的增长后，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衰落，由于大量廉价的外国商品的流入，而当地产品无法与之竞争。阿根廷内地的纺织业和酿酒业开始衰落，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市场上，它们输给了廉价的外国酒和服装。厄瓜多尔基多省(Quito)的纺织品生产者也因为遭遇同样的失利而抱怨。在墨西哥的制造业中心普埃布拉(Puebla)，瓷器生产在1793至1802年间遭遇了灾难性的下跌。尽管这样，普埃布拉和克雷塔罗(Queretaro)仍然是纺织制造业的重要中心。

尽管西班牙采纳了重商主义者的立法，旨在限制殖民地的生产业，尤其是精良的纺织业，但这个立法似乎对于大规模增长的制造业只是一小的抑制剂。更重要的是，这个抑制剂缺乏资本投入，西班牙人更喜欢把土地和矿产作为投资目标，劳动力处于半屈从状态的制度也同样对工人和生产力造成危害。洪堡在1803年参观了克雷塔罗的毛织品作坊，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 不仅羊毛准备的技术过程有很大的缺陷，而且在这个特定的工艺下，工人暴露在不健康的环境条件和恶劣的待遇中。在工作间，自由人、印第安人、有色人种和被司法发配的犯人混在一起，被强迫工作。所有劳动者都是半裸的，身上覆盖着劣质不成形的破布。每个作坊都像是黑暗的监狱。双扇的门永远是关闭的，工人不允许离开房间。有家室的人只能在星期天看望家人。如果他们不小心最轻微地触犯了作坊的规定，等待他们的都将是无情的惩罚。

雪茄和香烟的生产是极少数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线之一。在克雷塔罗的同一个小镇里，洪堡还参观了一个拥有3 000名工人的烟厂，其中有1 900名女工。



妇女经常在纺织厂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尤其是像这个厄瓜多尔奥塔瓦洛的工人那样的土著妇女，她们把羊毛纺成线，再用原始的织布机织成布料

18世纪的劳动制度

洪堡的评论证明了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殖民时期，劳动制度的重要元素是持续的奴役和压迫。尽管波旁王朝理论上不喜欢强迫劳动，但他们仍试图在西印度加紧劳役偿债制度的合法实施。为了更好地收取贡赋，何塞·德加尔维斯(Jose de Galves)——查尔斯三世的改革人

试着[illegible]当地人和他们的印第安村庄及庄园有更紧密的联系。1769年，他们还引进了结关单制度(clearance certificate)，结关单是证明劳工没有欠债可以向其他地主找工作的文件。没有结关单的劳工流动是非法的。劳工的债务是由新西班牙的矿产条例造成的，智利的金矿和银矿也有同样的功能，结关单制度像在墨西哥的使用一样，在这里也被采用。詹姆斯·里雷(James D. Riley)的一项研究指出，1785年以后，波旁王室的政策趋向于使债务在墨西哥变得"不那么重要"，他也指出没有官员愿意追捕欠债人，并强迫他们还债或者工作。尼古拉斯·库什纳(Nicholas Cushner)认为，在18世纪基多(厄瓜多尔)耶稣会庄园里，"债务是为了保持稳定劳动力的机制"，但劳动者[illegible]低供[illegible]。他又补充道："这是印第安人版的黑奴制。"

像常有的情况一样，实际上，劳役偿债制的重要性和它严格的强制性在各种个案中有不同作用性。到18世纪末期，新西班牙的人口增长，带来了劳动力的增长和小生产者的消失，极大地减少了债务作为固定和保持劳动力的重要性。例如，埃里克·冯·杨(Eric Van Young)记录了瓜达拉哈拉地区常住劳工人均负债的减少，表明了他们在对付雇主时讨价还价的能力有所增强。这种新的状况使庄园主根据生产状况的变化选择保留或解雇工人。因此，在18世纪后期的墨西哥，地主在收成不好的时候，突然想起可以节省给工人的报酬，就简单地解雇工人。这个变化还伴随着一个趋势：实际工资的减少和乡村生活水平的下降。

在安第斯区域，米塔制在受其支配的省份里，一直为矿产业和农业劳动力提供了重要补给，直到殖民时期结束。在其他省份，农业劳动力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是繁重的进贡要求和商品摊派制(repartimiento de mercancias)的运作，产生了对现金的需求，这就迫使许多当地人寻找在西班牙人庄园上工作。这些亚纳科纳债农包括一大批所谓的外来者(forasteros)，他们逃离当地的印第安村庄，为了躲避可怕的米塔制劳役服务和进贡的负担。除了在庄园的土地上工作，这些劳动者或佃农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还必须为主人的家庭提供服务。理论上自由，但这种依附的方式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流动

早期劳动斗争

我们对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劳动斗争的知识是很破碎的，部分是因为历史学家对这些内容没有什么兴趣，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第一次相当现代式的劳动冲突大概是发生在18世纪末的墨西哥，墨西哥是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多样性的殖民地。罢工有时候发生在工匠的店铺，比如1784年，工人在巴西利乌·巴达木勒(Basilio Badamler)的面包店罢工，抗议“可怕的工作条件”。更常见的是，他们出现在集中了大量工人的行业，或者实行劳动分工以促进工人合作和团结的行业中。一个大规模的工业是被王室烟草垄断的雪茄和香烟制造业，它的建立伴随着一场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匠的无情的镇压(1773—1776)。这个垄断经营的巨大工厂在墨西哥城雇佣了约7000名男女工人。工人包括土著人、梅斯蒂索人和西班牙人，他们被付现金工资，在18世纪80、90年代，他们每年的工资总额大概75万比索。工人的战斗精神在罢工和抗议中展示出来，这让政府很担忧。1788年，墨西哥城的贸易商会声称，这种大型工人集合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以在总督宫殿的游行为例，这次游行是因为工作日的“小小延长”而引起的。工人冲过守卫，涌入宫殿，占领了庭院、楼梯和走廊。总督听到了他们的抱怨，“审慎地给他们一个字条，命令工厂的管理人员废除那些改革，还有上帝的帮助，骚动结束了，民众离开了，带着那个字条像是大获全胜，总督决定忽略这个很可能造成叛乱的骚动”。1791年，工人又一次在总督宫殿游行，抗议一个合同安排的改革，改革允许他们把工作带回家，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一场更富戏剧性的劳动斗争在1780年代墨西哥的银矿山爆发。冲突场景发生在墨西哥北部的雷亚尔·德尔蒙特(Real del Monte)的矿区。在这儿，像所有其他墨西哥银矿一样，大多数的劳动力是自由的，但小部分工人是从周围的当地村庄通过分派劳役制或者强抓劳工的方法招募的。抓壮丁部队也会挑选被称为“懒汉”或者“流浪汉”的人，去缓解常年的劳动力短缺。就是这些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抱怨，引起了一

[illegible]对时，[illegible]使固执的雇主完全停工。银矿业中劳动的过度[illegible]——把矿石从下面的矿坑中取出、装到上面的驴子上需要30个不同的工作步骤——[illegible]发地造成一种工人间的利益共享和合作。

在[illegible]是很危险的，矿工每天暴露在野外，事故会夺去他们的[illegible]或者生命，[illegible]人患上了[illegible]人虚弱或者致命的疾病。当时墨西哥矿[illegible]斯科·德甘博亚(Francisco de Gamboa)说，矿工[illegible]"[illegible]会倒塌，岩石会滑落，沉重的负荷会压断他们的背，[illegible]下的毒气、[illegible]，还有潮湿、发热、工人自己的热量"。在殖民地[illegible]墨西哥的矿工很少有活过35岁的。但[illegible]殖民[illegible]，工资是很不错的：下到地下的工人每12小时的轮[illegible](real，10分)(1里亚尔可以买一磅毛织品或者5[illegible]者工资的两倍还多。他们还能得到"好处费"(partido)[illegible]，"好处费"是指有技术的工人有权分享一部分他们人运送的超过定额的银矿。

[illegible]罗梅罗·德特雷洛斯(Romero de Terreros)试图把矿石搬运[illegible]的工资从4里亚尔降至3里亚尔，增加定额量，逐渐废除"好处费"，[illegible]此引起了[illegible]形成的危机。一个有同情心的教区牧师建议工人们通过合法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还试图和雇主调解他们的纠纷(这个牧师后来因为煽动行为被赶出印第安人村庄)。最终事态还是受到了干预，考虑到银产业对王室财政的至关重要性和因为常年劳动力的短缺，工人占据有强硬的讨价还价地位。作为重要的矿产业和矿产业法律专家的弗朗西斯科·德甘博亚，被派去仲裁冲突。他的裁定满足了所有工人的需要：虐待人的老板被逐走，降低工资被取消了，"好处费"的权力用书面得到了确认。①

多里斯·拉德(Doris Ladd)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出色和微妙的重

① 但是，[illegible]尔蒙特的胜利不是这个时期新西班牙矿区劳动力冲突通常的[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对[illegible]人采取的是更具侵略性的态度。受到正规军和准军事力量的支持，[illegible]"好处费"，工人被允许留下来，并且会降低工资。

构。她解释说，在雷亚尔·德尔蒙特的斗争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在劳动阶级存在之前出现了，反映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并指出工人的思想是"激进的"和"革命的"。她引用了工人们的律师表达的思想：罢工者对社会和经济公平的坚持是，"在所有神的、自然和世俗法的制度里，都存在着的一条戒律，即劳动和利益之间应当有公正的比例。"但是这种对公正的诉求有一种有限的范围和意义。它只适用于一群自由的、有相当特权的、有技术的工人，但并没有考虑到那些被抓奴队从家里拖到矿区并被迫劳动的土著人。依赖于当时一系列的有利条件，罢工者取得了胜利，这意味着回到了斗争发生前的普遍状况。但这个胜利还是把被征召来的当地工人留在了和从前一样无法忍受的境况中。因此不免让人怀疑，是否把这种屈服当做正常的思想能够被真的描述成"激进的"和"革命的"。

政治改革

在查尔斯三世的统治下，对杂乱的帝国领土区划进行整顿的工作还在继续。秘鲁总督辖区已经因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分立而缩小，又在1776年因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首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立进一步减缩。这次变动反映了西班牙政府关注拉普拉塔河口的大规模走私。这也反映了他们害怕外国可能会进攻这个地区，因为英国已经把他们的触角伸进了其附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又名福克兰群岛），还有已经从巴西开始向南扩进的葡萄牙人，他们已经在拉普拉塔河口北岸上建立了萨克拉门托定居点，以此为据点，他们威胁银运和蒙得维的亚城。要消除这个危险，西班牙政府集结了大批军队进行远征，为了全面控制河的两岸。总指挥官佩德罗·德赛维略斯（Pedro de Cevallos）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临时总督的身份出现。1778年，随着何塞·德维尔提斯-萨尔赛多(Jose de Vertiz y Salcedo)的任命，总督辖区长久性地确立了，在他跨越10年的统治期间，这个地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出现了。这个繁荣景象要主要归功于1778年的"自由贸易"法令，法令直接授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以及受到许可的殖民

过之前的贸易往来。178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的王室检审庭，完成了拉普拉塔省份的解放，摆脱了利马的远程控制。

随着西属美洲行政管理去中心化的趋势，必须越来越加强来自马德里的监控和指挥，这不仅反映了反对外国军事力量和贸易侵入的斗争，而且也显示了对一些问题的启蒙性意识，比如如何解决交流和不同的疆域高速扩张引起的管理问题，而这个意识是被制图技术的提高和对大南美具体地理知识的增长共同激发的。这个趋势有两个明显特征：18世纪总督辖区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利和这类辖区数量上的增长。委内瑞拉和智利被上升到都督辖区的地位。都督辖区享受的自治权利与此相伴，开明的改革者出现了，比如智利的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Ambrosio O'Higgins)，他尝试经济改革，刺激矿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引进新的农作物，总之他不仅要提高西班牙王权的利益，还要提升智利人民的福利。

总督辖区和都督辖区的建立与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改革紧密相连：1782至1790年，监政官制度被移植到殖民地，这个制度是从法国传到西班牙的。这个改革是为了更高的管理效率，并希望能让王室从殖民地获得更多的收入。监政官是依靠辖区内资本进行统治的管理者，被指望能从负担过重的总督身上接管一些职责，尤其是财政事务。在他们的其他职责中，监政官被期望能进一步推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培养新的农作物，改进矿产业，修建道路和桥梁，建立商业行会和经济社团。在他们的刺激下，已日暮西山的市镇议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激发出更大活力。监政官制度同时废除了督办和市长这些镇压当地人的臭名昭著的统治工具。这些官员被称作协助代理官(subdelegados)的当地城镇管理者代替，这些管理者是由监政官推荐，然后被总督确认的。

改革高峰时期的很多监政官都是有能力和有素养的人，他们不止追求增加经济活动和经济收入的目标，也同样在提升教育和文化的进步。但这并不包括他们的手下大部分的协助代理官。这些人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很快因为压迫行为而变得臭名昭著。通常的抱怨是，他们强迫当地人和他们进行通商，尽管监政官法令禁止商品摊派制。1780年

代普遍的反抗大部分是由当地人和克里奥尔精英中想要分享18世纪改革进步的果实但最终失败者引起的，因为改革进程中的主要受益者是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地主、矿主和商人。

加强防御

146 波旁商业和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收入，这只有在实现另一主要目标是加强帝国的海域和陆地防御。18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依靠它的重点已经放在了海军力量上：海上护卫舰和……18世纪中叶以前，在殖民地保持武装力量是被忽视的，政府主要依靠……的当地武装力量。"七年战争"的失败，特别是被英国人分别占领了哈瓦那和马尼拉(1762)，导致了弥补殖民地防御系统不足的改变。主要港口要塞的防御工事被加强了，同时建立了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由一部分永久驻扎在殖民地或者在半岛和海外之间轮流服务，还有殖民地民兵，由志愿兵和招募的新兵组成。

为了使军事服务更吸引克里奥尔上层阶级，因为他们会提供武装力量的军官团体，王室向接受军衔职位的克里奥尔青年赐予额外的特权和赦免。为了增加声望和荣誉的诱惑，参军者能获得免除受民事法律和义务制约的特权，除了某些特别指出不在赦免之列的罪行外。这种如此与殖民地官员的阶级保持一致的特殊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有助于形成了一个在拉丁美洲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武装力量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拥有自己的一系列利益，不从属于作为政治生活仲裁者而行使的政府权力，通常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在波旁王室的统治下，殖民地的军事力量被诸如教会和国家官僚体制这种互相竞争的团体所控制。

尽管波旁王室推动的殖民地军事力量建设给上层阶级的克里奥尔青年提供了机会和好处，但对缓解克里奥尔人长期以来的抱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克里奥尔人感到自己实质上被排除在国家高级官员、教会和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之外。波旁政策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虑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上半叶，富有的克里奥尔人有时候可以买到高官职位，在

段时间里，他们占据了墨西哥城和利马有名望的检审庭中的职位。但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反克里奥尔人的逆动。查尔斯三世的殖民地大臣何塞·德加尔维斯就是代表那个朝代开明专制思想的典型官僚。他本人并不相信克里奥尔人的能力和忠心，就把高地位的克里奥尔人从政府管理机构的职位中去除了。新的上层官僚几乎都是在西班牙出生的，包括接管总督很多权利的监政官们。

其他的改革政策伤害了克里奥尔人的既得利益或者给他们的感情上的伤害造成了危害。1804年，西班牙王室实施了一项紧急收入措施——巩固皇家债券，命令殖民地的教会机构召回他们所有的未偿贷本、扣留资本和抵押资本，这些资本的利息支持了教会仁慈和虔诚的事业。这些资本将转给王室，王室会每年给教会付利息资助教会的活动。尽管该措施的主要动机是缓解王室紧急的财政需要，但它还有一个次要目的，就是把殖民地经济从"永久性经营"(mortmain)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财产更大的流通。

这个措施使殖民地秩序的两个堡垒受到了沉痛打击：教会和有财产的精英。大庄园主、商人和矿主在教会机构借了大笔债，现在必须还清所有债务，要不就会失去财产或者破产。很多精英家族也把庄园的部分财产捐出给教会以获得一个牧师的职位，每年付利息提供牧师的薪俸，牧师通常是家族的一个成员。尽管教会并没有借贷这个资本，但负责实施此措的官员要求涉及的家族马上用现金交回这个捐助的财产。很多小型和中型地主，和其他中间阶级从教会借钱的人也同样受到该法令的威胁。

这些措施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但抗议也渐渐被软化，表现为负责的官员开始协商偿还的数量和其他偿还方式。欠债人（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都有）对法令的反对十分强烈，以至于在新西班牙之外几乎难以实施，在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措施被取消之前，收到的1 500万比索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来自新西班牙。该项政策留下了一个苦痛的遗产，尤其是对像后来墨西哥独立战争的旗手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神父那样的个人，因为无法按规定还债，他的庄园被

封了几年。

因此，尽管（而且部分因为）波旁王朝改革的精神，土生白人渐渐和西班牙王室疏远了。这种疏远增强了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萌发，它否定直接的政治出路，而是在文化和宗教上找到了主要表达方式。

殖民地文化和启蒙运动

至少到18世纪，被教会和国家政权强加的对出版自由的审查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殖民地智力和想象力的发挥。因此殖民地文化从这一缺陷中深受其害，但是又无可避免地缺乏西班牙文学和艺术的新鲜活力，因为西班牙文学和艺术是一个更为古老和成熟的文化的产物。尽管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困难，诸如缺乏书籍出版，但殖民地文化还是留下了大量不同寻常而宝贵的遗产。

殖民地文化的主要灵感来自于西班牙传统，尤其是16世纪的影响，它们对当地的影响有时候可以在设计和装饰中看出来。厄瓜多尔的基多和墨西哥城是艺术活动的主要中心。新世界的第一个艺术学校在王室的支持下于1779年在墨西哥城建立。可以想象，宗教主题主导着绘画和雕塑。在建筑领域，殖民地模仿西班牙先例，从16世纪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到17世纪巴洛克的装饰风格，再到18世纪更繁冗的装饰风格。

西班牙殖民地的知识氛围并没有引出科学的探究或者成就。直到1773年，哥伦比亚的植物学家穆提斯(Mutis)还被指控为异端，因为他在波哥大举行了哥白尼学说的演讲。宗教裁判所的检察官称穆提斯"也许是拉丁美洲唯一支持哥白尼的人"。18世纪最后十年，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知识阶层与欧洲的接触，开明掌权者的资助和保护为科学活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科学在新西班牙富有的省份迈出了最伟大的一步，在这些地方，矿产业的扩张引发了对地理、化学、数学和冶金学的兴趣。在墨西哥城出现了一个矿产学校、一个植物园和一个艺术学院。墨西哥的科学复兴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璀璨人物，如安东尼奥·德莱昂伽马(Antonio de Leon y Gama)、安东尼奥·阿尔萨特(Antonio de

Alzate)、华金·贝拉斯克斯·加迪纳斯-莱昂(Joaquin Velazquez Cardenas y Leon)。这些人将启蒙运动追求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进步与热情与严格的天主教正统结合在一起。比如,阿尔萨特激烈指责欧洲哲学家的"不忠"和怀疑论。

同时处于开明的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自身,对殖民地的知识复兴作出了贡献。18世纪早期的修道士本尼托·费霍(Benito Feijoo)在许多文章中向各种愚蠢行为和迷信学说发起进攻,同时在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产生了巨大的自由化影响。费霍用他对培根、牛顿和笛卡尔的阐述,使启蒙运动在西班牙语国家中被接受。西班牙人到美洲的科学家进行野外探索,得到王室的授权,有时候还会得到资助,这些科学考察推动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并把殖民地介绍给一些杰出的欧洲科学家本人,如法国人查尔斯·玛丽·德拉·孔达米纳(Char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和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

在所有人之中,耶稣会在调和教会教条和启蒙运动思想的努力中,在这一过程中,最具技巧和策略。在墨西哥,安德烈斯·德格瓦拉(Andres de Guevara)、佩德罗·何塞·马尔克斯(Pedro Jose Marquez)、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克拉维杰罗(Francisco Javier Clavigero)等人公开地讲授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的学说。这些耶稣会士把物理放在中世纪学者之上,把实验方法置于抽象推理和推测之上,但他们将这些精神与对教会教义坚定不移的忠诚结合起来。因此,把耶稣会从西属美洲驱逐出去,也就让这里失去了最有力也最细致地捍卫传统天主教和务实的人群。意大利是多数耶稣会士被流放后的定居点,在流放期间,有些人利用空闲时间写了一些关于他们美洲故乡的历史和地理书籍。这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弗朗西斯科·克拉维杰罗的《古代墨西哥史》(1780—1781),该书是根据时间序列撰写的最好著作,也是天主教正统与启蒙运动批判和理性方式混合下,体现耶稣会特征的最好阐述。

尽管往往忠诚于王室,这些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著作还是揭示了对社会和政治紧迫的敏感,这是一种对经济落后的不满,和一种包含对西

班牙政权具有潜在危险的自由贸易的主张。在西属美洲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中，殖民地报纸和刊物在批判和改革思想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受到教会和国家的强制性审查，以及承受着若干年的财政困境，它们的寿命也是短暂和充满波折的。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 19 世纪初期，在殖民地受教育群体中，禁书的传播和影响持续增长。尽管如此，也不能像一些作家那样下结论说，宗教裁判所在 18 世纪变成了没牙的老虎，激进的思想能够几乎完全不受惩罚地被宣扬。确实，宗教裁判所的影响在波旁王朝时期下降了，尤其是在查尔斯三世时期，因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王室影响。但是审查制度从来没有放松过，宗教裁判所还在继续保持着警惕，随着驱使西班牙和法国分裂的外交车轮的每一次转动，审查官的螺丝就被拧紧一次。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墨西哥引发了对宣扬激进思想的一场恐慌，在墨西哥城的一次较大的信仰审判中达到高潮，长期监禁、没收和其他严厉的惩罚都被用了出来。但西属美洲独立的先驱们在文章中表明，这些试图压制新思想运动的行为是多么无力。他们的作品显示出对洛克、孟德斯鸠和其他启蒙运动重要人物思想的广泛认识。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

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萌芽建立在其他基础上，而不是欧洲的启蒙运动，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和值得怀疑的。对各自的省份越来越认同，将其看成是祖国(patrias)，18 世纪克里奥尔知识分子收集整理出一个壮观的论据库，旨在反驳知名欧洲作家的攻击，比如孔德·乔治·德布冯(Comte Georges de Buffon)和康尼利乌斯·德包弗(Cornelius de Pauw)，他们宣称新世界及其居民有内在的自卑感。

大体上说，克里奥尔爱国者的祖国全都在美洲。早在 1696 年，墨裔法国人奥古斯丁·德贝坦科特(Agustin de Vetancurt)就宣称新世界在自然美和资源方面都优于旧世界。他在辞藻华丽的散文中写到，新西班牙和秘鲁是整个世界吮吸营养的两个乳房，嗜血变成了黄金和

白银的乳汁。在意象的变迁中，他把美洲比作一位佩戴着从资源丰富的[illegible]中拿出的珍珠、翡翠、宝石、水晶和黄玉的美丽少妇。

在《古代墨西哥史》一书的序言中，克拉维杰罗陈述道，他的目的是"恢复已经被埋没的事实，被难以想象的大量美洲作家模糊的事实"。克拉维杰罗赋予古代墨西哥历史的史诗性英雄主义角色反映出克里奥尔人对根源的寻找——寻找真正的古迹而不是半岛人宣称的欧洲。他对托尔特克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编年史提供了大量像古希腊和罗马历史中一样的勇气、爱国主义、智慧和美德。墨西哥的古迹中展示了可为[illegible]的英明的奇奇梅克国王霍洛特尔(Xolotl)和如尼萨瓦尔科约特尔(Nezahualcoyotl)与尼萨瓦尔皮里(Nezahualpilli)这样的[illegible]。通过这种方式，克拉维杰罗提供了一个初生的墨西哥国家[illegible]、拥有相应的尊严和英勇气概的过去。智利教士胡安·伊格纳西奥·莫利纳(Juan Ignacio Molina)在他的《智利历史》(1782)中也表现出同样的主题。

由克里奥尔人努力发展的一个集体性的自觉意识，同样在宗教思想和象征主义中找到了表达。在《奎策尔扣特尔和瓜达卢佩：墨西哥国家意识的形成》(*Quetzalcoatl and Guadalupe: the formation of Mexic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中，雅克·拉法耶(Jacques Lafaye)展示了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如何发掘两个有力的传说而获取墨西哥的精神自治，甚至超过西班牙。一个是关于1531年圣母马利亚在墨西哥城附近的特佩亚克(tepeyac)山显灵的传说，说圣母马利亚向一个来自库奥蒂特兰(Cuauhtitlan)的名叫胡安·迭戈(Juan Deigo)的印第安人显灵，并且通过他向墨西哥主教传达了在那里建立一个教堂的命令。主教要求的证据是来自特佩亚克山冬天的玫瑰被胡安·迭戈的长袍包住，而长袍被奇迹般地绘上了圣母的形象。从17世纪开始，棕色皮肤的圣母(indita，与据说帮助过的洛斯·莱梅迪奥圣母相反)被称做瓜达卢佩圣母，在整个墨西哥被崇拜。借助她的名义，米格尔·伊达尔戈得以在1810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科尔特斯的大规模起义中，成为大量当地人和麦斯蒂索人的领导者。

另一个伟大的传说是关于托尔特克人的救世主、白种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后来殖民地时期的作家揭示出，魁扎尔科亚特尔就是基督教使徒圣托马斯。1794年12月12日，克里奥尔人多米尼吉·塞尔万多·特雷萨·德米尔(Dominican Servando Teresa de Mier)在



瓜达卢佩圣母的传说，被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者利用，催生了他们19世纪为独立和文化主导权的斗争，后来又被下层阶级的当地人和梅斯蒂索农民为社会公平的斗争所利用

瓜达卢佩建起了他的讲坛，声称魁扎尔科亚特尔就是圣托马斯，他在很[illegible]以前带着四个弟子来到新世界为《福音书》传道。他获得了成功，[illegible]在征服[illegible]，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被修改的基督教已经统治墨西哥了。如果米尔是对的，美洲就没有任何东西源自于西班牙，甚至基督教。[illegible]新认识到米尔传道的革命性暗示，于是逮捕了他，将其流放到西班牙。

这个[illegible]明了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迈向最终目标的曲折路线。[illegible]之一是克里奥尔人对当地人和混血群体的霸权，霸权建立在[illegible]，以及像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这样的全民崇拜[illegible]之上。在 18 世纪 80 年代，那些人积攒的愤怒爆发[illegible]殖民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性存在。在这个[illegible]中，[illegible]级表明他们的贵族国家在它的孩子中并不真正包括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黑人。

1750 – 1810 年，过渡时期殖民社会的概况

[illegible]·吉本做过估计，西属美洲在殖民地时期[illegible]，人口数量大概为 1 700 万。吉本推测，其中有 750 万[illegible]印第安人；大约 320 万是欧洲人；大约 75 万是黑人；剩下的 550 万是混血人种。这些数据表明了从 17 世纪衰落的低点开始，当地人口持续[illegible]的上升，也表现了欧洲人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甚至混血人种人口更迅速的增长。

在殖民地后期，曾经用来描述和划分种群的分类变得越来越模糊，即根据“[illegible]”或缺少“[illegible]”来定义构成殖民地人口的群体。一个原因是殖民地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导致西班牙化和种族融合的快速化。禁止印第安人住在西班牙城镇，白人和混血人住在当地人城镇的法律慢慢地被忽视了。大批想要逃脱贡赋和摊派制负担的印第安人，移民到西班牙城市和[illegible]，在那里学习说西班牙语、穿欧洲的衣服，并且适应其他的西班牙生活方式。那些住在远离西班牙经济活动区域的村子的人，不太容易被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出现影响，所以保留了更多的

“当地性”，因为许多涉及当地历史、地理和经济合作人的事件，使管辖区的当地社区比起新西班牙的其他社区，似乎更加不易被西班牙文化同化。但是政治和社会变化也渐渐地改变了该管人的文化特性。它们的亲缘基础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外来人、农民和商人具有了自由的和受矿区米塔制统治的劳工的流入。这也同样受到了18世纪后期波旁改革政策的影响，波旁政策按照地理位置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还根据当时人口数量重新分配土地，为了皇家和地方的利益，拍卖多余的土地。

18世纪后期，那些富有的当地印第安村社首领，那些在服装和语言上被西班牙人同化的人，还有那些甚至获得相当水平财产的人，都被合法地当做了西班牙人，即克里奥尔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高度西化的梅斯蒂索人，以及也许少一些的黑人和穆拉托人身上。简言之，一个独立的种族，慢慢趋向于不是被肤色所定义，而是被职业、服饰、语言和自我自觉这样的特征定义。

波旁时代后期的经济进步，以商品农业、矿业和国内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为特征，它为一些幸运的低层阶级个人提供了机会，也为种族标签重要性的下降作出贡献。一群规模日大的富有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家族企图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地位的提高，通过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与西班牙精英的孩子结婚。查尔斯三世关于种族通婚的政策反映出这个改革国王的困境，他希望促进一个进步的中产阶级的增长，但又害怕会毁坏古老贵族秩序的基础。查尔斯三世把这个问题与工匠劳动联系起来，一方面颁布法令说与贵族阶层通婚不受禁止，一方面又颁布法令授予殖民者家长特权，可以拒绝同意他们孩子的种族通婚，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威胁到了他们家族的“荣誉”。就像高级殖民法庭解释的那样，这些法令作为规定，只有当打算结婚的双方在财产上不平等的时候，才会批准这样的家长拒绝，这意味着，像前面提到的，一个富有的穆拉托人也可以是西班牙精英成员合适的结婚对象。最后的波旁国王也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允许帕多斯（pardos，自由的穆拉托人），不管他们是否奴隶出身，可支付能让他们从“声名狼藉”的地位获得自由的《血统净化证书》（cedulas de gracias al sacar），从而成为“法律上的白种人”。

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对小部分富有混血人群的让步，反映出了这个等级制度所依附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种族偏见和刻板成见还是继续在殖民地的思想环境中占统治地位。比如，像刚才提到的，穆拉托人和梅斯蒂索人仍旧热切地想要通过付补偿费变成"白种人"，但像加拉加斯市议会这样的精英团体却抗议波旁种族政策所赋予的越来越大的自由，认为这些政策促进了"白人和帕多斯人的混合"。最后，一些家长也准备对他们的孩子提出诉讼，阻止他们同深肤色个体的婚姻。

这种有当地或非洲血统的个体对精英社会的渗透，即使在最高的层次，也不会改变等级结构的坚硬，阶级分歧的尖锐，以及分离富人和穷人的巨大鸿沟。洪堡用"权力和财产如洪水猛兽般地不公"形容后期的新西班牙殖民地。但是殖民地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精英经济基础的改变，以及各种家族在相对重要性上的一些转移。如果说17世纪是大地主的黄金时期，那么18世纪，尤其是最后几十年，他们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些挑战来自进出口商人阶级增长的财富及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其中多数商人是西班牙移民血统。这些商人为矿产业提供了所需的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他们同样为购买督办的职位提供资金，督办是垄断与当地人社区进行贸易并与商人勾结的官员。为了提供反对商业损失的保护手段，而不只是保护地主制度认同的威望，富有的商人会买地产，建立综合庄园，生产各种农作物，并且要位于能供应大量市场的位置；然后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建立磨坊厂或者纺织作坊，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把自己作为主要的零售商。那些最富有的有权有势的克里奥尔人扩展了家族的势力，形成了稳固的地位，他们的后代在殖民地政府和教会重要和显赫地位的任命中，占有优先权。

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股新的从半岛来的移民浪潮。这些通常出身卑微的新来者的出现，激化了传统克里奥尔人对新来者(gachupines或chapetones)的不满，因为他们与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尽管根据洪堡所说的，"最底层受到最少教育并且没有教养的欧洲人认为自己优于在新世界出生的白人"，但多数的新来者无法找到他们所期盼的高地位和高报酬工作。1753至1811年墨

西哥城的审查报告列出，一些西班牙人从事不需要技术的苦力工作和家庭仆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没有工作。《墨西哥日报》（Diario de Mexico）经常刊登着这样的广告，失业的西班牙移民愿意接受任何低级的管理职位。两个敏锐的西班牙官员，豪尔赫·胡安（Jorge Juan）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在大约1750年访问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发现那里的克里奥尔人和欧洲人彼此都不做什么大生意，"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成功，大部分人没有办法保住足够的存款，他们变得贫穷和迷茫，由于对继续以前在欧洲从事的贸易感到反感，又不能让那些有钱人炫耀自己在西印度拥有的财富，这些人正在经历着最复杂的悲惨境遇。"

大众起义

传统上，一般把当地人大致描绘成西班牙制度不同程度上的被动
152 接受者，或者描述为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他们对西班牙制度反应的更深入仔细研究，表明他们不是"被动的西班牙殖民化的受害者"。相反，存在大量这样的证据说明，他们是从一开始使用各种策略反抗西班牙制度的积极活动分子，因此改变着殖民地环境，并且塑造着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这些策略包括起义、斗争、暴乱、蓄意破坏，有时候甚至利用他们主人的合法规定，达到防御和进攻。

在西班牙激烈竞争当地劳动力的环境下，逃跑使有效地躲避了西班牙的压力。比如，当地人抛弃了受米塔制劳役体系控制的印第安村庄，而可以作为亚纳科纳在农场、牧场和其他免除劳役区域的企业工作。历史学家杰弗里·科尔（Jeffrey cole）正确地指出这"是他们最有效地反对米塔制，以及市长们和督办们强加的其他义务的方法"。当地人也有策略地运用西班牙的合法法规，来达到"防御、补偿，甚至进攻"的目的。历史学家史蒂芬·斯特恩（Steven Stern）关于秘鲁瓦曼加省（Huamanga）的研究表明，他们通过"进行进攻性的、持久的，而且经常是敏锐地利用西班牙的司法机构去降低法定指标、推迟具体的服劳役和贡赋的上交、扰乱生产等等"，从而减轻了米塔制的负担。在墨西哥，

16世纪有数不清的暴乱。印第安人让西班牙政权认识到不能再在他们身上为所欲为，而且必须注意他们的不满。

近期的历史学研究强调当地人作为能动主体，通过利用西班牙司法机构和扰乱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虽然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有时候也会产生误解。因为这些努力绝不是总能成功的，有时候会造成严重的报复行为。历史学家马丁·闵乔(Martin Minchom)在其关于18世纪基多的研究中写道，当印第安人抱怨强大的地主们侵占他们的土地时，当地官员对他们的鲁莽进行了回应，[illegible]了土地上的71所房子，并把这个人传唤到法庭上。另一个墨西哥历史学家伊尔德韦托·马丁内斯(Hildeberto Martinez)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是关于当地人试图阻止与他们的土地分离的。这是两块位于16、17世纪曾经归当地领主所有的土地(现在的普埃布拉)，这个研究表明他们诉诸法律诉讼和其他和平手段都完全没有用。西班牙掠夺的方法包括完全的暴力、欺骗价格和租赁协议的操纵、偷窃房地产契约文件，以及在他们想要的土地上放养家畜，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微妙的手段。在1521年至1644年间，这些手段造成了在这两个社区里，超过13.7万公顷的土地流失。

起义是被压迫者反抗西班牙制度最让人难忘的形式。大量的当地人和黑奴的起义打断了西属美洲历史的殖民时期。在西班牙制度完全建立之前，很多地区的印第安人起来反对他们的新主人。在墨西哥，米克斯顿战争(Mixton war)从1540年延续到1542年。尤卡坦的玛雅人在1546年上演了大规模起义。一个印加国王的后代——曼科二世，针对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领导了全国范围的起义。在智利，不屈服的阿劳乌加诺人开始了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丛林和山区中，一批批逃跑的黑奴建立了自己的社群，成功地抵抗着西班牙企图消灭他们的行动。这场革命风暴在17世纪开始下降，但是在18世纪波旁改革加重普通人负担的时候又达到了顶峰。

波旁改革帮助殖民地的地主、商人和矿主更加富有，美化了城市，

扩展了上层阶级青年的知识视野，但是大量的平民并没有分享到这些利益。相反，波旁政府为了努力增加王室收入，建立了政府特许的垄断和有特权的公司，强征新税实际上加剧了低级阶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这种环境也就解释了1780至1781年间起义的一些特征，不同于克里奥尔人后来的独立战争。除了个别特例，拥有特权的克里奥尔人群体或者支持西班牙人反对当地起义，或者迫于压力加入革命运动，只是为了后来抛弃他们。

多数的18世纪起义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角色——当地农民。一个重要的例外是1765年的基多起义。安东尼·麦克法拉内萨(Antony Mcfalanezai)在关于这场起义的研究中，把它称为“18世纪西属美洲最长、最大和最令人敬畏的城市起义”。与西班牙和外国走私进口的竞争导致了基多纺织业下降，进而导致了经济危机。为了反对这一状况，部分精英联合工匠和店主进行抗议，反对具有威胁目的的新税收，以及在朗姆酒(aguardiente)垄断中威胁既定利益的改革。不管后来的暴动有多大规模，以及对西班牙商人表示出多大的敌意，起义从来没有撼动过西班牙的统治权。墨西哥城在18世纪有一系列的暴动，是由波旁管理者努力镇压乞求、管理酒品使用以及改变烟草工厂的工作条件引起的。西尔维娅·阿罗姆(Silvia Arrom)发现在墨西哥城，和在基多一样，城市的穷人成功抵抗了波旁政府试图管理他们生活的企图，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大众阶级争取对自己生存的掌控权，他们通常都会赢。”

秘鲁的起义

18世纪，西班牙对秘鲁印第安人的压力和需要极大地增加了。主要的剥削当地人的机制是前面提到的商品摊派制，这是统治当地人的最令人厌恶的勒索之一。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这被认为是18世纪秘鲁大部分起义的原因。这个制度是这样运作的：一个利马的商人要支付从王室购买督办这个职位所需的钱；他还可以用“分摊”的办法来配置督办这个职位，也就是说，强迫他管辖区域的当地居民购买这些商品，

有时候是一般市场价格的6至8倍。在库斯科地区，典型的摊派商品是骡子和纺织品，但有时候这些商品也包括一些当地人几乎不会使用的奢侈品。他们被强迫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费用，否则就会被关进监狱；很多人为了获得所需的现金而离开村庄去矿区、纺织作坊和庄园工作。这个制度因此有助于破坏当地传统的农民经济，也有助于两个目标群体——商人和其他的统治阶级团体：促进了商品内部市场的扩张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

在同一时期，矿产业米塔制强征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为了决心把波多西银矿的产出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王室和矿主进行了革新，更加残酷地剥削当地劳动力。米塔制工人(Mitayos)生产所需的矿石定额在1740年至1790年间翻了一倍，从每天15担增至每天30担。强迫这些招募来的工人在相同的工资条件下工作更长的时间，还迫使工人的妻子和孩子帮助他们完成定额量。在这一时期，招募的工人和自由工人(mingas)的工资都减少了。这些革新到达了预定的复兴波多西银矿目标，银产量翻倍，但是当地人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营业税翻倍增长，商品摊派制和米塔制的持续滥用引起了强烈的不满。1777年，查尔斯三世派视察官何塞·德阿列切(Visitador Jose de Areche)到殖民地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他加紧收取贡赋和营业税，扩大进贡等级的范围，包括了梅斯蒂索人。这个改革每年增加了100万由印第安人贡献的比索。这些措施不仅让普通人更加艰难拮据，也给当地的首领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因为他们负责让普通人达到要求的进贡定额。阿列切自己也预料到了这场风暴的来临，他写道："缺乏公正的法官，印第安人的米塔制和省内的商业形成了这个美洲的躯体。官员们只对他们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如果这些可怕的滥用权力的状况不被改变，而这一切都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毁灭一切的时刻就近在咫尺啊。"

大众对无法忍受的境遇的不满，激发了弥赛亚式的梦想和快速恢复印加文明和印加帝国的期待。普遍的想象把印加帝国变成了理想的

状态，没有饥饿和不公，没有殖民地政府的压迫，也没有西班牙人的矿区、庄园和作坊。这个再造的印加帝国的乌托邦影像，对1780至1781年间的大规模起义有着重要作用，并且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这个起义是有先驱的：在1730至1780年间，在安第斯山地区共发生了大大小小128次反抗活动。从1742至1755年，一个叫做胡安·桑托斯(Juan Santos)的当地领袖，在他安第斯山脉东部山坡的根据地，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游击战争。当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坎奎(Jose Gabriel Condorcanqui)起义开始的时候，这些对于他来说是记忆犹新的。这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印加王朝后代和富有的地方首领人，受到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王家述评》关于帝国时代的描述的影响，孔多坎奎不断地进行没有结果的尝试，通过合法的途径为印第安人能够获得解脱。在1780年12月，他高举起义的大旗，在廷塔(tinta)省附近伏击了令人憎恶的督办安东尼奥·德阿里亚加(Antonio de Arriaga)，并在简单审讯后将他处以死刑。同时他给自己起用了印加帝国最后一个首领的名字，自称图帕克·阿马鲁二世(Tupac Amaru II)。在他的行动之前，还发生过加塔里(Catari)兄弟在玻利维亚境内发动的一次起义。截至1781年前几个月，秘鲁总督辖区的南部高地被起义的烈火点燃了。尽管各种革命运动缺乏一个统一的方向，起义的领导者们一般都会把图帕克·阿马鲁认为是他们的首领，在他死后还引用他的名字。

在起义的第一个阶段，图帕克·阿马鲁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目标。在一些公开陈述中，他宣称自己忠于西班牙国王和教会，这限制了他的一些诉求，包括废除米塔制、商品摊派制和其他税收制度，总督督办和对当地土著人的省级官员的任命。但很难相信一个受到良好教育，并与西班牙官场打了多年交道的图帕克·阿马鲁，竟然认真地相信他可以通过协商而从王室那里获得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当他处决了阿里亚加督办之后。他关于忠诚的主张很快就与一些文件产生了冲突，在这些文件中他把自己刻画成秘鲁国王；也与他发起的反对半岛西班牙人(只除了教士)的火与血的战争发生冲突；还与他为了掌握领土权而建



作为最后的印加帝国的后代，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坎奎给自己取了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这个名字。1780年，他和他的妻子米塞拉·巴斯蒂达斯（Micaela Bastidas）领导了反对腐败都督的具有广泛根据地的反抗运动。起义成为几十年后遍及美洲大陆的独立战争的前驱

立的政府发生冲突。毫无疑问，他对西班牙的忠诚是一个面具，借助这个面具，他可以利用仍然强大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多数存在于在西班牙国王虚构的恩惠中。也可以吸引克里奥尔人支持者按照他的意愿进行改革，或许万一他最终失败了，还可以减免对他的惩罚。

对于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在西班牙的学院里受过教育，并且全面吸收了西班牙文化的价值的人来说，起义的目标是一个独立的秘鲁国家的建立，但是在政治和社会组织机构上必然是欧洲式的。他的计划是要求从西班牙完全独立，驱逐半岛西班牙人，废除总督、检审庭和督

办的办公机构。印加帝国要被恢复，他自己担任国王，由其他库斯科贵族氏族的后代组成的贵族辅助统治。等级制度应该消失，给予图帕克·阿马鲁重要帮助的克里奥尔人会和当地人、黑人以及梅斯蒂索人一起和睦地生活。天主教会被保持为国家教会，并得到什一税的支持。图帕克·阿马鲁的经济计划要求抑制米塔制、商品摊派制、海关和消费税，也要求废除大庄园和奴役，但允许小型和中型规模的土地所有，并且鼓励贸易活动。总之，图帕克·阿马鲁的计划要求反对殖民，进行一场国家革命，该革命将建立统一的民族和一个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欧洲式现代国家。

但是当地响应他号召的农民对这些意义和目标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弥赛亚式的兴奋中，他们把这个当做"帕查库提"（pachacuti）——一场巨大的灾难或者"颠覆行为"，可以把现存的社会秩序颠倒过来，并且回到理想的印加帝国状态，在那里身份卑微的农民（runa）不会再居于社会底层，而是社会的主角。他们有报复的欲望，针对征服者的残酷行为和250年的残酷剥削，他们洗劫了庄园，杀死了他们的主人，没有想过这些人是克里奥尔人还是欧洲人，是西班牙人还是白肤色并穿着欧洲人衣服的人。随着起义的扩大，古老的异教宗教在沉寂和繁荣了百多世纪后，再一次从地上涌上来。图帕克·阿马鲁原本希望和天主教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外面时经常有两个牧师陪伴，也希望能得到库斯科的莫斯科索（Moscoso）主教的支持。但是他的农民追随者洗劫了教堂的圣衣和装饰物，并袭击和杀害神父，在围攻库斯科时，杀死了很多天主教修士。在1780年12月，图帕克·阿马鲁进入一个村庄，召集了这里的居民，他们用"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不需要牧师缠着我们"这样的话迎接他。他回答说，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就意味着"在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他们。

这种对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目标相反的理解，以及它的农民追随者共同导致了图帕克·阿马鲁政策的失败，没有形成在除了半岛西班牙人之外的所有社会和种族团体面前，一种共同的提前独立意识。农民起义的自发和无法控制的暴力，彻底终结了几乎不存在什么希望的，

没吸引克里奥尔人、像莫斯科索主教这样的改革教士和其他当地贵族支持的机会。至少20个领袖，出于对图帕克·阿马鲁的嫉妒，或者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地位，带领着他们的下属投奔了西班牙阵营。一个著名的保王人士是迭戈·乔金汉加(Diego Choquehanca)，他是秘鲁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库拉卡(Kuraka)家族的首领。16世纪和他有同样名字的祖先也曾宣誓效忠王室，并被西班牙王室封予萨利纳斯(de salinas)侯爵的头衔；到1780年乔金汉加在阿赞加罗(Azangaro)省共拥有[illegible]处庄园。"不用感到惊奇的是"，尼尔斯·雅各布森(Nils Jacobsen)说，"乔金汉加家族在图帕克·阿马鲁危机时保持着坚定的保王立场。"

尽管起义的主要基础是自由农民团体艾柳，但也吸引了一批梅斯蒂索人和少部分克里奥尔人，主要来自中间阶级的职位(工匠、店主、文士、城市里挣工资的人)，这些人中的一些构成了反抗队伍领导层的一部分。从廷塔的督办辖区开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库斯科谷地东南边缘地带附近，反抗运动爆发并深入到提提加加湖盆地，在那里进行了持续最久和最激烈的斗争。受到之前胜利的鼓舞，图帕克·阿马鲁带领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起义军向南挺进，很快就完全控制了普诺(Puno)省周围的高原地区。但他没能好好利用之前的胜利，战术错误导致了他的失败，包括早期进攻库斯科的失败，是受了他妻子米塞拉的鼓动。他的妻子是起义的女英雄，也是他的主要顾问，她想在西班牙援军到来之前，好好利用古代印加资源的政治和心理的重要意义。另外，反抗力量之间的交流是很贫乏的，王室军队拥有占很大优势的武力和组织。西班牙人同样调来了大量的亚纳科纳，他们帮忙突破库斯科的围困并镇压了起义。尽管开始有一些胜利，但起义很快就遭受了完全的失利。图帕克·阿马鲁，他的家庭成员，还有他的主要将领被逮捕并处以死刑，有些人还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在现在的玻利维亚境内，起义又持续了两年，在两次持久的对拉巴斯的围攻中达到了顶点(1781年3至10月间)。

最后的印加起义促使王室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把令人厌恶的

督办替换为监政官和行政助理，在库斯科建立一个检审庭，是图帕克·阿马鲁在起义前的另一个愿望。但是这些和其他的改革最终证明只是形式，而没有实质的内容。拿着卑微薪俸的很多人以前是督办，继续着之前的剥削，包括被《监政官法令》禁止的商品摊派制，只是在小范围内变得不那么频繁。同时，因为起义而造成的一些西班牙地主、教士和保王的库拉加人士的逃跑或死亡，让农民抢夺者占有了他们的地产。“在独立前的几十年中，”尼尔斯·雅各布森写道，“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渗入了高原地区的社会和财产关系中。那些认为是农民丢掉了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的果实的人，也只说对了一半。”

新格拉纳达的起义(1781)

新格拉纳达的社员(comuneros)起义，像在秘鲁一样，有其恶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根源。但不像秘鲁那般动荡，它被明确地限制在解决不满的目标里。市镇辖区一系列新税收的增加，包括烟草税和人头税，在索科鲁(Socorro)地区激起了反抗。索科鲁是北部农业和制造业的重要地区。反抗很快传到了其他地区。起义的改良主义精神在一个标语上表现出来：“国王万岁，混蛋政府下台！”

从它的组织和努力建立一个所有不满和反抗西班牙人的殖民地种群的共同战线来看(除了黑奴)，社员起义标志着一个进步，已不再是路线混乱的向南方前进的运动。在索科鲁镇，来自附近城镇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匠选举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Común)，领导了起义。每一个参加起义的城镇都有自己的领导委员会，以及被大众选举出来的指挥官。

在犹豫踌躇或者不情愿的克里奥尔人领导者的命令下，大量当地人和梅斯蒂索农民以及工匠到首府波哥大进行游行。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直到海岸的援军到来，王室检审庭才派遣了一个由大主教带领的委员会，去同社员代表谈判协商。运动呈现的群众特性和被压迫者团体的统一，在反抗代表提交给西班牙使团的条款表现出来，后者签了字，但后来又否认了；这些条款包括当地人和梅斯蒂索人进贡和营业税的

[illegible]，归还被[illegible]的土地，废除烟草新税，以及在官员职位上，克里奥尔人优先于欧洲人

1781年6月[illegible]日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实质上满足了所有反抗者[illegible]，通过一个特殊的宗教仪式，由大主教签署。但是，西班牙使团[illegible]签署了另一个文件，声称协议无效，因为是被强迫签署的。兴[illegible]的起义者解散了，回到自己的家里。只有何塞·安东尼奥·加[illegible](José Antonio Galan)——一个年轻的梅斯蒂索农民领袖，完整地保持着他的小部队，继续着起义。

[illegible]解散起义军队的目的之后，西班牙官员准备完全捣毁反抗力[illegible]安东尼奥·弗洛雷斯(Manuel Antonio Flores)公开否[illegible]，接着大主教对不满地区进行了牧师性质的访问，把[illegible]的改革[illegible]被确认的反抗会被永远罚入地狱的威胁结合起来，[illegible]部队进入该地区，并抓捕大量的人入狱。起义的[illegible]人领导者为了赶紧补偿他们的政治罪过，开始与王室进行合[illegible]发动了徒劳的起义，被一个叛变的领导人抓获并移[illegible]人。西班牙人判处他死刑，并在1782年1月30日处以绞刑。社员起义至此结束。

第八章　拉丁美洲的独立

焦点问题：

-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 拉丁美洲和北美洲为独立进行的斗争为什么不同？有何不同？
- 为地方自治进行的斗争与谁将统治地方进行的斗争有什么不同？
- 独立斗争的四个主要中心是哪里？它们之间对比如何？
- 独立战争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是什么？

波旁改革，以及18世纪欧洲经济的复苏，给西属美洲许多上层阶
158 级的克里奥尔人带来了物质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实质利益。开明的总督
和管理者带来了改进和改善，使殖民地城市的生活更加健康而且更有吸引力。教育的改革带来新课本和思想的涌入，而且更多到欧洲学习和旅行的机会扩大了克里奥尔年轻知识分子的视野。

然而，这些收获并没有加强克里奥尔人对母国的忠诚之感。相反，他们扩展了自己的期望，不满的情绪也在加剧。克里奥尔精英的一些部门增加的财富使其实际上从管理和教会部门被排除出去的处境更加难堪。同时，克里奥尔人庄园、种植园和牧场增长的生产量也顶着西班牙重商主义保持的贸易禁令压力。加拉加斯的管理者何塞·阿巴洛斯(Jose Abalos)警告说："如果他的主人没有给予他们(克里奥尔人)所

开放的贸易口岸，那么他就不要指望他们的忠诚。"同时，波旁王室的政策也否定了美洲制造商所需的反对欧洲严重竞争的保护。

独立战争的背景

克里奥尔人和半岛西班牙人

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克里奥尔人和半岛西班牙人之间的裂缝中得到了最尖锐的表达。这个冲突被不断到来的西班牙人所加剧了。在18世纪后期，典型的移民是贫穷但是努力工作和节约的巴斯克人和桑坦德人，他们成为半岛商人的学徒，经常是亲戚。随着时间的推进，他的能力得到认可，移民可能会与半岛商人家中的女儿结婚，并且最终获得商业的所有权。商人自己的一个克里奥尔儿子可能被分给一个拥有土地的地产；其他克里奥尔儿子可能会进入教会或者法律机构，这两个地方都挤满了职业人士。

因此，尽管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都存在着一些克里奥尔精英，但半岛西班牙人仍然继续统治着有利可图的进出口贸易和省份间的贸易。西班牙出生的商人，组织成有力的商人行会，同样也在投资矿产和西班牙官员在当地人开展的商品摊派生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合乎情理的是，一些上层阶级的克里奥尔人慢慢养成了贵族习惯和散漫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些都被半岛人所诟病。很多其他一般的克里奥尔人，无所事事地从事着薪酬微薄的地方助理神父和政府里的小官职工作，极度厌恶那些阻挡他们晋升的制度化歧视。

结果，尽管一些有钱有势的克里奥尔人与他们的半岛对手保持着良好关系，通过联姻和形成同盟而把彼此的经济利益融合起来，但是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似乎形成了互相仇视的两个阶级。半岛人有时候为他们的特权地位辩护，说是因为克里奥尔人天生的懒惰和无能造成的，这样的性格特征被有些西班牙作家描述成是由于美洲气候和土壤的有害影响；克里奥尔人则反驳，把欧洲人描绘成卑鄙和一味攫取的暴发户。这些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带着如此强烈的仇恨，导致一位新西班牙

的西班牙主教抗议一些年轻的克里奥尔人，"如果他们能把自己血管中的西班牙血统清除干净，他们会很乐意这样做的"。这也无可置疑地促进了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成长；在殖民地晚期年代到西属美洲旅行的洪堡男爵，报道了一个常见的口头语："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美洲人。"

启蒙运动思想进入拉丁美洲毋庸置疑导致了克里奥尔人不满的增长，但是各种影响的相对分量是不确定的。波旁君主们改革自身也通过多方的官方改革试图努力削弱克里奥尔人的力量，以提高殖民地生活的品质。这种团体的典型代表是省长胡安·安东尼奥·里阿诺(Juan Antonio Riano)，他把一种法国语言和文学品位引入到他的瓜纳华托省省会墨西哥城；他还负责"绘画和音乐兴趣的教育，以及学校中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这些学校以前曾被耶稣教会管理"。

很多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阅读被禁止的作品，如笛卡儿、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激进的哲学家；此外还有另一个拉丁美洲存在的传播启蒙思想的机构，那里有包括以笛卡尔、莱布尼兹和牛顿理论为基础的科学读本，它们在殖民地自由地流通着。到1800年，克里奥尔精英已经十分熟悉这些当代欧洲的先进思想。

美洲革命导致殖民地"危险思想"的增长。西班牙人目睹警惕美国施加给西班牙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威胁。西班牙在美国革命期间反对英格兰的战争中，不情愿地与法国联合起来，但是它与反抗者保持一定距离，拒绝承认美洲的独立，而且在合约的商议中，试图把美国困在阿勒格尼山脉以内，但是没有成功。1783年以后，美国增长的船只合法或不合法地触碰到了西属美洲的港口，和"扬基佬观念"一起，这些通道有时候引进了颠覆性的文章，比如托马斯·潘恩以及托马斯·杰弗逊的著作。

法国革命大概对克里奥尔人的思想起到了更大的影响。阿根廷革命家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Manuel Belgrano)回忆道：

> 自从我1789年在西班牙起，法国革命就引起了我思想的变化，尤其是与我通信的人之中，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的思想深深

地牢引着我，我看到了在任何地方都限制人享受上帝和自然赋予人的权力的暴君。



这个名为奴隶的海地人雕塑，手里拿着大砍刀，并且用海螺贝壳召唤他的同志反抗可憎的奴隶制度。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导致海地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整个美洲范围内引起了克里奥尔贵族内心的恐惧。

另一个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哥伦比亚人安东尼奥·纳里诺(Antonio Nariño)在1794年招来了西班牙人的怒气，因为他自己翻译并出版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他被关在非洲的监狱里长达10年，后来成为哥伦比亚独立运动的领导和创始人，并见证了革命的胜利。

然而法国革命很快采取了激烈的转向，克里奥尔贵族不再对把它当做榜样抱有幻想。一些西班牙殖民者和巴西的零散密谋都是受法国榜样的激发，但它们始终如一地只是小部分激进分子的工作，仅仅从一些底层阶级人群中吸引支持。法国革命直接造成的最重要结果是法属海地的奴隶在有才能的黑人和混血人领导下进行了反抗：图森·卢韦

蒂雷(Toussaint L'Ouverture)、让·雅克·德萨利纳(Jean Jacques Dessalines)、亨利·克里斯托弗(Henri Christophe)和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etion)。1801年,图森的部下德萨利纳宣布了海地新政府的独立。黑人革命者建立了拉丁美洲的第一块解放领土,同时结束了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但是这个成就非但不是促进了其他殖民地克里奥尔精英对独立的支持。因此,害怕脱离西班牙可能引发奴隶起义这个想法,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都加强了富有的古巴种植者阶级对西班牙的忠诚。

尽管存在一些秘密社团组织中的小密谋团体,他们在欧洲和美洲都有联络人,但是独立运动还是极可能在长时期内处于微不足道和无效的地位。直到1806年,当革命先驱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带领着大概两百名外国志愿者组成的部队,登陆到他的祖国委内瑞拉的本土海岸时,他的革命号召还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他不得不急忙撤退。如果外部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克里奥尔人的胆小和政治上的缺乏经验,以及人民的无动于衷,这些因素都将会推迟独立的到来。

革命的原因

在1808年到1810年逐渐酝酿成熟的革命危机的原因中,无能的查尔斯四世领导下的西班牙地位的下降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法国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明显地暴露出波旁改革的失败,改革试图纠正西班牙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缺陷。1793年,西班牙加入了英格兰和其他反对法国共和的国家联盟。斗争对于西班牙来说是惨烈的,1795年,王室最宠爱的大臣曼努埃尔·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签署了《巴塞尔和约》。第二年,西班牙变成了法国的盟友。英国人的海上力量迅速把西班牙船只从大西洋上驱赶出去,实际上切断了西班牙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严重的需求强迫西班牙允许中立国家船只与它的海外附属地进行贸易,这些船只从西班牙驶向国外港口。美国商人和船主是违反古老的限制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戈多伊在与英格兰战争中实施的灾难性政策还造成了其他结果。一个英国海军长官霍姆·皮帕姆爵士(sir Home Popham)自己主动进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舰队在 1806 年 4 月从好望角开往拉普拉塔，船上带有一批士兵。它沿着一大批英国商船的路线，这些商船急于想通过西班牙殖民地制度的裂口去倾销大量的商品。英国军队登陆后很快取得了一次敏捷的胜利。英国士兵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只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英国指挥官希望获得民众的支持，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保私人财产、自由贸易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但是，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联合起来驱逐他们不需要的解放者。一个志愿军队被秘密组织起来，袭击和击溃了占领的部队，逮捕了英国将军和他的 1 200 个下属。面对一个英国官员提出的作为英国的受保护国的独立理念的引诱，克里奥尔人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回答道：“要么是我们的旧主人，要么什么都没有。”

同时，英国政府向拉普拉塔派遣了强大的援军。当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狭窄街道时，第二次的入侵力量遇到了有准备的密集火力进攻，损失严重，终被击退。英国指挥官被顽强的抵抗镇住了，放弃了斗争，并且同意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先前占领的蒙特维迪亚城撤离。经验丰富的英国军队被由帕特里西奥斯军团打先锋的民兵击败，这是阿根廷独立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克里奥尔人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不会情愿再一次放弃了。

在欧洲，西班牙的痛苦达到了顶峰。领导着法国的拿破仑，渐渐把西班牙降级为一个没有用处的附属地。1807 年，拿破仑被葡萄牙拒绝加入他的对英国船只关闭港口的大陆封锁政策激怒，在查尔斯四世的许可下，法军可以通过西班牙入侵葡萄牙。法国军队横扫半岛；当他们接近里斯本时，葡萄牙王室和宫廷在英国的护航下逃往巴西。10 万法国军队继续占领了西班牙城镇。他们的出现以及皇家宠爱的戈多伊的亲法国政策，引发了民众的不满，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暴动，强迫查尔斯四世退位，让位给他的儿子费迪南德。而拿破仑则作为父子间争论的调解人进行干预，并提供帮助。愚蠢的是，这对父子毫无疑心地接受了

拿破仑的邀请，并与他在法国城市巴约纳(Bayonne)进行协商。在那里，拿破仑强迫他们两个人都退位，支持他自己的弟弟约瑟夫作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拿破仑之后召集了一次西班牙王公的大会，这些王公们都没骨气地支持他的独裁。

162 西班牙人还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1808年5月2日，一个反对法国占领军队的起义在马德里开始了，并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国家。起义者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里，建立了地方管理洪达。后来，一个中央洪达以被俘虏的费迪南德七世的名义，制定了抵抗运动的方向。它迅速与英格兰和解。当西班牙军队与受过极佳训练的法国军队在常规战役战场上战斗时，通常遭受失败，但是游击队的战事困住了大量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拿破仑对征服领土的控制极其不稳定。

然而到1810年代早期，法国的胜利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法国军队占领了安达卢西亚，并且威胁到了西班牙手中的最后一个城市加的斯。中央洪达这时自行解散，并任命一个摄政政府统治西班牙；这个机构超过了它的权力范围变成了一个国家议会，该议会在1810年到1814年间在英国海军枪杆的保护下在加的斯召开和运行。因为多数的代表来自加的斯，因而这里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氛围很难成为西班牙的代表，他们的观点比整体西班牙人要更解放。1812年通过的议会宪法决定实行提供了有限君主制，承诺演讲和集会自由，并且废除了宗教裁判所。但是议会几乎没有对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做出让步。它邀请西属美洲人代表一起进行商议，但是很清楚的是，半岛人的统治和商业垄断制度会依然没有触及。

在西属美洲，克里奥尔领导人期待很快发生西班牙的垮台，考虑着如何把这个剧烈的事件冲击作为他们的优势。那些事件已经把自治或者完全独立的理想转变成了现实的目标，这个理想直到当时还是一个遥远的期望。自信于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军队将会粉碎所有反对势力，一些克里奥尔人领导者准备在忠诚于“受人爱戴的费迪南德”的前提下，开始把权力接管到自己手中。他们借鉴西班牙地区洪达的榜样调整自己的行动，洪达以被逮捕的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西班牙官员被

人密使的到来打晕了,这些密使宣布费迪南德和约瑟夫·波拿巴都是西班牙的合法君主,这个困惑也让克里奥尔人占了便宜。

在1810年春天,随着加的斯沦陷的明显迫近,克里奥尔领导人采取了行动。他们控告总督和其他王室官员对费迪南德不忠诚,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和波哥大组织了民众示威,强迫这些政权向由克里奥尔人控制的地方洪达移交统治权力。但是克里奥尔人期望的勾结式的和平转变注定要失败。他们的保王声明,并没有骗到真保王的西班牙群体,在爱国主义者和保王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战斗。

南美洲的解放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斗与美国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个剧变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二者都试图推翻一个母国的统治,因为这个母国的重商主义制度限制了殖民地经济飞速成长的进一步发展。这两次风暴都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克里奥尔人领导,这些克里奥尔人从启蒙运动者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口号和理想。二者都是国内战争,而且民众的大部分群体都站在母国一边。二者最终的胜利都部分受益于外国的帮助(不管,北美洲的反抗者得到来自法国盟友的帮助多于拉丁美洲从外部接收到的帮助)。

然而,两次革命的不同之处也如此明显。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不像美国革命那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或者策略,不只是因为遥远的距离和其他地理上统一的障碍,还因为拉丁美洲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的隔离。而且,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缺乏如英国殖民地更民主和流动的社会提供的强大群众基础,克里奥尔人精英自身,就是进行剥削的白人少数群体,害怕反抗的当地人、黑人和混血阶级,因此自然试图在斗争中把这些人的干预降到最低。这种缺乏统一的地区和阶级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拉丁美洲不得不进行如此长期的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是像西班牙这样被很多国内和国外问题削弱和困扰的政权。

独立斗争有两个主要中心。西班牙南美洲有两个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一股解放浪潮从委内瑞拉开始向南流

动；另一个则从阿根廷开始向北流动。在秘鲁，大陆上西班牙最后的防御工事处，这两股水流汇合在一起了。巴西完成了迅速和相对和平的从葡萄牙的分离。最后，墨西哥不得不在获得独立以前，进行困难而曲折的旅途。

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是南美洲北部解放斗争的象征和英雄。他17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来自一个拥有大量土地、奴隶和矿区的富有克里奥尔贵族家庭。他的知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典阅读的影响。1803至1807年间，他在欧洲国家的游历进一步扩展了他的知识视野。他回到加拉加斯，并很快加入旨在推翻西班牙政权的密谋活动中。

1810年4月，加拉加斯的克里奥尔人党组织了一次示威，强迫总督辞职。一个克里奥尔人掌权的洪达誓言要保卫被逮捕的费迪南德国王的权力，但是它保证的忠诚既没有骗倒当地的西班牙人，也没有骗倒加的斯的摄政委员会。一个相当数量的种植者组成的富有克里奥尔人阶级也反对独立，当独立获胜的时候，很多人移民到古巴或者波多黎各。爱国者也对该遵循哪些政策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赞同立即宣布独立，比如玻利瓦尔，而其他人赞成推迟这个事宜。

也许为了不让玻利瓦尔挡他们的路，革命洪达把他派到英格兰请求英国的帮助。他没有成功地完成任务，但是说服了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返回委内瑞拉并且指挥爱国者军队。1811年，第一届委内瑞拉国会宣布了国家的独立，并提出了共和宪法的框架，这个宪法废除了一些特殊的特权(fueros)和当地人的进贡，但是保留了黑奴制度，使基督教成为国教，并把完全公民权仅赋予于有产者，但该项条款并不适用于自由的黑白混血人种。

爱国者和保皇者之间爆发了战斗。除了半岛人，摄政委员会还从波多黎各派出军队，再加上克里奥尔贵族的一部分，保皇者的事业还受到了一些自由黑人和混血儿的支持，这些人被共和国否认他们作为全



由何塞·吉尔·德卡斯特罗(Jose Gil de Castro)绘制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肖像。其中他的外貌和当代对玻利瓦尔的描述几乎一致。

体公民的一部分被激怒了。很多地区的黑奴利用混乱的形势进行起义，同时杀戮克里奥尔人和半岛西班牙人庄园主。但是多数民众还是保持中立，随着皇家或者共和国征兵的临近而逃离他们的村庄；如果被征用，他们会在可能的时候当逃兵或者站到另一边，如果那边的希望更大些。

在爱国者一方，主要将领米兰达和他的年轻军官们之间出现了分歧，尤其是玻利瓦尔，他不满米兰达的军事保守和犹豫不决。在这些争论期间，1812年3月26日发生了一次地震，导致加拉加斯和其他爱国者领土上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波及西班牙统治下的一些地区。保皇者教士宣称这次灾难是神对反叛者的惩罚。一系列军事失败使革命事业的破灭画上句号。

随着自身军队力量的解体，米兰达试图与保王派指挥官协商一个条约，然后带着共和国的部分财产逃离这个国家。他可能原本打算继

续独立的事业，但是情况看上去却是他希望保全自己。玻利瓦尔和他的一些同志，把米兰达的行为当做一种背叛，在他开始行动之前就抓住了他，并把他交给西班牙人。四年后，米兰达在西班牙的监狱中死去。玻利瓦尔因为家族一位朋友的影响而从西班牙的反击中幸免，并且被安全引导出来，离开了那个国家。

玻利瓦尔来到新格拉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这个地方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爱国者的统治下。这里像委内瑞拉一样，克里奥尔领导人也为政府的形式而争吵。他抵达两个月后，玻利瓦尔对新格拉纳达的市民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他要求统一，指责联邦制度在战争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并催促作为哥伦比亚人安全的必要而解放委内瑞拉。他被派指挥一支小部队去围剿马格达莱纳河的敌人军队。他采取了一个以快速运动、进攻性战术和士兵可通过这些优点而得到提升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背景和肤色。

胜利给玻利瓦尔带来了哥伦比亚军队的将军头衔，而且他解放委内瑞拉的计划也得到了同意。在历时三个月的战役中，他率领了人穿过委内瑞拉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向加拉加斯挺进。在委内瑞拉，西班牙人开展了反对所有爱国者的恐怖运动。在前往加拉加斯的途中，玻利瓦尔在特鲁希略宣布要展开一场反对所有西班牙人的你死我活的战争。随着玻利瓦尔接近首都，西班牙军队开始撤退。他胜利进入加拉加斯，并从城市委员会收到了解放者的称号；不久，恢复共和后心存感激的国会进行选举，赋予他独裁的权力。

玻利瓦尔的成功是短命的，因为国内外的局势发展开始反对他。1814年拿破仑的衰落还给了费迪南德七世西班牙的王位，使西班牙军队可用于西属美洲，并且提升了王室事业的重要性。同时，共和国的政策疏远了下层阶级的大部分群体。克里奥尔贵族顽固地拒绝给予奴隶自由。结果，奴隶继续斗争，但独立于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之外，共和派力量不得不转向一些奴隶起义的地区，进行严酷的远征。

委内瑞拉高原（llanos）上的牛仔（Llaneros）也转而反对共和国，因为农业法令没有得到所涉及的地主的书面认可，试图结束在平原地区

[illegible]控制牛仔的农业法令。这些法令还试图把牛仔转变成半奴隶的农奴，要求他们携带身份证并且归属于一个牧场。这些对他们[illegible]权利[illegible]的打击激怒了这些牛仔。在令人畏惧的何塞·托马斯·博韦斯(José Tomás Boves)的领导下，一大批牛仔，用令人害怕的[illegible]进行武装，入侵了高原地区，猛然袭击了加拉加斯，粉碎了所有抵抗。1814年7月，玻利瓦尔迅速放弃了这个城市，并且带着剩余的军队[illegible]哥伦比亚撤退。尽管博维斯在1814年后期的战役中战死，他还是毁灭了委内瑞拉的"第二共和国"。

[illegible]在1814年9月抵达卡塔赫纳，发现哥伦比亚处在混乱的边缘。[illegible]入侵战胜，还有省份间的互相争吵，而且反抗[illegible]。在确定了当下的形势已经没有希望了之后，[illegible]1815年5月离开那里前往英属牙买加岛屿。同时，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在巴勃洛·莫里略(Pablo Morillo)将军的领导下登陆[illegible]，完成了殖民地的再次征服，然后开始了包围卡塔赫纳的征[illegible]断、这个城市在12月投降了，哥伦比亚其他[illegible]个[illegible]也在战争中下来。在西属美洲的所有省份中，只有阿根廷还保持着[illegible]。要是费迪南德做出让步，把白人的同等权利赋予支持他事业的[illegible]人种，那么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可能会延续得更长。但是保守的费迪南德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玻利瓦尔仍然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独立会不可避免地获得胜利。他从牙买加寄出了一封有名的信，在这里他重申了那个信念，并提供了一个西属美洲形势和前景的精彩分析。他嘲笑西班牙的能力——"年[illegible]"，妄图把西属美洲保持为永久的附属地。玻利瓦尔还研究了大陆的政治未来。他认为，君主对于拉丁美洲的传统是外来的；只有一个共和国政权才能被它的人民接受。每个地区单独的政府是不切实际的，应当根据气候的差异、地理的多样性、冲突的利益和不同的特征进行划分。玻利瓦尔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结构，大胆地预测了不同地区的命运。比如，智利对于他来说，似乎有一个民主的未来，而秘鲁注定会遭受独裁，因为它拥有"两个与每个公正和自由原则都冲

突的因素：金子和奴隶。”

玻利瓦尔从牙买加来到海地，在那里他得到了黑白混血人总统亚历山德烈·佩蒂翁(Alexandre Petion)同情的聆听，以及一些物质性支持。作为回报，总统要求玻利瓦尔在他能够解放的土地上给予奴隶自由。在1816年3月，玻利瓦尔和一小队追随者登陆委内瑞拉海岸外的玛格丽塔岛。他试图在大陆上获得一处立足之地的两次努力，都被轻松击退了，玻利瓦尔很快又退回到西印度群岛。他反思了这次的失败，得出结论，认为入侵防御稳固的委内瑞拉西部海岸的尝试是一个错误，并且决定在奥里诺科河谷区域建立根据地，那里远离西班牙力量的中心。流动的爱国者部队仍然在这个地区活动，玻利瓦尔希望赢得牛仔们的拥护，这些牛仔不再对他们的西班牙盟友抱有幻想。1816年9月，玻利瓦尔从海地驶向奥里诺科河三角地，从那里他到達了上游的小镇安戈斯图拉（今玻利瓦尔城），并把那里作为他的总部。

战争的潮流现在开始涌现出对他有利的一面。爱国者游击队接受了他的领导。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主要牛仔首领何塞·安东尼奥·帕埃斯的支持。欧洲的发展也有利于玻利瓦尔。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使一大批英国士兵无所事事，这些老兵中的许多人来到了委内瑞拉，组成了以在战役中表现英勇著称的英国军团。英国商人提供贷款使玻利瓦尔能够在接下来的运动中确保人员和武装。费迪南德七世的顽固态度也很有帮助，他拒绝对殖民地居住者做任何妥协，这导致英国政府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始用更为友好的眼光看待西属美洲独立的前景。

在1819年决定性战役的前夕，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召集了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大会赋予他独裁的权力。他向这次大会提交了一个委内瑞拉宪法计划，在计划中，他督促废除奴隶制，并且把土地分配给革命士兵。但是提出的宪法还是有一些非民主特征，其中包括一个拥有实质性国王权力的总统，一个世袭的参议院，而且把投票权和官方职位限制在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之中。大会忽视了玻利瓦尔的改革建议，但是选举他为共和国的总统，并且采纳了一个包含了他很多理想的宪法。

然而，战争还是要取得胜利。玻利瓦尔为委内瑞拉解放和哥伦比亚设想的大胆策略，从完全出乎意料的方面给西班牙力量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当帕埃斯手下的牛仔骑兵分散开来，并且在委内瑞拉北部用敏捷的攻击袭击了西班牙部队的主要部分时，玻利瓦尔带着2 5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沿着蜿蜒的奥里诺科河和阿劳科河前进，穿过平原，然后攀越险峻的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一直到达新格拉纳达的首都波哥大所处的高原地区。在博亚卡(Boyaca)地区，爱国者军队用短暂而锋 166
利的攻击出其不意地击败了保王者，抓获了1 600名战俘，收获了相当多的装备。波哥大没有进行任何防御，玻利瓦尔在人民的欢呼中进入了首都，这里的人民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遭受着苦难。

玻利瓦尔留下他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桑坦德尔(Francisco Santander)去组建一个政府，然后很快离开安戈斯图塔，准备委内瑞拉的解放。然后，令人振奋的消息从西班牙传来：1820年1月1日，一个等待运往南美的军团发生了反叛，开始了一次起义，强迫费迪南德恢复1812年自由宪法，并且放弃政府再次建立殖民地的计划。这个消息给爱国者带来了欢乐，但给委内瑞拉保王分子带来的却是沮丧和被抛弃感。1821年7月玻利瓦尔和帕埃斯的部队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博博(Carabobo)粉碎了最后一个重要的西班牙力量，只剩下一些海岸城镇和要塞还掌握在被围困的保王者手中，委内瑞拉已获得了自由。

玻利瓦尔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南部。只要西班牙人还掌握着安第斯中部地区大量山地的防御工事，西属美洲的独立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当玻利瓦尔准备从波哥大对基多进行一次重要进攻时，他派遣了有能力的年轻助手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Antonio Jose Sucre)，从哥伦比亚太平洋海岸的海上夺取瓜亚基尔港口。在苏克雷到达之前，瓜亚基尔的克里奥尔人党举行了起义，宣称独立，并且把港口置于玻利瓦尔的保护下。随着阿根廷将军何塞·德圣马丁(Jose de Sam Martin)率援军的到来，苏克雷的势力更加壮大，他向厄瓜多尔高地挺进，在靠近基多的皮钦查(Pichincha)山的山坡上击败了西班牙军队。同时，玻利瓦尔从波哥大开始向南部挺进，沿着考卡(Cauca)河谷沿岸，遇到了顽

强的保王军抵抗，这次抵抗抵消了苏克雷在皮钦查的胜利。那些组成前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省份——未来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共和国——现在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1821年在玻利瓦尔的倡导下，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建立联盟，并且联合成一个叫做哥伦比亚或者大哥伦比亚的国家。

南部解放运动和圣马丁

玻利瓦尔领导的解放运动与从阿根廷向北推动的运动结合起来的时机已成熟。自从1806至1807年被英国入侵击败后，克里奥尔人尽管在名义上效忠于西班牙，但实际上控制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入侵英雄和当时的总督圣地亚哥·利涅尔斯(Santiago Liniers)，与克里奥尔人领导层进行全面合作。由塞维利亚洪达派遣的一个新总督代替了利涅尔斯，与利马的总督联合起来粉碎了秘鲁高地(玻利维亚)不成熟的克里奥尔人起义。但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进程缓慢，因为他意识到克里奥尔人至高的权力。在他们的压力下，他颁布了一个法令，允许与反法联盟国家和中立国进行贸易，但遭到加的斯垄断代表的坚决反对。但是这个让步并没有拯救西班牙政权。革命仍是空中楼阁，正如他们中一个成员说的那样，克里奥尔人领导者只是在等着果实的成熟。

在1810年5月，当得知法国部队已经进入塞维利亚并且威胁到了加的斯，秘密的爱国者社团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强迫总督召集一次公开的城镇会议，决定殖民地政府的未来。阿根廷第一次国会选举罢免了总督，建立了以费迪南德名义统治的洪达。革命洪达正试图巩固它对广阔总督辖区的控制。内陆省份在激烈的斗争后顺从了。穿过拉普拉塔河位于东岸的蒙特维迪亚(位于现代乌拉圭)，1814年之前正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该年便陷入了阿根廷的围攻中。革命洪达遇到了来自乌拉圭潘帕斯大草原加乌乔牧人的更顽强抵抗，这些人由何塞·赫尔巴西奥·阿尔提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领导，他要求乌拉圭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松弛联邦联系中得到自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

[illegible]也不与阿尔提加斯的加乌乔牧人的民主扯上任何关系，于是，一场内战开始了。结束之时，阿尔提加斯被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葡萄牙[illegible]属于巴西的战火中，他不得不逃到巴拉圭。乌拉圭直到 1828 年才获得独立。

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内另一部分的巴拉圭克里奥尔贵族，同样怀疑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目的，并且击败了派去解放亚松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之后，亚松森的克里奥尔人发起义了，罢免了西班牙总督，并宣布巴拉圭独立。这次起义的重要人物是杰出的何塞·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Jose Rodriguez de Francia)，他很快成为该国的第一个著名的独裁者。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解放秘鲁高地北部山区的努力同样失败了。爱国者军队两次突然进攻这个地区都被击败，入侵者被逐了出来。险峻的地形、长距离的通信和玻利维亚当地人的无动于衷都导致了这些失败。

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还有其他严重的内部问题。一场争论爆发了，一方是[illegible]以及社会改革的拥护者，脾气暴躁的马里亚诺·莫雷诺(Mariano Moreno)及其自由主义支持者，另一方是由大地主康涅利奥·萨维德拉(Cornelio Saavedra)领导的保守党派。这个争论预示着独立后阿根廷历史头几十年的主要裂缝，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歧。1813 年，国民议会给了这个国家一个名字——拉普拉塔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 of La Plata)，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米塔制、委托监护制、贵族头衔和宗教裁判所。然而，一份独立的声明拖到 1816 年才被宣布。

同样在 1816 年，军事人才何塞·德圣马丁打破了长期的军事僵局。圣马丁出生于今阿根廷北部地区，是一名西班牙军队的上校，当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具有 20 年的军队服役经验。他很快来到拉普拉塔，把他的利剑贡献给爱国者政府。他很快被升为秘鲁高地的军队指挥，这支军队在图库曼彻底完败在保王者手中，现在正处于恢复元气的阶段。他断定到即将到来的在秘鲁高地对西班牙地位的攻击注定会失败，便提出了一个为获得完全胜利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

了联合省执政胡安·马丁·德普那雷多(Juan Martin de Pueyrredon)的支持。圣马丁建议进行一次为解放智利而跨越安第斯山的行军，西班牙在智利的反击已经推翻了革命政权，这个政权是1810年由贝尔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和其他爱国者们创建立的。此计划如若成功，拉普拉塔和智利的联合力量可从海上袭击秘鲁。

为了在西班牙的眼目下掩饰自己的计划，并且争取大规模组织的时间，圣马丁获得了一个职位，即作为库约(Cuyo)省省长，该省首府门多萨(Mendoza)位于战略通道的东部终点处，这个通道穿过安第斯山区到达智利。他花了两年时间招募、训练和装备他的安第斯军队。像玻利瓦尔一样，他曾经承诺保护黑人和混血人志愿兵的自由，后来宣布他们是他最好的士兵。智利的难民为了躲避西班牙在他们国家的反击，同样加入了他的军队。

圣马丁有条不紊并且全面地要求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提供军队、军火、食物和各种各样的装备。1817年1月，军队开始了跨越冰冻的安第斯山通道的征程，其难度可与玻利瓦尔攀爬哥伦比亚高地相比。21天后，军队涌入智利的土地。西班牙军队2月在查卡布科(Chacabuco)的决定性失败开启了圣马丁进入圣地亚哥的大门。他在迈普(Maipu)又赢得了一次胜利(1818)，这是一场结束智利独立最后威胁的战役。圣马丁拒绝了智利人提出的要他担任共和国最高统治者的邀请，这个位子是由奥希金斯制定的。圣马丁开始准备从海上攻击5 500英里以外的利马。

他执行的计划需要建立一支海军。他招募了一批英国和美国的船只，并且邀请了一名尽管古怪但是很有能力的海军长官托马斯·柯西兰爵士(Thomas, Lord Cochrane)组织他的海军。1820年8月开往秘鲁的远征由7只战舰和18只运输舰的舰队组成。圣马丁让他的军队在利马以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登陆，但是推迟了向秘鲁首都的移动。他希望通过经济封锁、宣传和与西班牙官员的直接谈判获得胜利。利马贵族、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希望避免武力斗争，因为那些斗争可能引起当地人和奴隶的反抗，这就帮助了圣马丁的策略。1821年6月，西

王军队撤离利马，向安第斯山区撤退。圣马丁进入首都，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宣布了秘鲁的独立。

但是他的胜利远远没有完成。他还要对付反革命的阴谋和利马上层精英对其社会改革项目的抵抗，这些改革包括结束当地人的贡赋和给予奴隶的孩子以自由。圣马丁在1821年8月取得军队和政权的最高权力，这又增加了小宗派的反对。同时，一支规模庞大的西班牙军队在利马附近进行演练，向圣马丁提出战争挑战，但他不敢用比自己规模小很多的军队去参与战斗。阴谋和围绕在他身边的敌意氛围让圣马丁失去信心，他开始相信只有君主才能带来西属美洲的稳定，他派了一个密使去欧洲，为秘鲁的王位寻找一位王子。

这也就是圣马丁前去瓜亚基尔的背景。1822年7月26、27日他在那里与玻利瓦尔进行了会晤。会议的议程包括几点。一是关于瓜亚基尔的未来。圣马丁宣布秘鲁拥有这个港口城市；然而玻利瓦尔已经把它并入大哥伦比亚，圣马丁面对的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个议题是个西属美洲的政治未来。圣马丁主张把君主作为新国家出现混乱的解决方法；玻利瓦尔则相信一个形式上共和、而内容上为寡头政治的政府制度。但是两人面前摆着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击败秘鲁的西班牙力量而完成大陆的解放。

圣马丁在会议后从公众生活突然告退，但两个解放者都不愿意透露在那个会议上说了什么；而稀缺的真实会议档案记录又用一种神秘的氛围包裹了这次会议，从而产生了两个相反而且偏袒性的解释。一种观点是阿根廷历史学家赞成的，即圣马丁来到瓜亚基尔寻找军事帮助，但是被玻利瓦尔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愿意与对手分享将独立战争进行到底的光荣。于是圣马丁毅然决定离开秘鲁，并允许玻利瓦尔继续他已经开启的事业。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则认为圣马丁来到瓜亚基尔主要是想把瓜亚基尔收归秘鲁。许多历史学家否认圣马丁向玻利瓦尔要求更多的部队，并坚持他是因为个人原因离开秘鲁的，与这次会议无关。

两种解释都趋向于削弱两个解放者的形象和现实主义情感。圣马

丁不是一个烈士，玻利瓦尔也不是一个富有野心的阴谋诡计者，为了自己对权力和光荣的热情而牺牲圣马丁。圣马丁一定已经理解玻利瓦尔只想整合所需的军事、政治和心理资产，用来清理秘鲁宗派系统的老巢，并最终获得战胜西班牙在山地地区军队力量的最终胜利。鉴于利马的形势，圣马丁的出现只能抑制那些任务的完成。考虑到这些，玻利瓦尔独占战争领导的地位以及圣马丁退出的决定反映了他们对秘鲁问题以及所需解决方法的真实估量。

圣马丁返回利马发现在他缺席的期间，他的敌人已经[illegible]，通过把他的主要改革大臣贝尔纳多·蒙特古多(Bernardo Montegudo)驱赶出国家来打击他。圣马丁没有试图重获他的权力。1822年9月，面对第一届秘鲁国会，他宣布辞去保护者之职，并于当晚离开。他经由智利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智利，他的朋友奥希金斯也已处于下台的边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illegible]陪伴下，他在1823年底航行进欧洲。1850年他在法国去世。他被美化成阿根廷的国家英雄是25年以后的事情。

圣马丁的离开使利马和它控制下的领土陷入了被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重新征服的严重危险之中。玻利瓦尔没有采取行动把利马互相争吵的派系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让这个形势一直恶化到1823年5月，此时秘鲁国会向他请求帮助。然后，他派苏克雷带着只有几千人出发了，因为他想让利马的政治家屈服于他的膝下。西班牙军队占领首都带来的恐慌让克里奥尔领导人接受了玻利瓦尔的绝对统治。

玻利瓦尔在1823年9月到达秘鲁。他要求用近乎一年的时间达到政治的稳定，并将他手下的军队和在他指挥下的不同国家的军队合并形成一支联合力量。在一个月艰难的高山地区的跋涉中，海拔极高的高度让玻利瓦尔和他的手下都遭受了高原反应。爱国者的骑兵军团和保王者的军队在胡宁(Junin)湖附近的地方进行了战斗，西班牙人战败(1824年8月6日)。保王军指挥官何塞·德坎狄拉克(José de Canterac)向库斯科撤退，留下苏克雷为指挥官，玻利瓦尔返回利马召集援军。苏克雷在阿亚库乔(Ayacucho)最后的重要战事中获得了战

[illegible]在山地和海岸一些地点只有零星的抵抗有待扫荡。大陆解放的事业完成了。

巴西独立的取得

与西属美洲的政治独裁、经济紊乱以及军事毁灭相比，1808至[illegible]进程则是一个相对没有流血的转变过程。巴西[illegible]出现在18世纪，当时作为巴西人对葡萄牙为了母国[illegible]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一种反应。第一个反[illegible]谋于1788至1789年在米纳斯吉纳斯组织起[illegible]控制金和钻石的生产和价格，同样还有繁重的[illegible]；这个地方还存在一个知识分子团体，他们在欧[illegible]运动的理想。但是这个密谋从来没有超越讨论[illegible]被发现并且粉碎了。其他在里约热内卢(1794)、[illegible](1817)的密谋，以及伯南布科的短暂起义[illegible]部分克里奥尔精英，甚至一些下层阶级的[illegible]密谋和起义都夭折了或者被很快粉碎。巴西在[illegible]对葡萄牙的反抗可能引起奴隶的反抗，都有[illegible]。如果不是欧洲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巴西的独立可能还会被推迟很久。

法国入侵葡萄牙(1807)，紧接着是葡萄牙王室逃到里约热内卢，给巴西带来了大量好处。确实，王室的迁移实际上意味着巴西取得了独立。葡萄牙王子——摄政王若昂(Joao)打开了巴西港口，向友好国家的贸易开放，允许了地方工业的兴起，并建立了巴西银行。1815年他把巴西提升到和葡萄牙同等的王国法律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巴西的新地位是用一种独立形式替换了另一种的独立。从葡萄牙的控制中脱离出来后，巴西又处于英国人的经济统治下，英格兰在1810年的《斯坦福条约》中获得了重要的关税优惠以及其他特权，其结果就是廉价机器生产的商品的涌入使该国的手工品产业陷入困境。

巴西精英对巴西的新角色以及对他们阶级不断增长的教育、文化

和经济机会表示满意。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和不满混合在一起，不满来自于成千的葡萄牙侍臣和随从，他们跟着王室来到这里，并且与巴西人竞争工作和利益。在他们看来，巴西的葡萄牙商人已经尝到了里斯本贸易垄断转移的苦头。因此，巴西的独立也激化了马松博人(mazombos，出生在巴西的葡萄牙人)和雷诺伊人(reinois，出生于巴西并且忠诚于葡萄牙王权的精英)之间的冲突。

与母国分离即将来临之际，1820年葡萄牙革命爆发。葡萄牙革命者为王国制定了自由主义宪法框架，但是一涉及巴西，他们立即很保守。他们需要唐·若昂(Dom Joao)马上返回里斯本，结束他一手策划好的双重君主制度，并且恢复葡萄牙的商业垄断。唐·若昂的[illegible]和犹豫不决，让他不知道该转向何处。在他那些急于返回葡萄牙并重获他们失去的地产的侍臣的压力下，他最终批准了新的宪法，并返回葡萄牙。然而，他留下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唐·佩德罗(Dom Pedro)作为巴西的摄政王，并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如果发生巴西人要求独立的事件，建议他担任运动的领导人并且把巴西的王冠戴到自己头上。佩德罗也从何塞·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Jose Bonifacio de Andrada)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建议，后者是一名巴西科学家，他在葡萄牙的停留使他对葡萄牙的殖民改革能力不再抱有幻想。

很快，葡萄牙议会想要把时钟往回调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它企图通过废除1808年以来巴西赢得的所有自由和让步。其中有一项法令坚持要唐·佩德罗马上从巴西返回完成他的政治教育。事件的步伐在1822年迅速前行。1月9日，在何塞·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和其他巴西顾问的敦促下，唐·佩德罗拒绝葡议会要求他返回葡萄牙的命令，并发表了他著名的"我留下"宣言。他的那些顾问认为这是一个向独立转变的绝佳机会，并且不会受到民众的干预。9月7日后来被所有巴西人当作独立日，在这一天，他发表了更著名的"伊皮兰加呼声"(cry of Ipiranga)："独立或者死亡！"1822年12月，在击败了葡萄牙军队的轻微抵抗后，唐·佩德罗被正式宣布为巴西的立宪皇帝。

墨西哥的独立之路

在新西班牙，和其他殖民地一样，1808 至 1810 年间的波旁王朝危机激励了一些克里奥尔领导人为了能在“费迪南德的名义”下，实施自治而进行独立的斗争。但是，在墨西哥，独立运动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暴露出明显的分歧。一方是那些仅仅为了争取管理国家而斗争的人们，另一方则是那些反对国内统治而斗争的人们。这些平民大众，不再保持冷漠，而是加入到了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试图把两个精英之间的私人争斗转变成初期的社会革命。

1808 年 7 月，拿破仑逮捕查尔斯四世和费迪南德七世以及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消息，传到了墨西哥城，从而在墨西哥精英间激起了强烈的争议。面对西班牙迫在眉睫的垮台前景，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一样都希望争取权力，以保证他们的团体可以控制新西班牙，而不管西班牙危机的结果怎样。克里奥尔人先行动了。墨西哥城市议会是一个克里奥尔人的据点，他们要求总督召集一次议会，由克里奥尔人控制的市议会和其他代表大会——由不同精英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代为管理墨西哥，直到费迪南德七世的被迫退位无效和取消，并重新获得王位。总督何塞·德伊图里加拉伊(Jose de Iturrigaray)支持这个号召，指出西班牙正处于“无政府状态”。

必须强调的是，支持建立一个殖民地议会的保守并且拥有土地的精英，期望的是自由贸易和自治，或者在西班牙帝国的范围内进行地方自治，而不是独立。他们没有打算在战斗中拿起武器，因为这些战斗很可能带来被压迫阶级的危险干预，而给他们自己的人身和经济生存带来危险。重要的克里奥尔思想家弗雷·梅尔乔尔·德塔拉曼特斯(Fray Melchor de Talamantes)向筹备中的议会推荐的改革表明了克里奥尔精英野心的局限：废除宗教裁判所和教会特赦权(fuero，教士从公民法庭获得赦免的特权)；实施自由贸易，以及促进矿业、农业和工业改革的措施。

然而，克里奥尔人为了地方自治和自由贸易的运动，给半岛商人带

来了威胁，这些商人的财产依靠现存的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封闭商业系统而持续。1808年9月15日的晚上，商人发起了政变。富有的半岛商人加布里埃尔·德耶尔默(Gabriel de Yermo)领导一个军团的民兵先发制人，赶走了伊图里加拉伊总督，并且逮捕了带头支持自治的克里奥尔人。一系列短暂的半岛人统治的政权掌握着权力，直到一个新总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贝内加斯(Francisco Javier de Venegas)在1810年9月从西班牙来到这里。

克里奥尔贵族的领导者，担心自己的大量财产利益，没有回应半岛人的反攻。克里奥尔人控制墨西哥命运的运动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一个主要由"边缘精英"组成的团体手里——站在相对适中的经济和社会立场的巴伊奥(Bajio)上层阶级个人手里，该地是一个大致属于克雷塔罗监政区的地理区域。

这个地区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有助于解释它在墨西哥独立战争第一阶段中的决定性作用。它是墨西哥地区农业和工业结构中最现代的地区。那里极少有传统类型的原住民社区；大量的人口由部分欧洲化的城市工人、矿工、农奴或者各种类型的佃农组成。农业被大规模的商业灌溉庄园控制，这些庄园为上层阶级生产小麦和其他产品；平民的主要食物为玉米，只有贫困的佃农在边缘土地上耕种。那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纺织工业，它经历过一次变迁，从利用奴隶和其他强迫劳动力的大庄园转变成承包外销制度(putting out)，在这个制度中，商人-出资人向工匠家庭提供棉花和羊毛，工匠用自己的织布机把它们变成布匹，"通过用更长的工作时间获得微薄的报酬强迫数量不断增长的工匠家庭剥削自己"。矿业是该地区利润最高和资本最密集的工业；在一些不错的年份里，瓜纳华托最大的矿区巴伦西那(Valenciana)，可以给它的主人净赚超过100万比索的利润。巴伊奥经济的准资本主义结构，基于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这也就促进了工人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的增长。比如，瓜纳华托的矿工用各种方法抵抗试图结束"好处费"(他们开采的超过定额的铁矿而获得的相应的分享)的尝试，包括降低产量；而雇主则召集民兵强迫重新开始全面生产回应他们。巴伊奥的劳动力在18

[illegible]最后几十年里，经历了工资和生活水平以及就业机会的下降。这[illegible]是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造成的结果：迅速的人口增长使地[illegible]给低工资或者用季节性劳工代替长期工人；国内纺织业面对廉价的[illegible]化生产的进口货的竞争；以及矿区因老化而增长的费用。这些因[illegible]造成了家庭的不安和不满。然后在 1808 年和 1809 年，干旱和饥荒[illegible]开始袭击巴伊奥，现存的紧张和抱怨进一步恶化。就像先前发生在[illegible]年的干旱和饥荒一样，大地主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贫苦人民身上[illegible]获利，先是储存粮食远离市场，然后在价格上升到顶峰的时候卖[illegible]。正是在这种家庭社会不安和严重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下，墨西哥[illegible]争开始了。巴伊奥是这次风暴的中心，这里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形成了革命的先锋。

1810 年，一个克里奥尔人的起义密谋在克雷塔罗重要的政治和工[illegible]只有两个谋反者属于克里奥尔人地区精英的最高圈[illegible]他们试图把其他有名的克里奥尔人吸引到这个密谋中的努力被拒[illegible]大多数人是“边缘精英”——苦苦挣扎着的地主们，一个食品杂[illegible]，一个地产管理人，一个教区神父。一开始，谋反者似乎就计划动[illegible]印第安人和混血人无产阶级，大概因为他们也怀疑自己能够赢得他们[illegible]阶级大多数人的支持。多数密谋者的动机是希望发动军队。米格尔·伊达尔戈是多洛雷斯(Dolores)城镇的一位神父，也曾经是巴拉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尼古拉斯修道院的院长，他深深地同情着土著人。博学的伊达尔戈因为他的自由思想的理想早已引起西班牙政权的注意，他还因他的科学兴趣和在教区发展新工业而闻名。

得知他们的密谋已经被告发给西班牙官员后，密谋者们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发动起义，尽管筹划还没有完成。1810 年 9 月 16 日，星期天，伊达尔戈召集他教区的教民聚集起来做弥撒，以反抗他们的西班牙统治。这里像西属美洲的其他地方一样，也使用了“以费迪南德的名义”；伊达尔戈宣布领导一次起义，是为了支持受人爱戴的国王，因为他被不信神的法国人背信弃义地逮捕并且罢免。不到两周的时间，起义的领导者们已经召集了上千的反抗者，并开始向瓜纳华托的工业和矿

业中心进军。在进军中，伊达尔戈紧握着携带瓜达卢佩圣母形象的旗帜，并宣称圣母是他的运动的庇护人，因此呼吁他的追随者献出宗教的虔诚。整个进军路线沿途，当地的精英们没有加入起义，他们带着沮丧的神情观望着，反抗者抢夺店铺，并夺取在两年的干旱和饥荒后1810年充足的丰收带来的粮食。在上千名矿工的帮助下，9月28日瓜纳华托被攻占了，这些矿工联合起来进攻丰饶的市政粮仓，但是西班牙官员、民兵和当地精英都试图遏制这些起义，随后是成百上千的西班牙人在粮仓和城市被杀害。瓜纳华托的屠杀和抢劫是这次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把双方的冲突公开化了，一方是伊达尔戈和他的盟友的基本目标——克里奥尔人对自治或者独立的墨西哥的统治，另一方则



何塞·克莱门蒂·奥罗斯科(Jose Clemente Orozco)，墨西哥最有名的壁画家之一，创作了这个墨西哥解放者伊达尔戈的大胆形象，手里拿着燃烧的火炬，领导墨西哥人反对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的运动。

起他们的低层阶级追随者对报复和社会公正的渴望。从瓜纳华托事件中得到启示后，克里奥尔精英的大多数在伊达尔戈没有能力控制的运动的巨大暴力之前，害怕地退缩了。

在他的第一波胜利后，伊达尔戈颁布了法令，废除奴隶制和纳贡，——是土著人和混血人每年上缴的人头税。三个月后，他在瓜达拉哈拉的总部下达命令，要求把已经被西班牙人占用的城市附近的原著民村社土地交还给印第安人村庄，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涉及土地问题；他的愿望是“只有印第安人在他们各自的村庄才可以使用那些土地”。尽管这些改革中规中矩，但是它们使墨西哥斗争带有一个民众特征，而这个特征在南美洲独立运动中一直是缺失的。但是这样一来就更加疏远了克里奥尔人，他们可能希望自治或者独立，但不是社会革命。另一方面，这些改革走得并不够远，巴伊奥和哈利斯科(jalisco)这些地区中伊达尔戈的农民和工人阶级追随者的根本性苦难：没有土地、 173
吃不饱肚子的工资和高昂的租金、佃农的缺乏保护以及利润丰厚的地主对粮食谷物的垄断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缺少明确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改革的计划，伊达尔戈的追随者们把他们在无法忍受的境况下的积怨，通过屠杀西班牙人，以及掠夺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等的财产发泄了出来。

伊达尔戈没有能力把他的反抗团体锻炼成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也无法充分利用先前的胜利。在墨西哥城附近击败了一支保王者军队后，他在城市外面扎营三天，然后在他让对方投降的要求被拒绝后，他没放一枪就莫名其妙地从这个几乎没有任何防御的城市撤退了。这表明他害怕重复先前胜利后的暴行，或者他相信如果没有当地民众的支持，他不能保住这个大城市，根据历史学家埃里克·凡·杨(Eric Van Young)的研究，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伊达尔戈的运动注定要失败。但是中部高地的农民也没有召集起来继续伊达尔戈的目标，这些农民还拥有社区土地，可以满足他们的最低需求，并通过在大庄园赚的微薄工资弥补不足的种植收入。随着他的军队因为逃兵而慢慢减少，伊达尔戈向巴伊奥撤退。被保王者军队赶出瓜纳华托后，伊达尔戈和

其他起义领导者向北逃去，希望在科阿韦拉(Coahuila)和得克萨斯建立运动的新根据地。在起义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伊达尔戈在进入美国边境的途中被逮捕，被一个宗教裁判所指控为异教徒和叛国罪，并且被行刑队处死。

伊达尔戈的失败和去世没有结束他发起的反抗起义。起义的火焰继续在广阔的墨西哥地区燃烧着。后起的领导人从伊达尔戈战术的失败中得到启示。很多人发展出了一种灵活和移动的游击队战斗方式，放弃了试图通过在常规战场上的高级武器和训练来击败保王者的力量。在他们反对拿破仑的战斗中，西班牙人自己有效地采用了游击战——用小卫队进行进攻和撤退的快速运动式的战争，充分利用本地的地形和乡村民众的支持来阻挠进攻和追击。墨西哥游击队的战略不是为了赢得快速胜利，而是使敌人筋疲力尽，并且通过抢劫和焚毁富有人们的店铺和大庄园、扰乱贸易以及制造对战争的厌倦感和对越来越独裁专横的殖民地政权的敌意，摧毁社会和经济基础。

伊达尔戈死后，一名梅斯蒂索神父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José Maria Morelos)成为革命运动的最高指挥官。莫雷洛斯在他为伊达尔戈服务之前，曾给炎热和潮湿的米却肯太平洋低地贫困的宗教团体提供过援助，伊达尔戈要求他在那个地区组织起义。海岸低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与巴伊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的主要工业、糖、棉花和靛青，因为来自高地市场附近地区以及进口布料的竞争而处于下降状态。所以，庄园佃农和劳动力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依附和不安。当地村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在恶化，因为村头目把社区土地租给外来人，这个行为使很多家庭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最后土地。

这些状况引发的不满给莫雷洛斯和他的起义运动在海岸低地地区提供了大量的民众基础。莫雷洛斯非常清楚该地区乡村人民的问题和需要。像伊达尔戈一样，他命令结束奴隶制和进贡。他还废除了原著民社区土地的租金，废除了社区财库(cajas de comunidad)，这些资金经常被村里的显要人物乱用或者被王室官员慢慢剥削干净；村民从此以后可以留住他们的劳动收入。莫雷洛斯还扩大了伊达尔戈的社会改

[illegible]制度，禁止所有的强迫劳动，废除所有种族条款的使用，除了“加丘平们”，因为他们是被人憎恨的半岛西班牙人。莫雷洛斯支持激进的土地改革，这个事实[illegible]没有什么疑问。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一份“计划”，提议把所有大于两里格的庄园分割成小地块，还谴责了一种情况，即“一个个体拥有大面积没有耕种的土地，而让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奴隶，这些人作为农奴(gánanes)或者奴隶在这些土地上被迫工作”；他看到了小型土地所有制的社会益处。但是莫雷洛斯的行动自由被他与[illegible]人[illegible]精英之间的联系限制了，一些精英是他的助理官员，他答应会尊重他们的财产。

莫雷洛斯是一个出色的游击队领导人，他用严格的纪律、训练和统一方式代替了伊达尔戈的松散方式，在太平洋低地地区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基地后，向战略性的中央高地和首都挺进。他向墨西哥城南部富产糖区域的推进没有获得当地原住民社区足够的支持，这些社区仍保留有相当可观的土地所有，他被迫向南撤离，进入了瓦哈卡(Oaxaca)地区的[illegible]高地。他的军事努力被抑制住了，因为与难以控制的叛乱者之间的分歧和他希望建立一个代表性政府的决定，他的决定是在军事条件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的时候提出的。1813年秋天，他在奇尔潘辛戈(Chilpancingo)召集的一次大会上宣布墨西哥的独立，批准了莫雷洛斯的社会改革，并赋予他至高无上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但在后面的几个月里，战争的潮汐开始涌向起义事业相反的一面，这部分因为莫雷洛斯的战术错误，包括放弃流动的游击战而采用阵地战，这个错误在他长时间被困阿卡普尔科要塞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13年后期，莫雷洛斯在保王党力量的手中遭遇了多次失败，对方是由能力强劲且咄咄逼人的总督菲利克斯·卡耶哈(Felix Calleja)领导的。

拿破仑的失败和1814年凶残保守的费迪南德七世返回西班牙王位，使成千上万原本打算被送到海外镇压西属美洲起义的士兵得到了解放。奇尔潘辛戈大会逃跑了，变成了一个流浪的团体，国会的争吵和对保护的需要分散了莫雷洛斯对所有重要军事问题的注意。他带着重新

恢复起义事业的希望，想通过提供代替费迪南德残酷暴政的选择而获得克里奥尔精英的支持，他在阿帕兹甘镇(Apatzingan)举行了代表大会并且起草了一个自由主义宪法(1814年10月)，提出了一个共和政府框架，还宣布在法律面前市民平等，以及演讲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在1815年的进程中，无情的保王派压力迫使代表大会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11月，在进行了一场使代表大会可以逃脱的后方保护战斗后，莫雷洛斯被一支保王党队伍逮捕，并被带到首都。和伊达尔戈一样，他在1815年12月22日被行刑队枪决。

伟大的游击队领导者去世了，革命运动尽管无组织，但还在继续着。确实，大量起义部队和西班牙镇压起义之间的斗争在1815年和1820年达到了新的致命性高度。为了避免伊达尔戈，甚至是莫雷洛斯的错误，斗争的领导者避开了激战，也没有努力去争取大量人口的中心地区。相反，他们指挥一个流动性的战争，用小队伍突袭和毁灭保王的庄园主，中断贸易，或者征收贸易费用，切断通信，并且控制大片乡村地区。当被镇压起义的军队追击时他们就逃跑，然后当大量西班牙部队离开后再重新出现。一场无望的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地区指挥者和地方洪达强加给所有居民的支持那场战争的沉重赋税，以及对不只是起义者，而且还有赞成妥协和自治的高职位克里奥尔人的残酷对待，都使得克里奥尔精英，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保王的人群发生了变异。

这些群体和很多保守的西班牙人一样，试图寻找一个走出僵局的方法，以避免莫雷洛斯提出的共和政权下的那种激烈的社会变革。1820年，西班牙强迫费迪南德七世接受1812年宪法时，一场自由主义起义爆发了，一个走出僵局的方法似乎也出现了。被选入西班牙议会或者国会的墨西哥代表，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可以保留与西班牙的关系，但是要给新西班牙和其他美洲"王国"在帝国范围内的自治。议会中的大多数西班牙人拒绝这个提议，从而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议会在1820年采取的激烈改革，包括废除教会和军事特权，招来了保守的地主、教士、军官和商人，不管是克里奥尔人还是半岛人的怨

限。出于害怕失去特权，他们计划把墨西哥从母国那里分离出来，并且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建立独立国家。他们的工具是克里奥尔军官奥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Agustin de Iturbide)，他发动了对起义者毫不留情的镇压战争。伊图尔维德向主要的起义领导比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ero)提出了和约和和解。他的计划将独立、君主、罗马天主教会的[illegible]权，以及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的国民平等都放在一起。格雷罗是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者，伊图尔维德则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梦想着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但是当时，伊图尔维德的计划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而格雷罗还是不情愿地接受了它。格雷罗和伊图尔维德的联合力量迅速克服了保王党人零散的抵抗。1821年9月28日，伊图尔维德宣布墨西哥独立，八个月后，由伊图尔维德召集的选举大会确定了他作为奥古斯丁一世成为墨西哥皇帝。

除了华而不实的气派，伊图尔维德的帝国没有民众基础。短短几个月内，奥古斯丁一世不得不退位，并且被警告永远不能回来。伊图尔维德怀着复辟的希望，于1824年从英格兰返回，带着一小队人在海岸登陆。他很快被新共和政权的部队逮捕，并被处决。

墨西哥的解放给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带来了成功的结局。如果不提拉丁美洲妇女对这个结局的贡献，那么战斗的故事就不会圆满。一个墨西哥女英雄唐娜·何塞法·奥蒂斯·德多米尼格斯(Dona Josefa Ortiz de Dominguez)是克雷塔罗克里奥尔镇长的妻子，是位勇敢的女性，她向伊达尔戈和其他密谋者发出警告，西班牙政权即将前来逮捕他们，因此在革命还没开始之前就拯救了革命。在西蒙·玻利瓦尔领导下解放的土地上住着一位聪慧漂亮的女主人曼努埃拉·萨恩斯(Manuela Saenz)，她离开自己富有的英国丈夫加入解放者队伍，并在刺客手中把她的丈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她分享他的思想，安慰他，鼓励他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战斗，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哈罗德·比埃尔克(Harold Bierck)写道，"在很多方面，她就如同多数人叫她的那样，是位女解放者(la libertadora)。"

在拉丁美洲的每一个部分，女性都参加了武装斗争。她们通常来



一名西班牙贵族的私生女曼努埃拉·萨恩斯，被天主教女修道院驱赶出来，后来成为政治独立和女性权利的激烈倡导者。在独立斗争中，她遇到了西蒙·玻利瓦尔，并与他陷入爱河。在1828年，她还拯救了他的生命。

的中间和低层阶级。玻利瓦尔赞扬大哥伦比亚的"女战士"。在她们中间有英雄波利卡尔帕·萨尔瓦利埃塔(Policarpa Salvarrieta)，当西班牙人因为她帮助革命而处决她的时候，她只有23岁。在巴西，玛丽亚·奎特伊拉·德耶苏斯(Maria Quiteira de Jesus)，出生在巴伊亚省一个养牛和种植棉花的小牧场，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年轻男性，加入了革命军队。她的英勇使她在1823年赢得了独立巴西的第一个统治者唐·佩德罗颁发的奖章。弗朗西斯卡·米勒(Francesca Miller)说道，在海地独立的战斗中，女性是"无处不在的"，一些人还指挥着部队。

在独立斗争的余波下，许多妇女因为她们参与了斗争而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妇女为了独立战斗而且牺牲，为什么她们不能获得投票和被选举的权利？这是1824年提交给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墨西哥政府的一份请愿信："妇女也希望获得市民的头衔……看到她们

作为女公民 H 或女公民 N 被算入统计数据中。"但是过了一个半世纪，所有拉丁美洲妇女才实现了那个愿望。

拉丁美洲的独立：一项总结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并伴随着大量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革命伴随着或者紧跟着一系列社会变革。独立带来了宗教裁判所的灭亡，结束了以人种族群为基础的合法分层，废除了多数土地上贵族的头衔。它还促进了奴隶制的废除，促进了公立学校的建立，以及相同的改革。然而，所有这些变革都是非主导性的；独立留下了完好无损的现有经济和社会结构。这很自然，因为领导独立的克里奥尔精英没有改变现存秩序的意图。他们希望代替半岛人占有权力的位子上，并且把他们的港口向世界贸易敞开，但是不希望有什么劳动和土地制度的变革。确实，他们作为在欧洲和北美市场上出售的原材料和作物的生产者，其利益需要保持大庄园制度，因为庄园中有被奴役的当地无产阶级进行劳动。独立没有伴随着任何农业改革。被放逐者或者保王者没收的庄园通常落入了克里奥尔贵族的手中，一些土地还落入了梅斯蒂索人或者白黑混血人官员的私囊中，这些官员被克里奥尔精英所同化，他们自然很快忘记了自己出生的那个群体。

革命没有在拉丁美洲扩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实际上却缩小了基础。革命政府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情况下，因为要求在其成员中分配社区土地，而毁坏了原住民社区的土地所有制。这个过程加速了这些社区土地被克里奥尔地主侵占的过程，也加快了西班牙语国家的当地农民转变成短工或苦工的进程（见第九至十一章）。因为没有发生结构性的经济变革，尽管披着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装饰性外衣，殖民价值观还是继续统治着拉丁美洲社会。

第二部分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



咖啡种植园》，1935 年，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绘制。

独立以后，殖民地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原状。对独立前后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1853 年，哥伦比亚 179
自由主义者拉蒙·梅尔卡多(Ramon Mercado)声称："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不是一场革命……独立只触及了表层社会问题，其本质特性没有变化。"取得独立以后，为了实现经济政治稳定，新拉丁美洲国家开始了长期艰难的斗争。由于对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经济社会变化没有伴随独立过程而出现——比如，没有进行对下层社会有利的土地和收入重新分配，使新兴国家面临巨大的障碍。大庄园大体依靠简单工艺以及奴隶、苦工，并且继续在经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事实上，有土地的贵族影响力处于上升趋势，而这是在独立战争中军事上起到主要作用以及西班牙日渐衰落两方面的原因所致。然而，我们不能贬低发生变化的限度和程度。尽管独立并未产生主要的社会变动，但不排除发生较小变化，这使得精英内部分裂，旧社会秩序的贵族支持者被从渴望更民主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分离出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时期结束后，其二者之间的斗争是 19 世纪上半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取得独立以

后，尽管从前贫苦的民众只能在政界处于附属地位，并且只允许一小部分人晋升到精英行列，比如工匠和南美牧人，但已近突破接纳这一关。拉丁美洲一些主要港口对外开放，还在思想方面建立了相对自由的市场，至少在首都及其他大城市是如此。在几乎没有时间放慢脚步的情况下，新欧洲思想学说进入拉丁美洲，并适用于解决大陆问题，比如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实证主义。这些新的学术风潮吹过不久前曾经布满灰尘的殖民地通道，有助于此地区知识更新，并促进更深入的社会变革。

照字面意思，新共和国宪法至少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使殖民地社会等级不再具有法律基础。然而，由于比例关系变化甚微，人种、种族和社会阶层之间界限仍基本保持不变财富，权力和权威继续由重铸殖民地种族结构并将自己等同于白种人的统治阶层掌控；然而，在一些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包括较暗肤色的人在内，都试图利用战争或政治活动中的非凡能力攀爬社会阶梯。

组成旧社会阶层的所有群体中，庄园主的地位变化最小。墨西哥历史学家查尔斯·玛丽亚·布斯塔曼特(Carlos Maria Bustamante)是为数不多的克里奥尔领导人中一员，他认识到独立并没有使他摆脱枷锁。他写道："尽管他们自以为有自由，而事实是仍受原有障碍的束缚。"当地人的纳贡和强迫劳动在独立战争中或者战后遭到废止，但在很多国家纳贡和强迫劳动很快又以其他名义再次出现。更糟糕的是，本地人的公有土地、社会组织以及文化本应受到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法律政策一定程度的保护，却越来越多地遭到抨击。自由主义者尤其相信，同西班牙投票系统以及特殊优惠权一样，这些社会传统成为阻挡进步的绊脚石。

然而，直到大约1870年，在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生活在土地公有制度下。然后，出口经济的快速增长、铁路时代的到来以及所导致的土地价值和劳动力需求大增使白人和混血人庄园主以及受庄园主操纵的政府开始向本地人土地发起猛烈侵占。土地没收与劳务偿债、佃农人数增长在同时进行。为使劳动

者依属于种植园，雇主不惜使用从负债劳役到彻底强制的各种手段。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同经典的欧洲模型极为相似的农奴身份。例如，在安第斯山地区除了在主人农场工作外，艾马拉佃户还需在庄园主家或在城市提供家庭劳务，并且家庭服务期间农奴可以被买卖或者赠送。这种或者其他形式的农奴制一直生存到20世纪。

在牧师和地方官吏的协助下，主人阶层试图通过对当地人实行心理控制来增强经济征服。这最终演变成一种关系及角色形式，即指定主人为行善人物，由他来确保苦工和佃农的生计，后者则用完全服从来换取主人在紧急情况下对其予以保护。在拥有大量土著居民的国家，雇主和苦工之间的联系通常包括复杂的规矩，即要求土著与主人讲话前需先获得申请批准，在主人面前卑躬屈膝，在作出包括婚姻在内的所有重要个人决定前也要先获得批准。

但是，这些更多表现为苦工特点的关系和卑屈姿态并不为所有本地人接受。19世纪下半叶，在安第斯山地区、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本地幸存的土地拥有者为防止自己土地被前来侵占的庄园主吞并，进而成为无土地劳动者的进程而进行了顽强抗争。他们用所有能支配的手段进行斗争，包括作为万不得已手段的武装起义。19世纪60、70年代，武装起义在墨西哥爆发，被土地拥有者和政府官员称为“共产主义”，最后遭到强大的军队的无情镇压。

独立后拥有更多的活动自由，更多当地自治社区逐渐消失以及当地人和混血人混杂的大庄园的发展，增强了始于殖民地末期的文化互渗趋势。这种文化渗透反映在双语制的发展：土著人同白人交流时，使用西班牙语越发频繁，本土语言只用于本族人之间沟通。一定数量的公立学校进驻本地区，也有助于土著人接受西班牙语为自己的第二语言，他们有时甚至完全放弃了使用母语。据墨西哥历史学家爱德华多·鲁伊斯(Eduardo Ruiz)回忆，小时候他只说塔拉斯科语，但已经忘记在12岁时学的西班牙语。“我不得不承认不想有那些记忆，因为被当做印第安人受教育是羞耻的事情。”随着频繁摒弃地区潮流，偏好类欧洲风格，一些文化互渗在衣着方面也表现出来，而有时是迫于法律和

罚金。例如，在许多墨西哥地区，粗糙棉布料的白色裤子加衬衫以及宽边帽几乎成为本地人的制服。

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现代工贸社会的教育和工作，加强对土著人的文化同化和融合，进而使之融入白人社会，但往往事与愿违。19 世纪末，由于各种原因在五个拥有最多土著居民的国家：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文化互渗过程中，土著社区的规模并未明显缩减。独立后一二十年间，经济停滞和政治困境加强了社会孤立和文化分歧的情况。出口部门扩大使拉丁美洲经济得以复苏，而这次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以土著的利益为代价，并主要致力于凸显拉美国家的贫穷落后。经济上被边际化，政治进程中几乎被排除，受白人和混血人庄园主、神父和官员的极度剥削，同时不信任和猜忌造成的障碍也把土著人从白人世界割离出来，从而阻碍了任何有效的文化互渗，更不用说融合。

土著社团承认对同化压力做出让步的必要性，但保留了将土著人和基督教特征融为一体的传统住房、饮食、社会组织以及行政区。在一些地区，征服前时期包括偶尔的活人献祭在内的迷信仪式仍存在。土著人终日受剥削，并被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称为下等人，迷信仪式在拥有大量土著人口的国家普遍存在，以上都是这些地区形成民族意识的主要障碍。先驱者　墨西哥人类学家曼努埃尔·加米奥(Manuel Gamio)于 1916 年写道，墨西哥没有建立拥有一个欧洲意识的国家，却选择由众多在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和心理方面有所不同的小民族组合而成。

独立战争通过推广“成功青睐有才之人”理论，使许多本地人和出身卑微的混血人能够在军事、政治和社会领域飞黄腾达。自由主义总统　墨西哥的比森特·格雷罗和胡安·阿尔瓦雷斯(Juan Alvarez)以及才华横溢的各国领导人　厄瓜多尔的胡安·何塞·弗洛雷斯(Juan José Flores)、玻利维亚的安德烈斯·圣克鲁兹(Andres Santa Cruz)、秘鲁的雷蒙·卡斯蒂利亚(Ramón Castilla)都描绘出了一条混血人的飞腾之路。

混血和白黑混血领导人的发展在某些克利奥尔精英中激起恐惧，以至于玻利瓦尔，他悲观地预测会爆发种族战争，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会发生冲突。玻利瓦尔将勇敢仁厚的墨西哥爱国主义者比森特·格雷罗描述成“蒙昧的印第安人和凶残的非洲人极为失败的作品”，这其中就显示出偏执的种族歧视。事实证明这些恐惧毫无理由，尽管一些混合种族领导人仍然略微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表示忠诚于自己的出身——卑微的民众，如格雷罗和阿尔瓦雷斯，但是大多数人很快就与克里奥尔贵族同流合污并坚定维护其利益。

另一方面，后殖民时期的克里奥尔政治家必须将混血人种中的中小产阶级政治和力量考虑进去，尤其是技工人员组织。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满足、也未实现民众强烈愿望的白人精英的剥削。上述情况曾发生于波哥大，在反对保守主义者过程中哥伦比亚自由主义者状告工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Juan Manuel Rosas)则成功地将自己与混种的加乌乔人及城市工匠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反对贵族自由主义中央集权派。

中世纪以后，欧洲种族主义思想意识影响力日益增加，导致对肤色敏感度提高，斯宾塞哲学生物决定论的影响尤为严重。从墨西哥到智利各国均认为：所谓的白人精英，甚至中产阶级优于土著人和混血人。黑色皮肤日益成为社会地位提升的障碍。

21世纪初，猖獗的伪科学种族主义典型是德国移民的儿子——阿根廷人查尔斯·邦吉(Carlos Bunge)的相关评论，他认为混血人和白黑混血人是“不纯正的，隔代遗传的反基督教者；他们就像童话中九头蛇的两个头，缠绕一位美丽柔弱的圣母——西属美洲，令其窒息”。

通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均不受当时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影响。阿根廷自由主义者多明戈·萨米恩托(Domingo Sarmiento)认同欧洲资产阶级秩序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观点，出于对这种文明的狂热，他认为：“可能消灭野蛮人、破坏初始文明、征服使用自己土地的民众看起来不公平，但正是这种不公正使美洲免于被遗弃到没有进步能力的野人民族手里，今天生活在美洲大地上的是高加索种人，一个居住在地

球上的所有民族中最完美、聪明、漂亮、进步的民族。”少数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不赞同这种观点。其中包括智利人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o Billbao)，他指责“用文明来掩盖犯罪和暴行的虚伪嘴脸”，这明显与萨米恩托反对土著人和高加索人的战争有所关联。另外一名反对者是古巴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他公开指责以“文明”有夺取“野蛮人”土地的自然权利为托辞，而其中“文明”是通常专门为当代欧洲国家所设的名词，而它们则是急需得到其他民族的土地，却将“野蛮人”的称呼给予其他所有非欧洲、非欧洲出身的人。

甚至在独立战争以前，黑奴在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目已开始下降。这种情况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发展使得奴隶制度无利可图，因此，人们开始倾向于解放或者将奴隶制度转向租佃制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奴隶逃跑到附近丛林山区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在那里能组建自治社区。大约在1800年，据估计在委内瑞拉87 000名奴隶中大概有24 000人曾经是逃亡者。当然，废奴运动最强有力的证据是，被奴役的非洲人及其后代，在图森·卢韦杜尔和他的海地朋友的带领下，拿起武器捍卫共同的自由，从拉丁美洲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

独立战争是对解放的最大激励。爱国主义指挥官——比如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以及保王官员都经常为回报其军事服务而主动给予奴隶自由，有时黑人奴隶是双方主要战斗力量的重要组成者。在安第斯山战役中，黑人大约占圣马丁军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此外，战争引发的骚乱和秩序通常导致农场秩序崩溃，也可能引发奴隶战争，使庄园的恢复困难重重。

墨西哥独立以后，奴隶制进一步衰退，其中部分原因是奴隶制公开排斥新政府自由派的观点，但是更多的是英国敌对态度的后果。英国于1807年在本国废止奴隶贸易，此后对所有仍然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施加压力；英国对巴西的施压直接导致巴西奴隶制危机及其最终灭亡。

奴隶在不是主要劳动力的国家获得解放最早、最快；由此，智利、墨西哥以及中美洲联邦(1823－1839)于1823至1829年之间相继废除

奴隶制。在其他国家，奴隶主展开了一场持久的保卫奴隶制斗争。在委内瑞拉，一项过程极为缓慢的解放法案于1821年就通过了，但是直到1854年奴隶制度才最终被废除。而在秘鲁，雷蒙·卡斯蒂利亚于1855年废除奴隶制。经过较长时期平息了反叛奴隶的暴力斗争后，西班牙议会于1873年在波多黎各、1880年在古巴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但在古巴这种制度仍然变相存在，直到1886年才最终废除。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化和宗教因素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奴隶制比北美洲各国要好。但应当指出的是，19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的奴隶制 185
状况并未支持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对巴西咖啡和古巴蔗糖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两个主要奴隶制国家有利用鞭笞来保证奴隶工作得更长、更重的残暴行为。奴隶以不同形式的反抗作出回应，其中包括从减慢劳动速度到公然反抗。正是这种反抗导致了奴隶制度最终废除。

独立以后，高度仪式化行为的父权制家族组织和从容的生活方式仍然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拉丁美洲精英的特征。家长制大家庭的亲属关系网在宗教仪式亲(compadrazgo)制度下进一步扩大，而正是这种制度建立了上层社会教父母面向低等社会教子及其父母的保护关系。继而，下层阶级家庭成员也期望成为教父家庭的追随者，并致力于维护教父家庭的利益。

在殖民地时期，大庄园主大部分时间通常在城市居住，而把庄园留给总管负责(但绝不允许他们不详审账簿、不关心盈亏账目的情况出现)。在同样的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自诩为创业者的小部分人，他们敢于挑战社会中的传统土地偏见，如理查德·格雷厄姆(Richard Graham)所说："他们最终的结果是被资本主义思想、对工业化的信心以及对工作和实干的忠诚所俘获。"巴西的马乌阿子爵(Maua)是上述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于1850至1875年创立了反对传统主义者的银行和工业帝国。然而，马乌阿的帝国最终瓦解，原因有二：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官员无动于衷，甚至持反对态度。企业家时代还未到来，19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史中遍布早产的工业项目残

骸。这些惨败还象征了资本主义思想方法和价值观的失败。

新殖民主义秩序是以拉丁美洲经济融入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而形成的。19世纪中叶后，随着新秩序的逐步发展，尽管拉丁美洲仍然保留一定的前资本主义特征，却开始倾向于接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理念。19世纪80年代的一名阿根廷作家指出，大庄园主不再处于半野蛮、半封建状态，转而成为终日往返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豪宅、庄园以及巴黎的住所之间的科学管理者。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大牧场主才成功转变为"科学的管理者"。他们更喜欢将管理庄园的工作交给他人。但是作家还是认为精英们逐渐欧化已经开始在整个拉丁美洲进行。

精英欧化过程始于独立后，19世纪中叶后大大加速。独立后的几十年内，习俗和消费模式变化凸显。西班牙驻墨西哥大使夫人范妮·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Fanny Calderon de La Barca)亲眼目睹了，她在一系列欢快的信函中将圣安纳(Santa Anna)时期的墨西哥上层社会描述为"时尚改变"。"优雅的黑丝披风逐渐为不雅致的女式帽取代。盘板上绘有吉多·奥罗拉(Guido Aurora)肖像，行驶缓慢的古老的四轮马车最终被伦敦制造的四轮马车淘汰。老的东西缓慢且不情愿地让位于新的东西，让位是在进行的，至少在殖民地世界是如此。"

在散懒的殖民地城市，比如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19世纪60年代，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弗里德里克(Friedrich Hassaurek)对许多基多的社会和习俗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带着不满的情绪指出："虽然运输非常困难，但在基多仍有120架钢琴等待运送。"据此时期的另一位美国赴基多拜访者詹姆士·奥顿(James Orton)教授所述："上层社会追随巴黎模式，而男士将老式西班牙经典外衣放入衣柜。"他酸酸地说道："这种现代宽外袍很适合厄尔多瓜人，可以防止他们的胳膊做任何事情，并能够掩盖大量罪行，尤其是骄傲和贫穷。"

在共和国治下，衣着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这点同殖民地时期是一样的。奥顿写道："在基多没有一个绅士会穿着斗篷上街，因而市民被分为穿斗篷的人和穿外衣的绅士。"更甚者可以从衣着来区分不同政治派别的追随者。在罗萨斯管辖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当

[illegible]成[illegible]主要成员时，即被称为“穿夹克的人”，形成对比的[illegible]派自由主义者，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illegible](Justo José de Urquiza)是罗萨斯的征服者。在他的加乌乔人军队中，萨米恩托(Sarmiento)是唯一穿着呈欧洲风格的阿根廷官员，在挂着[illegible]的加乌乔人中，他的教士服和平顶帽显得尤为怪[illegible]。约翰·林奇(John Lynch)写道：“对萨米恩托来说，这只是原则[illegible]，反对罗萨斯、反对其考迪罗主义的抗议……[illegible]不改变阿根廷军队的军装，我们就一定会有自己的考迪罗’。”

[illegible]在大城市除去本土人在外的所有人中取[illegible]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服装的态度仍然反映[illegible]将轻视手工劳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19至20[illegible]，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穿工人短上衣的人被禁止进入银行和国[illegible]。詹姆斯·斯科比(James Scobie)所述：“所有人均试[illegible]与手工劳动者之间有联系的事实。”甚至工人本身也倾向穿戴传统的外衣和领带。

1880年[illegible]欧洲移民蜂拥入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同时较少一部分人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比如智利和墨西哥。结合城市化不断发展以及出口部门的持续扩张，外来移民加速了社会变化。这些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数量可观的现代工业工人阶级，并增加了蓝领和中产阶级白领工人总数。

除少量的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工会组织主义学说之外，移民并未威胁到现存社会结构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贵族思想意识，相反许多移民被现存观点同化。能进入上层社会的外国人通常是受过教育或者管理[illegible]人士。从中产阶级移民出身到融入上层社会的过程极其困难，并且发生比较少，而对下层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少数移民通过贸易往来或者投机生意创造财富。他们的子辈和孙辈一直坚持掩盖财富的来源，通过投资土地使其看起来更加体面。这些新生代富豪同他们的贵族伙伴一样对当地人和工人表现出极度轻蔑。



这两幅图分别描绘了哥伦比亚的梅斯蒂索人农夫和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有力地表明，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服装的已分识别作用仍然非常明显。

独立并没有使女性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式的法典增强了丈夫对妻子财产的控制权，女性的公民地位可能进一步恶化。女性陷入更多来自家庭的羁绊，并且一直被教会和父母灌输顺从、温柔和没有私欲的观念。

两性之间任何关系均以父权观念为主，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哥伦比亚人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Mariano Ospina Rodriguez）1864年在女儿玛丽亚同何塞·马里亚诺·罗迈·巴特雷斯（Jose Mariano Romay Batres）新婚前夜给女儿一封信中的建议："你的幸福取决于是否真诚、始终如一谨守这些美德：谦卑、耐心、顺从、克制……而维护家庭关系的恰当行为亦是以上述基督教美德为标准。"

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继续告诫女儿："你的首要职责是留心查看丈夫的爱好、习惯和嗜好，以便做到永远不与其相抵触。不管在你看来有多重要，永远不要试图强加你自己的意愿，或者让他放弃自己的习惯或

者爱好；相反，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保持这些东西……通常，你会发现自己有与他不同的习惯和喜好，但永远要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取悦于丈夫。”这种双向标准的性行为十分盛行；教导女性克制性欲，相信生育是性交的唯一目的。但女性的实际行为不必完全遵守法律和思想意识。例如，西尔维亚·阿罗姆(Silvia Arrom)的行为表明，这些限制未能阻止19世纪初期墨西哥女性搞婚外情。

然而，一些拉丁美洲精英阶级女性，如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先驱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1803－1844)，就大大偏离了正当行为的权限。她是秘鲁贵族庄园主的女儿，同时是一名法国母亲，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法国，被视为一位秘鲁女权及社会主义者。她容貌出众，才华横溢，文笔优美，活跃于法国女权及社会主义界内。1835年，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游记》，书中提到基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行为准则的社会改良；1840年，又出版了《伦敦漫步》，书中主要描述英国社会中心巨大的贫富差异。在最后一本书《工人联盟》(1844)中，她号召“世界上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联合起来，这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的相比早了四年。特里斯坦清楚地识别出被社会性别化了的受剥削阶层。她写道：“受压迫最深的男性还可以压榨自己的妻子，因此女性是最下层阶级中的下层阶级。”她还通过论证“妇女解放是男性解放的必要条件”，预先构想20世纪的女权主义理论。

独立后上半世纪的民主自由运动刺激了一些有利于女性的发展。萨米恩托写道：“在阿根廷，人类的文明水平可以通过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他的教育规划将女性的主要的角色设定为小学老师。在墨西哥，革新运动成功后，颁布了新学校法令，法令号召为女孩设立中学以及培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1870年后，这两个国家均出现小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大部分由学校老师组成，他们组建社团、编辑报刊，为女性文化、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即使在奴隶制度趋于衰退的社会，如巴西，胡安娜·保拉·曼索·德诺荣哈(Joana Paula Manso de Noronha)创办了一份女性权利报刊，她在为《太太杂志》(*Jornal das Senhoras*)(1852)写的社论中对自己从

事社会改进以及妇女精神解放工作的目的进行了阐述。19世纪末，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工厂和血汗工厂，并按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领取薪酬，这成为资本主义雇佣者超额利润的一大来源。到1887年，据统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39%有酬全工作的劳动力由女性组成。

在一些国家，由于许多教士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保王主义态度，使得教会丧失了名誉，并在同外面世界以及新思潮有更多接触后更进一步衰退。在许多国家，教会在教育、婚姻、葬礼及类似方面进行限制，而自由主义者通过取得的各种成功向其专制统治施加压力。由于教会一直坚持同保守派结盟，自由主义者的胜利便意味着对其积累的财富以及特权，以猛烈打击的形式进行报复。

垄断性宗教团体的殖民地准则，很早就被允许自由崇拜与高度重视的英国商人的需要所粉碎。事实上，保守的罗萨斯不喜欢外国人，他在阿根廷重新恢复耶稣会，并捐献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个圣公会所在地的地产。尽管一些狂热教士刺激民众反对外来异教徒，基于双方友好互惠的原则，天主教徒同反对者和平共处的体制得以逐渐形成。

宗教裁判所泛滥所招致的信徒们的厌恶，在独立战争期间消失了。然而，在许多国家，政府仍有权对颠覆性的异端作品进行审查或查封。政府不定期行使这项权利。19世纪20年代，教士及保守派反对势力向哥伦比亚自由派副总统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施加压力，迫使他授权法学院停止使用唯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书作为教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斯公开烧毁颠覆性的书及其相关资料。然而，据图略·霍尔珀林(Tulio Halperin)所述，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商的出版广告表明这种镇压是一种极其无效的手段。19世纪40年代，在圣地亚哥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Francisco Bilbao)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的激烈论坛被政府刽子手焚烧。然而，据萨米恩托所说，招致这种后果的不是比尔瓦奥书中的内容而是其粗暴刺耳的口吻；比尔瓦奥只是因为亵渎受到惩罚。

19世纪中叶后，实证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它将崇尚科学反对神学

[illegible]的道路，力求在许多国家减少甚至完全避免禁止发表异端思想或者反教权作品的事件。总体上看，19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环境[illegible]所谓自由，即只要这些想法是用理论形式表达[illegible]基本联系，而没有直接反对现任政权。[illegible]，对有安全威胁内容的报纸或者宣传手册进行迅速查封或者没收，[illegible]不在意包含最大胆社会理论书籍的发行量。举实[illegible]，[illegible]实行独裁统治，对涉嫌敌对的新闻工作者及报[illegible]，[illegible]允许自由买卖发行马克思以及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著作。

[illegible]，天主教会在影响力和权力方面遭受进一步衰退。[illegible]会导致一种强烈支持教士行为的产生，其[illegible]·[illegible]·莫雷诺(Gabriel Garcia Moreno)为代表，他[illegible]厄瓜多尔、拉斐尔·努涅斯(Rafael Nunez)于[illegible]伦比亚实行独裁统治，他同梵蒂冈起草了一份宗教协定，[illegible]在殖民地时期享有的大部分特权。但是这样的[illegible]在知识界中社会和知识影响的全面衰退。反教权[illegible]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和大部分其他上中层社会男性(包[illegible]教会外在形式和宗教仪式的人)的思想意识中[illegible]。但是教会对所有阶层的女性、土著人和贫苦群体仍有普遍的影响。

独立后，[illegible]人的大量外资未兑现，而且欧洲对拉丁美洲产品的需求[illegible]预期值，最初的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一些地方手工艺行业已经被廉价的欧洲工厂制进口产品摧毁殆尽，因而自由贸易带动[illegible]商业活动增长的份额几乎也被前者抵消。经济活动[illegible]以及[illegible]贸易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市场相对匮乏助长了地方经济自给自足、[illegible]，政治不稳定，甚至混乱的状态。

由于上述因素，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来说，19世纪20至70年代是一个暴力时代；[illegible]个独裁交替的时代；是开展集体的后殖民斗争与创建与众不同的国民身份的革命时代。其标志便是考迪罗(caudillo,

铁腕人物)。它诞生在武力基础上，而不是一种国家制度。地区最高考迪罗通常在辨认或承认各地区的考迪罗联合协议下管理国家事务。考迪罗们不管怎样，都表现出赞同共和思想及制度。挂名上"保守党"和"自由党"、"集权派"和"联邦派"标签的各个政党，活跃于大部分独立的州。保守主义的大部分支持力量均来自大庄园主和城市中的富裕者，而自由主义者通常包括地方庄园主、专业人士以及其他过去曾享有较小权力并满足于现存秩序的群体。通常，保守主义者认同保留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安排，并对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青睐有加。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受美国榜样的鼓舞，他们提倡联邦制政府、保障个人权利、政府教育管制并终止教士和军队享有的特权。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关心普通农民和下层社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欧洲工业革命大约于1870年开始加快速度，刺激了拉丁美洲经济和政治更快发展。流入拉美地区的欧洲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正是为满足扩展商品贸易以及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不同国家的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是不一样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

极度片面是新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单一产品或少数几种产品繁荣兴旺，使得这些商品在世界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面前极为脆弱。相比之下，由于劳动力和土地向其他行业转移而衰退，其他部门的经济停滞不前。

19世纪末期，发展显露了两个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出现在土地租佃和劳动力庄园制度结构内部，并伴随外商对该地区自然和人造资源的控制而稳固增长。到1900年，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地区处于统治地位，出现了最终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新依附结构或殖民主义。

新经济秩序需要和平和政府的持续。事实上，1870年以后拉丁美洲政治条件向更加稳固的方向发展。保守党采纳实证主义者所坚持的科学和进步思想，使得旧政党统一战线渐渐瓦解；而自由党不再关注宪法方法和公民自由，开始热衷于物质财富。新型自由主义领袖的出现标志着发财政治的形成，其中包括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哥伦比

亚的拉斐尔·努涅斯和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an Blanco)。独裁和革命仍在许多地方循环，只是革命发生的频率和毁坏性均有所下降。

1820 至 1900 年期间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历史的主要趋势伴随拉丁美洲生活和文化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第二部分主要介绍 19 世纪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秘鲁、古巴、中美洲联合省以及大哥伦比亚的简短历史。所有这些历史包含了那个时代的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每段历史各不相同，各自都反映出为确定国家而发起的独特斗争。

第九章　非殖民化进程和寻求国家身份(1821 — 1870)

焦点问题：

- 独立战争对土地贵族、军事和对外依赖等方面有何影响?
- 什么是考迪罗主义下的经济和社会?
- 19 世纪早期，拉丁美洲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 墨西哥自由主义思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 19 世纪早期巴拉圭的发展与阿根廷有何不同?
- 外国干预和阶级、种族间的冲突对 19 世纪早期中美洲地区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了何种影响?

独立并没有给拉丁美洲的解放者们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有秩序的自由和繁荣。在绝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终于结束，接着却是数十年的内乱。许多爱国领导者开始醒悟了，玻利瓦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 1829 年写道：“在美洲根本没有信任可言，在美洲各国也如此。条约就是一堆废纸，宪法只是书面的东西，选举如同战争，自由就是无政府主义，生命是一种折磨。”拉美的停滞不前和社会混乱与英国前殖民地——美国的迅速进步形成鲜明对比，这进一步加剧了一些拉美国家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悲观和自我怀疑情绪。

独立成果

旧大厦此时已破碎了；随之，争取解放的斗争也开始了。因为独立并没有带来能改变殖民模式的经济和社会上的改变，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垄断的终止，殖民经济和社会结构仍完好无损。西葡大庄园、大牧场、大地产等，运用旧时的技术，雇佣大量苦工和奴隶，继续控制着农业；广大农村贫民没有被号召起来挑战大地主的经济政治特权。确实，革命战争虽然取缔了西葡殖民机构——总督、监政官和检审官；削弱了人们原先对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根深蒂固心理，但却增强了贵族的特权和权威；其中的殖民精英——商人阶层，随着大量保王派商人被驱逐或迁移到国外，失去了影响力；矿主遭受了战争的摧残或是其财产被没收的命运；教会作为一个阶级，以前经常支持西班牙殖民统治，现在却在冲突中挣扎，力量减弱。 193

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还由于革命军官地位的提高，贵族统治阶级失去了军事精英的权威，这些军事精英曾因战争胜利而获桂冠加冕。由于数年的战争冲突和战争后的社会不稳定，新独立国家加速了军事化进程，以确保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现役部队通常消耗国家财政支出一半以上，官员人数不断增长。军官由于不满足于充当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角色，而变成政治纠纷的独裁者，所做的决定通常代表的是与保守主义者相和与大地主有密切联系的城市精英的利益。

经济停滞

独立领导人本期望随着西班牙商业垄断的结束，对外贸易会得到扩大，以援助和恢复国内经济。事实上，对于在自然资源或是地理位置上有优势的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咖啡和蔗糖）、阿根廷（皮革）和智利（谷物和皮革），它们能迅速从革命危机中恢复过来，在经济上稳步发展；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墨西哥、玻利维亚和秘鲁，由于它们的采矿业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能恢复到殖民时期的生产水平。

19世纪早期，经济停滞不前，这使许多新兴国家受困，这是由几大

因素所造成的。国家独立并没有带来土地和收入的再分配，而土地和收入的再分配本可以刺激国内市场和生产的扩张。也没有引进大量外国资本——一部分是因为政治混乱使外国投资受阻，一部分是因为那时欧洲和美国投资国内的工业需要资金，并没有多少资金流向拉美。拉美主要产品的出口仍然低于预期水平，因为欧洲仍主要把拉美作为其制成品，尤其是英国纺织品的倾销地。来自欧洲工业制成品的大量涌入损害了本土的手工业，榨干了新国家的金银储备，由此产生了长期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控制拉美市场的英国人进一步削弱了本土和他们竞争的本地商业阶层。直到19世纪中叶，从墨西哥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到瓦尔帕莱索，最富有最豪华的商人大都是英国人的。尽管如此，伊比利亚商人仍继续控制着许多区域的内部的零售贸易。

总体来讲，以上的发展状况阻碍了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却加强了大庄园主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国内道路的缺少和交通运输的自然阻隔（如丛林和大山）引起了许多国家内部的经济停滞，从而也加剧了地区主义倾向和增强了大小考迪罗在地区的统治地位，这些头目通常是本区域的大地主。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鼓励和促使这些头目雇佣私人的帮工和仆人在全国范围的政治斗争和革命中充当棋子。确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以此来弥补其他机会的缺乏，因为赢家会控制所有重要的海关机构（征收进出口税）和其他的国家税务来源，从而为他们自己和忠于他们的人谋得政府工作、合同、土地和另一些利益。精英分子把依靠政治和军事活动作为一种职业，把海关作为政府税收的来源会造成两种消极的结果。一种是军事和官僚机构臃肿加剧，进而经常挪用经济发展的资源；另一种就是对国外贸易的依赖性倾向加强。

政治：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方案

新国家的政治制度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作出了很大的形式上的认可。除巴西外，所有新独立国家都采用了共和政府的形式（墨西哥有两次帝国统治的时间间隔），并推崇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它们的宪

也适用于总统、国会、法院；也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做了详尽的阐述。

然而，这些具有现代特征的表面工程却没能够掩盖它们背后的独裁和寡头政治的现实。具有代表性的是，无论宪法是怎样规定的，主要的行政长官都是依靠武力夺取权力的考迪罗；通常，他的统治得到手下众多考迪罗联盟的支持，这些小考迪罗在自己的属地都是处于权威地位。立法和司法部门的独立都是虚的。一般来说，选举都是一次次很马虎的活动，因为执政党通常会控票，而反对党除了反抗别无选择。

文化程度、年龄和财产数量的多少剥夺了绝大多数人民和混血人的选举权利，如果他们有选举权，赞助者经常会迫使他们为他或是他的候选人投票，人们的名誉票都用不够（选举通常是公开的，用的是彩色选票，并要得到监督者的批准）。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他们都一致同意，一方面使农民、牛仔和另外一些更低层次的人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从而将他们排除出政治舞台；另一方面阻止他们这些人组成有思想、有目的的联合体。（自由党推行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款规定本土居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土居民有划分和处理公共土地的权力，这样就使得土著人失去了集体土地和文化传统与伊比利亚人世界的个人主义竞争能力。但是，处于这些集体中的尤其是那些有智慧的、有野心的、很幸运的成员有机会进入伊比利亚人精英集团，其中一些还成为了最为杰出的领导人，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墨西哥的萨巴特克·贝尼托·华雷斯，另一个是秘鲁的混血总统安德烈斯·圣·克鲁斯。）

乍一看，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拉美的政治历史就是上演着一部由无数的独裁统治者轮番登台和政变频繁上演的历史剧，看似毫无意义和微不足道。但是，这时期的政治斗争不仅仅是上层之间争斗利益的斗争，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这些冲突的发生，也造成了失败一方的悲剧。各个党派都为自己贴上所谓的“保守”、“自由”、“集权”和“联邦”的标签，但有些领导人非常机会主义地给自己贴上某些标签，并很快又把这些标签拿下来。

大体说来，保守派代表的是传统的权力拥有者、权威和想维持现存

制度的人的利益。因此，大地主、上层教士、高级军官和大官僚还有商业垄断集团都倾向于保守党。相反，自由党代表的是在殖民时期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经济政治权力的这些群体的利益。他们目标是渴望改变现有的制度。因此，自由党得到了来自各大省市的地主、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这些群体都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商人，还有工匠的支持。自由主义思想也吸引了有野心有激情的土著人和混血人。但是，地区冲突和家族冲突抹掉了他们的差异性，使政治形势复杂化。

自由派想要瓦解产生于殖民时期的旧的社会结构，他们想依照北美模式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受到美国这一成就的鼓舞，自由派通常倾向于建立一个能维护个人权利的、能控制教育领域的联邦政府，这也就意味着教会和军事独裁统治的终结。他们具有现代热情，有时还呼吁要废除、拆毁女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废除奴隶制。自由派的联邦主义思想对新国家的一些地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渴望拥有开发自己资源的权力，免受资本家和其他省份地区对它们的控制。

而保守派坚持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确立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和教育的垄断以及教士和军官的特殊权威。他们对类似于言论自由、出版和宗教自由等这些新事物充满不信任。简而言之，保守派想要寻求和挽回能和新生共和制度相调和的殖民秩序。事实上，一些国家的保守派已对共和制失去信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绝对君主政权。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他们都不在乎土著居民、黑人和混血人的利益。在大多数拉美国家，这些人却占据人口的绝大部分。自由派不能容忍土著民族的落后状况，认为他们的集团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侵犯了公共土地分配政策的合法性——以牺牲土著人利益而使地主受益的一项政策。尽管自由派在理论上是维护小地主和农村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实行任何一项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保守派则视大地产为其权力的基石。作为传统主义者，他们有时呼吁继续执行西班牙式的对土著居民的殖民政策。

对独立后半个世纪里的拉美保守党派和自由党派特征的这种概括[illegible]，没有述及各个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制度和理论上的变迁，这些变迁反映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下面对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中美联合省[illegible]的探讨，不仅仅揭示了这一共同主题，也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多样性。

墨西哥

墨西哥独立战争一开始由激进的教士伊达尔哥和莫雷洛斯领导，[illegible]由伊图尔比德领导获得胜利。他领导一个由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保守派组成的联盟，这些人士对1812年重新确立的[illegible]深感担忧。在这些保守派支持下所获得的独立，[illegible]经济和社会模式不会有什么改变。确切地说，由伊达尔哥发起的起义至少对墨西哥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短期的影响。例如，约翰·图蒂诺指出，巴伊奥叛乱摧毁了大庄园生产，大庄园主只有当价格因作物歉收而飙升时，才把一直储存的玉米拿出来卖，从而获得暴利。叛乱也改变了雇用牧场工人生产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illegible]规模最大化，这在头半个世纪里"不仅为农村生产玉米的生产者，也为城市[illegible]消费者带来真正而持久的利益"。同样，弗洛伦西亚·马龙和彼得·盖亚诺强调受欢迎的农村和城市团体应参与墨西哥19世纪的政治斗争，这反映了他们对墨西哥国家的形成和农民觉醒有长期的影响。

尽管如此，大庄园主仍继续控制着许多区域的农村地区。尽管土著农民努力保留大量公共土地，随着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他们的经济和 197
政治地位也有某些改善。但是由于西班牙保护性法律失效，侵占本地人的土地倾向越来越严重。依附于大庄园的苦工和佃户经常遭受债务奴役、低工资待遇、高租金、高宗教费的压迫。在1856至1857年的宪法公约中，自由主义者庞西亚诺·阿里亚加(Ponciano Arriaga)宣称：

> 除了少数例外，墨西哥富有的地主们……都如同中世纪的封

> 建领主。在他的庄园土地上多多少少已形成了惯例：他自制定并执行法律，行使司法和民事权力，征收税款和罚金，自己拥有监狱和刑具，自行施加惩罚和拷打，管理商业，禁止进行不经他允许的任何生意，除非是为庄园攫取土地。

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写到了关于独立后下层阶级改变不大的情况：“独立有名无实。以前他们是通过西班牙人来统治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些方式来统治我们。剥削依然存在，衣食住行没有任何变化。”

墨西哥经济

战争的蹂躏使煤矿、庄园荒废，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但西班牙商业和金融垄断的结束带来了外贸大规模增长，驶进墨西哥港口的船只从1823年的148艘猛增到1826年的639艘，但是出口没有跟上进口的步伐，所导致的贸易赤字不得不利用出口贵重金属来弥补。金银的外流恶化了新政府各方面的矛盾，新政府一开始接手的就是一个空空的国库，所以它不得不支持臃肿的官僚和军官阶层，而这些阶层反对任何建议减少他们人数和工资的政府。西班牙商人和其资本的外流使新政府的经济更为困难。战争遗留下的社会混乱又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抢劫团伙时常危及行人的安全，以至于无论是去普埃布拉或韦拉克鲁斯还是从那里回来，墨西哥城的游客都有可能在路上遭抢劫。

外国贷款看起来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1824至1825年间，英国银行向墨西哥贷款达到3 200万比索，以墨西哥海关关税做担保。但是墨西哥只得到仅仅1 100万比索，因为在贷款到期之前，高额的贷款利息已使墨西哥银行走向破产。到1843年为止，所欠的利息和本金使外债高达5 400万比索。债台高筑不仅仅造成沉重的利息负担，而且也危及墨西哥独立和领土完整，因为外国政府可能因墨西哥违约而进行干涉。

尽管主要来自英国的投资能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采矿业部分恢复，使战争时期废弃的、损害的旧矿产重新开业，但是，可用的资金不充

[illegible]建的技术问题比预期更严重,产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1830年阿维奥银行建立,为工业发展提供政府援助。这刺激了墨西哥工业的复兴与现代化进程。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在独立后30年里取得了有限的进步。主要的工业中心包括墨西哥城、普埃布拉、瓜达拉哈拉、杜兰戈和韦拉克鲁斯。但由于资金短缺,没有一个相应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严格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这一切阻碍了墨西哥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843年为止,阿维奥银行[illegible]个不得不关闭。这样一来,墨西哥的经济仍继续依赖采矿和农业。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贵重金属,尤其是银,还有诸如土[illegible]、胭脂虫、龙舌兰(用于制绳的一种植物纤维)的农业产品。而进口的主要是国内工业无法制造的工业制成品。

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

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冲突充斥着墨西哥独立后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1821年9月27日,前起义军领导人,“解放者”伊图尔维德与另两位义军首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比森特·格雷罗(共和党人士)和瓜达卢佩·维多利亚(自由党人士)肩并肩地进入墨西哥城,宣告墨西哥独立。政治冲突从此开始。1823年,伊图尔维德被迫退位,这就为共和制的建立扫清了道路。但很明显的是,共和派又迅速分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联邦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

1824年颁布的宪法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相互妥协的产物。宪法规定19个州拥有征税的权力;一人有一票的选举权,总统和副总统每四年进行一次改选。这就满足了各省的经济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国家的立法机关是两院制的,一个上议院(参议院),一个下议院(众议院)。通过确保各省官僚的权力,联邦结构也满足了各省中产阶级的需求,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这个宪法也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尽管教会失去了对教育的垄断地位,但天主教被规定为官方宗教,教堂和军队的特权(fueros)仍被保留。

独立战争的英雄、自由派领袖瓜达卢佩·维多利亚被选为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他把保守派人士卢卡斯·阿拉曼选进内阁。但是好日子不长,1825年阿拉曼被迫离开政府。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最终以对抗的形式出现,这反映了英美竞争对墨西哥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由美国公使乔尔·罗伯茨·波因塞特创立的约克共济会支持自由派和联邦主义,波因塞特把美国作为自己改革的榜样。而他的对手,由英国代办亨利·沃德赞助的苏格兰共济会却支持保守派。保守派所代表的是旧时贵族、教会和军官,垄断商人和一些很富有的利益。它的发言人和理论者就是阿拉曼,他是政治家,是一位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描写墨西哥历史的作家。

自由派所代表的是克里奥尔人和混血人中产阶级、小地主、专业人士、工匠、等级低下的教士和军官的利益,他们反对代表上层阶级的特权和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既是教师又是经济学家的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Jose Maria Luis Mora)曾经非常简明地表达了自由派的立场。但自由党内出现了分化:温和派提倡改革循序渐进,有时也可以加入保守派;而正统派却提倡进行彻底的反封建、反教会改革。

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每个派别都没有能稳固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但是在1833年,自由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总统瓦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在莫拉的支持下,促使国会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废除军队和教会的特殊权力及豁免权,这意味着军官和教士必须服从法院的管辖,废除什一税,使墨西哥大学世俗化,减少军队,建立一个公共教学部门并组织民兵。通过中央政府来推动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自由派认为他们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追随者。

自由派的改革计划不可避免地遭到教士和保守派的反对。军官开始谋反;牧师宣称1833年的"霍乱"是神明不满自由派所作所为而进行惩罚的标志。这时,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塔·安纳将军(Antonio Lopez de Santa Anna),一位曾经支持自由派活动的老考迪罗,现在却

[illegible]成了保守派谋反的领导人。他领导叛军攻占首都，将瓦伦丁·戈麦斯·法里亚斯和自由派驱逐境外。随后他当选总统，自己精心组建反动[illegible]，取消了1833年的改革法律，废除了1824年的宪法，并于1836年[illegible]了[illegible]保守主义宪法。这部新宪法削弱了地方上的权力，所有部门[illegible]由中央政府控制；确定了上层阶级靠金钱的多少进入权力中心的制度；恢复了教会和军队。

1834至1855年，桑塔·安纳和保守派统治墨西哥长达20余年。[illegible]，保守派把地方上的利益都集中到繁荣的人口密集的[illegible]墨西哥、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他的集权主义倾向在1837[illegible]中得到集中体现，关税法恢复了海关、销售税制、内陆海关[illegible]网，从而确保了税收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墨西哥城。

同时，保守派对偏远和边界地区像墨西哥北部和尤卡坦的忽视使[illegible]在1836年独立。桑塔·安纳对地方自治权的损害使爱国[illegible]主义者发动起义，反对桑塔·安纳的独裁统治，这也就促使以萨[illegible]·休斯敦为首的得克萨斯美国殖民主义势力开展活动。在尤卡坦，[illegible]的种姓战争既是一场反对保守派中央集权的地区战争，又是一场反对[illegible]种族战争。几乎有十年时间，尤卡坦从墨西哥分裂出来。

在美国于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之后，北美侵略墨西哥战争即墨美战争(1846－1848)是保守派的另一场灾难。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和墨西哥在得克萨斯边境的一次冲突，但爆发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美国波尔克政府决定吞并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战争以墨西哥失败而结束，这主要是因为保守派不愿调动农民军队反对美国侵略，还有统治者一味妥协，匆忙结束战争。墨西哥历史学家曾说：“墨西哥政府宁愿与美国签订条约也不愿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墨西哥于1848年与美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使墨西哥丧失了近一半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州，美国仅仅付给墨西哥1 500万美元作为补偿。

但是，自由派领导人，包括贝尼托·华雷斯、梅尔乔·奥坎波和庞

西亚诺·阿里亚加继续进行反抗。一些人表示："穷人们团结，他们能保卫自己。"在一些地区，农民起义频发，他们一方面反对大庄园体制，呼吁改革，一方面继续反对侵略者。国会反对派强烈反对条约的批准，要求战争继续。自由派人士曼努埃尔·雷洪(Manuel Rejon)在他的"评论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里说，这个条约意味着美国对墨西哥的经济控制。他预测新的边界将会让美国的企业更接近墨西哥心脏，这会导致墨西哥的美国化；他还论述："我们不能够在自己的市场上和美国进行竞争……条约宣判了我们的死刑。"最终，依照美国盛行的种族主义观点，他怀疑被割让区域的墨西哥公民是否会如条约中所许诺的那样，他们的政治和财产权利会受到保护。

曼努埃尔·雷洪对被割让区域墨西哥公民处境的担忧不久就成为现实。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导致英美淘金人袭击加利福尼亚本地人。来自洛杉矶的安东尼奥·科罗内尔(Antonio coronel)，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英美势力对本地人进行刺杀、勒索和滥用私刑，并视他们为外国闯入者，这在当地经常发生。"而原加州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他们根据1824年宪法被认为是自由的墨西哥公民。他们成为了并没有得到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所承诺的保护，反而成了谋杀、奴役、土地剥夺、饥饿的受害者。在20年里，加州本地居民人口就减少了10万。理查德·格里斯沃尔德·德尔卡斯蒂略(Richard Griswold del Castillo)曾写道："在描述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在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时，'大屠杀'只不过是个轻微的词罢了。"新墨西哥不再是个州，它变成了一块殖民地，西班牙后裔居民直到新墨西哥在1912年重获州立地位时才获得公民身份，本地民族直到1953年才拥有选举权利。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所规定的维护他们的土地权利并没有实现，为此墨西哥裔美国人表示极为不满，并宣称在割让区域的土地分配中存在严重缺陷。美国法院规定美国政府有继承完成土地确认进程的权力。在加州和新墨西哥州，这个规定使墨西哥裔美国地主承担了巨大的诉讼和法律费用，高利贷利率和牛肉价格下跌又使他们的境况急剧恶化，在土地确认进程中幸存的少数人受到来自"蛀虫们"的巨大

势力，这些强盗主要是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英美人，他们强占土地，无恶不作。美国违反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关于维护墨西哥人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条款，基于此，墨裔美国人为重新获得所丧失的土地而进行坚决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

改革，内战和法国干涉

保守党领导下的墨西哥遭受了巨大灾难，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保守党政策的浪潮，从而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复兴。1846 年，在战争期间，自由派控制了瓦哈卡和米却肯两大州。在米却肯，新的州长是梅尔乔·奥坎波，他是一位深受卢梭和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和科学家。在米却肯，贝尼托·华雷斯任州长，他是一位出生于萨波特克的律师，在任内，他以正直、高效率和民主简朴而闻名。

奥坎波和华雷斯是创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他们进行了一场名为改革的运动。像 18 世纪 30 年代的老套自由主义一样，改革寻求扫清墨西哥的封建残余，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它的思想比莫拉的贵族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更为灵活。正统派像庞西亚诺·阿里亚加和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Ignacio Ramirez)，他们超越了自由主义思想，攻击庄园体制，提倡保护劳工和妇女权利以及其他先进的思想。1853 年，桑塔·安纳重新执政，对持异见的人进行大清洗，从而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刺激了反对势力的联合，包括许多不满的温和派和保守派。1854 年初，旧自由主义首领胡安·阿尔瓦雷斯和温和派领导人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共同发出呼吁，制定了一个名为《阿尤特拉计划》的起义纲领。该计划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召开一个起草新宪法的新国会。一年之内，桑塔·安娜被迫下台，一个正统派临时政府上台执政。阿尔瓦雷斯任临时总统，贝尼托·华雷斯任司法部长，米格尔·莱尔多·特哈达任财政大臣。

华雷斯一上台就发布一项法令，即《华雷斯法》，宣称把教会和军官的特权仅限于内部纪律事项。1856 年由特哈达起草的《莱尔多法》对 202
教会权力的物质基础(土地财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项法律禁止教



墨西哥的何塞·克莱门蒂·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在这幅名为《华雷斯的胜利》的画中，歌颂了墨西哥人民英勇抵抗法国的入侵，以及本尼托·华雷斯(Benito Juarez)的英明领导。画中描绘的是1862年5月5日的普埃布拉战役，此役中，普通的墨西哥平民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武器不足、人数也处于劣势的墨西哥正规军，大胜法国的兵团。

会拥有不用于宗教意图的土地，佃户有买卖财产的权利。它也拍卖不动地产给出价最高的人，同时要付给政府许多销售税。

法案意在产生一个农村中产阶级，但是它没有对教会地产的分配做任何规定，所以，大部分土地都落入国内和国外的地主、商人、资本家手中。更糟糕的是，除了用于土著居民的公共用途和公用牧场以外，法案禁止土著人拥有土地，规定以变卖教会财产相同的方式来变卖土地。结果，农村出现了许多抢夺土地的人，他们一方面向法院告发，一方面在拍卖会上购买土地。法律规定本地的业主有优先购买的机会，但是他们连最低的购买价格都付不起。当他们起来抗议和反抗的时候，特哈达却这样解释道，他颁布这项法案的意图就是公用土地应该在土著人中间划分，而不是卖给其他的人。但是又说："印第安人群体的继续

存在是无法容忍的……”

莱尔多也说，那些租用土著人土地的人有权力进行购买。这样一来，结果就是，在1856年夏季和秋季，许多人失去了耕地和牧场地，他们主要是从这些土地获得收入，用来支付宗教仪式和公共用途的人。在1857至1867年这10年间，《莱尔多法》落实得非常缓慢，这是由于人民的反抗，以及自由派在与保守派反革命势力和法国干涉势力的斗争中需要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自由派长期所倡导的农业政策迫使划分公共土地，这就为农场主甚至是一些小农和中农购买土地提供了便利，也加强了大庄园体制，扩大了农村中产阶级的规模。

这时，温和自由派起草了1857年宪法，宣布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限制教会；禁止教会和民营企业拥有土地；保护私有财产。它恢复了1824年的联邦构架，但是以一院制代替了两院制，并废除了副总统职位。但仍然出现了一些谴责土地垄断、劳役制和财富分配不均的不和谐声音。庞西亚诺·阿里亚加就是其中一个，他抱怨道：“我们宣扬我们的思想，却忽视了现实情况。”“一个饥寒交迫，倍感痛苦的民族怎么能实践我们所推崇的政府？我们仅在言辞中谴责奴隶制，却没采取实际行动。实际上，我们的人民比古巴或是美国的黑奴过得更为凄惨。”尽管阿里亚加的言辞很有力讥讽，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却很温和：国家应该控制和拍卖未开发的土地。立刻，保守反对派视阿里亚加的方案为“共产主义的”；而温和的多数派秘密地在国会中通过了该宪法。

因为新宪法吸收了《华雷斯法》和《莱尔多法》，教会就公开宣布将宣誓效忠的公共官员开除教籍，开展政治斗争。反革命势力积聚了数月的力量。1857年，“三年改革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进展，双方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陷入了财政窘境。但是，保守派有教会支持的优势。1859年，华雷斯颁布改革法令，这项法令无偿没收教会财产，将其国有化，分了教会建筑；废除修道院；确立宗教自由，政教分离。

1860年中期，尽管保守派势力进行摧毁性袭击，但是战争的浪潮正朝着有利自由派的方向发展。战争结束了，但是顽固势力仍在寻求国外的帮助。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保守派政府仇视墨西哥自由派和

华雷斯，更有甚者，他们寻找各种借口进行干涉，因为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控制或损害了外国财产，外国股东叫嚣着要求赔偿，讨还债务，这三个欧洲国家也如此。了解到这些索赔是无中生有的后，华雷斯以国家贫穷而拒绝赔偿。1862年，上数三国毫无缘由地侵略和占领了韦拉克鲁斯，但法国拿破仑三世企图推翻自由党政府，建立一个由法国控制的傀儡政权，继续派出远征军同保守党残余势力勾结，攻入墨西哥大片国土；1863年7月，他宣布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皇帝。

为了顺利迎接墨西哥新统治者的到来，法国军队从韦拉克鲁斯一直朝普埃布拉开进，在普埃布拉，法军遭到了墨西哥军的顽强抵抗，损失严重。最后，法国仍迅速占领了许多主要城市，但是共和派游击队控制着国家大部分领土。

同时，保守派流亡势力代表团1864年为马克西米利安村过进行了加冕，使其成为墨西哥皇帝。保守反动势力本指望马克西米利安帮助他们重获丢失的财富和权威，但是，马克西米利安考虑到现实情况，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因为本土和外国的地主以及资本家购买土地可为他带来丰厚的利益。而且马克西米利安还极力争取温和自由派的支持。

这样一来，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希望都落空，也无法摆脱困境。马克西米利安军队的胜利并没有打击自由派反抗的信心，反而使国内人民更加仇视侵略者。倚仗墨西哥崎岖的地形，1865年，联合政府在与法国和保守反抗势力同盟斗争中取得胜利，并强烈要求法军撤离墨西哥——一个被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视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下的地区。那时法国国内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和外交问题，拿破仑三世决定减少损失，终止其在墨西哥的征程。没有了墨西哥和法国同盟的帮助，马克西米利安和他主要的大臣——米拉蒙（Mirámon）和梅希亚（Mejia）因叛国罪被捕，被执行枪决。

战后改革

华雷斯，墨西哥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英雄，在1867年当选总统，恢复共和政权。他的政府所面临的是一个已被战争毁坏的国家。农业和

[illegible]支持；在1[illegible]年，墨西哥出口低于1810年的出口水平。为了[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军事控制的危险，华雷斯解散了2/3的军[illegible]了[illegible]，不过迅速被[illegible]。他把国家有限的资源用于[illegible]发展，尤其是初级学校的发展；到1874年为止，有8千所学校在运转，学生达到35万。

[illegible]农业政策旨在促进农村地区资本主义的发[illegible]不是[illegible]的利益为代价的。确实，1868[illegible]通过迫使分割公共土地来努力实施《莱尔多[illegible]和抢夺土地的风气。结果就是农民在全[illegible]发生[illegible]起义，最[illegible]一次就发生在伊达尔戈州(1869[illegible]为是“共产主义者”，[illegible]在联邦军队的帮助[illegible]恢复旧的秩序。有少数自由派表达抗议，但没引[illegible]是[illegible]斯，他谴责[illegible]的盗窃和抢夺土地的[illegible]行为，并呼吁终止法律的实行。

[illegible]斯在1[illegible]一次当选总统。他镇压了由革新战争英雄波[illegible]·迪[illegible]叛乱，因为迪亚斯指责华雷斯试图变成一个独[illegible]者。[illegible]因[illegible]病发作去世，继任总统的是最高法院的大[illegible]多·德·[illegible]。[illegible]在1876年，迪亚斯在[illegible]斯资本主义势力的帮助下，发动叛乱夺取了政权。

迪亚斯以改[illegible]的名义就任总统。但事实是，他信奉实证主义的反革命思想，认为秩序和进步[illegible]在自由之上。墨西哥资产阶级的意[illegible]转换反映了他们从一个支持革命的阶级变成了一个比旧的克里奥尔[illegible]族更为残暴更为贪婪的统治阶级。那种独裁统治的残余迅速渗透到[illegible]统治阶级的各个方面。新旧富人的利益需要政治的稳定，被驯化的劳动力，与能改善和有助于外来投资的政治经济环境。迪亚斯的“体面专政”的使命就是达到上述的目标。

阿根廷

1816年，图库曼代表大会宣布拉普拉塔河联合省独立。尽管如

此，"分裂"才能更恰当地描述拉普拉塔地区的政治形势，自克里奥尔人于181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夺取政权起，原来西班牙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巴拉圭、乌拉圭和上秘鲁的解放运动

巴拉圭第一个起来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在克里奥尔人律师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独裁统治下，巴拉圭宣布自己独立。然后，弗朗西亚迅速对其进行封锁，不再向控制其通往海洋的河流渠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缴贡赋。弗朗西亚仅仅允许巴拉圭经由巴西与外界进行有限的许可式贸易，这也主要是通过军方。

弗朗西亚统治下的计划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利益：对农田的计划分配减少了出口作物如巴拉圭茶、烟草、蔗糖等的生产，从而确保了食物的充足供应，这样土著人及混血平民的健康也就有了保障。弗朗西亚制度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就是建立许多国营农场和牧场，这就使牲畜养殖非常专业化，从而终结了巴拉圭主要从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进口畜类的依赖性。而在弗朗西亚统治下最遭殃的还是西班牙人（弗朗西亚利用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压迫和虐待）和克里奥尔贵族（受到严格监视和镇压）。

加乌乔人领袖何塞·阿蒂加斯也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领导乌拉圭脱离联合省，进行独立战争。181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从蒙得维的亚撤退，把它交给了阿蒂加斯手中。随后，阿蒂加斯不仅仅保卫乌拉圭民族，而且进行社会改革。1815年，他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把贵族土地分给农民，给黑人、土著民族、桑博人和贫困白人以优惠。但是这套方案没有机会得以实施。1817年，一支强大的巴西军队侵入乌拉圭，将其占领。直到1828年，英国不愿看见乌拉圭处于巴西或是阿根廷的统治之下，插手进行谈判，乌拉圭才获得独立。

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北部山区一角的上秘鲁，在1810年后也想脱离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上秘鲁头三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后来被西班牙势力打败，主要是因为本地人的无动于衷和不支持，当地克里奥尔

仍对西班牙保持忠心。直到1825年，玻利瓦尔的副手何塞·塞德·苏克雷将军，才最终解放了秘鲁。苏克雷以解放者的名义将上秘鲁更名为玻利维亚，第二年，它在玻利瓦尔起草的一部复杂的、完全不切实际的宪法中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争取进步和民族统一

各省区之间的纷争在图库曼成立的拉普拉塔联合省中滋生，危及国家的统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富庶的港口将霸权强加在内部贫困地区，激起了内地的各种抵抗。西班牙贸易垄断的结束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了丰厚的利益，虽然圣达菲、恩特雷里奥斯、科连特斯沿海各省的收入减少了，但是它们的肉类和皮革出口增加了，土地价格也上涨了。但内地省份原先受殖民垄断保护的酿酒业和纺织业却无法与更为便宜、质量更好的欧洲进口商品进行竞争，处于不利地位。

内陆各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原始工业，要求获得自主权，甚至要获得独立，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更希望建立一个由港口城市管辖的统一的自由贸易区。这就是阿根廷集权派和联邦派斗争的导火索。到1820年，联邦派胜利；联合省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共和政权，其中内陆省份被考迪罗们控制了，所代表的是本地区统治阶级的利益，拥有自己的军队。

1821年，出现了统一运动的新浪潮。里瓦达维亚，一位充满激情的自由人士，深受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影响，发动了一场彻底的教育、社会和经济改革。他提倡初等教育，创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废除封建势力和什一税，缩减修道院。里瓦达维亚了解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努力引进英国外资。但是，工业化的道路被证明是非常曲折的，效果甚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牛群养殖，其范围迅速向南扩展。为了控制加大量加乌乔牧人的流动，里瓦达维亚制定了流浪法，规定他们必须拥有护照，有农场主的书面许可，才能离开。

1822年，为了增加国家税收和产值，里瓦达维亚引进了永佃权制，它是一项旨在以固定的租金把公共土地划给承租人的计划。里瓦达维

亚在农业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他没有[illegible]规模，也没有规定促进[illegible]生产的具体措施。[illegible]多本土和外国商人、政治[illegible]，使他们加入了[illegible]所产生的最终结果竟是产生了一个[illegible]、财大气粗、[illegible]亚进步思想实施阻碍的地主[illegible]不是[illegible]。

里瓦达维亚的方案还影响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illegible]；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illegible]，在一个[illegible]的经济全面发展。182[illegible]年，在里瓦达维亚的[illegible]下，[illegible]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会上起草了[illegible]选为新国家的总统，并提出了将布宜诺斯艾利斯[illegible]港口联邦化的提案



虽然他为自己精心塑造了亲民的形象，但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Juan Manuel Rosas)是一名富裕的农场主兼军事考迪罗，因此，其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捍卫阿根廷有地贵族阶层的利益。

也就是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都将归属于整个国家，海关的所有税收也都用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

里瓦达维亚的这个建议反映了他的民族主义和他需要调动国家资源进行与巴西争夺乌拉圭的战争(1825—1828)。国会批准了他的议案，但是遭到内部联邦派的反对，他们担心这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削弱他们的力量，因此拒绝批准宪法，甚至要求他们的代表退出国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农场主们也站在联邦派的一边，因为他们根本不肯交出他们的特权，认为里瓦达维亚的社会经济改革就是一个愚蠢的计划。由于改革方法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1827 年 6 月 28 日，里瓦达维亚被迫辞职，后被流放。这项旨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计划最终失败了。

派系斗争告一段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寡头拥护的联邦主义占了上风，联邦派人士罗萨斯在 1829 年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1831 年，他提出一个联邦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其他省份行使外交权力，在其他方面，各省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罗萨斯所定义的联邦主义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拥有海关收入，继续控制贸易。罗萨斯与各省的寡头建立个人联盟，在武力的支持下，整治不服从指挥的领导人，以此来确保他控制内陆的独裁权力。

罗萨斯的长期执政颠覆了里瓦达维亚的政策。罗萨斯和他的地主统治阶级唯一所关心的经济问题就是皮革和腌肉的出口以及外国商品的进口。这个独裁者在 1835 年的关税法中提出保护麦子种植和手工业，但是由于土地争夺和随后出现的牲畜养殖竞争，以及手工业的落后性，结果麦子种植业和手工业都无法从法案中受益。罗萨斯自己是一个大农场主，也是腌制厂主。他发动讨伐南部印第安人的“荒漠远征”，抢夺了土地，并以低价出售给地主。自此，里瓦达维亚所推行的国家拥有控制土地权被废除了。

尽管他声称要施惠给加乌乔人，但是却制定更严格的流浪法以防止他们过分强大，他将所谓的闲散人员安置在农场或是军队里。有些历史学家说罗萨斯代表乡村群众反对城市贵族，但这与他的话语是不

相符的。他担心农民反抗，便培养加乌乔牧人和战斗的人来打击他们。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都知道，被剥夺财产的人中总有起来反对富人和有权力的人的倾向……我认为应对这个阶层的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控制和指引他们。"但是罗萨斯的"民粹主义"并没有改善无产者的处境。在罗萨斯的控制下，农场中的纪律非常严格，它甚至恢复了殖民时期的拷打、鞭打、足枷、火烙等。罗萨斯的政府就是一个封建领主体制，它建立在与大地主、军阀非正式结盟基础上的。

罗萨斯极力镇压反对派和潜在的异见者。为了执行独裁者的意志，他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玉米棒子队"。这个恐怖组织与警察一起迫害和谋杀大量反对罗萨斯的人。所有的官方杂志和报纸的头条都写着"野蛮、肮脏的集权派去死吧！"的标语，甚至连着装都要有联邦主义的象征——红丝带。数千名反对分子出逃往蒙得维的亚、智利、巴西或其他的避难地。

208 在罗萨斯的统治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商人和地主享受着繁荣，而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畜牧业和农业的技术非常落后，港口设施不完全。

同时，沿岸各省在畜牧业和农业方面却发展得更快，它们逐渐意识到罗萨斯所标榜的联邦主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也意识到拉普拉塔河的自由航行制度能确保其繁荣。1852年，反罗萨斯势力形成联盟，并联合恩特里奥斯省省长乌尔基萨，共同打败了罗萨斯军队，推翻了其政权。

反罗萨斯战争的胜利没有结束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其他省之间或者是联邦主义和集权主义之间的冲突，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融合统一的缓慢进程。取得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权的流亡自由派和在恩特里奥斯的首领乌尔基萨（仍推崇联邦主义）之间出现了裂痕。为了追求现代化和进步，乌尔基萨建议建立一个松散的联盟，各省都能分享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关税。但是这样一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领导人担心乌尔基萨（他错误地被视为罗萨斯式的考迪罗）夺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乌尔基萨使用武力都没有迫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接受统一计划，最后，双方同意和平分治。结果，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代表没有参加在1852年召开的圣菲制宪会议。

1853年宪法反映了一位新闻记者阿尔韦迪的思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把美国模式作为阿根廷政权的榜样。这部新宪法在某些方面与美国宪法十分一致。原先的联合省变成了一个联邦共和国，总统每六年为一任期，也就是说每六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立法机构为两院制：参议院和众议院。天主教规定为国教，但是人民有宗教自由。各州有权选举自己的州长，组建自己的立法机关，拥有自己的法院，但是联邦政府有权干涉，包括武力干涉，来确保各州遵循宪法的规定。乌尔基萨被选为阿根廷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保守派地主势力曾是罗萨斯的最坚定支持者，现在却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一边，拒绝接受1853年宪法，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产生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国家。结果，阿根廷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由乌尔基萨组成的巴拉那政权，另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两个政权维持了五年的时间。在联邦政权的首都巴拉那，乌尔基萨极力平息地方叛乱，刺激经济增长，鼓励教育和移民，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仍然落后于富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加强与欧洲国家贸易的基础上实现繁荣）。

为了增加收入，乌尔基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展开了一场关税战：如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支付了商品关税，在巴拉那河罗萨里奥港口卸载的商品还必须征收附加税。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驶往罗萨里奥的船只进行制裁，中断与巴拉那的所有经济活动。于是1859年，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巴托洛梅·米特雷率军打败了乌尔基萨政权，取得胜利。布宜诺斯艾利斯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其他省份对其港口的依赖性，以及各方国家统一的意识增强，终于使各省达成了妥协。1862年召开的就是代表所有省的大会，最终达成了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临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关税国有化，附文就是其省的税收不应低于1859年的水平。杰出的历史学家、

诗人和政治家巴托洛梅·米特雷，被选为阿根廷统一国家的第一位总统。

统一后，米特雷在促进经济进步和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正如协议中所承诺的那样，关税被国有化了；制定了首都联邦化的计划。连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内陆省份的铁路和电话线的建设也启动了，来自欧洲的移民越来越多；在建立公共学校方面也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大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耗时长耗费大的巴拉圭战争(1865－1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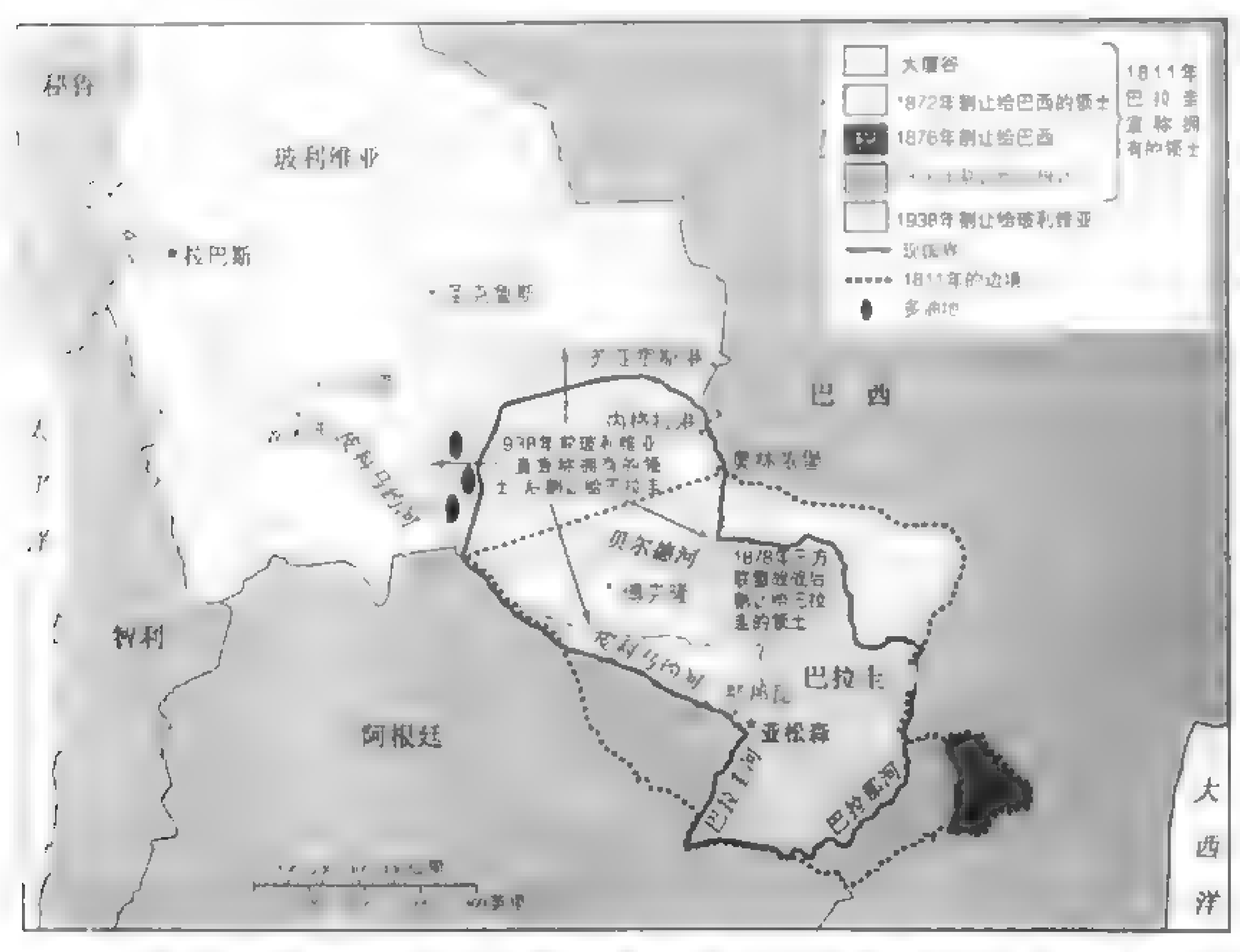
巴拉圭战争

弗朗西亚总统在1840年去世后，老洛佩斯继任巴拉圭总统。老洛佩斯继续沿袭弗朗西亚的独裁统治，但政府结构相对松散。既然他接手的是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国家，老洛佩斯的统治方式也就比弗朗西亚更为宽松，更为灵活。老洛佩斯致力于与外界发展关系，结束巴拉圭外交和经济上的封闭状态。阻碍巴拉圭统一的顽固敌人——罗萨斯政府倒台后，老洛佩斯政权得到阿根廷的承认，阿根廷的巴拉那政府也开放了与巴拉圭的贸易。老洛佩斯与一系列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联系。

国家的封闭状态从此结束了，随之经济规模也扩大了。尽管农业(尤其是烟草、巴拉圭茶等出口农产品的生产)仍然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老洛佩斯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他其中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拉美最现代的企业——铸铁厂。他也重视交通运输的改善，兴建道路和运河，生产商船，修建短途铁路等。

在继承弗朗西亚政策的基础上，老洛佩斯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1848年，他将生产巴拉圭茶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林地和许多耕地收归国有。这样巴拉圭茶和其他产品的出口逐渐被政府垄断，国营农场的数量增加到64个。老洛佩斯也重视发展教育，到他逝世为止，巴拉圭已有435所初等学校，招收了25 000位学生，有文化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都大。

[illegible]地位，老洛佩斯将许多土地和企业的所有权纳入[illegible]了政府[illegible]手中；因此，产生了得到国家支持[illegible]私有地产的规模仍很小；私有农场受农场主[illegible]劳役和债务奴役很少了，1842年的《解放[illegible]义迅速发展，土著人和混血人生[illegible]在1862年去世后，巴拉圭已经成为拉美最先进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随后，老洛佩斯的儿子小洛佩斯继位。小洛佩斯在此之前就已经担任了巴拉圭军队的总司令和国防部长，他从欧洲采购了包括机关枪、[illegible]在内的大量新式武器，使得巴拉圭军队成为拉美最现代化的部队。在老洛佩斯统治时期，巴拉圭与巴西时有边界冲突发生。在小洛佩斯时期，边界冲突终于演变为一场公开战争：1864年，巴西出兵帮助乌拉圭红党颠覆了巴拉圭支持的白党政府。小洛佩斯无法忍受巴西破坏乌拉圭权力平衡的举动，也担心巴西会限制巴拉圭通往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口，使巴拉圭的对外贸易要完全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眼

色行事。

然而巴西政府无视小洛佩斯的抗议，双方矛盾激化。同年11月小洛佩斯对巴西宣战。翌年5月在英国驻阿根廷大使爱德华·桑顿的策划下，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签署协议，结成三国同盟以对付巴拉圭，并签订秘密条约以瓜分其领土。由此，巴拉圭所面对的是一个包括南美最大的两个国家，在人力和其他资源占有巨大优势的联盟。

但是战争持续5年才结束，因为在巴拉圭要塞部位拥有在数量比联军多大约7万个纪律严明的精锐部队。1868年7月，巴西军把小洛佩斯包围在乌迈塔(Humaita)要塞。此时，巴拉圭军队已坚守了要塞一年多，食品和武器弹药严重缺乏，小洛佩斯不得不弃塞突围，巴西军随后夺取了要塞。战至12月，加西亚指挥联军部队经过一次血战之后，终于攻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城下，1869年1月亚松森被攻占。但小洛佩斯带领残部退入北部山区继续进行游击战。巴西人经过11个月的清剿，于1870年3月1日将其俘虏并处决，战争结束。战后巴拉圭的人口从战前的52万多减少到不足22万，其中成年男子不到2.8万，整个国家满目疮痍，土地荒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种生产活动均由妇女承担，社会经济长期无法恢复。不仅如此，和平条约使巴拉圭丧失了11万平方公里国土，战后赔款更增加了巴拉圭的经济负担。主要占领国巴西在巴拉圭扶植建立傀儡政权，以恢复巴拉圭经济。

新政策的实质就是推翻弗朗西亚和洛佩斯推行的政策。绝大部分国营土地都以廉价变卖给投机商人和外国商人，而不能递交有效文件的佃户却被排除在外，尽管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已耕种好几代。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为止，国营土地几乎不存在了。外国人通过贷款、优惠和购买土地将势力渗透到各个方面，从而剥夺了巴拉圭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

萨米恩托统治下取得的进步和发展

巴拉圭战争给阿根廷也带来了变化：获得了巴拉圭的赔款和领土(福莫萨、查科和米西奥内斯)。政治上，萨米恩托走进权力中心

1868—1874)，他致力于阿根廷的统一和经济政治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阿根廷掀起了科技革新的浪潮。铁路扩展到内地区，连接着牧场和农场。带刺铁丝网和苜蓿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牲畜的质量。1876年，来自法国的冷冻货箱船为腌肉的出口打开了渠道，欧洲大陆对阿根廷牛肉的需求量大增。牧场和农场的扩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萨米恩托政府就鼓励向阿根廷移民；在他执政六年中移入了十多万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萨米恩托改善公共学校体制，向国外聘请教师，建立教师培训机构。但是萨米恩托的政策也有不足之处，他把土著人和加乌乔人视为文明进步的阻碍，利用流浪法或另一些镇压措施控制这些人。

萨米恩托在任期间，阿根廷呈现出一派发达、繁荣的景象。但其中也隐藏有缺陷：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升值并没有使悲惨的加乌乔人或大量的新移民受益。外来移民没有自己的家园，也无力购买土地；结果，许多人决定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其他沿河城市，从而形成从事贸易活动的城市中产阶级。同时，由于经济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来兴建铁路、电话线、煤气厂以及其他设施，外国对阿根廷经济的影响在扩大；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加强了土地殖民模式；英国对于这种经济基础设施的控制日益严格也强化了这样的殖民模式；对外国大城市的依赖，伦敦取代塞维利亚成为金融中心。但是米特雷、萨米恩托和阿根廷的另外一些建设者被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和国家繁荣的气象所迷惑了，认为这种繁荣是永久的。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会更为严重，也没预测到阿根廷下一代将面临什么问题。

智利

1814年10月，秘鲁总督派兵前来恢复殖民统治。智利民族志士在奥希金斯领导下越过安第斯山，与圣马丁的军队会合。1817年，这支军队在圣马丁指挥下进军智利，2月12日在查卡布科和迈普大败西班牙殖民军。同年，智利独立，成立共和国。奥希金斯，这位智利解放运动中的英雄，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被推举为智利最高执政官。执

政府，奥希金斯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削弱贵族和教会势力，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取[illegible]长嗣继承的承袭权[illegible]和大户之间肥沃的土[illegible]大地主的不满；他对[illegible]教会[illegible]和对宗教活动的严格限制激怒了教会势力。[illegible]也加入了反对奥希金斯的行列。1823年，奥希金斯被迫[illegible]。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智利国内持续动荡，几近[illegible]。

波塔利斯和经济增长

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智利国内政治和武装冲突[illegible]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保守派也是集权主义者，代表了中央山谷的大地主和圣地亚哥富有商人的利益；自由派则是联邦主义者，代表了北部和南部省份的地主、商人和矿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中央控制国家政治和经济。在1830年，保守党在[illegible]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直到1837年，波塔利斯才把他的思想推广到智利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作为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商人和一家进口企业的拥有者，波塔利斯真正服务于由大地主组成的寡头集团和数目有限的智利市场的商人。尽管他私下里表达了无神论观点，但是他仍支持教会势力，把它作为控制低等阶级的工具。他深刻了解到贸易、工业和采矿业的重要性，他采取措施扫清内陆贸易的一切障碍。而且，波塔利斯提出了一[illegible]税以增加国家税收，解散多余的雇员以减少国家开支。农业受高关税的保护；改善港口设施；加强智利商船建设，1835年，连接智利各港口的轮船队开始运行。在保守党的精心统治下，以及由于各国对智利的银、铜和皮革的需求增加，在18世纪30年代，智利经济取得了稳步发展。

经济的增长增强了大地主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波塔利斯恢复了教会的权力，使智利和教会势力关系正常化。

1833年，由保守党控制的议会颁布了新宪法，进一步加强了大地主的权力。实行间接选举，选举权只限定于25岁的男人或是能满足所

有文化修养与财产资格。新宪法恢复了继承权，以确保大庄园的永久存在。天主教被定为国教，教会有控制婚姻的权力。总统享受对国会立法、任命官员的绝对否决权。既然总统控制了整个选举机器，那么选举只是个形式而已罢了。

在布尔内斯统治下的经济扩张

1841年，曼努埃尔·布尔内斯继任总统；1846年开始第二任期。国家经济开始了又一次的飞跃。金融、采矿业和农业空前繁荣。克里木战争和19世纪50年代加州和澳洲的淘金热为智利的小麦扩展了国外市场，从而刺激了耕地的扩大。1840年，一位名叫威廉·惠赖特的美国人创建了轮船商队。他建立了一家公司，1852年，这家公司完成了智利第一条铁路线，为科皮亚波的矿石出口提供了出路。从圣地亚哥到瓦尔帕莱索的铁路直到1863年才竣工。外资尤其是英国资本开始向智利经济渗透；英国控制了智利外贸，也对智利的采矿业和铁路产生极大的兴趣。但是智利资产阶级组成了一个重要集团，在合资企业和银行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主动性。

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主要是大地主；他们的土地自然升值。一些大地主将他们的钱投资于铁路、采矿业和贸易。贵族的保守性和封建性阻碍他们转变成资产阶级。在智利南部，出现了小块土地占有格局，19世纪40、50年代，德国殖民势力增强。富有的中央大峡谷仍然被大田庄主控制着，依赖于低效率的技术和廉价劳动力。因此，一面是基于采矿业、贸易、银行、集约型农业和工业的资本主义；一面是基于大庄园、劳役和贵族的半封建主义。

尽管智利看起来比其他拉美国家更发达，但像激进分子拉斯塔里亚那样的自由派不满保守党在实现现代化上的犹豫不决。他们想加速变革，呼吁重新修订1833年宪法，结束寡头统治。

一位抨击教会和西班牙文化遗产的作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坚定地站在拉斯塔里亚一边：“拉斯塔里亚在法国待了几年，深受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激进共和思想的影响。1850年他回到智利，团结一批倡导

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工匠。从此开始了反政府运动，在几个月内，人数就达到4 000。”

蒙特的温和改革

平等协会在1850年选举前夕创立，布尔内斯已经选择蒙特为他的继承人。尽管蒙特提出进步的教育改革，赞助艺术和文学，但是自由派仍认为他采用波塔利斯的专政统治方式和1833年宪法。自由派像拉斯塔里亚、激进民主派像毕尔巴鄂等人宣称选举进行当中是欺骗行为，呼吁要改革宪法。结果政府宣布全国处于戒备状态，并镇压平等协会。圣地亚哥和拉塞雷纳的自由人士起来反抗，但迅速被镇压了。拉斯塔里亚被流放，毕尔巴鄂和阿科斯逃往阿根廷。蒙特当任总统，为了防止叛乱发生，他赦免了反叛者，废除了继承权和什一税。

继承权的废除，使大地主的地产四分五裂，从而使贵族数目减少。由于分裂的土地都落在了一些庄园主手中，佃户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变，受影响的各方愤怒抗议。什一税的废除，以及蒙特拒绝耶稣会返回，极大地触怒了教士阶层。为了应对他们的叛乱，蒙特于1857年颁布了新的民法：教育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对教士有管辖权，非天主教徒有采取世俗婚礼的权力。

继承权和什一税的废除是自由派和保守派、新兴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之间的一种妥协。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没有赢得什么，地主也没有失去什么；主要的输家就是教会了。尽管蒙特的改革疏离了保守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但改革使他赢得了温和自由派的支持，他们和温和保守派组成了新的联盟——民族党，它的口号就是“有秩序的自由”。

在蒙特第二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了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1857年的大萧条使铜价格迅猛下降，澳洲和加州对智利小麦的需求也大量减少。经济停滞点燃了政治不满的火焰，另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1859年爆发。反叛者包括激进知识分子、北部采矿行业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工匠和小农。他们都反对中央大峡谷大商人和大地主联盟。他

[illegible]改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国家对采矿业和工业提供支持;分割地[illegible]地;[illegible]。叛乱结束之前,已失去了5 000人的生命,一些[illegible]人被[illegible]了,另一些被驱逐出境了,还有一些逃亡了,而许多[illegible]人、[illegible]农民都被处决了。莫里斯·塞特林把这次叛乱作为[illegible]的转折点:“资产阶级叛乱失败意味着智利资本主[illegible]已不可能,迫使其选择新的出路,这也意味一种客观的历史可能性没有成为事实。”

[illegible]复,出现了又一个繁荣时期,产生了新的[illegible]人涌入智利南部、建设城市、开发耕地农场。

[illegible]在其北部,那里有丰富的铜、硝酸盐和海[illegible]的。[illegible],硝酸盐主要储存于玻利维[illegible]和秘鲁的塔拉帕卡省,于是智利资本开始涌入这[illegible],迅速[illegible]了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硝盐工厂。在北部,出现了一个[illegible]的资产阶级。[illegible]加洛,一位富有矿[illegible]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党派——激进党,它比自由派更激进,反对宗教压迫和专制政策。

自由党上台

[illegible],智利的政治权力就逐步转移到自由党手中,1871年,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当选为第一位自由党执政总统。1873至1875年间,自由党和激进分子促使国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宪法改革:参议员任期由九年[illegible]六年;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公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这也意味着新兴资产阶级取得反对大商人大地主的胜利。到1880年为止,在智利个人财富超过100万比索的59个人中,只有21个是在殖民时期就有的;20个是通过农业获得财富的;而剩下的是通过做煤矿[illegible]、铜和银的生意获得的。阿诺尔德·鲍尔从中观察到一个最有趣的事实:“通过农业来发展财富的不止那20个,那剩下的39个——矿主、银行家和资产阶级——反过来把自己的钱投资到农

业领域。"鲍尔的评论直指"智利的社会结构"——智利农业寡头继续施加影响。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并没有给智利民众、工人阶级、佃户等带来任何帮助。

在智利独立后半个世纪里，对农民社会有限的共同理解促使自由和保守派精英克服分歧，追求一种强调寡头政治集权和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国家政治认同。同时，绝大多数智利农民、马普切人、下等族群，都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他们在民主、平等和反殖民等问题上被动员起来以促进创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尔马塞达自己就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却站在他们一边，支持改革运动。

中美洲联合省

独立前夕，五个共和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
216 瓜和哥斯达黎加①原是危地马拉都督辖区的五个省份。在都督的统治下，少数富有的克里奥尔商人组成协会，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1800年，由于陷入了欧洲混战，贸易减少和国内政治混乱，西班牙无力控制美洲殖民地，引发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浪潮。1821年墨西哥宣布独立后，中美洲也宣布独立，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分裂成众多自治市政府。墨西哥"皇帝"伊图维德主张将中美洲并入到墨西哥帝国，得到了中美洲保守派的支持，却遭到众多自由派人士的反对。1822年，大多数议员表决赞同和墨西哥合并，但是第二年伊图维德就退位了，自此，合并就没有再提起。

独立和联盟的未来，1810—1865

尽管其他省反对和憎恨危地马拉的控制，但是中美洲的联合性传

---

① 为叙述上的简洁，伯利兹和巴拿马也包括在中美洲的范围内，但事实上，伯利兹是英国殖民地，巴拿马则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03年以后成为巴拿马共和国）。因此，从历史上看，与这个地区并没有什么关联。

一直持续存在。1823年，召开了中美洲地区的"全国制宪会议"，成立了由5个州组成的中美洲联邦，包括的五省：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1824年宪法规定建立一个联邦政府，每个州有自己自由独立的政府，宪法带有强烈的自由派色彩：如规定废除奴隶制和教会特权，取消贵族头衔，实行文明，提倡自由贸易和自由合同劳动。第一任、曼努埃尔·何塞·阿尔塞，一位萨尔瓦多的自由派人士，被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同时，各州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府，在组建过程中，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争夺权力的现象：基地在危地马拉的保守主义，是由商业垄断集团、许多大地主和教会所拥护；自由主义是另一些许多省份的地主、工匠和知识分子等中产阶级所坚守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权力都掌握在大地主和大商人手中，他们经常调动其私人军队和劳工进行斗争。

实际上，各州既不愿也不能资助自己的政府和危地马拉城的联邦政府，表面上统一的中美洲联邦不久就解体了。阿尔塞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特权极力抵制自由派的影响，由于萨尔瓦多省进行了许多反教会的社会改革，而且还传播来自美国的自由思想，他派军队侵入萨尔瓦多，引发了内战(1826—1829)。战争中，自由派领袖之一、洪都拉斯人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击败了阿尔塞的军队，解放了萨尔瓦多，然后凭借着来自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援助，侵入危地马拉，放逐了危地马拉大主教，阿尔塞总统逃到墨西哥。自由派赢得了对国家的控制。

1830年，莫拉桑被选为联邦共和国总统和军队司令官。同时，加尔韦斯，一位前保守人士和现自由人士、危地马拉执政官，发动了一场危地马拉政治和经济重建运动。这个运动方案包括允许世俗婚姻，建立世俗学校，允许修女还俗，减少教会节日等；农业改革包括允许占地者可以半价购买土地，允许本地人在空余土地上定居。加尔韦斯也谋求危地马拉司法制度的改革：设立陪审团和人身保护令，赋予州长有任命法官的权力。这最后一项措施打压了土地权益集团参与政治生活，也限制了地方官员参与司法和行政事务。

由于失去了地方土地权力集团的支持，再加上1837年席卷中美洲

的霍乱所造成的灾难使加尔韦斯的改革方案无法实行。地方教士宣扬霍乱是神的惩罚，受此煽动，土著人和混血种人开始起来反抗加尔韦斯。主要的一次叛乱发生在1838年，由拉斐尔·卡雷拉领导。

卡雷拉军队占领了危地马拉城，于1842年打败了莫拉赞军队，结束了联邦共和国的统治。然后，卡雷拉在危地马拉建立了一个保守派政权。1854年，他取消选举形式，要求国会任命他为终身总统，直至他1865年去世，并在国内推行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变革：恢复教会特权，将财产归还地主和教会，恢复劳役制。公共土地迅速被保守派富人寡头占领。保守党各部长都是从统治者家族的精英中挑选。除了传统上的劳动安排外，出现了自由劳动和货币经济，大地产上土著人和拉迪诺人则因无力偿债而在大种植园中被奴役工作。

在卡雷拉统治时期，尽管绝大多数地区的劳动力已在各地比以前更为自由，但中美洲各个地区都有相同的趋势和发展。至19世纪50年代为止，世界对咖啡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了农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同时也侵占了土著人大量的公共土地。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的靛青和咖啡的出口增长使这些国家政治相对稳定。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这些落后的共和国内，养牛业主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

加州金矿的发现，使中美洲作为越洋运输路线必经之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同时也加剧了本地区美英势力的竞争。1855年，尼加拉瓜自由派邀请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帮助他们推翻保守党政权，这对中美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帮助自由党组建政权后，沃克在一帮大约300乡下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宣称自己为总统，将奴隶制合法化，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1856年中期，危地马拉自由派和保守派联合起来，并在其他中美洲共和国的帮助下，进行民族战争，打击美国入侵，在1857年打败了沃克军队。尽管后来沃克几次试图征服中美洲，都未果。

民族战争促使即将垂死的中美洲统一运动再次提上日程。萨尔瓦多自由派总统巴里奥斯是建立联邦国的主要倡导者。但巴里奥斯想实现莫拉赞理想的努力受到卡雷拉的挑战，因为卡雷拉坚定地维持中美

[illegible]萨尔瓦多及其同盟洪都拉斯派兵。战争以卡雷[illegible]斯被流放；自此，在中美洲各个共和国，都是由保[illegible]，巴里奥斯试图东山再起，但最终被捕，被执行枪[illegible]他死后，中美洲暴力连连的历史也就随之结束。

[illegible]、阿根廷、智利和中美洲带来经济和[illegible]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非同[illegible]、经济滞后和政治混乱，从而使它们无法形[illegible]国家所采用的共和政治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却[illegible]的分歧斗争充斥着政治、经济和文化[illegible]巴西、古巴、秘鲁和哥伦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illegible]过程中，时有冲突发生，但普遍反对奴隶制、渴望自由的诉求决定性地塑造着这一进程。

第十章　种族、国家和自由的含义(1821—1888)

焦点问题：

- 废除奴隶制运动对巴西、秘鲁、古巴及大哥伦比亚国家认同的发展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
- 半个世纪后，巴西奴隶制发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 为什么秘鲁克里奥尔精英反对圣马丁和玻利瓦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
- 起义集团内部关于种族和奴隶制上的冲突是如何影响古巴19世纪民族主义演变的？
- 解放斗争又是如何影响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国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相互争斗的？

随着国家取得独立，迅速进入建设时期的新国家却并未解决要当
219 处理国内自治的一系列问题。谁来管理国家，怎样管理，以及通过政府的什么机构来管理？谁可被称为公民，自由意味着什么？政府将如何限制个人自由，怎样规范不同社会阶层、种族和族裔群体以及外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解决上述问题和建立后殖民地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构的过程中，奴隶制和种族的殖民地遗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塑造统

[illegible]民[illegible]争，这些曾在美洲被奴役的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积极地参[illegible]，殖民地[illegible]中，以摆脱历史上因地域、阶级、人种、种族和性别而划分的社会。[illegible]容易地从奴隶主那里获得自由，也就很容易地转变为一种从父权制、中间控制和贵族统治那里寻求自由的呼声。通过这场斗争，甚至在[illegible]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精英分子冲突，公民权利的含义得以扩展。在巴西、古巴、秘鲁和大哥伦比亚出现了新的民族国家。[illegible]人奴隶、有色人种自由人、农民、城市工人、商人、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起，都要求废除奴隶制，尽管他们的动机不同，但他们都遭到了富有的奴隶主们的坚决抵制。在这场冲突中，种族因素可以解释构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关系，并对19世纪甚至以后的这些新国家作出了界定。

最初，弗兰克·坦嫩巴姆(Frank Tannenbaum)等历史学家认为，[illegible]人的独立领导人如西蒙·玻利瓦尔极力支持废奴主义，其结果是在"没有暴力、没有屠杀、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完成的，而这与美国解放黑奴的情况恰恰相反。此后，历史学家调查了后殖民地掌权者的决策过程，得出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拉丁美洲的废奴主义受到的是政治和军事利益的驱动，而不是对道德的狂热追求。根据这一观点，共和国的大多数精英们接受废奴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招募黑人士兵来反对保王党征募士兵的政策，或者结好外国人，比如海地的亚历山大·佩蒂翁，他以提供食物和军火作为交换，要求玻利瓦尔于1816年承诺保证解放所有奴隶。虽然这与坦嫩巴姆的解释略微不同，更具有批判性，但是，人们仍旧关注精英们的想法和行动，却忽视了被奴役的非洲人以及他们后代的声音。

然而，最近新生代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对恢复消失的历史感兴趣，他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且调查了新的有关档案的收藏品。尽管他们认为大多时候掌权者缺乏对奴隶制是错误的作道德上的定罪(或者没能独立地去实行它)，但是他们仍然强调奴隶和有色人种自由人在反对奴隶制和迫使不情愿的掌权者废除奴隶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拉丁美洲黑人的文化、宗教、家庭生活的研究显示，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种会

采用合法的或者法律以外的策略，不断地追求自由。例如，据法院记载，奴隶将共和国法律当做其诉求的基础，坚持向政府要求自由。然而，奴隶经常使用被杜博伊斯称为"全民大罢工"的策略：公然反抗法律约束、拒绝工作、逃跑并加入到叫帕伦克（palenques）或者基伦波（quilombos）的逃亡黑奴团体，参加游击队，甚至公开反对奴隶制机构。整体说来，历史上的这次民众反抗对政府机构及公民权力和发展中国家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总的来说，一个关于解放黑奴的开端以及过程有[illegible]。首先，很明显，独立没有马上废除奴隶制。其次，[illegible]领导者极力辩论奴隶制的道德性，并且最大程度地寻求折中方法，以有效地延长他们存在的时间。最经常提到的是"自由子宫"法的通过，依照这条法律女奴隶的孩子是自由的，并且在他们成年以前需要奴隶主抚养，成年以后，他们要为了自己的自由支付给奴隶主赔偿金。第三，奴隶主只接受对一部分人废除奴隶制，包括反叛的奴隶和有色人种自由人、经常使用暴力的人，以及威胁到新共和国私人财产权长期安全的人。有权人士担心下层煽动的改革活动引起社会革命，这些改革活动包括逐渐废除奴隶制，同时设置收入和文化的要求，以限制人们参与政治的自由。最后，对立阶级之间几十年的国内冲突和政治动员，以及多种族联合政府为解放道路做出了充分准备。由于公民中的积极分子为了统一国家的语言而丢弃了导致分裂的种族色彩，使得这些经历有效地淡化了种族歧视斗争。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奴隶解放是赔偿奴隶主损失，而且新兴国家也倾向不谈及这种一直持续到黑人和混血种族子孙后代的种族不平等。

这些国家经历的历史自然各不相同，而这些不同取决于当地的传统、可利用的土地、与大西洋两岸接近的市场、对奴役的依靠、自由有色人种的数量以及外国的影响。因此，一个关于这段复杂历史的审慎研究，需要对秘鲁、哥伦比亚、古巴和巴西的特别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因为在这些国家奴隶的数目最为庞大，极不公正的制度存在的时间最长。

巴西

1808年，[illegible]国人侵葡萄牙，迫使葡萄牙王室逃往里约热内卢，[illegible]在地，使巴西向独立迈进了最主要的第一步[illegible]·佩德罗作为摄政者，代替国王若昂六世统治巴西[illegible]，他拒绝了[illegible]葡萄牙的请求，并发出著名的“不独立，毋宁死！”的呼声，从此巴西开始了正式的国家独立。

皇帝唐·佩德罗

[illegible]·佩德罗[illegible]的拥护下执政，而这些贵族决定延续自[illegible]制度，并且决定独立过程不会出现其他拉丁美[illegible]暴乱。巴西贵族有他们自己的意愿，巴西确实[illegible]和平稳的独立。但这也意味着独立以后的巴西保[illegible]殖民地社会结构、君主制度、奴隶制度、大庄园制度、单一种植、低[illegible]农业经济、不受重视的社会和文盲占90%的自由民。

[illegible]·佩德罗[illegible]的臣民许诺一部宪法，于是于1823年召集议宪[illegible]，但是该会起草的文件过分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作为回应，他[illegible]解散议会，并通过皇家声明公布一个个人挑选的委员会，指派他们[illegible]这部宪法。[illegible]这是一部中央集权的宪法，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该宪法一直沿用到1889年君主制度垮台。

另外，国会是两院制议会：一种是上院（贵族院），它是由国王选定议会成员（参议院）；一种是下院（众议院），由选民选举成员，但选民有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这就有效地剥夺了大多数人的选举权。国王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和罢黜大臣以及召集或者解散议会的权利，还可以任命各省省长或总督。

人们对唐·佩德罗专制解散议宪大会以及1824年宪法的高度集权强烈不满，但伯南布哥是共和主义者以及联邦制拥护者骚动的中心，不满情绪在这儿尤为强烈。1824年，由商人马诺伊尔·德卡瓦略领导的反叛集团声称，创建赤道联邦可以把16个北部省团结在共和国政府的

统治下。虽然一些领导者表达了反对奴隶制的意愿，但是他们没有为奴隶制废除做任何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会把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鼓动起来，结果产生一场以海地经历为模板的革命。他们失去了奴隶这一潜在的支持者，帝国的军队在一年内最后打碎了这次起义。

唐·佩德罗虽然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人们对他专政的不满继续积累着，他的名声也在随之持续减弱。再次，奴隶制问题开始显得严重起来。他的外交政策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1825年，唐·佩德罗和英国签署了一份条约，作为对巴西独立的承认和一场贸易协定的回报，这份条约规定巴西在1830年结束奴隶交易。尽管有这项禁令的存在和英国海军对贩卖奴隶船只的奋力抓捕，但是贩奴贸易仍然在巴西政府完全了解和赞同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而英国对协约的监督执行造成了奴隶价格猛增。在经济繁荣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种植者可以支付高额的奴隶费用，但是在经济萧条的北方，棉花和甘蔗种植者却不能和他们竞争工人，因此国王唐·佩德罗成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罪魁祸首。

1830年，法国九月革命推翻了不得人心的独裁皇帝的统治，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巴西的城市举行了一场让人激动的暴力游行示威。激进分子(Exaltados)走在反叛队伍的最前列，号召废除君主制，建立联邦共和国。在乡下，奴隶和自由有色人种抓住这个机会要求废除奴隶制，它长期以来一直是脆弱的各省精英联盟的基础，面对这场危机，唐·佩德罗宣布退位，传位给他5岁的儿子小佩德罗，两周以后他回到葡萄牙，再也没有回来。在佩德罗一世统治时期，葡萄牙商人和葡萄牙裔弄臣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些进展，消除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并且使巴西完成了向完全独立的转变。

摄政、叛乱和小皇帝

激进派自由主义者目睹了向建立联邦共和国转变第一步的唐·佩德罗的下台，革命是他们的工作，但是温和主义者却在享受革命果实。

排斥了。激进派由此走上了和温和自由主义者一样的道路，温和自由主义者主导了唐·佩德罗从葡萄牙脱离，随后由于国王接受保护种植园，同时使自由派失去了影响力。唐·佩德罗的离开对温和派来说是一个转机，他们赶紧恢复自己在中央政府的支配地位，以免使革命脱离自己的控制。

首先，议会任命由温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三人摄政委员会，来代替国王主持政务直至他 18 岁成年。另外，从有财产的阶层招募军人，建立国民自卫军，以镇压城市暴徒和反叛的奴隶。同时，新的政府为了平衡激进的联邦制拥护者的意见，开始实行宪法改革。经过三年的讨论，议会批准通过了 1834 年的增订条例。根据新增法律，各省选举的议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包括对当地政府预算以及税收的控制。这些条款加强了大地主对他们自己地区的控制权。认同唐·佩德罗反动统治的国务委员会被废除了，但是中央集权仍然存在。按照省级议会条令，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有偏袒的否决来任命各省省长。

摄政政府开始为反对一系列起义作斗争，而这些起义主要发生在经济受到主要作物、甘蔗、棉花市场损失影响的北部地区。在南部中心地区（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经济繁荣，贵族种植者在中央政府的安全控制，所以没有发生任何起义事件。这些起义是当地的自身原因造成的。其中一部分有影响力，并且经常发生，比如，帕拉地区的所谓小木屋运动（来源于 caban，即小木屋），它缘自于富有的葡萄牙商人对当地贸易进行垄断，这引起了小商贩、农民和低等阶层的怨恨，从而爆发了这场起义。另外，像巴伊亚共和党人以及分裂主义者的起义（1837—1838），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曾经繁荣的地区由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损失而造成的贵族种植主的挫败，还鼓动了大部分黑人和长期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混血种人。一位奴隶主写了请愿书，抱怨发生在种植园的“不服从”，那里“奴隶甩手不干活还可能会发生不幸的灾难。除此之外，这些奴隶还会给相邻的庄园带来坏榜样，尤其是在巴伊亚事件之后，大部分奴隶正在失去必需的顺从”。另外，为了减少摄政者对废奴主义者反抗的担心，1834 年修订的法律规定，造反的奴隶可

受到死刑的惩罚。

所有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是1835年发生在南里奥格兰德首府阿雷格里港的暴乱。因这场战争的成员多是中低等阶层出身，因此被轻蔑地称为破汉衫战争，养牛主是实际的起义领导者，他们控制着起义军队的普通士兵——加乌乔牧人。高度的地方分权、由中央政府强加的税收和不得人心的管理者引起的不满以及共和党人观点的影响力，都是导致起义的原因。1836年南里奥格兰德摆脱巴西独立，建立共和国。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是狂热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相当多和他一样的意大利流亡者的存在给起义带来了特别激进的气味。近十年以来，两个政府存在于巴西——共和政权和帝国



让·巴蒂斯特(Jean Baptiste Debret)的这幅《巴西的奴隶制》(*Slavery in Brazil*)描绘了巴西奴隶制一贯的残忍特性。正是这一特性引发了巴莱阿达起义。这场起义是以非裔巴西编篮工曼努埃尔(Manuel Francisco dos Anjos Ferreira)命名的，他领导数千名非裔巴西人发起了一场浩大的运动，希望废除奴隶制，建立独立的共和国。

帝国军队对南里奥格兰德起义的无能镇压，进一步减弱了摄政政府，1838年巴莱阿达(Balaiada)起义在马拉尼昂、赛阿拉北部各省燎

奴隶制[illegible]尼昂，存在有最大的奴隶比率——大概占总额[illegible]，这次起义是由低等阶级反对征兵开始的，进而发展到黑人奴[illegible]、[illegible]人种、根基稳固的逃亡奴隶团体的一场暴乱。科[illegible]是一个逃跑奴隶领导者，他招募了一支 2 000[illegible]奴隶[illegible]种植主释放奴隶。根据历史学家马蒂亚·罗瑞[illegible]，另外一个混血领导者雷蒙多·戈麦斯声称“所有有色[illegible]著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毫无疑问，起义越来[illegible]，[illegible]反映了反叛军队广泛的跨阶层和多民族特性，政[illegible]例如，军队指挥官路易斯·阿尔维斯·德利[illegible]一个起义领导者：“他不想让自己与起义的黑人[illegible]由于[illegible]以及经常遭受迫害者，所以就力图吸收他[illegible]，这对君主制度、种植园寡头以及保护他们私人[illegible]了[illegible]。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特权，掌权者利用[illegible]义者，允诺赦免所有的起义者，并以追捕逃跑的奴隶[illegible]，他的赦免提案旨在“避免更深远的叛乱，而激发奴隶和自由人叛乱者之间的憎恨”。

[illegible]秩序时，执衷于向联邦制度妥协的温和自由 224
[illegible]中央政府力量的保守党派在政治上达成和[illegible]些重要事件上保守党和自由党看法完全一致，比如对君主制[illegible]、奴隶制以及[illegible]他们一致认为需要镇压格兰德河叛乱以及[illegible]起义[illegible]和政府在格兰德河的经历，以及给所有参加[illegible]武装力量的奴隶自由，两者对君主制度和奴隶制构成了严重威[illegible]。为了在反对[illegible]分裂分子的战争中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illegible]党和保守党想要让小佩德罗在他法定年龄以前就管理国家。1840[illegible]年议会两院精心策划了一场议会政变，宣告 14 岁的唐·佩德罗皇帝执政。唐·佩德罗任命了一个保守政府，并且在 1834 年的新增法律中废除了联邦改革，[illegible]了省级立法机构的权力，除去了地方选举法院法官和警察机构的权力。

此后，政府着手[illegible]格兰德河起义的真相。1843 年 2 月，由于阿

根廷的侵入而造成与乌拉圭友好结盟的中断，再加上内部斗争，共和国政府处境变得非常困难。面对军事挫败，共和党人政府接受了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请求，于1845年2月签订一个和平协议。该协议对所有反叛者进行赦免，省长废除了共和政权的所有法律。但牧牛场场主也赢得了一定的让步，包括提名候选人以及保留他们的军事头衔。

在一系列起义中，1848年发生在伯尔南布哥的起义是19世纪30、40年代动摇巴西的最后一次大范围起义。它以累西腓为中心的原因包括：对垄断了当地贸易的葡萄牙商人的敌视，保守派政府任命的不得人心的省长，以及对当地大种植园主的怨恨。反叛纲领号召所有的葡萄牙商人从累西腓撤走，扩大省区自治，失业者有工作，分割卡瓦尔康蒂家族的土地。然而，即使这个激进计划也不包含任何和废除奴隶制相关的内容。1849年，帝国军队占领了累西腓之后，这项运动宣告失败。许多被俘虏的领导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所有人在1852年被赦免。

19世纪30、40年代，起义和武装斗争的起因主要是经济不景气，而经济的衰退是由外国市场对传统巴西出口疲软所造成。咖啡早在1830年就十分重要，在1850年以后咖啡种植业开始繁荣，并且延伸到南部中心，在这里用其日益增加的税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且为地区精英和国家政府之间合作的新纪元打下坚实的基础。咖啡业新的一番繁荣，不仅证实了新殖民主义以农业出口为重点明显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还阻碍了在巴西自主发展上采取更为持久但更艰难途径的任何想法。

政治博弈　奴隶制的危机

到1850年，巴西看起来处于和平状态。皇帝主持实行一种准议会体制，用其权力为极小统治阶层谋取利益。他重视议会制政体，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自由党和保守党首相，如果新的大臣不能在议会获得大多数席位，则会通过操纵选举任命其他人。由于统治阶层在重大事件上能够一致，因此党派斗争中唯一的事情就是政府由谁主持，获得

[illegible]败利尔·若阿金·纳布科是唐·佩德罗的拥戴者，在他的《废奴主义》中这样描述了系统的运作：“代表制体系，是议会体制到父权制政府的嫁接，由于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后会涉及利益问题，因此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他们仅仅在民主国家的仿制品中认真地摆摆姿态。如取缔政[illegible]部门，责令[illegible]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滥用个人职权，没有人会在这种打太极(shadow boxing)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巴西政治表面上的稳定依赖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等繁荣的咖啡种植地区，以及对巴西咖啡产[illegible]良的需求和良好的价格。但是由于土地枯竭、技术陈旧和国外蔗糖的竞争，种植甘蔗的北部地区和种植园社会持续衰退。

英国对巴西施加压力，强迫巴西签订《英-巴协定》，于1831年7月起禁止进口奴隶到巴西，由此北部地区危机日益严峻。1850年以前这一条约从来没有有效地执行过，19世纪40年代每年有多于5万个奴隶被卖到巴西。从1849至1850年，英国政府向巴西施加压力，通过反奴隶贸易的《[illegible]兹法》，并指挥军舰进入巴西领海，以备在需要时打击巴西奴隶贸易船只。19世纪50年代中期，巴西的奴隶进口终于中止。

奴隶贸易的废止有重大意义，劣等食物、严酷的工作条件和其他消极因素造成了奴隶较高的死亡率，使自然繁殖不能维持奴隶的人数，这些促使了奴隶制度的最终消亡。由于咖啡种植主对奴隶劳动力有很强的竞争能力，相当多的一部分奴隶从北部地区迁移到南部地区，这样奴隶贸易的废除造成了很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奴隶贸易废除运动加剧了日益衰落的北部地区和繁荣的南部中心地区的不平衡。19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巴西人确信奴隶制造成了巴西严重的信誉丧失，必须予以废除。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使巴西和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成为西半球唯一存在奴隶制的地区，从而加重了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巴拉圭战争也对解放事业起到推动作用。为了弥补因前线巨额损失而造成的巨大缺口，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给予愿意参军的一部分政府拥有的奴隶自由，一些私人奴隶主也效仿了官方

的做法。

皇帝由于对奴隶制小心谨慎的处理方法受到了谴责，这样对奴隶制的批判越来越多地和对皇帝的指责联系在一起。[illegible]"黑人、白黑混血、土著人"是倾向废奴主义[illegible]的，尽管[illegible]，他们[illegible]挺过废除奴隶这一关，但是[illegible]。[illegible]门塔·布埃罗说："政治经验告诉我们，最好[illegible]就是不要涉及这一事宜。如果有人允许这条规则存在，那么[illegible]会[illegible]发展，最[illegible]会得到结果，基于种族的特征或者分歧往往是不好的；[illegible]是民族[illegible]渴望的目标，这一点如果不是现实的至少也是可能[illegible]。"这种[illegible]也成为了19世纪巴西[illegible]的阴影，并且最终导致了像杰[illegible]·[illegible]这样的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他们留下了政治排除[illegible]。

新生的共和运动和反奴隶制运动同时出现。[illegible]是由激进自由主义分子组成的。1869年，这个组织发表[illegible]，要求[illegible]的权力，并且保证赋予奴隶新生儿以自由。奴隶制[illegible]了[illegible]帝国的危机。

反奴隶制运动

从巴拉圭战争结束(1870)开始，奴隶制问题蜂拥而出，并且逐渐成为巴西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就个人而言，唐·佩德罗反对奴隶制，但是被困在一些只要有可能便决心拖延的奴隶主同越来越多要求解放奴隶的自由主义领导者、知识分子、城市中产阶级和自由的有色人种(他们甘个不认为自己是奴隶)的激烈交锋之中。1870年，西班牙解放了古巴和波多黎各所有的奴隶，其中包括新生奴隶和年长奴隶，这使巴西成为美洲唯一以最早的殖民地形式保留奴隶制的国家。奴隶对奴隶制的公然违抗预示着社会永久的不稳定，出于对此的恐惧，一位保守派大臣立即施加压力，推动了《里奥布兰科法》的制定，并使其于1871年在国会通过。这项措施释放了所有妇女奴隶的新生儿，并且赋予奴隶主照顾他们到18岁成年的责任。而在当时，奴隶主不仅可以释放这些儿童以换得政府的补偿，还

[illegible]21岁使其成为劳动力。这项法律还释放了所有[illegible]或者王室的奴隶，并为解放奴隶创立了基金。



[illegible]罗斯（[illegible]）的一家种植园中对咖啡做干燥处理，约1882年

[illegible]为了[illegible]奴隶制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而设计的策[illegible]。[illegible]188[illegible]年，[illegible]仍然有超过10[illegible]万的奴隶，其中仅有113个奴隶通过这项法律得到自由。

反奴[illegible]公开指[illegible]这项法律是一个假象，并且为最终的解放提出了更有力[illegible]。1886年，反奴隶制运动发展到很强的势头。[illegible]在进行的经济、[illegible]会和智力现代化中吸取了力[illegible]的[illegible]体来说，奴隶制是时代的错误，是和现代性很不兼容的一种社会制度。

奴[illegible]也开始出现分歧。在北部地区，奴隶制在经济上[illegible]、[illegible]多的奴隶主开始给劳动者发工资，以吸引依附于[illegible]人和混血种人。1877至1879年的大[illegible]是[illegible]奴隶人数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这次干旱使该地

区有钱人开始卖出奴隶，或者带着他们的奴隶离开。很多省份，比如说亚马孙和塞阿拉地区，当地和混血的劳动者人数很快超过了为数不多的黑人奴隶，并且该地区于1884年废除了该省境内的奴隶制。相反，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咖啡种植者，由于和北部种植者联合起来做奴隶贸易，把奴隶从北部卖到咖啡种植区，还对废除奴隶制度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废奴运动产生了拥有非凡智慧和道德才干的领导者。其中一个是帝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儿子华金·纳布科，他写的《废奴主义》一书对奴隶制的剖析和对腐败迹象的清晰表达，对他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何塞·德·圣马丁是一个优秀的黑白混血宣传员，以急躁和讽刺风格而出名的新闻工作者。另外一个黑白混血安德烈·雷博萨斯是一个工程师和教师，凭智慧天分赢得了皇帝的敬佩和友好关系，他是这次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对纳布科和他的战友来说，反对奴隶制斗争是一次更大斗争——巴西社会转变——的主要前线。他们希望废除奴隶制能够为实现其他目标，比如土地改革、公民教育和政治民主铺平道路。

由于陷入持续增长的压力，议会于1885年9月28日采取了另一项措施，这项措施规定，给所有到60岁的奴隶自由，但是要求他们继续服侍他们的主人三年，并且五年内不允许离开居住地。这些条件，以及很少有奴隶活到超过65岁的事实，说明如此之多的奴隶中很少有人获得这个机会。帝国政府还允诺购买剩余奴隶十四年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实际按照《里奥布兰科法》实施的承诺。在确信这项法律只是另外一个精心策划的策略以后，废奴主义者拒绝接受所有的妥协方案，并且要求立即无条件解放黑奴。19世纪80年代中期，反奴隶制运动已经取得可观的规模，更具有战斗力。大量的奴隶表示对自由不赞同，由于赛阿拉的奴隶制度已经废除，废奴主义者通过组织从圣保罗开往赛阿拉的“地下铁路”[①]来援助他们。聚集在军事俱乐部的军官，反对用军队追捕逃亡的奴隶。

---

① 当时秘密运送黑奴的一个组织的名称。——译者注

1887年2月，圣保罗用民众捐款筹募的资金解放了所有的市内奴隶[illegible]，释放了所有的奴隶，但前提是他[illegible]要继续在种植园工作一段时间。1887年底，即使是顽固的圣保罗种植园主也改变了[illegible]，他们把付给奴隶工资和提高工作和[illegible]，并且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以促使欧洲移民来圣[illegible]。这一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圣保罗的移民人数从1885年的[illegible]人增加到了1887年的多于3.2万人，并于1888年达到9万人。[illegible]随着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圣保罗已经[illegible]，转而接受奴隶制，甚至加入了废奴运动的队伍。

1888年5月13日，巴西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和传统的解释相反，[illegible]，亦不是奴隶主和平接受[illegible]。由于废奴主义者的鼓动、大批奴隶的逃跑、[illegible]和由此造成的政治秩序的大动乱，总的奴隶人数于1885年急速下降。事实上，奴隶制的废除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而非改良。

废除奴隶制[illegible]的结果，驳斥了反对者的不祥预言。从奴隶制[illegible]中解放，[illegible]全世界持续偏高的咖啡价格（直到1896年），巴西经济[illegible]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程度甚至多于帝国时期[illegible]的经济增长。种植园主用移民替代咖啡种植园的被释黑奴来为他们工作，而城市中[illegible]的工作也被移民抢走。因此，对于过去的奴隶来说，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废奴主义者对授予被释黑奴土地的要求却被忽视了。在很多地区，以前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种族主义的传统以及种植园主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使他们几乎完全控制着以前的奴隶。由于政府拒绝给予土地和教育，被释黑奴在“饥饿的鞭子”的逼迫下，坚守在最艰苦、报酬最少的工作岗位。此外，政府改革在高收入和文化水平方面对参与政治事件的公民加设条件，这样便有效地剥夺了自由公民的选举权，除此之外，他们还大量减少有色人种和穷困白人的选票。据1872年统计，社会中仅有16%的人有读写能力，这样这项法规就剥夺了99%有资格的选举人的选举权，为长达一个世纪的隐秘种族歧视创造了条件。

秘鲁

克里奥尔贵族的财富是从当地土著被强制劳动和工作在矿井、车间及大牧场的被奴役非洲人那里剥削而来，他们没有很担心秘鲁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的革命会放火点燃这个易燃物堆成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何塞·德·圣马丁和西蒙·玻利瓦尔将军，曾经尝试着去改革新成立的秘鲁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会见玻利瓦尔之前，颁布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禁止奴隶进口，秘鲁所有奴隶的新生儿自动获得自由，废除当地贡赋以及解放所有其他的强制土著人劳动的形式；他还发表声明说，所有的秘鲁居住者，不论是当地人或者克里奥尔人，都是秘鲁人。

这些改革措施不符合克里奥尔掌权人士的利益，因此在圣马丁离开利马到瓜亚基尔会见玻利瓦尔之后从未实施过。玻利瓦尔于1823年在秘鲁获得权力，并且他制定了反映相同自由主义思想的改革方案。为了建立一种独立的小农场，他命令解散土著公社，将公社的公有土地分成若干份，每一个家庭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剩余的作为公有地产。玻利瓦尔触及了土著人公社的财产，却没有触及封建主的财产，就是由当地佃农或农奴耕种的大农场，他们需要付给地主的租金占到其农作物收获总价值的50%至90%。

玻利瓦尔精心策划的土地改革，对大农场、政府官员和商人有利，他们利用改革建立大庄园，却以牺牲土著公社的公共土地为代价。这个过程开始时很缓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力逐渐大增。玻利瓦尔为废除土著人贡赋作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微。在他1826年离开秘鲁以后，秘鲁的克里奥尔人政府重新以土著捐税的名义对山区人征税(serranos)，重新向沿海混血居民开征人头税。

新政府严重依靠贡赋，并且把它作为一项财政收入，反映了秘鲁经济的不景气。矿业和沿海种植园农业在18世纪末就开始衰落，不足的出口量不能支付从巴西制造业的进口，而独立革命造成了这两个产业最终破产。新政府已经背负英国资本家的大量战时债务，因此，开始与

口开展大量的进口贸易，而英国是它当时最大的贸易伙伴。1836年以后，出口额在稳步增加。1840年，随着鸟粪的开发利用，沿海地区开始了自由经济时代，但是在第一阶段，鸟粪高潮期并没有完成重新振兴沿海农业的资金积累。

秘鲁的政治和经济

秘鲁落后的经济、山区和沿海地区的深刻分隔和缺少可给予方向、智慧和引导的管理阶层(比如在智利出现的管理阶层)，是造成 229
该共和国政治紊乱和内战的原因。这为奴隶争取自我解放提供了大量机会。首先，随着沿海农业和高地矿业生产的日益衰退，城市奴隶制越来越成为其替代品出现。乡村的奴隶主可以通过租赁奴隶获得收益，比如出租奴隶到利马或者其他城市，在那里他们做技术性工作，赚来钱付给奴隶主或者购买自由。其次，城市奴隶制能够给黑人奴隶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且减弱了奴隶主对他们的直接控制。利用这种优势，城市的奴隶在法庭上指责他们的主人违反了共和国法律，并控受到身体上的虐待。有人甚至由于主人是英国人或是新教徒，也要求拥有被解放的权利，其理由是为了投诉他的不公，会不利于利马信仰天主教的克里奥尔人地方法官。再次，城市奴隶还参加各种密谋，比如说1835年，为了推翻政府并且杀掉利马的白人，由约翰·德·迪奥斯·阿尔戈塔领导了一次起义。最后，尽管和加勒比奴隶起义相比相对较少，但是像1851年的奇卡马起义一样，黑人奴隶在武装起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对奴隶制"每天反抗形式"的环境下，这场暴力武装起义肯定是秘鲁的"奇怪机制"。奴隶制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不能再被共和国精英们所忍受，尤其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的经济优势已被耗尽。

在这些条件下，一些独立战争时期的平民出身军人考迪罗，开始在新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当中有些不只是自私的野心家或者克里奥尔贵族团体的傀儡。混血将军拉蒙·卡斯蒂利亚是最能干最开明的军人考迪罗，并在1845至1851年和1855至1862年期间

担任总统。在卡斯蒂利亚的管理下，秘鲁经济在鸟粪出口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这项出口贸易被英国资本家所控制，他们有权利把鸟粪卖给特定的地区，以换得秘鲁政府的借款(以货物作为抵押)。极高的利益和回扣都增加了他们的利润。尽管卡斯蒂利亚曾经试图，政府对一定的鸟粪储藏直接进行开采管理，控制其出售的数量和价格，并且将肥料收入纳为发展项目，但是任何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然而，鸟粪业的繁荣刺激了秘鲁当地商务和银行业务的增长，而且建立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鸟粪业的繁荣还为秘鲁政府进行现代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1851年，第一条铁路线开始在利马和卡亚俄之间运营。

鸟粪业收入的增长，使卡斯蒂利亚能够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对国家建设进程也作出了贡献。1854年，他废除了奴隶制和印第安人的贡赋，减轻了当地人沉重的政府财政负担，并且解放了人数达2万人的非洲奴隶。废除奴隶制对沿海种植园主十分有利，他们得到的补偿高出奴隶价值10%。种植园主用这些补偿金，以买种子、植物和贩卖到秘鲁的中国契约苦力，这些人就是实质上的奴隶。同时，自由黑人经常会成为佃农，他们生活在大农场边缘，为庄园主提供适当的无报酬劳动和租金。由于这些发展的刺激，棉花、甘蔗和谷物产品延伸到沿海地区。从阿雷基帕和利马用于出口羊毛和皮革的牲畜饲养业规模不断扩大，高地经济在小范围内也在迅猛发展。

1850年以后，秘鲁经济整体向上发展得益于许多因素，比如，美国北部地区棉花产业的暂时混乱和大量外国资金的流入。因此，棉花和甘蔗出口迅猛增长。沿海的大庄园通过把土著公社、佃农和分成农全部赶出他们土地，继续扩张。这个过程是伴随沿海农业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的，而现代化则是在庄园引进轧棉机、锅炉、糖的提炼设备和蒸汽牵引机。

尽管农业部门的利润使利马商业和土地贵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但是秘鲁政府却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危机。鸟粪储备是秘鲁向外贷款的担保，其存储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减少，而借款得来的绝大部分收入

用于偿付外国债务的利息。1868年，在军人考迪罗何塞·巴尔塔统治时期，财政部长提出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使秘鲁从困境中解脱，并且为其提供了发展资金。以前鸟粪被卖给很多代销人，而这项计划消除了这一过程，也授予法国德雷福斯公司在欧洲的鸟粪产业垄断权。作为回报，德雷福斯公司同意替秘鲁支付外国债务的利息，并且给予秘鲁大量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当前难关。这项协议取得了大量的新贷款，给了秘鲁未来无限的希望。

亨利·梅格斯(Henry Meigg)是美国投机商和企业家，由于在智利修建铁路而出名，他竭力地说服了帕尔塔和皮埃罗拉，使他们相信应该在安第斯山修建铁路，以开发山区的矿产资源。因此，大量根据德雷福斯公司借来的资金，以及逐渐变少的鸟粪业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投入到铁路建设工程当中，而这项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中没有显示出可获利。

帕尔多和平民党

对于产生于利马的当地商业和银行业中产阶级，德雷福斯公司的合同公然冒犯了他们的利益。以商业富豪帕尔多为首，并包括被德雷福斯公司取代的鸟粪代销商在内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向最高法院质问了这项协议的合法性。他们指出，把鸟粪买卖分配到他们公司的当地代理商，会对秘鲁的经济发展更有利。这些当地中产阶级遭到挫败，但是他们于1871年组织了平民党(civilianist party，意为反对军人考迪罗)，并提名帕尔多作为总统竞选候选人。平民党是“旧贵族和新生资本家”的混合物，他们反对教权主义和武装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并且提倡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直接作用。帕尔多轻易战胜了两个对手，于1872年就职。

在帕尔多的管理下，农业持续繁荣，一条航运线于1876年出口值达到一个高峰。外国资本不断地流入本国。这些年中，一个爱尔兰移民W·R·格瑞斯开始建立一个工业帝国，主要包括：纺织工厂、一条航运线、巨大的甘蔗种植园和秘鲁第一个大规模糖提炼工厂。虽然私

人工业繁荣了，但是政府却陷入了更大的债务和赤字之中。由于价格下降，鸟粪耗尽和另外一个重要资源的竞争，鸟粪出口走到了终结点，而竞争是由秘鲁南部省份塔拉帕卡由智利、英国和秘鲁资本家开发的硝酸盐业造成的。1875年，为了控制硝酸盐工业并将其变成政府新的的收入来源，帕尔多征用塔拉帕卡的外国公司和私营企业，垄断了硝酸盐的生产和销售。私有财产被充为国有，付给不可靠的政府债券作为补偿，原来获利的企业家被这项举措激怒了。同时，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财政的混乱状态，收归国有的举措也没能收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1876年，秘鲁经受了世界经济风暴的压力，几个月内，现有的银行被迫关闭；以后的几年，政府不得不放弃支付国外债务，并且开始发行没有价值的纸币。经济崩溃之后是军事失败：太平洋战争。尽管秘鲁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是由于智利拥有更强的武装部队、政治稳定并且有英国资本家的支持，秘鲁仍然遭受了失败。这场战争对秘鲁经济的影响，从衰退开始到几个阶段：智利占领了秘鲁的南部沿海地区，并对该地区进行掠夺，他们切断了出口收入；拆除秘鲁工厂的机器运到智利；并且派遣部队到山区占领村镇，战争影响了农民的家园。在凯赛雷斯将军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进行有效的游击战争，以削弱智利占领者的力量。1883年的《安孔条约》最终结束了战争。

古巴

由于不同的殖民地历史，古巴19世纪的发展和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有很明显的不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在古巴登陆，在此后的三个世纪，这个岛主要充当西班牙舰队重要的中途停留地。古巴在很大程度上与横跨大西洋的市场孤立，没有珍贵的金属，也没有足够的居住人口，因此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烟稀少的帝国边远居民点。岛上的大多数居民，工作于只供岛内消费的小规模农场。和加勒比地区的蔗糖生产岛不同，17世纪末古巴奴隶人数很少（非洲后裔人数仅有4万，是海地的十分之一），而且大多工作于非农岗位，从事有技能的手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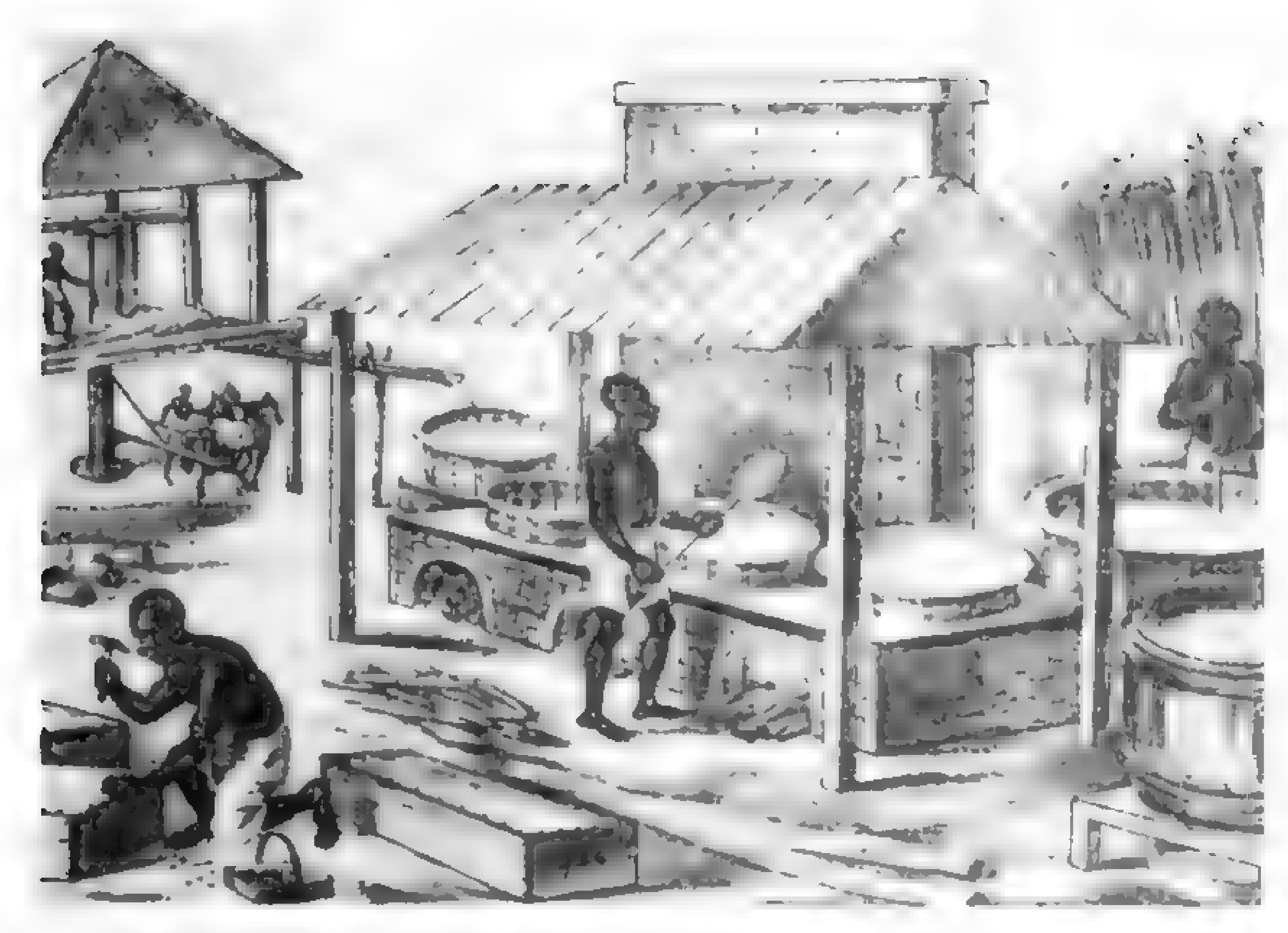
经济和社会变化:产糖大王的辛酸收获

18世纪下半叶,迅速的经济和政治变化使古巴变成了单一种植的岛屿,即依赖某单一种作物的生产和出口,作为经济谋生之道。由于1762年英国人占领哈瓦那所激励,继而又被1783年独立后的美国[illegible]的市场所刺激,古巴经历了一场商业的萌动。更为重要的是,18世纪90年代的海地革命,破坏了那个岛的糖业生产,使它不再是[illegible](它现在也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使古巴发展成为了主要的糖生产国和奴隶进口国。到下半个世纪,古巴的糖生产量迅速增进,好多万计的被奴役的非洲人到达古巴海岸。从1774年到18[illegible]年,古巴的人口数从171 620人猛增到1 396 530人,其中30%是非洲后裔。

虽然,[illegible]并没有刺激大庄园的创建。由于大多数转变[illegible]的土地,此外,许多农场上也并没[illegible],而是[illegible]于生产咖啡和土豆,由于废除了这些作[illegible]享有非常可观的利润。而且,制糖作坊本[illegible]需要(牲畜饲料)和奴隶对粮食作物的需求[illegible]人数有显著的增加,20世纪的许多古巴社会的领导者都出身于这些农场。

世纪之交之际,由海地糖业生产破坏而造成的经济繁荣结束了,因为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岛屿也对同样的刺激因素做出了反应,开始扩大和有了生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过量供应。正当市场从这次挫折中恢复之际,拿破仑战争时期,又利用外交手段关闭了美国港口。不久之后,古巴经济出现了两个新挑战:欧洲引进甜菜糖和英国发起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第一步是迫使西班牙于1821年结束奴隶贸易)。进而由西班牙[illegible]制造成了更深层面的阻碍:那就是高额关税、[illegible]人的高额借贷和西属美洲独立战争造成的崩溃。

1820年,首次[illegible]的科技创新开始改变古巴蔗糖加工业的特点。为了和甜菜糖[illegible]业抗衡,作坊主需要增加运营,大量投资蒸汽 232



一位名叫布莱克·卡洛塔(Black Carlota)的非裔古巴妇女在1843年领导的一场令人生畏的奴隶起义，吓坏了西班牙派驻当地的官员以及克里奥尔种植园主们。正如这幅1830年的图所描绘的，这些种植园主依赖被奴役的非洲劳力来为他们的糖业种植园卖命。

设备。作坊越大生产的糖越多，消耗的燃料越多，需要的劳动力也越多。规模较小，效率较低的作坊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现代化的设备，可以使作坊规模增大，但是由于有限的运输设备，这个过程只能逐渐完成。由于铁路建设耗资巨大，在古巴或者西班牙都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如此大的工程，直到很长时间以后铁路才变得很重要。作坊在淡季大多不再生产，因而也承担着很高的开支。即使在收获季节过后，还需要给奴隶和牲畜提供食物和住处。作坊的燃料问题也限制了它的发展速度。作坊附近的森林很快被耗尽，而木料运输到工厂需要相当高的花费。

由于大作坊的需要，大种植园也在古巴发展起来。传统意义上说，蔗糖加工业建立在以下两种方式中任意一种基础之上：土地由当地居民或者临时劳动力耕种；或者分配给被称为“垦殖者”(Colonos)的农

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工资或者一份作物。他们种植并收获甘蔗，然后运到工场加工，生产加工费用则用糖来支付。现在，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成功的种植园主开始扩张种植园，并且最大限度地使用大量的非洲奴隶。他们清理土地、种收甘蔗并运送到加工作坊，一天工作达16个小时以上。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之下，大多数奴隶八年之内就死去，……土地所有权日趋集中和糖业种植园资本化的趋势，是……糖加工业剧增直接造成的结果。

19世纪上半叶，糖加工业的扩张表现在种植园规模增大、作坊数目和奴隶数目有所增多。作坊数目从1827年的1 000个增加到1846年的1 442个，在1860年作坊数已达2 000个。19世纪的前几十年，再度兴起的奴隶贸易使奴隶人数从1788年的1.8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12.[illegible]万人；1811—1820年，西班牙奴隶贸易者贩卖的非洲劳工多达16.1万人，1[illegible]年，有大约25万奴隶劳作于古巴的糖加工业种植园。

贸易的扩张和大规模糖加工业的引入，为巴西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经济繁荣，却削弱了克里奥尔人起义，当时这场起义正席卷西属美洲的其他地区。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古巴仍忠于西班牙，因为古巴的克里奥尔人惧怕出现奴隶起义，而且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理由来损害新得到的繁荣。同时，由于种植园体制越来越严酷，不满情绪在奴隶和自由黑人之间蔓延；他们每天进行反抗，比如减慢工作、假装生病、破坏设备、人工流产等。除此之外，被奴役的非洲劳工定期用较大的奴隶起义来反抗奴隶制度，比如，1812年的阿庞特起义和1844年的拉·埃斯卡莱拉起义。在海地革命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奴隶起义的影响下，这些起义把非洲奴隶、古巴出生的黑人奴隶、自由黑人和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共同争取消灭奴隶制和种植园农业。

19世纪下半叶，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对腐败的西班牙官僚越来越感到愤恨，而西班牙政府则决定要克里奥尔人继续服从于西班牙在西半球拥有的这块最后和最富有的殖民地，殖民地越来越不满残暴的西班牙统治，在经济上也更少依赖于母国。随着古巴逐渐变成美国商品倾

销市场和所需物品的进口来源。美国并吞古巴的阴谋，出现在古巴岛上和其他北美洲圈子中。在古巴，保守的克里奥尔种植主在并吞中看到了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保险之策；而在美国，一些赞成奴隶制的团体把并吞看作为种植园奴隶制的扩张获得广阔新地区的一种方式。一些人甚至想把古巴分成三个或者五个州，这样可以给美国南方国家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但是内战使这些计划破灭了。

19世纪60年代，克里奥尔人的不满加剧，并且被正在发展的民族和阶级意识所激励。由于受到国内纷争和经济衰退的打击，西班牙政府变得软弱不堪，因而克里奥尔掌权人士拒绝了它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改革建议。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克里奥尔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西班牙经济和政治政策严重限制了古巴的发展。

同时，古巴的糖业经济已经发展到高度专业化。在东部地区，人口较为稀少，主要由自由白人组成，黑人只占小部分，他们工作于大牧场，这些牧场为支配古巴西部基于奴隶制的蔗糖种植园的消耗供应肉类。东部的克里奥尔人地主，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比较少，因此，对奴隶的畏惧小于对西班牙统治的畏惧。塞斯佩德斯是一个克里奥尔地主，他于1868年10月10日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亚拉村自发释放了自己的奴隶，并发起了古巴第一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接下来的十年战争期间，由于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领导者处于支配地位，种族日益成为造成起义运动分裂的原因。他们的需求简单、直接：独立、废除奴隶制，并且建立殖民地之后的种族平等。

即使西班牙人想利用克里奥尔农场主的种族恐惧操纵分裂起义，但是，越来越多的黑人军事领导人却宣扬一种新观念，那就是国家超越种族。1869年，反抗运动起草了一部宪章，宪章声明"共和国所有的居民都是自由的"，并且给予"自由战争的所有士兵"以公民权，而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古巴黑人。但是一些克里奥尔起义领导者担心，古巴黑人中的激进主义会同样要求从西班牙和奴隶主那里获得自由，因此，他们企图修订宪法来要求古巴公民，使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任职"，很明显，这是对古巴黑人的歧视。他们还起草了《解放条例》，规定被解放的

奴隶从属于"[illegible]所有者"或"其他主人"。自然，这些疏远了起义的古巴白人，他们拒绝在废除奴隶制、独立和种族平等问题上妥协。对他们来说，古巴国民身份(Cubanidad)超越种族；身为古巴人，就意味着平等与自由，不再受到不管是来自西班牙、或是来自克里奥尔人奴隶主、还是来自自己认为的白人的影响。

十年战争

十年战争是一场持久、充满仇恨和毁灭性的游击战争。1878年，西班牙与多数克里奥尔人同意接受和平，政府授予他们一部分自主权但拒绝给予独立，于是十年战争耻辱地结束了。《桑洪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战争，但是一些起义领导者却拒绝和解，比如黑人革命者"青铜巨人"安东尼奥·马赛奥，因为这项和约仅仅承认了起义军队中奴隶的自由，没有实现革命的主要目的：完全独立和废除奴隶制。结果，由于古巴黑人拒绝投降，更多的奴隶逃到了逃奴社区，并且仍然拒绝工作或服从种植园主人。殖民统治者企图用新的殖民地法律镇压这次奴隶起义，如限制奴隶出行，惩罚和外界联系的奴隶，禁止奴隶拥有弯刀并控制奴隶销售。

然而，尽管有这些措施，古巴黑人的反抗最终导致了1879年小战争的爆发。其特点是没有克里奥尔人参与，凸显了黑人的军队以及政治上的领导，要求废除奴隶制和平等权利。由于急需稳定岛屿，维持西班牙殖民政权以及阻止加勒比地区产生第二个黑人共和国，西班牙政府于1880年废除了奴隶制来获取古巴自由黑人的忠诚，但前提条件是，解放了的奴隶要有一个八年的"保护期"，或曰"学徒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奴隶制的废除也除去了使克里奥尔人种植园主忠诚于西班牙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此后，预期独立、出售自由、与美国无限制的交易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十年战争和小战争对古巴社会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十年战争期间，克里奥尔地主阶层有相当程度的减少，从而阻止了岛上形成一支传统的拉丁美洲土地贵族精英。其次，他们确信将来的古巴独立

领导者（白人和黑人）会成功废除"种族"概念，并以"国民"来替代之。为此，古巴民族主义者何塞·马蒂和古巴黑人记者胡安·瓜尔贝托·戈麦斯创作出一本战争记事录，记事录不再提主导战争中的"黑人起义者"，而是称他们为"国家英雄"。历史学家阿达·费雷尔认为，这些反霸权的文章反驳了西班牙所宣扬的未来"黑人共和国"，以及描绘出为"感激""白人慷慨"的忠实黑人形象。

自然的，这种消极的黑人起义者形象是个与1886年至1895年黑人政治活动是矛盾的。古巴黑人根据新出台的政治纲领，组织了"有色人种阶级协会中央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把促进种族平等作为最重要目标的团体。他们的目标是：创建免费的公办学校；废除有种族隔离的公民注册和"贵族爵号"；保证平等使用公共道路、运输工具和公共住所。

再次，战争期间工厂的变动、1855至1895年的经济危机和铁路网的扩张共同刺激了大庄园的扩散。在大庄园发展时，工厂也需要更多的甘蔗，而这些甘蔗来自一个比以前更广阔的地域。同时，使窄轨的引进刺激了古巴（和全世界）的铁路建设。为了寻找更多的甘蔗，作坊主开始铺设自己的铁路。而运输的限制，是造成甘蔗清求竞争不为人知的一个条件。

作坊主面对的自然规律，就是在收获时期，在最可能低的价格下保证有足量的甘蔗。他们可以通过减少分成农的独立性，或取得这些人的甘蔗田而做到这一点。第一个办法是把曾经自由的农民变成了大作坊的附属品，第二个办法则创立了大庄园。小的和中等规模的种植园主中途退出，并逐渐被佃户或者临时工所代替。分成农一直到独立时都在维护保管他们自己的土地，但是独立以后他们日益被流入制糖厂的大量国外资本所征服。日益减少的经济资源，使他们难逃一劫。

美国的企业家填补了由克里尔奥贵族破败和西班牙利益团体破产造成的空白，数以千计的北美洲人带着自己的投资资金来到这个岛上，经营制糖厂或者商品住宅。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废除了原糖和糖浆的进口关税，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美古贸易和美国对古巴

经济影响力；1896年，美国财团在古巴投资了5 000万美元，控制了糖业。美国对古巴出口物的购买达到了其出口总量的87%。“制糖托拉斯”（美国精糖提炼公司）于1888年进入古巴岛，表明美国在古巴经济中的地位，使得制糖业越来越趋于集中。

尽管1898年战争把古巴变成了北美洲人的港口，但它在消除种族隔离问题方面没做什么事情，即使是在古巴独立以后也一样。19世纪末，古巴由西班牙精英和克里奥尔人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控制，古巴黑人不得不为古巴社会的弊端背黑锅。统治者拒绝让他们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机会，拒绝其参政权，在享受充分的公民权利方面对他们设立障碍。直到1881年法律才对种族间的联姻解禁，但是自此以后仍然受社会的责难。

种族制度也制造了两个古巴：一个遵随西班牙文化传统和惯例，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共济会；另外一个以非洲的萨泰里阿教为主，该教是一种融合性的大众宗教，也是一个秘密的相互援助社团。历史学家艾琳·赫尔格认为，古巴黑人，对其在西班牙社会中上升的能力被强加限制感到非常失望，转而逐渐依靠非洲遗产来保护自己，并且组织要求他们合法权益的社会抗议运动。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早期历史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名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委内瑞拉是他的祖国，哥伦比亚（后曾叫新格兰纳达）和委内瑞拉是他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首次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玻利瓦尔试图将委内瑞拉和新格兰纳达统一为单一的强大国家，并且期望建立一个由所有使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共和国组成的大联邦，一直从墨西哥延伸到合恩角。1819年，安古拉斯图拉国民大会（在委内瑞拉）通过组建哥伦比亚国（后被叫做大哥伦比亚）将委内瑞拉、新格兰纳达、厄瓜多尔（当时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联合起来。1821年，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境——库库塔，革命议会正式成立联合国家，并起草了一项自由改革计划，包括：逐渐废除奴隶制、废

除本地贡赋、土著人公社的土地划分为私人小块土地(一种用于剥夺土地人们的"改革")、禁止建立较小的男修道院并没收其财产、支持公共中等教育、制定一个教育的总体发展计划。议会还采用了中央集权的宪法，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不分肤色和种族。

根据玻利瓦尔的言论，克里奥尔人建立了一个民族的国家，正是基于他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指责。在玻利瓦尔看来，西班牙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奴役它的子民，并且剥夺他们发展为文明国家的人。因此，受过启蒙教育的"建国之父"们强调在共和制国家中所有人都被赋予完全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之前，有责任为自己及被托付给予指导启蒙教育的的责任。玻利瓦尔时代富有的克里奥尔人，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以及安全的理想相矛盾，他们是在构建一个有等级的国家，以保护私有财产和秩序，避免遭受妇女、贫穷白人及有色人种所有的激烈反抗，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渴求自由和平等。

理所当然，新共和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奴隶制。土著人、被奴役的非洲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自从奴隶制出现在殖民地时代开始就一直对它的适应及反抗。其中包括奴隶起义、逃离到偏远地区，成立被称为cumbes 或帕伦克的自治村镇，以及其他的日常反抗行为。独立战争期间，玻利瓦尔和他的战友通过招募奴隶参加独立军队而鼓励他们要求解放。自由黑人和混血人曾成群结队地走向军队报名。独立后，妇女、奴隶、自由黑人和混血人，依据共和国法律和民众解放的诺言，向政府要求解放。作为对大众要求平等公民权的回应，克里奥尔领导者制定保护私有财产和家长制法律和政治制度。

废奴运动是克里奥尔精英之间以及他们和下级军官之间讨价还价
237 的一个显著例子。1820年，按照军事需要和议会声明，"没有任何人是另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是玻利瓦尔指挥下的一个出色将军，玻利瓦尔命令他在安蒂奥基亚和乔科省通过许诺解放招募大概5 000人的奴隶军队。这很自然地在奴隶当中激起极大的热情，但是这项举措触动了矿山所有者和其他依靠奴隶劳动力的业主。为了缓解这些冲突，桑坦德把军队招募人数缩减到3 000



奴隶起义运动此起彼伏，是大哥伦比亚从殖民地向共和国转变过程中一大鲜明特征，也决定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国内在19世纪就公民权问题发生的争论的本质。其中的一场起义发生在17[illegible]年，是由一名获得自由的桑博人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José Leonardo Chirinos)领导的。智利画家伊恩·皮尔斯([illegible])在[illegible]所画的壁画正是以这次起义为题材，并使其得到永远铭记。

人，并且命令其他奴隶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库库塔议会采取的妥协，有效地延迟了奴隶制。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只有通过复杂的解放过程逐渐废除奴隶制。此后，所有的奴隶孩子儿都将是自由的，但是他们需要为自己母亲的主人工作直至18岁成年。这项法律还建立了一系列地方奴隶解放洪达，该委员会是由当地的贵族组成，主要负责收集税款以偿付奴隶主的损失。众所周知，这些洪达很不称职，并且很大程度上代表奴隶主的利益，没能解放大多数奴隶。

尽管如此，奴隶仍然通过组织起义来对玻利瓦尔和克里奥尔人的政府施加压力，1821年至1827年，奴隶起义席卷了整个共和国。由于担心国家正在临近的毁灭，1828年玻利瓦尔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

令有效集中了对地方洪达的控制，并且对不执行法令的地方洪达成员进行财政罚款。这引起了来自权贵和地方军人考迪罗越来越多的指责，如混血种人领导者何塞·安东尼·帕埃斯，公开指责玻利瓦尔的"独裁"行为，并于1829年号召大哥伦比亚解体。除了奴隶制引起的冲突，大哥伦比亚的存留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及经济和社会现实。由于它各部分之间距离很远，又处于多山地形，一封信从波哥大到加拉加斯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交流十分困难。这些状况还阻碍了委内瑞拉、新格纳那达以及厄瓜多尔间经济联系的发展。同跨越陆地穿越安第斯山脉与波哥大联系相比，加拉加斯和其他委内瑞拉沿海城市同欧洲交流相对容易。玻利瓦尔的理想是把一些独立的拉丁美洲共和国融合成一个联邦国家。但委内瑞拉的可可种植园主和商人连同后来加入的军人考迪罗领导人，不仅一点都不支持玻利瓦尔的这种观点，甚至更不支持他联合所有西属美洲国家组成一个大邦联的思想。

帕埃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1830至1863年委内瑞拉联邦战争

1830年5月6日，议会在巴伦西亚召开，为独立的委内瑞拉制定一部宪法，这是这个国家在不长的历史中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只有21岁以上自由的高收入男性才有选举权。这项要求排除了大部分的人，使90万人无缘参加政治生活。这些人中60%是非洲人后裔，另外15%是当地人，剩下的25%是白人。他们中只有很少的小部分，大概1万人组成了统治阶层，其中包括富有的商人、大庄园主、官员以及军官，而通常军官也是大庄园主。这个阶层的成员经常通过家庭网络联系在一起，对政治进行控制。

军人英雄何塞·安东尼·帕埃斯，被选为总统兼军队最高指挥官，他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委内瑞拉独立战争的斗士，也是以前的大庄园工人。他的成功，显示可通过允许通常出身卑微的军人考迪罗成为新的精英，使旧殖民统治阶层得以重生。在帕埃斯管理下的委内瑞拉社会与经济同殖民地社会经济秩序很相似。大庄园仍然是最基本的经济活

[illegible]作，独[illegible]拥有人考迪罗对保王党人的庄园和公共土地的迅速获得，土地占有集中十分严重。1830年的法令强迫出售所谓未耕[illegible]土著人土地，给大土地主提供了更多的扩张土地机会。在乡下，劳[illegible]仍然以奴隶制、雇工制以及不同形式的租佃制为基础，其中包括收益分成和强制个人服役。

[illegible]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一样，委内瑞拉的奴隶制很长时间以来也处于衰退状况。被奴役的非洲人对奴役公然反抗，或通过抵制、反叛等被动形式，或建立逃亡黑人村落(逃跑奴隶的定居点)，从而使奴隶制成为社会不稳定、经济低效率的因素。根据1821法令的规定，奴隶主需要在[illegible]解放新一代新出生的自由黑人，但他们仍继续坚持保护自己私有财产权。而且，1830年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通过了一项奴隶解放法令，这项法律将奴隶主对奴隶的控制延长到21岁。此后，另一项条例又创立了一项强制性的"学习期"计划，将解放奴隶的年龄从21岁延长到27岁，从而确保此期间主人对其劳动力的控制。由于殖民地后期开始出现的趋势仍在持续，许多奴隶主发现自动解放奴隶更有利可图，因为被债务和其他义务所困，他们作为承租人或者短工依然留在以前主人的土地上。到1844年，有1.1万个奴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由，其中只有150人是由于到了被解放的年龄。但是1844年，仍然存在着4万名奴隶。

长时间的革命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原料毁坏和人员伤亡——人口锐减到26.2万人，并且破坏了国家不同地区原本脆弱的经济纽带。然而，到19世纪30年代，委内瑞拉却经历了一场经济繁荣，这场繁荣是以主要出口物由可可转变成咖啡和国家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从此以后，这一市场购入了委内瑞拉咖啡、可可、靛蓝染料和皮革出口的80%。

较高的咖啡价格以及1830年的繁荣，使种植园主渴望通过贷款拥有新的土地以增加产量。外国工商资本家、委内瑞拉进出口商人(前者的代理人)和当地的放款人很乐意用咖啡作物和种植园主的庄园作为担保进行放贷。但是，殖民地法律却设置了障碍，对利率进行规定并且

处罚高利贷。1834年委内瑞拉议会通过的贷款法消除了这一障碍，该法废除了西班牙在契约上所有的传统控制，不管利率多高，只要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国家都会强制执行。19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咖啡价格的下降，委内瑞拉经济逐渐陷于困境，当债权人拒绝再为债务人筹钱，这使得委内瑞拉陷入更严重的萧条时期。经济危机在精英阶层中引发分歧，派系产生了，并且在40年代发展成政治派别。其中一个称为保守党，反对党成员把他们称为"寡头人"，把他们和不受欢迎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帕埃斯是该党公认的领导人，他代表着进口商、出口商人、外国合伙人、债权人、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僚和一些大[illegible]和利益。自由党是安东尼·莱奥卡迪奥·古斯曼领导的，是一个由受债务困扰的种植园主、城市中产阶级、工匠、寻求改革的年轻一代和反对帕埃斯长期独裁的考迪罗结合而成的松散联盟。

古斯曼对保守党的经济政策的严厉抨击，促成了委内瑞拉社会自从1839至1852年一系列的公众起义和奴隶暴乱，这被描述为是为了反对私人财产的公开战争。起义和暴乱使保守党人害怕，他们发起了一场混血种人和奴隶间的全面社会种族战争。尽管保守党人指控古斯曼的煽动性鼓动，事实上，自由党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害怕社会革命，并且也没和这些起义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政府用惯常采用的方法来对他们进行镇压，对古斯曼进行审判，认定他煽动起义违法有罪，并判处他死刑。

到了1854年，普遍的动乱、奴隶起义以及对奴隶制的被动抵抗大大增加了奴隶制的成本，它和全世界咖啡价格下降结合起来，严重影响了种植主的利润。此后，保守党企图通过支持议会通过许多法律来支持他们的同盟者，这些法律是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种植主而制定的，其中的一项法律废除了委内瑞拉的奴隶制，并且保证对奴隶主的赔偿，其中很多人为了避免提供资助费已经自动释放了奴隶。

事实上，废除奴隶制旨在结束一场经济上花费很高和社会上的破坏稳定的民众运动，但是解放奴隶给大部分自由人的生活没有带来什么改观。由于缺乏可提供各种职位的现代工业系统，以及任何分给他们土地的计划，很多人不得不作为背负着沉重义务的佃户，继续工作在

[illegible]奴隶[illegible]，其他一些人赚到以代币发放的勉强工资，只能在庄园商店里以[illegible]的垄断价格兑换想要购买的物品。

19世纪50年代，艰难的日子还在继续。低走的咖啡价格和精英[illegible]社会剥夺的扩大，迫使保守党和自由党暂时将力量联合起来，但[illegible]政府与[illegible]一部分极端保守党人夺取了权力，建立了一[illegible]政府，并驱逐了许多自由党人，后者则以一场起义作为回应。这场起义也是联邦战争(1858－1863)的开端。

“联邦”[illegible]自由党精英人士和普通追随者有不同的意思，后[illegible]，他们集合起来参加联邦战争，高呼“杀[illegible]”[illegible]指责自由党精英人士在煽动一场“种族战争”，但[illegible]，这是一场穷苦大众和富有的精英人士之间的战争。[illegible]自由党领导人给国家制定了一部新宪法(1864)，新[illegible]中有很多改革措施，包括授予个体男性拥有选举权，并增加了20[illegible]权。[illegible]没有实质性的社会改革，那些权利实际上都是没[illegible]，仅仅意味着地方考迪罗依然[illegible]，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还是大庄园主。

[illegible]，对于在[illegible]起义中站起来反对保守党政权，聚集在自由主义[illegible]旗号下的农民和工[illegible]，这个词有着不同的意义。[illegible]在埃塞基耶尔·萨莫拉(Zamora)的宣言中被[illegible]，他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游击战士，支持原来的苦工和佃户占领大庄园，支持建立联邦国家并由普通公民推举当地政府机构。萨莫拉是联邦战争中民主和社会革命趋势的代表，1860年，一颗行刺者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

由于担心农民革命者力量不断壮大，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同意和[illegible]，于1863年签署协议结束了战争，这场战争以将近5万生命为代价，并且对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许多庄园被毁坏，并且由于战时劫掠和忽视，大草原上的牛群也完全消失了。和独立战争一样，联邦战争也只造成了有限的改变。旧的保守党寡头统治政权解体了，获胜的一些平民出身的自由党军官占领了他们的庄园。但是普通士兵，战争

的胜利以后，却被迫放弃占有的小块土地，重新回到大庄园中继续做雇工。

桑坦德与哥伦比亚两党制的诞生，1830—1850

继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1830年从大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后，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名义下其余的领土也走向了独立道路（包括今天的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在玻利瓦尔的老战友桑坦德的领导下，新格拉纳达通过了一项宪法，宪法规定：总统选举四年一次，设立两院制国会及省级立法机构。宪法赋予所有已婚或年满21岁、非家庭佣人或雇工且经济上独立的自由男性有选举权。实际上，一小撮贵族统治阶级主导着政治生活。

地理、经济和新国家的社会状况都对自由民主社会的建立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该国处于高耸的安第斯山脉的山脊之下，广袤的谷地、各地和高原是百万人的家园，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交通运输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新格拉纳达显示出许多前资本主义特点。大部分工业活动（酿酒、纺织，陶器制作，制鞋）在家中以妇女为主进行。许多国家投资的企业开始努力建立生产肥皂、玻璃制品、纺织品的工厂，并且在波哥大建立了钢铁厂，但是大部分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40年代相当大的工匠群体出现在较大的城市，比如波哥大、麦德林和卡利。尽管本地工业有适度的关税保护，它们仍很难与国外进口的产品竞争。经济落后在交通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直到20世纪，该国部分地区还一直以搬运工人和骡子做运输工具。甚至在轮船航行成为马格达莱纳河的常用交通工具后，从大西洋港口航行到波哥大要花费四至六个星期。生产力的有限发展和经济活动缓慢的节奏，为精英阶层只创造了不多的财富。19世纪上半叶，波哥大的上层人物大概人均收入达到5 000美元，而资产达到10万美元的人屈指可数。

缺乏刺激经济的活跃出口基地，并向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提供资源，是19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经济和政治上的主要困难因素。力求用烟草、棉花和其他出口商品取代日益衰退的黄金产业，造成了一系列短暂的经济繁荣期，但是由于市场萎缩、价格下跌和不断增长的国外出口

[illegible]战争，种植园经济很快崩溃。出口基地和全国性统治精英的缺乏，[illegible]说明该国集中出现“经济群岛”、区域隔离和自给自足的原因。[illegible]专制之外[illegible]政治独裁，而政治独裁则代表着永久的不稳定，因为[illegible]的手段、战争或战乱，甚至有大庄园主出身的将军的分权裂土。[illegible]人可以动用由雇工组成的私人部队，同竞争的军人考迪罗或脆弱的中央政府划分势力范围。

大庄园或种植园控制了经济命脉——农业，它们主要种植小麦、大麦、马铃薯并且饲养牲畜。它们的劳动力通常由混血种人雇工或者佃农组成，他们按劳动或者实物支付租金，以换得种植自己承租土地的权利；他们还通过[illegible]受到债务的限制，有时他们还要为主人个人服务。

在这些大庄园周边土地和山坡边居住着其他的农民，他们主要依靠[illegible]农作物或[illegible]邻地区提供农作物来获取靠不住的独立。安蒂奥基亚西北部地区有着崎岖的地形和很少的人口，这里庄园不多，但有很多的中小型土地拥有者。一个更加独立的农民阶层也出现在桑坦德省。西班牙人奴役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及其后裔劳工在种植园劳作或在西部各[illegible]开采黄金。然而，这些机构被独立战争、奴隶反抗以及“自由胎儿”法律极大地削弱了。

然而，奴隶主们努力捍卫他们的财产权，并要求限制废除奴隶制的速度以及1821年后出生的自由民的权利。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为了确保奴隶儿母亲的主人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法律限制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流动，将违反法律的流浪者关进监狱，并批准庄园主实行强制“学徒”制度，即将获得自由者安置到贸易行或其他有用的职位上，直到他们25岁。

显然，奴隶和获得自由者们通过激烈的反抗或者逃跑来阻止政府对他们的劳动实行控制。此外，他们还和商人、技工、自由人联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致力于立即解放跨阶级多种族同盟。一些获得了自由的黑人甚至通过他们所坚持的天主教理想国、无政府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信念而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视为一丘之貉。这个大规模的运动成立了一个“民主协会”组织，不断施压何塞·洛佩斯·希拉里奥的自由

党政府废除奴隶制。最终，政府在保证奴隶主获得充足的补偿以平息他们的反抗以后，于1851年废除了奴隶制。这一措施解放了大概25000个奴隶，这对很大程度上依赖奴隶劳力的金矿开采区造成最重大的影响。

但是自由主义者将奴隶解放和法律平等联系了起来，认为在"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民族和同一种语言"下，要求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为了国家统一作出牺牲，以创造一种统一的全民性的拉丁美洲文化。这导致了土著人和非洲人牺牲公共土地以及他们的自治政治传统。此外，自由主义者加强攻击本地公共土地及被强制分割的"被解放"土地，土著的土地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流入到相邻的大庄园主手中。土著和非洲人因此而没有了土地，成了需要服役于庄园主的雇工。

在他们努力创造一个统一的"混血种人"国家的同时，自由主义者力图同保守派划清界限。直到19世纪40年代，两个党派之间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的不同越来越不明确。实际上，两者都代表了上层阶级的利益，并且都采用了形式上的代议制民主及共和制政府；两者都相信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并且相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其他公民自由，经济政策上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策略。没有政党关心农业问题或其他的乡村和城市民众问题。唯一使他们伤神的问题是宗教和政府关系以及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新兴的自由党鲜明地反对教权主义，将宗教视为进步的敌人；然而，他们崇尚信仰自由并且将宗教和政府分开。早期的保守党支持宗教宽容，但赞同宗教和政府的合作，他们相信宗教可以提高道德和增进社会和谐。

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想意识出现了更大的分歧，并且出现了新的政治派别：各各他分子(gólgotas)①、城市手工业者和德拉古分子(draconianos)②，以及后来与工匠结盟的低级别军人。在烟草种植业迅速扩大、咖啡周期开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外贸易

---

① 各各他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意思是信仰耶稣基督的狂热人士。——译者注

② 德拉古为古希腊政治改革家，这里意为改革派。——译者注

[illegible]分子是商人阶层的儿子，而该阶层到 1850 年人口已增长到 200 万。

[illegible]反对奴隶制运动、法国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 1848 年法[illegible]的教育和[illegible]，这些人发展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极具情感的派[illegible]是基于对基督教的浪漫主义理解，在他们那里基督被描述为[illegible]，并以 19 世纪世俗改革先驱的身份出现。这一思想体系[illegible]是包括废除奴隶制、教会和军人特权、强制性的十一税和对自由企业的所有限制。

在 19 世纪前[illegible]年中，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手工业者面临着[illegible]进口[illegible]竞争，后者导致了严重的失业。他们的困境[illegible]于奴隶[illegible]和使他们的[illegible]受益的较低关税造成的，他们很容[illegible]反对奴隶[illegible]政治斗争中的自由平等话语。1847 年，他们创立了[illegible]从波哥大[illegible]开始的“民主协会”关系网，该网络差不多有[illegible]个城市。这些互助协会成员开展教育和慈善活动，同时也是自由[illegible]人的政治工具，使那些被土地贵族大力支持的新商人精英能够去追寻自由放任和现代性的胜利。

[illegible]，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提供了一种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巴[illegible]、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确立了各自的国家身份，与此有密切关系的种族和[illegible]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自由主义者从根本上抓住了自由和平等的话语，一直坚持进行各地区的废除奴隶制运动，坚持奴隶解放，但是他们也创造了一种民族话语，它要求从外国统治和政府控制下获得自由，这也是维护他们的阶级特权和财产的必要条件。这种民族话语试图平息种族平等及群众民主参与的更为激进的要求。

第十一章　新殖民主义和自由国家的胜利(1870—1900)

焦点问题：

- 什么是新殖民主义？它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是什么？1870至1900年期间，自由国家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 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对土著社区、土地、劳工、贸易和外国投资等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 阿根廷的胡里奥·罗卡政府对土著社区、土地、劳工、贸易和外国投资等采取了什么政策？
- 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在危地马拉实施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委内瑞拉的纲领和拉斐尔·努涅斯在哥伦比亚的计划有什么不同？它们又是怎样分别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 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计划和何塞·马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e Manuel Balmaceda)在智利的发展政策有什么不同？自由主义发展计划是怎样影响社会底层阶级、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

欧洲工业革命大约于1870年开始，其不断加快的步伐刺激着拉丁

美洲的经济和政治以更快的步伐发展。由于原材料和食品需求不断上升，拉丁美洲的生产者增加了它们的商品产量。自由国家政权巩固的标志是政治稳定程度日益不断增强，这也减轻了该地区对欧洲和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依赖。

受增加的移民、投资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鼓励，欧洲资本大量涌入拉丁美洲，修建铁路、码头、工厂和其他扩大生产贸易所需的项目。拉丁美洲由此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它用原材料和食品交换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制成品。自由贸易政策逐渐被拉丁美洲各国所采纳，这样它们就放弃了创建本土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从而加速了该区域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

新殖民主义

现在大不列颠帝国和之后的美国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主导地 244
位，新的经济体系也加速了拉丁美洲对英美的依赖，这也可以称作“新殖民主义”。尽管它有着内在的缺陷和在本土市场出现一些衰败迹象，但是，1914年前新殖民主义秩序还是呈现出相当稳定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的贸易出现混乱，所需制成品的进口面临困难，这标志着新殖民主义和自由国家全面危机的开始。

虽然从1870至1914年的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经济的总值在快速增长，但这个发展过程的步伐和程度都非常不平衡，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加入这个发展的进程远晚于其他国家。新殖民主义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片面性（单一耕作）。一种或者几种主要产品成了国家发展繁荣的基础，当国际市场上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和定价发生波动的时候，这个基础非常容易被摧垮。阿根廷和乌拉圭依赖小麦和肉类；巴西依赖咖啡、糖，也短暂依赖过橡胶；智利依赖铜和硝酸盐；洪都拉斯依赖香蕉；古巴依赖糖。

在拉美国家，现代出口部门变成一个孤立区域，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经济部门隔离，并且榨干了其他部门的劳动力和资金，从而加重了它们的衰退。现代经济出口导向的经济特点在国家铁路系统建设模式里非

常明显，这个模式不是被设计用来整合国家内的各地区，而是为了满足出口工业的交易需求。此外，现代出口经济经常是建立在极度不稳定的基础上，快速、狂热的增长，然后时不时被突然外部全面需求导致的萧条所打断，这构成了新殖民主义模式的一个部分；这些知名的短暂兴起和衰落的故事中有：秘鲁的鸟粪、智利的硝酸盐和巴西的橡胶。

19 世纪末期，新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胜利并非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这并不是由于欧洲经济"领先"以及这个区域过去的殖民史所预先决定的。从殖民或者半殖民经济或社会到目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跳跃，虽然很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本所做过的那样。独立之后，新生的国家必须要在自治和依赖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如历史学家弗罗伦西亚·马龙(Florencia Mallon)所说的那样："在以国内市场为主和资本形成和注重对日益依靠出口生产之间，新国家不可避免地最终选择了后者。"但是，如果没有大庄园的解体，劳役偿债制度或者其他强制劳工制度的废除，以及对本土工业采取从始至终的支持政策，由资本主义所需的有活力的企业家阶级和大型国内市场的形成，还是无法达到的。但是这些改革需要一个强大、积极的单一民族国家，致力于抵抗市场力量和重新分配物质资源。然而，大部分精英觉得这些举措代价太高并且具有威胁性。取而代之的，他们接受了自由发展的理念，这些理念强调私有化公共资源，减少政府支出，消除官僚作风，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优惠，以及鼓励进口贸易。因此，大部分拉丁美洲精英选择了继续保持依赖这条更为轻松的道路，开始是大不列颠帝国，而后是美国分别取代西班牙成为他们依赖的对象。

但是，19 世纪的拉丁美洲也采取了一系列非凡举措来打破这种依赖局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样的两种努力。弗兰西亚博士和洛佩斯父子领导下的巴拉圭提出了一个短暂而又成功的自主发展计划，他们以国家为主导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多样化计划将巴拉圭从一个落后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相对繁荣进步的国家，但是灾难性的巴拉圭战争中断了这一计划，并且将巴拉圭又带回那个落后并且依赖性强的国家。1850 年代在智利，一个由矿业资本家、小农场主和工匠组成的联盟试图推翻土

[illegible]同时推行激进的政治社会改革；但他们“失败的[illegible]地扼杀了。在这一章节我们将探讨智利在“智利[illegible]利”[illegible]发展的第一次努力，也由于其领导者的死亡而以失败告终。

大农场体系的扩张

[illegible]在传统的土地占有和劳动关系构筑的框架中进化[illegible]大庄园体系扩张，并达到一个远远超出殖民时代[illegible]欧洲对拉丁美洲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内[illegible]提高了土地价格，大地主阶层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起了对[illegible]土著人[illegible]土地的侵占。至少在部分地区，这样的侵占反映出[illegible]与土著人竞争的努力。19世纪50、60年代，墨[illegible]改革运动为这次侵占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在波菲里奥·迪亚斯[illegible]安第斯山脉地区，相似的立法行为将所有的公共[illegible]成了个人所有制，导致了周期性的土著居民暴乱和政府血腥[illegible]。但是，不是所有的土著居民都反对这种在19世纪将古老的公[illegible]有体系肢解[illegible]做出的努力。无论在墨西哥还是安第斯山脉地[illegible]在村庄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土著人居[illegible]主动[illegible]公共土地的私有化，并将其视作一条个人致富之路。

自由派政府没收了教堂所有的土地，也促进了大庄园的发展。墨西哥利用《莱尔多法》和《华雷斯反教权法》，再次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illegible]墨西哥的先例，1860年代哥伦比亚的自由主义政府也没收了教堂的所有土地；1870年代自由派独裁者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委内瑞拉[illegible]了许多教堂的不动产；1895年厄瓜多尔的自由主义者征用了教堂的所有土地。

通过铁路建设和战争而实现的公有土地扩张也促进了大型不动产的扩张。从教堂或者是土著人社区强行征令来的土地，通常被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大片地贩卖出去。土地的集中化，使得土著人或是印欧混

血种人的小型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可耕种土地极少，但还有一些是小型庄园的普遍发展。这些小型农场依然低效率地使用过时的技术耕种小块土地。

被征用的土著人社区的所有土地，不管是马上使用还是保留着以期望升值，都使大地主们具有了在劳动力需求增长的时候，有能力控制当地的劳动力资源这样一个优势。被迫离开土地的土著人很少数能够变成了全部工资以现金偿付的真正工资劳动者，因为这样的工人太少，并且拥有太多的精神独立性。一种称作债务雇工的劳动制度变得普遍。在这个制度中，工人工资的全部或者部分以只在公司商店使用的代金券形式偿付，这些商店的高价和经常的欺骗使得工人欠下的债务一代又一代传了下去。法律强制规定这些债务雇工（Peon）有义务一直留在这些庄园内直到他们还清债务。反对现代农业秩序所要求的更集中的劳动方式的这些债务雇工们，在地主手下的武装侍从，或者是当地警察或军事当局的压迫下，他们的反抗被镇压了。

在一些国家的这个时期可以看到，在为土著居民的强制劳动方案中，殖民地时期的劳役摊派制正在复兴。在危地马拉，这个制度要求健壮的土著居民为庄园主工作一定的天数。自由派总统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向负责此项事务的地方长官发布命令"任何想要逃避自己义务的印第安人将受到严格的法律处罚，农场主要被完全保护起来，并且每个印第安人在工作期间必须要每天工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离中世纪已经非常久远，奴隶制依然残留在一些区域——比如，秘鲁残留到了1855年，古巴残留到了1886年，巴西残留到了1888年。与奴隶制相似的是奴役体系，在这种体系下，1849至1875年间，9万个中国苦力被运送到了秘鲁，开采岛上的鸟粪和建设铁路。"奴隶制"这个词，同时也用于这样一种体系，即被驱逐出境者和当地被捕的造反者被墨西哥当局送往墨西哥南部种植咖啡、烟草和剑麻的农场充当劳力，处境苦不堪言。

农业劳动和农场租佃的现代制度仅在巴西南部和阿根廷出现，因为这些地区劳动力短缺，需要采取更大的激励措施来鼓励1870年到

工，包括从欧洲大批涌入到此的数百万移民。

在采矿业以及1890年之后在某些国家建立的一些工厂中，劳动状况令人震惊。在这些情况下，每个工作日工作12到14个小时，微薄的工资常以公司商店专用的可兑换代金券的形式发放，还要忍受雇主和工头各种残暴的行为。拉丁美洲法律一般禁止罢工或者其他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有组织运动，而且警察或者其他被雇佣的武装力量也被用来镇压罢工，经常会导致严重的伤亡。

外资控制资源

与新殖民主义一起兴起的，是掌控这片大陆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外国公司的稳定增长。这一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1870年，外资主要还集中在贸易、运输、铁路、公共事业和政府贷款上；当时，英国资本家在拉美的投资市场上有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至1914年，外国公司的所有权已经扩张到大部分采矿业，并且已经深入到房地产业、牧业、种植业和制造业；至那时，英帝国的对手已经有效地挑战了其在拉丁美洲的霸主地位。在这些对手中，美国的表现最为耀眼，其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从1870年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上升到1914年的超过16亿美元（此外还是与英帝国的投资有着接近5 000万美元的差距）。

外国经济的渗入，是与政治影响的增长甚至是武力介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的美帝国主义被证实是他们之中最有侵略性的势力。1898年后，“美元外交”和大棒政策的结合使加勒比海变成了“美国湖”，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几个中美洲国家都陷入了附属国的境地，成为了美国羽翼下的保护国。

政治收获

新的经济要求采取新的政治政策。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为出口激增所带来的繁荣景象而着迷，地价上涨，外资涌入，政府收入增加，使他们抛弃了与对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都加入到了对财富的追求中。实证主义者的“秩序和进步”的格言，现在变成拉丁美洲统治

阶级的口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理论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劣等民族"学说，常被用在种族主义者的言语中，以支持他们关于土著人、黑人、印欧混血种人和亚洲人内在劣等性的观点，这些理论也进入到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中。

出口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主导地位，同时土地贵族和更多资本主义导向的群体达成了共识，诸如政治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大部分意义；在一些国家，旧的党派名称消失了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一些自由派领袖——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哥伦比亚的拉斐尔·努涅斯，危地马拉的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都象征了政治上的融合。

到19世纪末，在一些国家，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移民和工业家组织联合起来成立各种党派，无论是激进的或者是民主的，都挑战着克里奥尔人土地贵族传统的政治领导地位。他们要求政治、社会和教育方面改革，这些将会给中间阶层更多的关注。但是这些中间阶层——制造商、零售商、专业人士(professions)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殖民主义秩序的产物并且依赖其谋生；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怀疑新殖民主义的生存能力。1890年，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的小型组织，对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和自由国家发起了挑战，但是这些运动的意义在未来才得到全部显现。

从1870至1914年这段时期，刚才所描述的那种趋势使得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中美洲、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历史上出现了某种一致性。然而，在这些一致性下，各个国家又展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性——这个差异反映了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环境。

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

迪亚斯的独裁专政统治

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掌权并得到了各个派别的支持，其

[illegible]担任[illegible]考迪罗和军队领导人，对旧政权家长制政治感[illegible]，以及相信迪亚斯会保护他们的土著人和印欧混[illegible]也[illegible]美国资本主义家，军队指挥官[illegible]支持[illegible]斯大地[illegible]认为他的前任是“反美[illegible]之后，波菲里奥·迪亚斯建[illegible]最长的个人独裁政权之一。

[illegible]是[illegible]个[illegible]的过程。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illegible]，包括一个态度激进的劳工报刊，都是自[illegible]政治政策大纲很快就变得清晰了。面对[illegible]下各阶层的[illegible]力，迪亚斯决定依靠大地[illegible]，只有他们[illegible]帮助才能够保住他的政治生命[illegible]所有权和其他既得利益。迪亚[illegible]曾经信誓旦旦宣告过[illegible]的人，现在却派遣军队去镇压农民对征用[illegible]在掌权之前他曾公开指责前政府对英国资本[illegible]1880年，迪亚斯甚至给予修建铁路的北美[illegible]对于迪亚斯来说，经济增长已经变成了最重要[illegible]这个国家的问题的关键。

[illegible]政治稳定；为此，迪亚斯推行了“面包加大棒”的政[illegible]这种政策[illegible]有权势的对手伸出橄榄枝，并且跟他们分享战[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政治背景和信仰。对嘴里含着骨头的狗，迪亚斯有[illegible]，要不就杀死狗，要不就偷走骨头。事实上，迪亚斯邀请了[illegible]中产阶级，包括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和新闻[illegible]者，[illegible]野外烧烤，而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被挡在了门[illegible]——比如说政府职位和垄断企业内部的工[illegible]会遭到报复。不[illegible]政见者被殴打、谋杀，甚至是[illegible]圣胡安城堡(San Juan De Ulua)或者是[illegible]底狱地牢囚禁。执行这个[illegible]乡村骑警队(rurales)，它原本是由强盗和游民

组成，之后逐渐被新招募的因改革冲突时期发生社会大变革而失业的工匠和农民所取代。除了追捕顽固不化的强盗，乡警人员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镇压农民反抗和破坏罢工。

通过这些手段，迪亚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他所有的权力，有力地使之对于1857年宪法和它所承诺的自由只留在了纸面上。选举对于国会——理论上的国家最高机构——只是一场闹剧：迪亚斯只是简单地把他的候选人名单分发给当地行政官员，然后他们只要确认这个选单。一位观察者轻蔑地称呼国会为他的马厩。州长也由迪亚斯挑选，通常是从大地主或者他的将军中选出。为了换取他们的忠诚，迪亚斯让他们可以肆意掠夺、随便恐吓当地居民。这些人之下的被称为"政治大员"(jefes politicos)的地区首领，也是经过迪亚斯同意，由州长任命的残暴的男人；再在他们之下的是市政长官，掌管当地行政机构。迪亚斯时期的一个特征就是官僚机构的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政府的行政开支增长了900个百分点。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国内大部分人支持下，墨西哥建立了一所拥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学校，他们力图唤醒民众充满仇恨的过去和承诺创造革命性的现在。作为在这之中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用讽刺的手法描绘了前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在画中他的脚践踏在1857年宪法上，他和他那些富有的跟随者们正在欣赏舞蹈。

军队[illegible]享有特别的优惠。高级军官有着优厚的薪水和很多损害[illegible]的途径。但是迪亚斯的军队却可悲地无法胜任国防[illegible]不是以他们的能力高低来任命的，而是依据[illegible]忠诚度。纪律、士气和训练都非常缺乏。大部分普通[illegible]的当地居民。这些士兵，通常被用[illegible]暴乱，他们自己也被苛刻地对待并且薪水微薄：下级士官一个月的工资为50美分。

教会[illegible]另一个支柱，由于独裁者不执行反教权的改革，教会[illegible]修道院、女修道院、教会学校又重新出[illegible]到了教会的手中。出于维护他们之间交易的原[illegible]来自下层阶级的抱怨声充耳不闻，甚至还教育他们应该服从当局的统治。

迪亚斯的[illegible]政策不仅用在有钱有势的人物身上，也同样对准享有[illegible]的知识分子。[illegible]由知识分子、专家和商人组成的小团队，紧密结[illegible]起为[illegible]出谋划策。他们被世人称为科学家派(Cientificos)，这[illegible]进行"科学"管理，在1892年后他们拥有了显著[illegible]力。这个团队的核心由大约五十人组成。他们的领导是迪亚斯[illegible]的岳父，曼努埃尔·罗梅罗·卢比奥(Manuel Romero Rubio)，[illegible]年他去世后，这个位置由财政部新任部长，何塞·伊夫·利玛窦(José Yves Limantour)继任。

对于科学家派来说，经济活动意味着一切。大部分科学家派成员接受，土著人和印欧混血种人都是内在劣等人群的观点，因此有必要依靠本地白人精英、外国人及其资本来引导墨西哥走出贫困落后的境地。用记者弗朗西斯科·G.科斯梅斯(Francisco G. Cosmes)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只拥有劣等民族的消极力量，不能积极地追求文明目标。"

土地的集中

20世纪初，墨西哥依然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1 500万人口中的77%仍然依赖土地生存。改革法律推动了土地所有制的集中，并且在

迪亚斯的领导下，这个趋势在渐渐加快。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生产出口产品的可能性，因此刺激了迪亚斯时期土地价格的上涨，并进一步强化了抢占土地的行为。

土地立法中很重要的一个是1883年为规划公共土地而制定的《划界法》(Ley de Deslindes)。该法授权私人公司去勘测这些土地，并且可以保留三分之一勘测过的土地；剩余部分以固定的低价格大面积卖给迪亚斯的心腹或者是他们的外国合作者。1883年的法律打开了大块收购土地的新路。在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和其他北部的州，个人获取了将近1 200万英亩的土地。但是土地法还不满足这些已收购的土地。1891年，《未开垦土地法》(Ley de Terrenos Baldios)宣布凡是没有合法地契的土地就是无所有权的土地，为进一步合法征收土著人村落和小土地所有者自古以来耕种的土地打开了大门。如果受害者武力抵抗，迪亚斯就派军队去镇压他们，把俘虏的反叛者像奴隶一样卖往尤卡坦州的剑麻种植园或是[illegible]种植园，这也是西北地区雅基人(Yaquis)的命运，他们坚持进行了漫长的英勇斗争，但依然被打败了。

另一个土地征收手段是1890年颁布的一条法律，旨在落实以前的改革法规，要求将土著人村落土地在村民之间进行分配。这项法规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在很多情况下，土地投机商和大庄园主哄骗不识字的村民卖掉他们的地契，以换取微不足道的利润。大庄园主们用其他方式，比如切断村落的水供应或者是直接采取武力，以达到他们掠夺的目的。至1910年，土地征收的过程基本完成。国内人口最密集的中部高原地区超过90%的土著村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公有土地。只有最为顽强的抵抗，才能在大地主们的掠夺中幸存下来，保住村落的土地。没有土地的雇农和他们的家庭占到了1 200万农村人口中的950万。

一般来说，新的土地所有者是不会有效地使用从土著人村落或是小土地所有者那儿征用的土地的。大庄园主让大部分霸占过来的土地空闲在那，等待着未来有可能的地价上涨或者是来自美国的收购者。因为一直空占着土地不生产，可使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人为地维持在

尽管最大的一些土地拥有组织——北部地区的养牛者和棉花种植者，
恰帕斯州(Chiapas)的咖啡和橡胶种植者，尤卡坦州的灰叶剑麻生产
商——应用了更多现代机械和技术，但大庄园农业技术状况普遍来说
非常落后，几乎没有使用灌溉、机械和商业肥料等。

食品生产停滞不前，几乎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像玉米和豆类
这样的主要粮食作物，它们的人均产量直到19世纪末事实上一直在持
续下降。在1907年至1910年这三年歉收的年份，产量下降达到最低点，
而歉收的根本原因是干旱。因此，在迪亚斯政权的最后几年里，从美国
进口的玉米以及其他食品稳定增长。尽管牧区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但 250
是人均消费量并没有同步增长，因为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家畜是被指定
用于出口市场的。

唯一超过人口增长的食品是酒精饮料。从墨西哥城中酒吧数量从1864年的51家上升到1900年的1 400家的事实中可以窥知其消费量的增长。在19世纪末，墨西哥由酗酒——一种对于无法忍受的生活和工作的普遍反应——引发的死亡率估计是法国的6倍。同时，在迪亚斯政权的最后时期，通货膨胀肆虐横行，极大地提高了大部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因为工资没有相应地增长，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处境急剧恶化。

经济发展

当面向国内市场的食品产量下降之时，面向外国市场的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生产却蓬勃发展。至1910年，墨西哥变成了灰叶剑麻的最大生产国，灰叶剑麻是一种制作纤维的原材料，国际市场上有着很大需求。墨西哥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契合美国的需要，美国是生产糖、香蕉、橡胶和烟草的外国人所有的农场的最主要市场。美国公司控制了采矿业，其铜、金、铅、锌的产量在1890年后迅速增长。被美国和英国利益集团控制的石油工业，也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至1911年，墨西哥成为世界第三的石油生产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本家实质上垄断了纺织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这些行业也在1890年后出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

外国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和迪亚斯政权对外国人青睐有加的态度，使得民间有了这样一句俗话："墨西哥是外国人的母亲，墨西哥人的继母。"科学家派统治集团，以快速发展对墨西哥经济至关重要，以及建立强大国家来保护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由，为这种做法辩护。因为外国资本的蜂拥而入，外贸额极大增长，现代金融体系出现，这个国家建立了相对密集的铁路网，将国内市场与外部市场连接起来。但是这些成功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残暴的独裁统治，大量人口的贫困化，粮食生产的停滞，低效率的庄园得到强化，以及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残留的封建和半封建印迹。

劳工、农民和中产阶级动乱

封建印迹主要残留在劳工关系领域。1910年，强制劳动和公开奴役，与债务雇工旧制度一样，成为南部尤卡坦州、塔巴斯科、恰帕斯州和瓦哈卡、韦拉克鲁斯部分地区的代表性特征。这些地区的橡胶、咖啡、烟草、灰叶剑麻和甘蔗种植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强制劳动力，包括政治流放犯、被捕的土著人反叛分子和用各种手段被诱骗到热带地区工作的合同工人。

在墨西哥中部，因为大片村落土地被征收后产生了大量没有耕地的本地无产阶级，土地租借、粮食分成和移民劳工使用增加，生活水平出现降低。该地区劳动力大量剩余，减少了大庄园主通过债务雇工将工人绑在他们土地上的需要。有着高薪酬水平的美国地区和北部大庄园主、矿山老板抢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得工资和收益分成制度更受欢迎，债务雇工制度则在弱化。但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农业工人的生活还是充满艰辛，并且经常遭受各种形式的虐待。

采矿业和工厂的劳动条件比乡村要稍微好一点。纺织厂工人每天工作12至15个小时，无技能的女工和小孩的工资是11美分，高熟练技术工则为75美分。雇主们还采用各种办法克扣他们微薄的工资：在使用工具或者机械的过程中犯了所谓的"疏忽"，或者有"残次品"；工人的工资通常全部或者部分地由代金券支付，这个代金券只能在公司



1907年墨西哥里奥·布兰科(Rio Blanco)纺织厂正在罢工的工人；这是家由法国资本家控制的工厂。军队镇压了这次罢工，血流成河。

[illegible]格比其他商店高很多。联邦和州政府法律都禁止工会和罢工。1907年在奥里萨巴(Orizaba)地区(韦拉克鲁斯州)，纺织工人[illegible]工人，无论男女，都被派来镇压的军队射杀；1906年发生在卡纳内阿(Cananea)地区(索诺拉州)的美资附属铜矿公司罢工，也有大量的工人被杀或者受伤。尽管面临镇压，迪亚斯时代最后几年中工会运动依然继续发展，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开始逐渐影响着力量较弱的城市工人阶级。

在迪亚斯统治时代的最后衰落期，不断发展的罢工浪潮和农村暴乱反映出了墨西哥人民中不断增长的更广泛的反抗情绪。由于科学家派、他们的外国同盟者和地区寡头统治者，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垄断控制，教师、律师、记者和其他行业人士的发展机会受到了严格限制，离心离德的心理在这些人中间渐渐蔓延开来。1905年在美国，一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Ricardo Flores Magon)的带领下，呼吁推翻迪亚斯政府，并且推行激进的经济社会改

革计划。

即使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也很快也加入到了批评的合唱中来。这些来自上层阶级的不同政见者，包括民族资本家，如有钱的地主及商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也憎恨外国公司在墨西哥享有的竞争优势。他们也害怕不变的、反动的迪亚斯政策可能会激怒大众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怀着对改革的恐惧，这些上层、温和的批评者们催促迪亚斯结束他的个人统治，改组政权，推行温和的改革计划，这是平息大众反抗和保持现有经济政治秩序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请求仿佛是对牛弹琴，一部分资产阶级改革者只好不情愿地准备走上革命道路。

同时发生的经济衰退和粮食危机削弱了不断增长的抗议者。1906至1907年的经济萧条，从美国蔓延到墨西哥，引起了一波的银行破产、解雇和降薪。同一时期，1907至1910年的农作物歉收，引起了如玉米和豆类等粮食作物价格的急剧上涨。至1910年，墨西哥内部冲突已经到了要爆炸的阶段。工人罢工、农村暴乱、中产阶级改革者的焦虑、一些大地主和资本家的不满，都显示出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尽管依然有着表面上的稳定和耀眼的光彩，但迪亚斯政权已经从下到上腐烂了。只需要轻轻一推，它就将轰然倒地。

阿根廷的政治和经济

虽然阿根廷的冲突一直主要来源于各省考迪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但胡里奥·罗卡(Julio Roca)和其他寡头统治者之间还是尝试通过加强港口城市和内陆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来统一整个国家。阿根廷，跟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一样，自由主义国家的巩固是新殖民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

国家政权的巩固

胡里奥·罗卡通过执行将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化的长期承诺，将这个新诞生的联盟制度化，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在变成了这个国家的

[illegible](La Plat)也变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内[illegible]布宜诺斯艾利斯，然而这个表面上的胜利却是一个[illegible]1880[illegible]各省律师和政治家接受了这个大城市的商业[illegible]是分享它。布宜诺斯艾利斯非但[illegible]地获取财富和权势直到它成功地获得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压倒性优势。

[illegible]的联邦化象征着阿根廷国家巩固的完成，其新领[illegible]层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经常[illegible]"1880一代"，或寡头统治者。正如它的名字那样，[illegible]欧洲模式的价值体系，但又深深带有犬儒主[illegible]的不信任色彩。这些专制的自由主义者[illegible]自由本身。他们认为加乌乔人、土著居民和涌入[illegible]移民无法很好地行使公民职能。当被问到如何定义[illegible]权，[illegible]统治者爱德华多·王尔德(Eduardo Wilde)回答说："这会是全民无知的胜利。"

[illegible]利益与大地主、富商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联系了[illegible]通过[illegible]他们个人或者他们阶层的财产，他们利用[illegible]公务[illegible]中饱私囊。虽然他们维持了议会制政府的形式，[illegible]自己手中的权力留住，并且形成了所谓一党专政(unicato)体系，[illegible]统治党行使权力。行政部门权力高度集中，[illegible]暴力和贿赂是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

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

[illegible]当选总统，仿佛证明寡头统治者的乐观主义是有道理的。[illegible]之前，罗卡领导了一次军事远征——所谓的"荒漠远征"。1879[illegible]年间，他往南进以征服南美大草原上的土著居民。这次[illegible]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国家公共领土增加了大片新土地。[illegible]土著人[illegible]是毁灭性的，却为实施民主的土地政策创造了机会，[illegible]促进小农[illegible]产生。但相反的是，罗卡

政府把所有土地大块都卖给了军队军官、政客和外国资本家，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钱。

欧洲对阿根廷牛肉和小麦需求量增长了，但当时的政府政策，对南部草原的征服引发了无节制的土地投机活动，使得土地价格猛涨，大宗农田导致了养牛业和农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展。这次扩张具有两个方面的标记。在这个时期进入阿根廷的数十万移民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少有人实现了成为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梦想。尽管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圣达菲省(Santa Fe)和恩特雷里奥斯省(Entre Rios)还能见到一些移民者的农业聚居地，但是在1890年代中期，由于小麦价格的下降，出现了从小规模农业转向大规模的畜牧业的变化。农场主(estanciero)一般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土地，这就使大部分想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大农场的帮工或者是佃农，他们对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希望是不确定的。因为租约通常只签订数年，这些移民在耕作了几季后，将南美大草原上的杂草换种成饲养牛群所必需的紫花苜蓿牧草，并且获得了第一次小麦的丰收，但在这之后就不得不搬走，让地主享受所有的劳动成果。

因此，绝大部分新移民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家了，因为这里冷冻和肉加工厂、铁路、公共事业，以及许多小工厂的兴起，引发了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确实，移民来的工人薪水极低、工作时间长，并且和他们的家人挤在条件恶劣的贫民区一个单间公寓中。但是在城市贫民区里(barrio)，他们和与自己相同的一类人住在一起，没有了远在南美大草原的孤独，没有了大地主的专横统治，并且还有少许机会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等级。因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从1889年的50万猛增到了1909年的124.4万。在国家财富、人口和文化中占据很大比重的大城市，以牺牲内陆为代价发展起来了，而内陆特别是西北地区，还是一副贫穷、停滞和人口稀少的景象。阿根廷，用一个熟悉的比喻来说，就是矮人般的身子长了个巨大的头颅。

外国资本和管理在这个时期阿根廷经济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克里奥尔人中的精英们，从他们所有的土地价格上涨和出口量的

[illegible]空，但是他们没有兴趣将利润投向工业领域或[illegible]，这都是发展出口经济所需要的，他们偏好奢侈[illegible]因为他们把经营土地的工作交给英[illegible]者，所以他们把屠肉加工、铁路、公用事业、码头[illegible]合作的机会也留给了英国资本。因此，这些资源[illegible]人手中。[illegible]外国利益让步政策的典型[illegible]，188[illegible]将国营的东方铁路——阿根廷运营状况最[illegible]——卖给一家英国公司。政府越来越多的收入不得不用来偿付比率越来越大的外国贷款。

[illegible]、机械和消费品的进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出[illegible]对消费品的比率失衡，导致了贸易条件的失衡[illegible]带有苛刻条件的新贷款缓解一时减轻了负担，[illegible]黄金储备的消失和政府决定不惜代价维持[illegible]，导致了没有[illegible]支持的纸币大量发放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illegible]这些，因为他们通过出口产品换来了法郎和英[illegible]，有了这些钱，[illegible]换取廉价的阿根廷比索来支付本地费用；并[illegible]，通货膨胀[illegible]土地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中，城市中产阶级[illegible]人是受害的牺牲品，他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

激进党的形成

1889至189[illegible]年，[illegible]当这场繁荣渐渐转为萧条之时，城市中产阶级和在灾难性通货膨胀中被掠夺的部分精英阶层，对一党专政以及政府腐败积累起来的怨恨，引发了名为公民联合会(Union Civica)的反抗运动。虽然新的组织建立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上，但是其领导层却团结了其他迥然相异的群体，如它的第一任主席莱昂德罗·阿莱姆(Leandro Alem)那样，如心怀不满的城市政客，如新的地主和被剥夺了特权的旧贵族家庭的后代；如被政府反神权法令所激怒的天主教徒。除了需要争取投票权之外，唯一能够将这些异质群体团结起来的就是推翻政府统治的共同决心。

1890年新政党的诞生正巧碰上了金融风暴：股票市场崩溃，银行破产数成倍增长，以及4月份内阁辞职。受到最近形势的鼓舞，依靠军队的支持，公民联合会的领导者们计划发动一次叛乱，但它最终以失败告终。

寡头统治者现在充分展现了其操纵和分裂敌人的能力。他们通过修改国家任命制度以平息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并且尝试通过紧缩开支政策来改善经济环境，紧缩政策缓解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比索，也恢复了阿根廷的海外信用。由于这些措施和逐渐从萧条中的复苏，群众不满之声开始减少了。

这些改革孤立了莱昂德罗·阿莱姆和其他的不妥协者，这些人于是组建了一个崇尚"激进"民主的新党派——激进公民联盟(Union Civica Radical)。这个党派清楚通过选票获取选举胜利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策划了又一起叛乱，但由于政府决定行动，莱姆和其他激进派领导人驱逐出境，这场运动被成功镇压下去。

阿莱姆结束流放归来后，于1893年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叛乱。这次叛乱主要占领了圣达菲和一些其他城镇，但是在两个月的战斗之后，叛乱由于缺少重要的民众支持瓦解了。受到此次失败和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olito Yrigoyen)意图争取激进党统治权阴谋的双重打击，阿莱姆最终在1896年自杀了。至1910年，由于重新联合后的寡头加强了他们的统治，此时由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被证明无论是以和平还是革命的方式都无法达到他们政治改革的目的。

然而伊里戈延是个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和永不服输的精明领导者。伊里戈延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警长，之前作为一个末等的政客，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获得了相当大的财富，然后将这些财富投入土地和牛群中。现在作为激进党的领袖，伊里戈延是其含糊党纲的设计师，该党纲认为既要有多种不同诉求，又要全心全意接受经济现状。这个党派的基本口号有"弃权"——拒绝参加被操纵的选举，还有"革命性不妥协"——决心诉诸革命直到恢复自由选举。

激进党代表资产阶级，但这是一个依附性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提倡

[illegible]化、经济多样化，或者是外资企业国有化。他们非但没有攻击新殖[illegible]义秩序，反[illegible]通过推进土地贵族和城市部门之间的合作来强[illegible]限度，[illegible]是挑战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对政治权利的垄断的。[illegible]在18[illegible]、18[illegible]年的大混乱之后渐渐走向衰落，但是在1900年又[illegible]复苏，[illegible]与伊[illegible]优道的个人领袖魅力和组织天赋。但是，最[illegible]由移民后代组成的城市和乡村中产阶级的[illegible]主导地位，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和企业活动的机[illegible]越来越多集中在克里奥尔精英在其中占主导的政[illegible]和专业[illegible]由于克里奥尔人管理委员会限制移民后代入学，[illegible]不安和失望的迹象，其中一些大学校园里爆发了罢课运动。

选举改革和劳工运动的成长

在这个[illegible]，[illegible]数欧改革。这些贵族阶层的改革[illegible]会造成永远的紧张和不稳定；他们害怕激进党的[illegible]终会[illegible]。他们相信，对激进党提出的要求进行让步，[illegible]政[illegible]，这[illegible]的选择，这样执政党——现在一般称之为保[illegible]权力[illegible]的民众支持和合法性。察觉到来自劳工[illegible]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威胁[illegible]，保[illegible]义改革者[illegible]也期望可以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联盟以对抗工人阶级革命者。[illegible]他们支持统称为《萨恩斯·佩纳法》(Saenz Pena, [illegible]12)中的一系列措施。新的法案赋予年满18岁男性公民普选权。这个被历史学家戴维·洛克(Savid Rock)称为"统治阶级以退为进的[illegible]条"，开辟了依附性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权力分享及公职分赃的道路。

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实现工人阶级追求的主要政治工具，该政党于1891年从[illegible]公民联盟中分离出来，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治家[illegible]·B. 胡斯托(Juan B. Justo)领导着该党直到他1928年去世。该政党公开声称的马克思主义，却是一种议会改良性质

的社会主义，主要吸收高技术的[illegible]工人和中低层[illegible]人[illegible]工人中的大部分，依然坚持着某种[illegible]。[illegible]民者，虽然对选举政治采取[illegible]，勇敢地抗议着[illegible]；[illegible]罢工，或者是将[illegible]或者[illegible]。[illegible]，劳工运动依然持续发展和[illegible]斗争，并获得了[illegible]星期日强制休假等初步的胜利。

智利的政治和经济

硝酸盐和战争

1876年，自由派总统阿尼巴尔·平托(Anibal Pinto)接手了一场经济危机(1871－1879)后的烂摊子：小麦和铜价格下跌，出口下滑，失业率增加。由于在1865至1875年间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的硝酸盐生产量翻番，硝酸盐出口的持续增长抵消了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硝酸盐，既是智利获得重大发展的基础，也成了一场战争的导火线，这场战争给智利和它的两个敌人，玻利维亚和秘鲁带来了戏剧化的后果。

在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Antofagasta)和秘鲁塔拉帕卡省(Tarapaca)领土范围内的硝酸盐资源由英格鲁-智利公司(Anglo-Chilean)开采。1866年智利和玻利维亚签订了一项条约，以南纬24度线作为他们在阿塔卡马沙漠中的国界线，并且保证两国政府各享有一半的整个范围内矿产出口的税收收入。英格鲁-智利公司的资本很快进入了这个区域，并开发了一套高效的采矿工业设备。根据1874年的第二个条约，智利与玻利维亚接壤的北部国界线仍是南纬24度。智利放弃了征收边境线北部出口税收的权力，却换来了在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的智利企业25年内税收不增长的保证。

智利虽然跟秘鲁没有边界之争，但是由于得到英国资本的资助，智利矿业利益集团积极进取，很快将他们的公司从安托法加斯塔省扩张

[illegible]1875 年，智利企业在秘鲁的硝酸盐企业雇[illegible]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因为公共建设项目成本昂[illegible]用于支付贷款的海鸟粪的开采耗尽，秘鲁政府处[illegible]的外国公司，垄断硝酸盐的生产[illegible]于 1873 年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规定[illegible]军事联盟。

[illegible]智利公司资本家，加强了对安托法加斯[illegible]1878 年，玻利维亚依靠其与秘鲁的军事联盟，[illegible]出口征收高税收，这个行[illegible]1874[illegible]斯塔省的智利公司拒绝支付新[illegible]1874 年的共同协[illegible]玻利维亚两次拒绝了智利将争论提交仲裁的请求。

[illegible]智利企业将会使 1874 年的条[illegible]还是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智利军队[illegible]的日子，占领了安托法加斯塔省[illegible]智利将统治范围扩展到整个省。对战[illegible]在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做着无用的调解努力。[illegible]秘鲁和玻利维亚私下订立的秘密联盟关系，指责秘鲁[illegible]是不可容忍的，在 1879 年 4 月 5 日同时对秘鲁和玻利维亚宣战。

在这场被称为太平洋战争的战争中，智利的敌方联盟人口超过其自身的两倍；作为敌对一方的秘鲁，拥有一支可观的海军部队。但是智利仍[illegible]主要优势[illegible]不同，智利拥有稳固的中央政府，具有强烈[illegible]，以及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陆军和海军。智利还具有地利的优势，而玻利维亚军队需要翻越安第斯山脉，秘鲁军队则需要穿越阿塔卡马沙漠。

虽然三方政权都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智利的情况没有其敌人那么[illegible]。更重要的是，智利得到了英国资本家利益集团的有力支

持，他们知道大量英国投资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战争的成败。智利获得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的硝石产地，[illegible]将使英国资本家感到满意。英国资本家也在玻利维亚和秘鲁投资，但是当智利政府坚持偿还其所欠债务的时候，秘鲁和玻利维亚却[illegible]英国贷款。除此之外，秘鲁有[illegible]硝石地区[illegible]国有化，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

在英国的帮助下，智利赢得了1883年的太平洋战争，并且使秘鲁接受了它提出的条件。根据《安孔条约》(Ancon，1883年10月20日)，秘鲁永久割让塔拉帕卡省给智利，塔克纳省(Tacna)和阿里卡省(Arica)在10年内由智利占有，在此之后将由全民投票来决定这两个省的最终命运。但是公民投票从未进行过，智利不肯放弃这两个省。直到1929年，最后秘鲁收复了塔克纳省，阿里卡省则归了智利。玻利维亚在1884年4月玻利维亚和智利签订的停战协定中，事实上承认了将它的沿海省份安托法加斯塔省割让给智利，但是此后很多年，双方没有[illegible]签署正式条约承认割让。1904年，玻利维亚与智利签署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智利同意支付玻利维亚一定的补偿费用，并建造连接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La Paz)和阿里卡港口的铁路线。这条铁路在1913年竣工。

太平洋战争的余波

智利在与秘鲁谈判的过程中，持续动用武装力量与阿劳加纳人(Araucanians)清算旧账。阿劳加纳人从殖民地时代起就一直对侵占自己土地的白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经过两年反对不平等待遇的战役后，阿劳加纳人被迫承认失败并且签署条约(1983)，条约[illegible]把他们安置在保留地，但是保留了部落的政府和法律。1880至1882年的征讨阿劳加纳人运动，把智利南部的边境界限延伸到一个高原丛林地区，并在那个地区激起了活跃的土地投机买卖和殖民化运动。

太平洋战争在经济和心理上对秘鲁造成了巨大打击，并使玻利维亚前所未有地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智利却变成了西海岸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大量的硝酸盐矿和铜矿，这些矿产是它经济的主要依

但是这些矿产的大部分很快就会落入外国人的手中。1881年，智利政府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将塔拉帕卡省的硝酸盐矿归还给那些持有秘鲁政府发的国有化补偿证书的私人所有者。

在战争期间，由于智利将如何处理那些财产存在着不确定性，因而国有化补偿证书大幅贬值，直至跌到票面价值的零头。投机者，主要是英国人，大量买进这些贬值的证书。1878年，英国资本只拥有塔拉帕卡硝酸盐矿的13%，到1890年，持有量已经上升到70%。英国人不仅通过建立公司直接开发硝酸盐矿，而且通过贷款、为硝酸盐矿企业活动提供资金，投资铁路建设，投资其他或多或少与硝酸盐有关的公司来加强对硝酸盐矿的渗透。一家叫做硝酸盐矿铁路公司的英国铁路公司垄断了塔拉帕卡的运输，公司由约翰·托马斯·诺斯(John Thomas North)控制，支付的红利高达20%至25%，而相比之下，智利国内的其他铁路公司只有7%至14%的利润。

智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曾是阿塔卡马矿区工业铁路联合企业的开创者，对于外国的接管他们几乎没有抵抗。由于缺乏自由派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加上智利资产阶级的资金相对缺乏，以及智利寡头政权和英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智利硝酸盐矿和铁路所有权转向英国人手中的进程大为加速。这一进程也把智利的矿主转变为满足于从英国公司的利益中分红的依附型资产阶级。

但是在智利其他一些方面，战争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活力，并且动员了当地制造商和工人，奋起要求进行选举改革；1884年，选举的财产资格以识字测试代替。因为大多数的智利男性是不识字的季节性农场工人(rotos)和佃农(inquilinos)，这个改变并没有实质性增加参加投票的人数。直到1915年，在350万人口中，只有15万人参加投票。但是这又促成了1886年何塞·马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总统在选举中取胜，他就职时提出了一整套设计完美的由国家指导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到19世纪80年代，受到太平洋战争的刺激，工业资本主义在智利扎根了。除了消费品工业——面粉厂、酿造厂、皮革厂、家具厂等，还存在为矿产业、铁路和农业服务的铸造厂和造

铁企业。巴尔马塞达力图限制和扩大这种不同的经济民族主义。

巴尔马塞达的民族主义政策

巴尔马塞达就职时，政府收入处于空前高涨时期（从太平洋战争前的大约每年1 500万比索至1887年的大约4 500万比索）。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硝酸盐矿的出口税收。当他担心随着硝酸盐矿的减少，这种资源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少时，巴尔马塞达明智地打算用这些资金来发展基础设施——如果硝酸盐矿哪一天消失，这些设施还会留下来。因此，公共工程在他的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1887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实业和公共工程部门，部门花费大量资金扩展和改善电信和铁路系统，建设桥梁、道路和码头等。为了给智利提供技术工人，巴尔马塞达还慷慨地资助公共教育。在他的执政任期内，智利学校的总入学人数4年间有了极大的提高，从1886年的7.9万人上升到1890年的15万人。他还赞成提高工人工资，但他的劳工政策却常常前后不一致；在外国和国内矿主的强烈压力下，他也曾多次派遣部队镇压罢工。

巴尔马塞达计划的核心是他决定要实现硝酸盐工业的“智利化”。在国会的就职演说上他宣称，他的政府将会考虑采取措施“把目前主要使外国人受益的工业国有化”，这明显是指硝酸盐工业。巴尔马塞达的策略后来出现改变，他鼓励智利私有资本进入硝酸盐矿的生产和出口，以阻止外国控制的硝酸盐企业联盟的形成，因为这种联盟企图通过限制出口获取利益，这便与希望保持较高产量以收取更多出口税收的智利政府利益发生了冲突。1888年12月，他谴责智利精英阶层缺乏企业精神：

> 为什么被引进的贷款和资本在我们大城市的各种投机买卖中停滞不前，却让外国人在伊基克(Iquique)建立银行，把塔拉帕卡的硝酸盐开采留给陌生人？外国人开采这些丰富的资源，从我国的财富中得到利润，用在别人的土地上，送给那些我们不认识的

人。[illegible]我们所需要的自己土地上的宝藏、我们的财产和财富。

[illegible]铁路公司[illegible]货物运输费减少了硝酸盐矿的产量[illegible]。为此，[illegible]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结束了英国硝酸[illegible]铁路公司[illegible]。他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英国硝酸[illegible]的敌意，比如诺思，他和智利精英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并[illegible]了[illegible]自由主义政治家作为其法律顾问。

[illegible]有许多国外敌人一样，巴尔马塞达也有着诸多的[illegible]敌人[illegible]、对他进一步限制教会权力的计划[illegible]。由于他的公共[illegible]了农产品[illegible]，这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土地贵族[illegible]对他建立国家银行并垄断货币发行的建议表[illegible]通过货币发行而获得收益，但这种不受控制的[illegible]发行会导致通货膨胀，并使办理抵押贷款的地主和出口商受益[illegible]政治团体，自由主义者和保守者，都反对他利用中央政府作为经济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工具。

这个时候，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成堆，巴尔马塞达的群众基础也在缩小，这更加重了他政治上的困难。到 1890 年，外国对铜和硝酸盐的需求减少了，而且在世界市场上出现过剩，价格出现下跌。英国的硝酸盐利益集团通过形成企业联盟减少生产量来应对这次危机。硝酸盐和铜的产量及出口的减少使国内的出口税收锐减，还造成了失业的增多和工资的下降，甚至通货膨胀也在降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结果导致 1890 年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和硝酸盐矿地区爆发一系列大罢工。尽管巴尔马塞达同情工人，不愿意用武力对付他们，但是在国内外雇主的压力下，他最终还是派遣部队镇压了罢工。这些镇压措施招致在后来巴尔马塞达与其敌人的最终对决中，工人阶级对总统的态度冷漠甚至充满敌意。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巴尔马塞达没有什么牢固的盟友支持他。他热切地促进工业资本家集团的发展，但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矿产

利益集团更加紧密地与英国资本结合在一起，或者直接变成了英国资本，他们与银行家、牧师及地主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发展经济计划。反对者还动员了议会的力量，使巴尔马塞达在议会中得不到过半数的支持，并迫使他废除议会制政府，回到了1833年宪法下的总统独裁制度。他行动鲁莽，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动员群众的力量，这就正中了正在准备内战的敌人的下怀。

1891年1月7日，议会领导人以合法性和宪法的名义正在发动反
260 对总统的叛乱。接着，当时由出身贵族的军官领导的海军迅速表示支持叛乱，他们占领了北部的港口和海关，并在塔拉帕卡的重要港口伊基克建立了自己的首都。

所有的英国企业积极地支持叛乱。在各地，正如英国大使所写下，"我们的海军军官、瓦尔帕莱索和所有沿岸地区的英国居民，都给叛乱者提供物质帮助，并承诺不再保持中立。"许多传统上支持他的工人，因为巴尔马塞达镇压罢工的行为而疏远了他，都保持中立，甚至有些人参加了由德国军官埃米·柯纳(Emil Korner)将军训练的叛乱军队。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失败的巴尔马塞达到阿根廷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891年9月19日，在他的法定任期结束的那一天，巴尔马塞达向自己的头部开枪，结束了生命。

智利第一个反帝国主义总统的死亡，使寡头统治的政权又重新复活，这是一个由地主、银行家、商人组成，与英国资本具有利益关系的矿业利益集团的联盟。一个新时代，即所谓的议会共和时代开始了。接受过往的经验，寡头政治现在更倾向于通过分成不同派系的议会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执行人。这种非集权的政府有益于维护乡村贵族及其盟友的利益。1892年通过的一个新法律，赋予了地方政府对地方和国家官员的选举进行监督的权力，这就加强了反对巴尔马塞达进步政策的地主、教士和政治头领们的力量。

议会制共和、外国控制的经济和工人阶级的成长

在议会共和时代，智利的经济越来越从属于外国资本，这从外债的

益增长和国内产业逐步成为外国所有的现象中反映出来。英国人在智利的投资到1890年达到了2 400万英镑，到1913年上升到6 400万英镑，其中的1 100万英镑变成了智利公共债务的一部分。同一时期，美国和德国资本开始挑战英国在智利的霸权。英国仍然是智利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美国、德国与智利之间的贸易快速增长。德国对智利的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向智利南部的移民潮一直在持续，这导致了受德国本土控制的小块殖民地的形成。智利经济从1890年代早期的萧条中复苏，带来了硝酸盐矿、铜矿和农业出口的增长，也使寡头阶级更加富有，但是佃农、矿工和工厂工人还是贫困如旧。工人数量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从12万人上升到了25万人，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这一阶层中逐渐流行。

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父”的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Luis Emilio Recabarren, 1876－1924)，在智利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觉醒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06年，雷卡瓦伦从一个矿区被选到议会，但因为他拒绝在圣经下宣誓而未就职。1909年，他组织了智利工人联盟，这是智利的第一个国家工会运动。三年后，他建立了社会党——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政党，并担任它的第一书记。

智利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军事能力在不断增加的罢工浪潮中表现出来。1911年到1920年之间，共发生了大约300次罢工，超过15万工人卷入其中。很多罢工被传统的残酷方法镇压，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死亡。

巴西的政治和经济

独裁统治的垮台

1888年奴隶制的废除，也破坏了它的姐妹制度——君主制，后者长期依靠农场主阶级的支持，尤其是北部的农场主，他们把君主制当做奴隶制度残存的保障。1888年以前，共和党的主要支柱是咖啡利益集团，他们对帝国政府给予甘蔗种植园主的好处感到愤慨，并希望获得与

他们经济势力相称的政治权力。现在，奴隶制已被废除，再加上政府并没有对他们的损失给予补偿，过去反对废除奴隶制的咖啡种植园主也加入了共和运动。在过去的67年中，为地方精英利益服务的寡头政治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共和宣言》发布后，唐·佩德罗二世前往欧洲的离别场景。这幅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绘画表明，很多巴西人，包括共和的支持者，对被驱逐的帝王的尊敬和爱戴。

共和主义和与之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也使官员阶层中发生了许多改变，他们不满帝国政府对他们的忽视和不公待遇。很多年轻官员属于新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是贵族后代，但是不接受父辈们的道路。实证主义，正如刚才所说，变成了“军事学院的信条”，一名受欢迎的年轻数学教授贡斯当·博特略·德马加良斯（Benjamin Constant Botelho de Magalhaes）对其进行了出色的阐释，他是这个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忠实信徒。实证主义理

[illegible]有[illegible]独裁的共和制度，并且不信任大众，这些正好满[illegible]，进步官员和商人—农场主的需要，这些人希望[illegible]现代化，但不希望对[illegible]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做出巨大的调整。1889年11[illegible]，由[illegible]里亚诺·佩肖托(Floriano Peixoto)元帅领导[illegible]事起义推翻了政府，宣布成立以德奥多罗·达丰塞卡(Deodoro da [illegible]seca)[illegible]临时首脑的共和国，并且将唐·佩德罗二世流放到法国。

[illegible]就像[illegible]的革命一样，共和革命也是自上而下的；政变([illegible]tat)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也没有引起民众的热情。权力[illegible]紧紧掌握在[illegible]人、地主和军队上层的代表们手中

[illegible]统治者迅速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结束军队体罚的法令，[illegible]识字代替[illegible]财产(因为财产和识字通常是一体的，这个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illegible]选举人数)来决定投票资格，以及建立世俗国家和公证结婚等后续法令。

新生共和国

起义后两年，[illegible]召开了一次选民议会，起草新生共和国的[illegible]。宪法规定成[illegible]一个联邦制和总统制政府，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最主要的争论是：一些党派希望各州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另一些则[illegible]担心过度联邦化会导致分裂的结果。统治着富有的中南部地区的咖啡利益集团，希望通过中央权力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制宪大会中，城市商业团体的代表主要是律师，赞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为中央权力会促进工业发展，有助于建立民族市场，并且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

妥协的结果是一个仅保留了头衔的联邦制。20个省实际上都变成了自治政府：官员由民众选举，有权决定出口税收(对于像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这样富有的州是项有利可图的特权)，有权保留民兵。联邦政府被授予控制关税和进口税收入之权，总统拥有最大的权力：可以任命内阁部长和其他高官，宣布戒严状态，当发生威胁到政治体制的

事件时，可以调用联邦军事力量干预各州事务。宪法宣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保证出版、演讲和集会的自由。

如果说这些自由与现代化运动所触及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关系，那么它们对于大部分国家地区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农场主，也就是先前的奴隶主，实际上垄断了国家的主要财富土地。垄断土地使他们能够控制了乡村人口。封建和半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以及佃农为个人承担军事服务的义务，在偏僻地区，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大的内地军队头目(coroneis)拥有全职私人士兵(jaguncos)组成的军队，彼此之间相互发动战争。

在这种持续的缺乏安全感和社会分裂的中世纪气氛中，救世主式的运动出现了，反映了被压迫的巴西腹地人(sertanejos)对[illegible]的渴望。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发生在巴伊亚境内，这里的干旱[illegible]作。在这里，劝世者安东尼奥(Antonio Conselheiro)在卡努杜斯(Canudos)的废弃牧牛场建立了定居点。安东尼奥反对私人财产，他要求加入他神圣团体的人都要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他承诺在他的圣城里，通过分享"失落的圣巴斯蒂安(Sebastian)"(1478年在非洲失踪的葡萄牙国王，但是会作为救世主转世)的财富，或者通过瓜分敌对地主的财产，将会拥有一个繁荣的未来。

尽管他带有宗教性色彩，但这种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集中存在，是大地主和国家政权无法容忍的。当1896年，腹地人轻松地击败了派来镇压他们的本州军队，州长要求联邦政府给予帮助。为了粉碎卡努杜斯男人、女人和儿童艰苦卓绝的反抗，联邦军队共发动了四次攻击，在最后一次进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一部由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1856—1909)撰写的巴西文学巨著《腹地》(*Ossertos*)，记录了保卫者的英勇和胜利者的罪行。它还向城市精英展示了巴西现实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经济革命

一个巨大的历史鸿沟把荒凉的腹地——卡努杜斯悲剧发生的地

与城市扩张相伴而来，城市中有雨后春笋般成长的银行、股票交易和公司。佩德罗·卡尔蒙(Pedro Calmon)写道："在里约热内卢，有大量地出现了新的角色——商业代理、繁忙的律师、各行各业的投资人、新的政治家等这个时代的人物。"甚至，巴西一些大型城市中心的外貌也有了改观。这些改变在联邦首都里约热内卢最明显。在1902年到1906年间这里变成了一座健康而美丽的城市。这一时期，省长佩雷拉·帕索斯(Prefect Pereira Passos)无情地拆毁了狭窄的旧街道，建设了宽阔的现代大道。出色的科学家奥斯瓦尔多·克鲁兹(Oswaldo Cruz)与黄热病和天花进行了斗争，通过填满坑塘沼泽，提供充足的清洁饮用水和下水道系统，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共和政权的经济政策面对着来自不同团体的压力：农场主阶级、银行资本家和商人。很多农场主，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处于不利位置，要求得到补偿和贷款以适应新的工资制度；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认为国内必须发展一个工业基地以使巴西摆脱落后状况，因而要求实施保护关税、建设基础设施和实施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政策。临时政府初期，这些希望得到了财政部长鲁伊·巴尔博萨(Ruy Barbosa)的强力支持，他相信工业是一个能够铸造巴西"智慧和独立民主"的坩埚。最后，在建立共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获得威望和影响力的军队，也要求增加武装部队的财政拨款。这些不同的需求远远超过联邦和州政府的收入。

联邦政府最初试图求助于印钞机以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并允许私人银行仅仅以巴西未来的信用作为担保发行货币。两年后，纸币的流通量翻倍，巴西货币单位米尔雷斯(milreis)与国外货币的汇率灾难性地猛跌。因为客观的经济条件(狭小的国内市场和缺乏足够的技术基础，包括其他一些因素)限制了巴西增长的真正潜力，大多数新资本被用于高度投机的目的，包括建立皮包公司。

最终的经济崩溃给很多投资商带来了毁灭，工人失业和工资降低，副总统弗洛里亚诺·佩肖托元帅发动政变，取代了总统达丰塞卡。在短期内，城市中产阶级团体因此受到了较多影响，通货膨胀持续高涨。

很多进口产品的价格增长到几乎无法购买的水平，但这却刺激了巴西制造业的发展：1890年到1895年间，制造企业的数量几乎翻倍。

但是一次带有强烈贵族和独裁色彩的对舰起义的镇压，却增加了佩肖特总统对圣保罗州的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依赖。圣保罗的咖啡寡头们试图用他们的权力遏制城市中产阶级的上升。寡头政治家们不再信任中产阶级快速工业化的政策，并且责怪金融的不稳定使得共和国在头几年遭到烦扰。1893年，老牌农场主的寡头政治家们重新联合组建了联邦共和党，其自由主义党纲支持联邦主义、财政责任和有限政府。而之前他们的分裂曾使中产阶级和军队结盟暂时占据了上层的地位。由于他们控制了选举机器，因此轻易地获得了总统宝座，又一次将咖啡利益集团的统治制度化，而城市资本家在政治活动中降到了次要地位。

继位的自由派政府把农业出口放在首要位置，并且完全接受了劳动的国际经济分工，从而导致巴西对外国制造业的进口依赖。曼努埃尔·费拉斯·德坎波斯·萨莱斯(Manuel Ferraz de Campos Sales)总统(1898－1902年在位)宣布："是我们选择正确道路的时候了；在那条路的尽头，我们必须努力出口我们生产的比其他国家更好的所有产品，并且进口所有别的国家生产的比我们好的产品。"这个信条确立了从帝国到整个共和初期的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自由主义者大量减少公共工程支出、增加税收，竭尽全力回收货币以提高巴西的国际信用，并且提供新的贷款来填补政府收入赤字。

咖啡成了国王。1880至1889年之间，巴西生产了世界咖啡产量的56%，从1900至1904年，这个比例达到了76%。咖啡最有力的竞争者——橡胶，在巴西1901年的出口中只占28%。曾经统治巴西经济的糖，现在只占出口量的5%。米纳斯吉拉斯，尤其是圣保罗，变成了主要的咖啡生产地区，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下降了。由于享有巨大的优势——有名的肥沃而疏松的红土，大量的移民劳动力和靠近重要港口桑托斯，圣保罗人(Paulistas)收获了国内咖啡产量的60%。

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咖啡潮，在1896年后很快出现了生产过量、价格下跌和存货积压。因为咖啡树在种植

年后才有产量，所以在价格下跌后仍能感受到咖啡种植在向圣保罗州西部边境扩张。1896至1900年间，仅在圣保罗，用于生产咖啡的树的数量就从1.[illegible]亿上升到5.7亿株。大型国际咖啡贸易公司控制着世界市场，它们在每个季节的高峰期时以低价购入，当周期性缺货而价格上升的时候，再把存货卖出去，这些做法增加了种植者的困难。

种植者强烈要求帮助，圣保罗政府采取了措施，在1902年迈出了咖啡“保卫战”的第一步，在未来五年内禁止种植新的咖啡树。其他的措施很快也被证明是必要的。面对1906年丰收的庄稼，圣保罗为了保护本州的经济命脉而实施了一个支持咖啡价格的计划。由于得到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银行资金支持，最终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圣保罗购买了几百万袋咖啡，阻止它们进入市场，使咖啡价格保持在一个有利可图的水平。购买持续到1907年；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存货在市场波动很小的情况下逐渐全部卖出。这次运作的主要获利者是国外商人和银行，因为他们控制着为了变现购买咖啡存货而建立的咖啡委员会，他们渐渐把存货处理掉，并获得大幅利润。问题只是被暂时解决，但必定会以更严峻的形式再度出现。

稳定物价的措施计划，有利于种植咖啡的州，却牺牲了其他州的利益，它反映了咖啡种植者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坎波斯·萨莱斯总统任期间，这个支配地位被所谓的“州长政治”(politica dos governadores)制度化。它的实质是维持一个原则，即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两个州(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实际上具有联邦政治和选择总统的垄断权。因此，从1894至1906年的前三任民选总统都来自圣保罗；从1906年到1910年的两任总统分别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

反过来，其他州的寡头统治者被赋予司法权限内几乎完全的行动自由，只有在有利于当地寡头政治利益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会使用管辖权进行干预。各州统治者之间的私下讨论决定了总统的人选，总统选举只是重复之前的决定，因为只有不到2%的人口有选举的资格。在1930年之前，没有哪位官方指定的总统候选人会输掉选举。同样互

惠互利的安排还存在于州长和城市或乡村的地方政治头目(coronels)之间，这些人汇集当地选票而选出州长；作为奖赏，他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地内不受约束。

尽管官方偏向支持农业，但工业仍在继续增长。到1908年，巴西
265 以它超过3 000个的工业企业而引以为荣。国外公司控制着银行、公共工程、公用事业、交通和进出口贸易等领域。另一方面，制造业几乎全部由巴西本地人和永久移民经营。这个国家工业主要集中在4个州：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和南里奥格兰德。重工业并不存在；过半数的企业是纺织厂和食品加工厂。很多"企业"是小作坊，只雇佣几个工匠，或者用原始技术进行生产，而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巴西人仍然进口高质量的产品。工业产品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束缚，其中包括在乡村占优势地位的半封建生产关系，极度贫困的农民极大地限制了国内市场发展，缺乏有技术和文化的劳动力，以及大地主和外国利益团体对工业发展的敌意。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出现了，他们注定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部分巴西无产阶级是从佃农和小庄园农民演变而来的，他们为了躲避惨淡的贫困和地方政治头目的暴政而进到城市；但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是由大批欧洲移民组成的，每年有10万至15万新移民来到这里。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通常是难以忍受的。童工很普遍，年纪达到12岁的儿童就能被合法雇佣了。一些技术工人每天工作9小时，而很多工种的非熟练技术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工资少得可怜，而且经常用代币券代替，这些代币券只能在公司的店铺兑现。完全没有任何立法来保护工人免遭失业、老龄或者生产事故的伤害。

在欧洲移民中，有很多激进分子，有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背景，他们帮助组织巴西的劳工运动，并赋予它激进的政治方向。工人中间民族和宗教的不同、大量的文盲，以及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的不和，都阻碍了工会运动和劳工党的成长。

但是工会在1900年后仍迅速成长，代表了该国大多数工会的第一

[illegible]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在1906年举行，为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大会的一个成果是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工会组织——巴西劳工联盟。它组织了地区罢工，当权者[illegible]逮捕劳工领袖进行镇压，并遣返移民，把反对者送到通往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铁路建设工地强制劳动。“社会问题是警察要处理的问题”这句话经常被用来总结巴西自由派政府的劳工政策。

中美洲的政治和经济

19世纪[illegible]之一时期，有三个中美洲国家值得特别研究——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由于这里大量生产两种需求量逐渐增长的产品咖啡和香蕉，因此也就发生了重要的经济变化。变化包括实行广泛的自由主义改革，但却完好地维持着现存的阶级和种族关系。这个自由主义纲领也产生了新的依赖：只出口一种或两种主要产品，外国控制着主要的自然资源，并且接受美国的政治霸权。在所有的地方，变化都伴随着土地所有制的集中，劳动力剥削的加剧，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日趋扩大的鸿沟。

危地马拉，1865－1898

1865年拉斐尔·卡雷拉去世之后，对危地马拉的保守统治来说，是持续六年的自由主义政治和军事挑战。自由派对世界经济的变化，尤其是欧洲对咖啡的需求大量增长，以及对所需的危地马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作出了回应。1871年，自由派夺取了权力，两年之后，充满活力的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成为总统。巴里奥斯和他的继任者都下定决心要巩固国家政权，征服相对比较自治的原住民社区，并且建立土地、劳动力和商品的统一市场。

他们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包括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转变。意识形态改革接受了欧洲和美国流行的白人至上主义学说，实施“白种化人口”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它拒绝了教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义，坚定支持科学和物质进步的信仰。这就要求教育的世俗化和扩大化。然

而，公共资金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公共教育；直到1921年，危地马拉的文盲率仍超过86%。为了降低教会的权力和权威，自由派政府将教会的土地国有化，结束了它的特权，并且确立了宗教自由和世俗婚姻。

经济转型涉及三大领域：土地所有制、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对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危地马拉的传统特产，靛青(indigo)和胭脂(cochineal)，已经被中小生产者种植了上千年；然而，咖啡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但土地却集中在相对较少的人手里。在巴里奥斯总统任期内，"农业改革"开始了，目的是使咖啡种植者得到可用的土地。巴里奥斯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没收充公。然后是将未开垦的国家所有土地，进行分割并且廉价卖出，或分给私人利益集团，最后是原住民社区的土地。法律要求为征收提供合法基础的私人财产提供契证。这个过程中，国内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小咖啡种植园主，他们可以购买或者从政府获得土地。然而自由派政府热烈欢迎的外国移民，也从新的立法中获得好处。到1911年，外国人(主要是德国人)拥有的土地几乎生产了危地马拉一半的咖啡。1926年，土地所有制的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只有7.3%的人口才拥有土地。

土地改革帮助达到了自由主义纲领的另一个目标：国内外新的咖啡种植团体得到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很多高山地区的土著失去了土地，移民到海岸附近新兴的咖啡种植区域。最常见的劳工制度是债务雇佣制——在危地马拉法律下是合法的，世袭的债务将印第安人拴在了种植园(fincas)中。还有一些当地人被招募为工人，他们从山里走出来，在大庄园和种植园做季节性劳工，这样除了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外，可以多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巴里奥斯还恢复了殖民地时期的派遣制度(mandamientos)，在这个制度下，印第安人被要求接受种植者的工作。为这个目的，地方官员保存当地人的登记材料，这些登记材料还可用于招募他们服兵役和从事公共工程。那些不能支付两个比索人头税的大多数人被要求从事道路修筑工作(每年两周)。

19世纪末期，印第安占全国100万人口的70%，他们自然反抗这

和[illegible]自由派的屠杀，有时还举行公开的地方起义。但是面对着准备铲除它们的无情的军人政府，他们通常通过利用“弱者的武器”存活下来，这是为了减少被[illegible]的危险而进行的抵抗方式。在危地马拉的乡村，这些原住民社区依靠根植于殖民地天主教传统的独立的宗教性兄弟会组织(guachibales)，维护他们共同的文化认同，保卫他们的自治权，并保持社区风俗、本土语言以及反抗自由主义那种不受约束的市场势力的同化政权的宗教仪式。

尼加拉瓜，1870－1909

中美洲联邦在1838年垮台后，尼加拉瓜20年的历史同样充满着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自由派邀请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来帮助他们，接着沃克试图在中美洲建立自己的个人帝国，于是自由主义者又不被信任，保守主义者在几乎没有反对的情况下统治了尼加拉瓜30多年(1857－1893)。

尽管早在1848年，咖啡就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直到1870年，尼加拉瓜的主要经济活动还是局限在养牛业和温饱型农业。原住民社区仍然拥有大量土地，独立的小农阶级依靠公共土地生活，债务雇佣制很少见。在大西洋海岸，自治的莫斯基托王国(Mosquitia)从1678年开始受到英国保护，这里居住着传统米斯基托人(Miskitos)、苏木人(Sumus)和非裔克里奥尔人(Afro creoles)，他们在英国和美国所有的公司的香蕉种植场、木材厂、金矿和商业码头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但是世界市场对咖啡需求的意外增长，使得尼加拉瓜的一些民族主义精英产生对土地的需要，他们需要适合耕种咖啡的土地，除此之外，还需要廉价的劳动力。

从1877年开始出台的一系列法律要求这些村庄卖掉公社土地，并把原住民和印欧混血种人赶出他们的土地，渐渐把他们变成一个依附的雇农或者佃农阶级。流浪者(vagrancy)法的通过和允许征用当地人作为农业和公共劳动力的这项法律，同样确保了咖啡种植者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法律激起了一次较大的原住民起义——公社社员

(Comuneros)战争(1881)，这次起义最终以印第安人的失败告终，在随后进行的凶残镇压中，5 000 人被杀。

由咖啡种植者组成的新阶级，对尼加拉瓜 1857 年以后一直掌握权力的保守的养牛业主的传统方法极为不满。1893 年，咖啡种植者们发动了起义，何塞·桑托斯·塞拉亚(Jose Santos Zelaya)掌握了政治权力。塞拉亚作为一名主张现代化的独裁总统连续统治了 17 年。他进行道路、铁路、码头设施和电信通信的建设，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他重新组织脱离教会和政府领导的学校，开发了公共教育。像同时代的其他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领导人一样，他相信外国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并给予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公司以大量的优惠。到 1919 年，美国控制了大部分的铁路、金矿、木材和香蕉生产，其中香蕉是尼加拉瓜财富的主要来源。

萨尔瓦多，1876－1911

到 19 世纪中叶，萨尔瓦多已经经过了两个经济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是由可可主导，它的繁荣在 17 世纪衰落了；第二个经济周期是来自靛蓝，它在 19 世纪后半期进入衰退下滑期，首先是因为来自其他生产地区的竞争，其次是由于人造染料的发展。它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出口作物，咖啡最终登上了出口排首位的宝座。咖啡种植大概开始于独立时期，但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迅速扩大。像中美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咖啡的兴起是以土著人土地的征用和侵占为标志的——以私有财产和物质进步的名义进行，因为大多数最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都被原住民公社拥有。

靛青每年都可以种植和收获，但咖啡树在种植的头三年没有产量。因此，种植者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或者贷款，而拥有资本或者贷款的人都是大地主，他们已经通过种植靛青变得非常富有。为了帮助大地主得到种植咖啡的土地和劳动力，政府在 1856 年通过的一个法令宣布，如果一个印第安人村庄公有土地的三分之二没有种植咖啡，土地所有权就会被移交到政府手中。后来，自由派总统和军事强人

[illegible]·[illegible](Rafael Zaldivar)，通过1881年的法律直接冲击[illegible]土地[illegible]有权，法律命令所有的公社土地必须在共同拥有者[illegible]的咖啡种植者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illegible]了道路)；13个月后，他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所有[illegible]有权。新的[illegible]法不仅损害了这些社区，还损害了印欧[illegible]的利益。这些农民通常依靠地方政府的公共土地[illegible]地带农场和林地)作为他们谋求生存的重要依[illegible]187[illegible]年，[illegible]人依靠公有的公社土地生活，这些土地占据耕地总量的40%[illegible]

[illegible]有权迅速集中到土地寡头的手中，这些人[illegible]"，这个数字尽管不是一个确切的数据，但象征性[illegible]这一现实，他们控制着萨尔瓦多的经济和政府。[illegible]里，大地主用他们自己的私人军队对付拒不服从[illegible]农民。188[illegible]年和1889年的政府法令将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整合成公[illegible]乡村[illegible]，后者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国民警察。1912年，建立[illegible]西班牙[illegible]为榜样的国民警卫队(Guardia Nacional)。和国民警察一样，[illegible]卫队在乡村驻扎，并为大地主提供治安保护。

对于[illegible]人，[illegible]繁荣的社会结果是灾难性的。少数失去土地的农民[illegible]在种植园或者新庄园，作为雇农，他们会得到一个居住的地方，以及耕地或者菜地，在那里他们可以种植一些口粮作物。[illegible]古老的靛青或者糖的大农场需要大量的长期劳动力，而咖啡种植[illegible]劳动力是季节性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咖啡种植园主是依靠雇佣劳动力。[illegible]这决定了多数萨尔瓦多农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作为[illegible](squatter)在小地块上耕种，或者在种植园做雇[illegible]，但是他们的小地块并没能为他们的家庭提供生存必需品。因此，他们必须在不同的作物收获季节更换工作，咖啡收获季节就在咖啡种植场工作，[illegible]或者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收棉花，最后再回到自己的耕地，收获[illegible]。这种不稳定的迁移方式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

联邦战争余波造成的骚乱在1870年结束了，这个时候委内瑞拉19世纪最强有力的统治者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开始掌权。像他的父亲一样，布兰科极其擅长蛊惑人心的讲演。他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是寡头政治的敌人，反对神职人员涉政，是虔诚信仰科学和进步的实证主义教义的人，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文明人”的“注重实际的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他与加拉加斯的保守派商人阶级、地区考迪罗，以及国外经济利益团体达成协议，其中国外利益团体从他雄心勃勃的道路、铁路和电信建设计划中获益。结果，古斯曼·布兰科想要建立资本主义委内瑞拉的梦想被证明是一个幻想；在他统治的20年后，委内瑞拉还是一个乡村式的、单一农作的和依附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里，考迪罗们在展开权力斗争时，依然猖獗横行。

他的制度被称为“考迪罗的全国联盟”，当他开始担任最高领袖的时候，那些阿谀奉承的国会和媒体称他为“杰出的美洲人”。1864年宪法定期性地被加强中央集权新宪法所取代。尽管古斯曼的独裁与委内瑞拉历史上其他独裁者相比较温和，但他也毫不犹豫地对他的敌人实行镇压。

借助他与各地军阀的协议，古斯曼的统治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尽管在1879至1888年间有几次大规模的反对他的暴动，并且在整个统治时期一直贯穿着地方起义）。在他掌权后不久，他和加拉加斯一个强大的商人团体共同建立了一个信贷公司(compania de crédito)。公司给他提供了开始一项改进交通和通讯计划所需的资助。1870至1874年间，51个修路项目开始动工。但是当地资金不能满足需求，古斯曼谋求与外国资本合作，但由于这个国家近代历史上经常发生内战，其他国家不愿意向这样一个国家投资。1879年，他获得了同英国投资者团体签署的第一个外国合同，内容是建设一条连接加拉加斯和主要港口拉瓜伊拉(La Guaira)的铁路。到他离职的时候，委内瑞拉已经有11条铁路完工或者正在建设中，所有的铁路都是服务于进出口贸易，

[illegible]拉加旺、目的是把农业及矿业地区同港口连接起来。考虑到对委内瑞拉不利的贸易条件——出口产品价格会下降，而进口制造品价格会上升，古斯曼主持修建铁路网的后果是增加了委内瑞拉经济的依附性，[illegible]了[illegible]，并且留给国家大量未偿付的对外债务，后者迟早会带来外国干预的威胁和统治权的丧失。

古斯曼[illegible]人[illegible]政的政策导致了教会力量的进一步衰弱。[illegible]个体公民身上的"多余税负"已经被废除。在古斯曼[illegible]下，教[illegible]特权(fuero)结束了，世俗结婚和出生死亡的注册[illegible]了，修道院和神学院被关闭了。教会禁止继承地产，[illegible]多教会[illegible]。古斯曼还试图禁止黑人移民和亚洲人移民，他[illegible]吸引欧洲人移民。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委内瑞拉[illegible]依然是一个[illegible]"白人"的富有的少数人统治着大多数"黑人"的社会。

在其他方面，古斯曼·布兰科的发展计划几乎没有引起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变。1894年，250万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在乡村；只有三个城市人口[illegible]万。大多数的在职人员都在从事农业劳动；小型现代工业仅存在于[illegible]业和纺织业这样的轻工业中。雇佣了约5万名工人的手工业店铺在经济上还是举足轻重。

古斯曼·布兰科去世后，接下来的是十年动乱，来自安第斯塔奇拉州(Andean state of Táchira)的精力充沛的年轻考迪罗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和他的搭档(compadre)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夺取了政权。他的搭档是富有的养牛场主和咖啡种植园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的上台反映了日趋增长的安第斯咖啡种植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尽管，他也想延续古斯曼·布兰科的中央集权政策，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军队代替旧时私人或政府的警卫队。但由于咖啡价格下降导致政府收入减少，他的军事改革计划失败了。这造成了地方考迪罗们一系列的叛乱，镇压叛乱花费了政府大量气力，还引发了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外国封锁了委内瑞拉的港口，使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海关税收大量减少。

卡斯特罗接管的是一个被战争与战和长期独裁所毁坏的国家。德国和英国政府要求立即支付未偿还的债务和在委国内战中遭受的损失，但是委政府却支付不起。1902年12月，尽管卡斯特罗表示愿意协商，两个国家还是派出了一支由12艘军舰组成的英德舰队进入了委内瑞拉水域，他们将执行夺取或者毁坏委内瑞拉舰队并封锁港口的命令。英德舰队的强大火力很快就击退了委内瑞拉海岸炮队的攻击，占领了几个委内瑞拉的港口。战斗双方实力的不平衡，封锁港口造成的灾难性经济影响，以及委内瑞拉内部一些地区的持续动乱，使和解变得十分必要。因此，卡斯特罗请求美国大使出面调解，以达成和解协议。协议条款要求委内瑞拉把30%的海关税收作为赔款以解决争端，要求重新建立交战双方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和解协议没有满足委内瑞拉自身损失获得赔偿的要求。

在卡斯特罗掌权的最后时期，他受到外国政府同美、英、荷、法和德国之间冲突的严重干扰，这些冲突往往是因为他坚持外国人必须服从委内瑞拉的法庭和法律。随着卡斯特罗健康状况的恶化，内部反对势力，尤其是美国支持的胡安·维森特·戈麦斯，结束了卡斯特罗的政权，并开始了新的自由主义独裁统治。

哥伦比亚的政治和经济

270 1853年，自由派总统和自由派控制的哥伦比亚国会，起草了新的宪法，赋予男性以选举权，这个条款使一些自由主义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不识字的信教农民会投保守主义者的票。实际上，在大多数地区，投票者还是根据当地头目(gamonales)或者老板的意愿投票，所以新的选举法律并没有改变什么。

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者希望不使用殖民地的传统做法，如限制和垄断等。他们废除了政府对烟草的垄断，取消了省级税收中的什一税（迄今为止，它由政府收取但用于支持教会），对金子和其他贵重金属征收的“五一税”，以及国民政府的其他传统税收。各省也授权废除这些税收。为了补偿政府收入上的损失，国会采取了向个人收税的措施。

在手工业者们的支持下,自由主义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他们却忘记了盟友的关税保护需求。这在1854年引发了一次新的政治危机,即由何塞·玛丽亚·梅洛(José Maria Melo)将军领导的一场短暂的政变爆发,政变获得了手工业者们的支持,工匠们组成了工人部队来保卫革命。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将军们,抛弃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组建了私人军队,并在一次极短的战役中击败了梅洛。梅洛的手工业者盟友被关进监狱,还有[illegible]人被驱逐到巴拿马。最终以手工业者们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18[illegible]年,自由派进行了宗教和政治改革,并将这些改革推进到极[illegible]。[illegible]废除了强制性的什一税和教会特权,废除所有的宗教秩序,关闭[illegible]修道院[illegible],并没收了教会的财富。然而,其结果是教会的土地转到了私人手中,但对土地所有制度几乎没有产生一丁点的[illegible];[illegible]只是变成了世俗的农场主,促进了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集中。主要的土地购买者是自由派商人、地主和政治家,保守派也参与了对教会土地的掠夺。

1863年,[illegible]宪法全力推行联邦主义时,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达到了高峰。9个自治的[illegible]州变成了独立的国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拥有除了明确给予中央政府之外的立法权,中央政府因此变得越来越缺乏权威。直到1885年,自由派一直在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无政府主义[illegible]中执政:中央政府无力干预地方的革命,而这些地方革命却在颠覆或建立各州的政府。

经济活动反映了出口基地的要求,使哥伦比亚不断地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到1870年代,烟草出口严重下降,但是这个下降是因为咖啡、金矿和其他产品的出口造成的。咖啡变成了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但是咖啡的发展仍落后于巴西,巴西更多地依靠欧洲来的自由劳动力。在哥伦比亚,咖啡生产主要在桑坦德和昆迪纳马卡(Cundinamarca)的中心区域,它的生产是建立在传统的大庄园基础上,依靠在残酷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下雇工及佃农们的劳动。在安蒂奥基亚和卡尔达斯(Antioquiar Caldas)地区出现了稍微令人满意的情

况，其特点是大庄园和更开明的分成租佃制和小地块土地所有制相结合，以及以高产量为标志的运作。在这些地区，产生了20世纪的哥伦比亚咖啡工业起飞。

成为主要出口品的咖啡的发展，国内外商人和咖啡种植者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征收教会土地给贸易和投机买卖带来的利益共同创造的经济利益，需要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下达强制命令，并建设咖啡工业发展所需的铁路和全国性的设施。自由主义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排除了很多障碍，但是联邦制的过分作用又制造了新的障碍。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不仅是保守派，而且包括很多中间派的自由主义者都相信，政治和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1879年拉法埃尔·努涅斯(Rafael Nunnes)开始实施这一规划。

拉法埃尔·努涅斯、重生和千日战争，1880—1903

努涅斯以一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其政治生涯，并在欧洲从事了13年的咨询服务工作。他在1875年回国，于1879年当选总统，在一个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合党派的帮助下实施统治。1884年再度当选后，他迅速粉碎了一次激进自由派的起义，并宣布1863年宪法已经"不复存在"。1886年，新宪法颁布，宪法规定由总统任命的州长管理各个部门，以代替具有独立自治权的各州，把总统的任期延长至六年，建立了选举众议员的文化和财产资格认证制度，并规定了参议员实行间接选举。在这个宪法下，努涅斯通过自己或者代理人的统治，一直控制着哥伦比亚，直到1894年去世。

努涅斯的专制共和国的基础是其强大的常备军队和国家警察力量。该国早期的政权实质上已解散了正规军；由大地主用他们的佃农和雇工组成的私人军队，在联邦时期的起义和内战中进行战斗。这些地区私人武装和民兵的存在与努涅斯的统一全国军队计划发生了冲突。1886年的宪法规定建立常备军队，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拥有军队和武器。建立于1891年的国家警察，一直监视着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并

摧毁了反对政府的多次密谋。

努涅斯进行了两项主要的经济改革。他宣称贸易自由或者低关税是经济衰落和贫困的原因，而经济上的衰落和贫困造成了战争，因此，他建议用关税保护措施来刺激某些工业的发展。他相信这会产生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将在统治阶级和不识字的平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但是他对于这个计划的实行是缩手缩脚而且矛盾的。新政策获得了成功，为国内工业提供了适度的保护。

为了缓解当时处于破产边缘的政府财政压力，努涅斯的另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是在1881年建立了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力；国家根据需求提供货币供应，直到1890年，国家银行都管理得很谨慎，而在这之后，失控的纸币发行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是1899年发生的一场花费巨大的内战引起纸币发行泛滥，以至于到达这样一个程度，即印刷机来不及印出需要的纸币量，国家已被成千上万在流通中贬值的比索淹没了。

努涅斯时代被称为“重生”的时代，“重生”表现了自上而下的努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这个时代可以与俾斯麦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德国统一事业相媲美。在努涅斯的统治下，具备了形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在这点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建立了常备军队，以及国家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他拆除了内部的贸易壁垒，而适度的关税保护政策，又促进了内部市场的形成。国家银行，尽管后期存在着管理不当的丑闻，还是做出了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初步探索；而且政府还促进内部改善建设，尤其是铁路。最后，他正式否认非洲裔哥伦比亚人和原住民公社的存在，否认他们的所有权要求，并允许私人企业有权使用边境地区的土地。这些政策，加上咖啡出口的繁荣，共同造就了土地、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并为哥伦比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当他去世后，腐败、公然操纵选举、出版自由和选举改革上的分歧，以及咖啡价格的猛烈下降造成的经济衰退等因素，共同引发了政治危机，军队开始出面解决问题。面对一个完全不受欢迎的政府，自由主义

者充满自信，并于1899年发动了起义，引发了灾难性的千日战争。战争延续了三年，造成了大约10万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最终以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推动了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发展。这中间典型的是鼓励出口、外国投资，和诸如土地和地下权利这样的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但是，它是依靠强有力的，甚至是残酷独裁统治的巩固。独裁者们用他们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市场，控制着劳动力，使地方考迪罗臣服，并且占用原住民的土地。自由派的独裁巩固了政治权威，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地支撑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而这样的发展会让广大的民众受益。因此，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是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不满，还经常伴随着由于社会改革而产生的暴力运动。

索　　引

本部分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页码后的 illus. 表示插图，map 表示地图，table 表示图表）

B

E

I

J

K

L

O

V

译 者 分 工

孙洪波：前言、第二部分序言、第 4 至 10 章

王晓红：导言、第一部分序言、第 1 至 3 章

郑新广：第 11 章

孙赛雄：索引

张家哲：全书译校